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艾森豪威尔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作者前言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曾是一位世界风云人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1953年至1961年为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他的显赫的军事生涯，不仅给他的总统职务带来了声誉，而且也为他带来了“美国选民的热爱和尊敬”。

艾森豪威尔于1890年出生在得克萨斯州丹尼森一个普通的劳动人民家庭。西点军校和陆军参谋学院毕业后，长期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等将军麾下从事参谋工作。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美国参谋总长乔治·马歇尔将军，根据艾森豪威尔对菲律宾的了解，就将他举荐到华盛顿总参谋部，策划在太平洋的行动。艾氏表现了突出的组织才能，能够非常老练地和诸兵种打交道。因此，马歇尔即任命他统帅在欧洲战场上的美国军队。

1942年到达英国后，他很快就被任命为进攻北非“火炬”战役的盟军总司令。1944年6月6日，欧洲第二战场开辟，他被委任为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战役的最高统帅，他凭借坚强的意志和外交策略，指挥海陆空多兵种数百万盟国部队，胜利渡海作战，为解放法国和向德国本土进军作出了重要贡献。1944年下半年，他被授予五星上将。这一军衔由国会在1946年定为终身军衔。

战争结束后，他历任美国陆军参谋长，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总统任内，艾氏继续推行杜鲁门政府制定的“冷战”政策。由于对外侵略连连受挫，1953年在国内外人民的压力下，被迫签订《朝鲜停战协定》。然而，在对华问题上，仍顽固坚持“扶蒋反华”的政策，并于1954年与蒋介石集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1957年又提出控制中东、近东的侵略扩张计划，被称为臭名昭著的“艾森豪威尔主义”。

许多评论家认为，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历“是光辉的，受人尊敬的”；但是，他在“冷战”期间作为美国的总统，所执行的政策却是“失败的，令人咒诅的”。

本书在讲他军事生涯的同时，也简述了他在总统任期内的主要经历。对于这位经历如此复杂的历史人物，笔者力求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表述，但由于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历史知识的局限，难免有不当或错误之处，敬希读者赐教。

解力夫
1990年岁末于北京

艾森豪威尔

第一章 德国人的后裔

将军出身贫寒家，德国后裔众人夸；
从小立下凌云志，艰苦磨练更风发。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生于美国开拓疆界结束之时，死于人类漫步月球之日。当他 1890 年 10 月 14 日在一间狭小的木板房呱呱落地时，他的父母正在美国西部得克萨斯州过着艰难的贫困生活。

艾森豪威尔的祖先是德国移民，他们原先居住在欧洲莱茵兰地区，属于宗教异端门诺教派。为了摆脱教派的排挤，艾森豪威尔一家迁入瑞士，1741 年又迁往北美宾夕法尼亚。他们都是一些普通的劳动者，精力充沛，刚毅顽强，在美国西部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后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祖父雅科布·艾森豪威尔，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伊丽莎白维尔担任教派首领的职务。这个教派名叫“河上兄弟”。因为教派大多数人居住在河岸上。绝大多数成员是普通农民，生活淳朴，视战争如同最深重的罪孽，这是他们的生活信条。

艾森豪威尔的祖父雅科布，生于 1862 年，后来当上了利肯谷江河教友会的牧师。他口才流利，善于做组织工作，颇得众人拥护。他讲道时，说德语，当时在江河教友会是绝无仅有的。他满脸胡须，目光炯炯，这就使他更显得威严。美国内战爆发时，雅科布还不到 40 岁。他没有参加南方同盟，因为如同大多数门诺派的教徒一样，他是一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在战争气氛极度紧张的 1863 年夏季，当南方的罗伯特·李将军率领弗吉尼亚北部的军队经过离艾森豪威尔家乡 20 英里的地方葛底斯堡挺进时，他的妻子正身怀六甲。就在大战爆发后 12 个星期，丽贝卡生下儿子戴维，他后来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父亲。雅科布把 1865 年生下的第二个儿子取了一个和阿伯拉罕·林肯同样的名字。雅科布和丽贝卡夫妇一共生了 14 个孩子。

“河上兄弟”的生活相当闭塞，与世隔绝。但是内战结束后，随着铁路线不断向大平原延伸，西部向人们发出了召唤。到了 19 世纪 70 年代，在“河上兄弟”中间开始掀起了迁往西部的运动。

西部最肥沃的处女地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他们。在教派的许多成员看来，这里展现出可以过安定和富裕生活的无限美好的前景。1878 年雅科布也被络绎不绝蜂拥而去的移民所吸引，带着全家离开了呆惯了的地方，随着众教徒前往遥远的堪萨斯。在 1861 年至 1865 年流血的国内战争后，堪萨斯的大门为北部和东部来的移民敞开。

艾森豪威尔一家与“河上兄弟”一样，定居在斯莫基希尔河的南岸、迪金森区肥沃的土地上。从宾夕法尼亚迁来的“河上兄弟”是当时相当大的宗教团体，有数百人之多。迁来之后不久，他们就在利康普顿创建了自己的学校。

雅科布带着全家在迪金森县定居后，雅科布买了一座占地 160 英亩的农场，造了一幢房子、一座谷仓和一架风车。他们全家迁至堪萨斯时，他的长子戴维正好 14 岁。为了使农场获得好收成，戴维和父亲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干。戴维厌恶这种没完没了的犁地、锄草的农活。农场生活中使戴维唯一感兴趣的是修理机器。他决定当一名正式的工程师以脱离农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对父亲说他要上大学念书。雅科布表示反对。他说种田是上帝的活儿，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把戴维留在农场里。后来，经过戴维反复地要求，

雅科布终于屈服了。他答应出钱让戴维进堪萨斯州兰康普顿的一所不大的学校。该校是江河教友会办的，在当时颇为骄傲地被称为兰恩大学。那儿既教授传统学科，又进行职业培训。戴维于 1883 年秋季进入兰恩大学，时年 20 岁。他在那儿学习了力学、数学、希腊文、修辞学以及书法。他打算将来开创一番新的事业，不再依靠父母，走自力更生之路。

1884 年，即第二学年开始时，22 岁的艾达·斯多佛也进了兰恩大学，她的出身和戴维相似，也是江河教友会的会员。她家于 1730 年由来因迁至美国，定居在宾夕法尼亚的边区，此后又向南顺着谢南多亚河谷迁到弗吉尼亚的悉尼山。1862 年艾达就出生在这儿。幼年丧失父母，她随叔父毕利·林克在一起生活了九年，她天资聪敏，信仰虔诚，把时间都花在书本和背诵经文上。当艾达 21 岁时，林克把她父亲遗留下来的一小笔财产交付给她。她用其中的一些钱买了火车票去堪萨斯，剩下的钱用来支付兰恩大学的学费。在大学里她结识了戴维，并爱上了他。这对年轻人的炽热感情，压倒了自己的抱负。他俩于 1885 年 9 月 23 日在兰恩大学的教堂里结了婚。“就母亲这一方面而言，”她的一个儿子后来说，“或许是不幸的，她没有毕业就遇上了戴维，结了婚，生儿育女，并开始挑起家庭担子。”

年轻的艾达，性格开朗，容貌端庄。她有一头金黄色的秀发，丰满的嘴唇，总是笑容可掬，宛如堪萨斯的草原和阳光那样开阔明亮。音乐和宗教是她最大的精神寄托。婚后不久，她就用遗产中剩下的最后一笔钱购置了一台乌木钢琴。她喜欢弹钢琴和唱赞美诗。她在笑后最引人注意的特征，是两眼闪闪发光，这种显示出自然大方和愉快活跃的闪光，弥补了戴维的沉静和严肃。

雅科布按原定计划赠给戴维现款 2000 美元和一座占地 160 英亩的农场作为婚礼。结婚中断了新婚夫妇的学业。传教士的儿子无意经营农场，年轻的戴维变卖了父亲赠给的土地，加上 2000 元，与人合伙做起了生意，在小镇开了个店铺，字号是意味深长的“希望”。年轻的店东亲自站柜台，接待顾客。但是戴维不走运。过了两年，到了 1888 年，经济灾难袭来了。一天早晨戴维一觉醒来，发觉他的同伙股东古德携带了大部分存货和余款逃跑了，留下的仅仅是一大堆没有付款的帐单。在古德逃得“不知去向”后的几年里，艾达一直在研究法律书籍，希望有朝一日能把古德绳之以法，不过后来并没有起诉，因为实际情况是小店的本钱也确实蚀光了。那时堪萨斯农业正值历史上最不景气的时期。麦子的价格暴跌至 15 美分一蒲式耳。戴维和古德的店铺对农民都是赊销，美国的一般店铺当时大部分是这样做的。农民们无力偿付欠款。“希望”杂货店遭到的失败是经济恶化的结果。经商彻底失败了。戴维把全部财产交付给当地的一名律师，委托他收回所有拖欠的帐款偿还债务，余款则不管多少全部给他。结果心地不善的律师将主顾赊欠的货款收齐之后，竟携款潜逃了。戴维想在经商方面找出路的希望，经受了第二次的打击。从此他不再搞类似的尝试了。女主人艾达帮助年轻的家庭经受住了命运的打击。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说：“父亲两次破产，每次母亲只是微微一笑，更加努力工作，帮助父亲渡难关，从而使这只破败的小船没有沉沦下去。”

在“希望”杂货店倒闭时，艾达又怀孕了。在丈夫寻找工作时，她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戴维在得克萨斯的铁路上找到了一份工作，周薪十美元。1889 年 1 月，即在埃德加出生不久，艾达领着两个孩子到得克萨斯的丹尼森与戴维住在一

起。他们在铁路旁租了一栋比棚屋好不了多少的木板屋住下。在 1890 年 10 月 14 日，名叫戴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第三个儿子降生了，也就是未来的美国第三十四届总统。

在德怀特呱呱落地时，他的双亲除了日常穿的衣服和一些简单的日用品外，一无所有。他们已把一笔可观的遗产花费殆尽。这时，他们有了三个孩子，而发财致富的机会却极为渺茫。但他们身体健康，对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充满信心。后来在友人的帮助下，戴维在阿比伦一家食品厂找到一份机修工的工作，月薪 50 美元。从此全家又迁回阿比伦。当艾森豪威尔一家踏上阿比伦的火车站时，全家口袋里只剩下 24 美元了。

1891 年，艾森豪威尔一家回到堪萨斯，定居在阿比伦城。在 19 世纪的最后十年间，阿比伦有 5000 居民。不久前修建的铁路把这个城市一分为二。艾森豪威尔家简陋的木板房所在的城市南部，住的是当地的贫民百姓和新迁来的无家可归的移民；殷实的市民则安居在阿比伦北部设备比较完善的私宅中。

阿比伦市民过的是美国穷乡僻壤的闭塞生活。阿比伦只靠一条铁路与外界发生联系。这里土地肥沃，它慷慨地为贫穷而勤劳的人们提供了赖以生存的条件，但这里也绝不是理想的天国。夏天，气温通常在摄氏 40 度以上，倾盆大雨把城市的街道变得无法通行，飓风时常毁坏庄稼和掀掉屋顶；而冬季，这个在广袤草原中的小城市被笼罩在零下 20 度的严寒之中。

当艾森豪威尔一家迁移到这里的时候，阿比伦已经和 1867 至 1871 年期间的牛仔旅店大不相同了。现在它是铁路的终点站，在美国西部开发史上起过特殊的作用。大批畜群被赶到这里，装进车厢，继续运往东部。经阿比伦运往东部的牲畜有 300 多万头。赚了钱的牛仔沉湎于有西部粗犷、狂暴特色的传统的娱乐。沙龙和妓院日夜营业。酗酒、动刀子斗殴和疯狂的牲口贩子们之间的对射，司空见惯。这一切使阿比伦的居民担惊受怕。据美国当时报刊报道，阿比伦的亡命徒比美国任何一个城市都多。阿比伦的最早几个警察局长都是被击毙或是被赶跑的。

阿比伦的治安史，记载了一位外号叫比尔的希科克的英雄。这位反对奴隶主的国内战争的参加者，成了开拓西部的传奇式的人物。这位新上任的警察局长精通枪法，能双手以惊人的速度命中抛向空中的钱币。为了捉拿盗匪，他经常腰插两支左轮手枪，出没在阿比伦的街头。当比尔有一次用枪打死两个向相反方向逃窜的匪徒时，目击者断定警察局长的双枪是同时射击，融成了一响。

这使得比尔在这个饱经沧桑的阿比伦博得了热烈的赞扬。比尔在这个城镇任职期间，他亲手击毙 50 多名被通缉的罪犯。比尔这个惊人的职业结局是符合美国牛仔的标准的：1870 年他在南达科特打扑克时，后脑中枪身亡——死于匪徒报复。

在阿比伦保持着开拓西部的暴风雨时代的传统。年轻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到这种传统的熏陶。他的所有的传记作者都提到这一点：他一生对西部小说始终深感兴趣。

如今在阿比伦这座现代化的城镇，还保存一个类似博物馆保护区的“古城”。沉重的大门通往小院的深处，周围是具有 19 世纪美国西部建筑式样的独特的矮小木屋。在古城境内甚至还有沙龙，在这里能以相当便宜的价格吃一顿便餐。这是以广大顾客为对象的当代美国风味菜肴。每逢星期日还为旅

游者举行“射击”表演。

表演开始俞，一些体格匀称的小伙子，不顾酷暑和潮湿，穿着传统的牛仔服装，宽腰带束得紧紧的，腰带上佩着上个世纪样式的沉重的柯式手枪。射击的参加者拄着陈旧的文柴斯太尔式来福枪，与观众亲切交谈。表演开始了，“牛仔们”轻松地越过巨大的围墙，从一个房顶跳上另一个房顶，向“古城”的沙龙和其他建筑物冲击。参加表演的“伤者”和“死者”从三四米高的木屋上跌落下来。古城被一团团硝烟所笼罩。当硝烟消散时，地上、房顶、棚顶和围墙上“尸体”横陈，这是些敢于冒险扰乱阿比伦治安的“匪徒”的尸体。随后，人们抬来了棺材，获胜的警察局长把倒下的“敌人尸体”放进棺木。警长对着暴徒头目的棺材发表简短的讲话。讲话的要点是，虽说杰姆是个匪徒，但他是个勇敢的豪迈的汉子。深表同情的警长把一束美丽的鲜花放进敞开的棺材里。观众兴高采烈地鼓掌和吹口哨，对表演者的高超技艺赞不绝口。

且说艾森豪威尔一家自迁到阿比伦后，在东南第二街祖赁了一幢狭窄的木屋，继续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父亲菲薄的工资刚够买最必需的物品，而供养的人口越来越多。

1892年母亲生了四弟罗伊，1894年生了五弟波尔，1898年生了六弟厄尔，最后于1899年生了七弟米尔顿。当得知命运又赏给他一个儿子而不是女儿之后，失望的父亲走出家门，久久地在城郊徘徊，使心情稍稍平静下来。五弟波尔幼年死于猩红热，而其他的兄弟长得结实、健壮，胃口好得出奇。维持大家庭的温饱已成为一个大问题。父母无力娇惯孩子。

1898年，在艾森豪威尔一家生活中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戴维和艾达带着孩子们迁到阿比伦东南街的一幢两层楼的住宅，周围还有三英亩的园地。这所住宅是戴维的兄弟阿弗拉姆借给他们的。阿弗拉姆已经迁居西部，他的兽医业务在那里很兴旺。迁入新居，大大改善了艾森豪威尔一家的生活条件。在年仅七岁的德怀特、他的兄弟和双亲看来，这幢房屋不啻是座宫殿，它有一个地下室、两层住房和一个顶楼。前客厅可放置艾达的那架钢琴，屋后有座牲口棚，上面可堆放草料，下面饲养家畜。他们买了一匹马用以耕地和拉车，两头母牛用来产奶，养了些鸡、鸭、猪、兔等提供蛋类和肉食，还有一间熏房用来熏肉，三英亩的土地除去种植饲料外，余下的空地足够辟出一块很大的菜地。菜园里长着樱桃、梨和苹果，还有一个葡萄棚。每个孩子，包括1899年出生的最小的弟弟米尔顿在内，都分到了一小块菜地。收获后，弟兄们推着车子挨家挨户去兜售。农场由艾达经营，她把生产的水果、蔬菜和肉类装罐贮藏。除了像盐和面粉那些基本必需品外，他们用不着上食品杂货店去了。家庭生活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艾森豪威尔一家深受镇上居民的尊敬。他们自食其力，乐于助人，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还清了一切债务，戴维夫妇对孩子们管教很严，教育他们热爱劳动，反对好逸恶劳。艾森豪威尔兄弟们的责任范围随着他们年岁的增长而扩大。每个兄长轮流值班，值日时应该4点半钟起床，之后，备马送父亲上班。德怀特干这些活是很勉强的，因为要他每天早晨醒来很费劲。几个兄弟自幼就养成做任何事情都要干好的习惯。家规是很严的，如果孩子中有谁干活干得不好，即使时间已经很晚了，也要打发去重做，直到干好为止。

在家中，母亲起着重要的作用。她不仅肩负着操劳家务的重担，而且还腾出时间和匀出精力帮助更加困难的人们。宗教团体的成员经常有人，甚至

在夜晚来敲艾森豪威尔家的大门，诉说发生的不幸，要艾达·艾森豪威尔出个主意和给予帮助。艾达从不拒绝。埃德加回忆说：“我晚上起来过许多次，在暴风雪和下雨天，提着灯和母亲到患病与需要帮助的邻居家里去。”

艾森豪威尔一家，笃信宗教。膜拜上帝是艾森豪威尔一家生活的中心。每天早晚两次，全家都双膝跪下祈祷；每次就餐前，由戴维朗读《圣经》，接着便祈求上帝降福。正餐后，戴维又拿出《圣经》来读。当孩子们都长大后，就由大家轮流读。艾达组织沃奇托尔团体的读经班学生们的集会，每星期天在她的客厅举行。艾达弹着钢琴领唱。戴维和艾达从不吸烟或饮酒，不打牌，不骂人，也不赌博。但他们并不强求孩子们和他们一样。

戴维是个有学问、博览群书的人。他熟练掌握英语和德语，能流畅地阅读希腊文书籍。他做事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身教胜过言教，对孩子们定有严明的纪律。有人说，戴维是位典型的德国父亲，是不容置疑的一家之主。他严峻，脾气急躁，令人望而生畏，但他从不打骂孩子。艾森豪威尔弟兄们回忆说，他们从未听到过父母亲互相大声呵斥，甚至连提高嗓门说话的事也没有过。德怀特说，他从未听到父母在家庭、社会或经济问题上有过争论。理由很简单，戴维作出的决定，艾达全部接受，样样事都按他的要求办。她助长了他的自负心理，一家人都围着他转。孩子们一长大，就轮流在五时起床把厨房里的炉火生旺，给父亲准备早餐。他们把热气腾腾的午饭送到乳品厂。当晚上戴维回到家里时，艾达已把晚饭准备停当。孩子们把碗碟洗刷完毕后，大家就围着他一起读《圣经》。“最后睡觉的时间到了，”厄尔回忆说，“这时父亲便站起来给墙上的那台时钟上发条，就该准备去睡觉了，这是睡觉时间到了的信号。”

在艾森豪威尔家里，反战情绪是十分强烈的。这种和平主义的根源在于“河上兄弟”的宗教观点。他们认为战争是最该受咒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回忆说，母亲仇视战争，她说战争“能把人变成野兽”。艾达·艾森豪威尔千方百计地用这种反战情绪影响她的孩子们。

戴维夫妇虽然对孩子们管教很严，但当孩子们作出重要决定的时刻，从不向他们施加压力。德怀特刚进入中学不久，由于不慎，在一次上体育课时，他的膝盖受了伤。过了一些时候，透入骨髓的剧痛使他卧床不起。腿部渐渐肿起来，德怀特开始发高烧。诊断结果并不能令人宽慰：是血中毒。医生认为只有立即截肢才能挽救病人生命。德怀特断然拒绝截肢手术，表示宁死不做残废人。医生还是坚持自己的解决办法，说延误时间必然导致死亡。的确病人的病情越来越危险。德怀特在失去知觉前，曾要求他的二哥埃德加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前，以防在他昏迷时被做截肢手术。

医生则警告他的双亲说，只要肿到骨盆部位，生命就无法挽救。大家都望着埃德加。埃德加说：“我们没有权利使德怀特成为残废人。”

如果我违背诺言，他将永远不能原谅我。”双亲被迫对医生说，他们不能代替儿子作出决定。只得寄希望于出现奇迹。奇迹果然发生了。结实、年轻的肌体战胜了疾病，德怀特的健康开始慢慢地得到恢复。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从小就具有坚强的意志，充满青春活力，是同龄人中最优秀的运动员之一，所以他无法容忍作残废人的命运。按照西部的传统，体力和大无畏精神是任何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所必需具备的品质。在阿比伦，人们都神圣地信守这种传统。

艾森豪威尔的许多传记作者都提到他在13岁时参加阿比伦青少年拳击

比赛的事。这场拳击，是 1903 年在德怀特与他北部的对手之间展开的。这时对他这个优秀运动员来说，是保卫南部荣誉的时刻来到了。比赛一开始，大家认为小艾克 获胜的希望并不很大。德怀特的对手、北部的拳击冠军梅里菲尔德是个反应灵敏、身材不高而结实健壮的年轻人。德怀特竭力进攻，但立即被准确的，迎面而来的拳头阻止住。经过半个小时的对打，两个年轻人都开始泄气了。一个小时后，小艾克的眼睛由于严重淤血而肿了起来，拳击手们开始气喘吁吁，嗓音嘶哑。先前热烈鼓掌的观众保持沉默。鏖战持续到天黑才告罢休。两个参加拳击的人几乎已经动弹不得，用双臂久久地相互抱住对方。谁也不愿让步。艾克被打得很厉害，以致在家躺着休息了三天。他懂得了在生活中应该具有比忍耐力更重要的东西。要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为此需要付出代价。

在同梅里菲尔德决赛之后，双亲既没有训斥他，也没有惩罚他。担惊受怕的母亲得知他参加的是正当的拳击赛，也就放心了；而且对这件事情的态度还是支持的，她认为在这种环境中能使孩子的性格得到锻炼。

在当地社会风尚的影响下，艾森豪威尔从小就崇拜英雄。在他家的对面住着一位名叫达布利的单身汉。据说，他在青年时代曾是著名警察局长比尔的助手，他对往事的追述简直把年轻的德怀特迷住了。德怀特常常同达布利和市警察局长亨尼·恩格尔一起到郊外去，看他们练习射击。有时他得以实现所有孩子的夙愿——用真枪射击。但是，德怀特比较崇尚的人物是鲍勃·戴维斯，鲍勃多年旅行，做过向导、猎人、渔夫，而且还是一位通达世理的“哲学家”。艾森豪威尔回忆说：“鲍勃是我真正的生活老师。”他教他的年轻朋友驾舟、撒网、判定方位。德怀特经父母的同意和他一起在河上度过休息日，在这里，艾森豪威尔还跟自己的“老师”“学了打扑克的门径。鲍勃是个文盲，但对玩扑克十分精通。他遇到的是个机灵的学生。德怀特很快掌握了这种风行的玩意儿的全部奥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打扑克技艺达到高度熟练的程度，德怀特一生酷爱玩牌。这给他的政敌提供了根据，说艾森豪威尔总统常常把打扑克、玩桥牌、打高尔夫球看得比处理政务还重要。

在整个青少年时代，艾森豪威尔最感兴趣的课就是军事史。他沉浸在军事史的阅读中，竟疏忽了家务事和学校的功课。他花在这方面的精力和时间之多，使他的母亲感到不安。她把他的军事史书藏在柜子里，但是，他找到了钥匙，每当母亲上城里去买东西或到她的小菜园去干活时，他就把书偷出来。这些书籍详尽地描述了希腊和罗马的战争，他读得入了迷。但并不是在当时就立志有朝一日要踏着亚历山大或凯撒的足迹前进。到了 20 岁以后，才产生了投身于军事生涯的念头，他喜爱战争故事。谁发起攻击？何时何地？从哪一翼？谁是英雄？建立了哪些功绩？他对英雄的事迹赞叹不已。艾森豪威尔最崇拜的军事统帅是汉尼拔和拿破仑。后来他学了美国革命史，对华盛顿也非常钦佩。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他的历史知识在全班、甚至全校名列前茅，因而他那一届的毕业年鉴预言，他将来会当上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

艾森豪威尔对体育也非常爱好，特别是参加橄榄球和垒球运动几乎是 he 生活的中心。除上课以外，他花在运动上的时间最多，他是一名很好的运动员，但并不出类拔萃。他很全面，不过跑得比较慢，体重 150 磅。他最可贵的是取胜的意志。他喜爱运动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他喜欢同年纪比他大、

个子比他高的人争高低。当他一垒打得分或者对方主力队员被半途截杀而失分时，他便会高兴得格格发笑。

他球打得越多，就越懂得整体配合的重要性。他关心的是赢得比赛的胜利。他是一个相信自己能力的自信的队员。像所有态度认真的运动员一样，他严格要求自己，深知自己的缺点所在。每当球队输球时，他总是引咎自责，而赢球时，他则赞扬全体队员。在体育运动方面他具有优秀的组织才能，后来他成为阿比伦中学体育联合会组织者之一。该会在学校之外独立活动。每月会费 25 美分。联合会用这笔钱去买球棒、垒球、球衣等。德怀特写信给该地区的各个学校安排日程，并让队员们挤上免费货车，解决从阿比伦到比赛地点的交通问题。在最后一年的时候，他被推选为阿比伦中学体育联合会的主席。在年鉴的年终报告里他写道：“我们起草了联合会的章程，健全了组织，使之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团体。剩下的只是每年改选一下新的工作人员。”他制订的章程缜密完备，40 年后仍在用。

少年时代迅速流逝，文森豪威尔即将中学毕业。随着毕业考试的临近，他对学习表现出愈益浓厚的兴趣。他中学毕业的成绩并不坏，取得了相当高的分数。其中数学、历史、英语的成绩特别好，在 31 名毕业生中，未来总统的成绩名列第三。

到了 1909 年 5 月，艾森豪威尔和他的二哥埃德加同时中学毕业了。埃德加想上密歇根大学攻读法律，可是父亲仍然不相信一个律师会是正直诚实的人，并对他说，如果他上堪萨斯大学学医，“我将负担你的全部费用，要是在密歇根大学学法律，那你只能靠自己了”。不管怎样，埃德加还是决定去密歇根。“接着我和德怀特一起商量，”埃德加追述说，“我们商定第一年我先上大学念书。他去工作并把钱接济我；接着由我去工作，把钱给他，让他读大学。”这年夏天，这两个孩子都去工作挣钱。埃德加在乳制品厂工作，德怀特则干着装运马口铁的活。9 月，埃德加离开阿比伦前去大学读书，德怀特接替了他在乳制品厂的工作，先制冰，后来当司炉工。最后他当上了夜班管理员，从下午 6 时一直工作到早晨 6 时，一星期干 7 天，每月攒 90 美元，几乎和他父亲的收入相当。经过一年的艰苦劳动，不仅解决了埃德加的入学费用问题，而且还给家庭提供了少量的补助。

1910 年夏天，德怀特开始和镇上一名医生的儿子埃弗雷特·斯韦德·黑兹利特交上了朋友。斯韦德得到了投考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军官学校的提名，但是在 1910 年 6 月的一次考试中他的数学不及格。他回家苦读一年，准备下一年 6 月重新参加考试。他与德怀特结成了莫逆之交，他们终身保持着这种友谊。

艾森豪威尔选择决定他以后命运的职业一事，应归功于斯韦德。斯韦德建议德怀特进西点军校。一来这座学校名望大，是美国将军的摇篮；二来可以免费受教育，这对德怀特来说可以解除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德怀特决心一下，经过一段顽强的学习准备，终于考试合格，艾森豪威尔成了西点军校的士官生。

当德怀特将他被西点军校录取的好消息告诉母亲时，他第一次见到她流泪了。过了五个月，1911 年 6 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告别了家庭，告别了朋友，告别了阿比伦，向着他既定的目标走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章 在西点军校

西点军校是摇篮，将军发奋勇登攀；
循规蹈矩按法典，刻苦练就铁打汉。

从阿比伦到西点军校，乘火车需要三天的时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坐在东去的火车上，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从今以后，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了，他已经是堂堂的军人了。今后他个人的命运，已经和美国军队的命运，美利坚合众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西点军校坐落在纽约市北部 80 公里的西点镇，成立于 1802 年 7 月，正是在美国第三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任期内（1801—1809 年）。当时美国刚独立不久，执政的资产阶级出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独立的需要，创建了这座以培养陆军军官为主的高等学校。起初，学员主要由国家总统和国会议员推荐，后来改为招考。建校 180 多年来，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军事人才。美国的高级将领多半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

当艾森豪威尔刚进入西点军校时，新生们正分别办理入学手续和接受严格的队列训练。在炎热的阳光下，学员们在操场上排成方阵，跟随着教官的口令认真地操练。“挺胸！收腹！再挺一些！再挺一些！头抬高！下巴往里收！动作快！动作快！”迟到的一些学员，正奔波穿梭于各座大楼，缴费，领被褥，搬进比斯特兵营的卧室，他们发现，当他们向平民生活告别时，甚至与他们的名字也告别了。现在他们都成了真正的美国军人。

初来西点，艾森豪威尔对这里的一切都不习惯。他对这座最高军事学府的观感也是好坏参半。他最不满意的是高年级学员对低年级学生的戏弄和污辱。他们强迫新生做供他们取笑的各种动作和背诵无聊的故事和诗篇。有些新生简直无法忍受。艾森豪威尔同寝室的一位来自堪萨斯的学员，年龄 17 岁，他离开家乡时是由乐队吹吹打打送上火车的。在比斯特兵营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他可实在受不了。他在第一天晚上便哭泣不已，以后夜夜如此。艾森豪威尔向他指出其他千百人能经受考验，他也能经受住考验。但那位同室同学呜咽他说，“我再也受不了了！”不久他便离开西点军校。

给艾森豪威尔留下深刻印象的另一个侧面是：礼仪，传统，参加正式学员行列，军人的天职。就在 1911 年 6 月 14 日入学第一天，当他和其他 264 名新生，一起站在检阅场上列队观看军校学员操练时，他就感到了军人的英姿。学员们军服笔挺地踏着军乐的节拍威武地行进着，就像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情景在当时是，而且永远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当艾森豪威尔宣誓效忠祖国，成为美国陆军一分子时，他感到“美利坚合众国”这几个字有了新的涵义，自那时起他将为自己的祖国服务。这是个庄严的时刻，艾森豪威尔始终珍视这个时刻。

西点军校崇尚过去的历史，为了对学生进行爱军爱校的教育，学校建立了由西点毕业的名将纪念室。这里有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担任过总司令、后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的格兰特将军，有在南北战争时期担任过南方军队司令的罗伯特·李将军，有在北方军队中担任西线总指挥的谢尔曼将军。军校还有在西点任教多年的美国名将温菲尔德·斯科特的坟墓，艾森豪威尔参观过这些名将的纪念室和坟墓之后深受感动，特别是格兰特将军的事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将军，在南北战争期间，作为联邦军队的司

令表现了突出的领导才干。他是 1868 年共和党竞选总统的合理的候选人。他在接受提名时呼吁说：“让我们实现和平。”

西点名将纪念馆详细介绍了格兰特的生平事迹。最使艾森豪威尔感兴趣的是，这位将军并非出生子名门显贵，而是有着和艾森豪威尔类似的经历。

1822 年，格兰特生于俄亥俄州的普莱曾特角的一个制革匠的家庭。小时候，他是一个腼腆的孩子，只是以驾驭马匹而闻名。他去西点军校求学是非常违背他的心愿的，毕业时他的水平在班里属于中等。他虽然把墨西哥战争看作是“强国欺负弱国所进行的最不正义的战争之一，但他却在扎卡里·泰勒麾下作战，并且佩服泰勒，仿效泰勒那种不修边幅的作风。战后，中尉格兰特同他在西点军校时一个同学的姐姐朱丽亚·登特结了婚。

1854 年，当他的家眷不在身边，单身在太平洋沿岸执行单调无味的任务期间，他离开了军队。

南北战争爆发时，他正在伊利诺斯的加利纳他父亲的皮革店工作。他痛恨农奴主的统治，从而自愿从军，参加了对南方农奴主叛乱的讨伐战争。格兰特自己并不渴望晋升为指挥员，但在他 39 岁时，这位文静、腼腆、短粗的小个子被伊利诺斯州政府任命为一个纪律松弛的志愿团的上校。他很快地把这个团训练成纪律严明的、能征善战的部队。到了 1861 年 9 月，他成了伊利诺斯州的凯罗所指挥的部队的一名陆军准将。他回到军队后，三年内就成了联邦的陆军总司令，八年内成了美国总统。

格兰特具有卓越的指挥才能，他的最大的特点是：冷静、沉着。在紧要关头，他总是他周围所有的人都想依赖的一个人。他是一位判断极为精确、运用战术极为熟练的人。当战役的紧要关头，格兰特认识到控制密西西比河谷的重要性。

1862 年 2 月，他沿田纳西河而上，开始实现这一目标。他占领了亨利要塞，然后进攻坎伯兰河上的多尼尔逊要塞。当南部联邦司令要求停战时，格兰特回答说：“除了立即无条件投降之外，任何条件都不能接受。”南部联邦军队投降了，林肯把格兰特提升为陆军少将。

同年 4 月 6 日到 7 日，在夏伊洛的阴暗的森林中，格兰特打了在西部最残酷的一仗，获得险胜。有人要求撤换格兰特，林肯总统却这样回答说：“我离不开这个人，他能打仗。”不久，通向维克斯堡的道路打通了。格兰特熟练而巧妙地调动部队夺得密西西比河上这座重镇，这样就把南部联邦切成两半。

1863 年 7 月 4 日，维克斯堡投降了。1863 年 11 月，格兰特的部队进攻了望山和传教岭，粉碎了南部联邦对查塔努加的控制，开辟了向南部纵深挺进的道路。林肯发现格兰特具有当最高司令员的才能，于 1864 年 3 月任命他为最高统帅。总统在颁发这项任命时说：“国家信任你，因此，以上帝的名义，国家一定支持你。”

格兰特纵观整个战局，指挥威廉·T·谢尔曼向南部挺进，而他自己则留在波托马克河的乔治·G·米德的军队里，这支军队当时正在北弗吉尼亚牵制罗伯特·E·李的部队。在弗吉尼亚经过一年的战斗，格兰特迫使罗伯特·李投降。1865 年 4 月 9 日，在阿波马托克斯县政府所在地，格兰特书写了一份宽大的投降条款，免除对叛国罪进行审判。格兰特在南北战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对维护年轻共和国的统一和独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艾森豪威尔看了格兰特的事迹介绍十分感动，他决心以格兰特为榜样，

刻苦锻炼，严格要求自己。他在军校过的几乎是斯巴达式的生活。住房冬天像冰窖，夏天像火炉，食物粗糙无味，不断进行操练，余下的时间就用来背诵功课。军校的首要目标，是培养学生具有“真正军人的品质”。为此目的，西点把学员塑造、锤炼成基督绅士和军官的固定模式。一切行动都要循规蹈矩。学员从清晨醒来时起，一直到最后闭眼睡觉止，一天的生活都有严格的安排。当普通大学正在摆脱 19 世纪传统的约束时，西点还是牢牢抱住传统不放。正当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风尚以及技术方面经历着急剧的变化时，西点的督学休·斯科特解释说：“西点不是改革对象，西点在它的壮丽的道路上前进，安全地向前进，不需要剧烈地变革。”艾森豪威尔的曾任美国空军参谋长的同学亨利·阿诺德将军回忆他在西点的学员生活时说：“我们按照法规，按照从格兰特当学员时起，一直没有改变的每天规定的老一套生活着。”

艾森豪威尔进入西点军校时，身高 5 英尺 10.5 英寸，是最魁梧的年轻人之一。他被编进高身材的士官生才能进入的干训队。这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艾森豪威尔从进入西点军校的最初时刻起，就表现出自己是个优秀的运动员。由于在军校非常流行的运动中取得了成就，他在同学中享有威望。在这方面，他那能使周围的人对他产生好感和能与具有各种观点、志趣和性格的人建立并加强联系的能力，帮了他不少的忙。

他在西点军校找到了他所向往的东西。在进入军校时，在他面前展现出从事体育运动的锦绣前程。1912 年的足球季节里，德怀特首先参加了足球大赛，为低年级的球队赢了球。艾森豪威尔的初次上场就引起了美国足球运动专家们的注意。艾森豪威尔被吸收参加美军联队。一些报纸都“预测艾克将闻名全国”，德怀特对拳击、摔跤、击剑、游泳等运动项目也有良好成绩。人们对这位意志坚强、刚毅的士官生的评价是，“如果有必要的话，他可泅水横渡英吉利海峡，与敌人短兵相接”。

足球是艾森豪威尔第一和最喜爱的体育项目。他的名字和肖像刊登在所有的体育报刊上。当军联队与印第安人进行比赛时，艾森豪威尔可与当时的神奇人物吉姆·托恩对阵。“堪萨斯的旋风”、“堪萨斯的龙卷风”等美名不时出现在向读者介绍有德怀特参加的球赛情况的美国许多报刊、杂志上。对这位新出现的运动员的看法是一致的。一颗足坛新星升起来了，不只是美军的，而且也是全国的。

艾森豪威尔球运亨通，但好景不长。在一场比赛中他膝部受重创，被抬下球场，在医院躺了 30 天。西点军校的外科大夫塞勒在让他出院时，警告他今后必须谨慎，并时刻记住膝部受过伤。德怀特离开医院时真诚地感谢大夫的精心治疗和忠告。“不必感谢我，”塞勒回答说，“我这样做是工作需要。我们不能失去像你这样的前卫。”但是，艾森豪威尔仍然不得不与足球告别，他回到连队不久，就同其他士官生一起参加练习骑马术。别的士官生在疾驰中潇洒地跳下马来，随即又迅速地跃上马鞍。而他骑在马上不慌不忙地绕了一圈又一圈。就在不远处的教练，并不想弄清楚艾克行动失常的原因，却当众侮辱他，说他是装假。德怀特盛怒之下一言不发，开始做难度大的骑马动作。剧痛立即透入膝盖。同学们将艾森豪威尔从练马场扶进医院。这是艾森豪威尔足球职业的终结，并且几乎断送了他的军人前途。两年半后，在进行毕业前体格检查时，塞勒大夫对于德怀特是否适宜于服兵役表示十分担心。

重伤使他不能再参加足球运动，但艾森豪威尔还没有放弃打棒球。游泳、

做体操等项活动。据他儿子约翰说，艾森豪威尔在中年时仍能在双杠上轻松自如地做只有专业运动员能做的最复杂的动作，甚至在50岁后能打一手好网球。在年迈时仍是个高尔夫球迷。

大干一番足球事业的理想的破灭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他在校学习期间精神上受到的最沉重的打击。还发生了一些不大愉快的事。在第一学年期末，他在服役的阶梯上刚迈出了第一步，授予他军士衔。但是很快又因为纪律松弛降为士兵。更严重的是，由受伤引起的心理上的创伤。如果说，他在班上212名学员中以第五十七名的成绩修完第一学年的话，那么第二学年他在班上留下的177名士官生中，只是第八十一名了。艾森豪威尔所在的那个班级，后来成为西点历史上最有名的“名星辈出的班级”。在1915年班上有164名同学毕业。其中有59名获得准将或准将以上军衔，3名获得上将军衔，2名获得五星上将军衔。其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当上了美国陆军总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在1915年《榴弹炮》年鉴上这样介绍他的这位同学说：“布雷德利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誓获成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根据西点军校的规定，1913年，艾森豪威尔可以享受回家一个月的假期。这是他一生中在离家长达两年后，第一次回到阿比伦。火车于晚间到达这个城市，没有人来接他，因为德怀特没有通知父母。他一口气跑完了从车站到家的不长的路程，母亲手执提灯相迎。当艾克看到母亲由于儿子突然归来而深受感动万分高兴的时候，自己也不禁激动起来。

德怀特家里发生了变化。父亲最终离开了工作多年的油坊，到不久前创建的瓦斯厂任管理人员。母亲在过去的两年间变化不大，身体虽然瘦弱，但没有什么大病，每天仍在辛苦地操劳着家务。如今，家中只剩下两个弟弟——厄尔和米尔顿。对他俩来说，艾克穿着在阿比伦先前从未见过的漂亮的士官生军服回来，简直比过节还要隆重。厄尔回忆说，德怀特是这个城市的英雄，他也乐意担当这个角色。“他竭力以自己的博学和举止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不放过身穿西点军校的军服在城里走走的机会……”

艾森豪威尔在阿比伦遇到的童年时代的朋友之一是韦斯利·梅里菲尔德，他是艾克当年决定参加这个城市的拳击冠军赛的对手。德怀特从他那里听到了在当地的一家理发馆当门卫的黑人德克·蒂勒的情况。这个身体特别健壮的年轻人是个不凡的拳击手，甚至几次去堪萨斯参加职业拳击比赛。德克毫不谦虚他说，堪萨斯的任何一个拳击手都是他手下的败将，并表示愿意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较量一番。

这两个人的较量立即招来了一大群拳击爱好者。观众中有脸上擦满肥皂的理发馆的顾客，他们深怕错过这个惊心动魄的场面。艾森豪威尔明白他面临的任務不轻。他的对手身材高大而健壮。筋肉像棒球一样在他黝黑的皮肤下滑动。何况他自己的膝盖酸痛，还绑上了弹性绷带。这次拳击完全是照章进行的。拳击者戴上手套出场，理发馆老板在场上执法，他还把全部助手带来。决胜是艰难的，第一个回合德克取得了胜利。经过奋力拼搏，德怀特终于赢得了第二个回合。最后两人握手言欢，结成拳击场上的朋友。

艾森豪威尔返回军校后，又苦攻自己的专业。西点军校除了纯军事课程外，还给学生讲授其他课程。德怀特仍像在中学时代一样，他对历史、数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一次在数学课上竟找到了解答难题的新方法，比教科书上的方法还合理。四年很快过去了，1915年6月12日是艾克结业的隆重日子。根据惯例，双亲被邀请参加军官毕业典礼。德怀特的父亲和母亲从遥远

的阿比伦来到西点军校。

在军校的四年，艾森豪威尔学到了许多东西。他首先学到了自己的专业，西点给他打下了从事军官生涯的坚实基础。他熟悉陆军的习俗、行话、传统、组织。他懂得怎样行军，怎样使用步枪和小型火炮，怎样骑马，怎样架设简单的渡桥或构筑防御工事。他精通数学和地理，物理和化学也还可以。他懂得怎样写作战命令。他知道大量有关军事史的事实。他清楚地知道，一名陆军军官应当怎样才够格。他学习的军事艺术史课程，着重介绍伟大的将领以及他们个人的特点，仔细地给军校学员们描绘出理想的军事领袖的形象。艾森豪威尔懂得，一名好的军官是具有高尚动机的人，是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祖国的人，是一位能够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善于决策的领袖。荣誉感和军人意识迫使他努力做到诚实和真诚，而憎恶欺诈、模棱两可或者闪烁其辞。作为一个军人，他重视军阶的权利和责任，对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

按着军校的教导，陆军军官应把自己看作是不过问政治的人。这是审慎的和必要的。他们的观点是，军人的职责就是接受命令，执行由总统决定的政策，决不是自己的政策。从这个前提中引导出一些推论。其中对艾森豪威尔有着最直接影响的，是政治与军官职务应泾渭分明，据 1915 年估计，在军官中参加过投票的不到百分之一。军官提名为政治职务候选人的事，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这方面的楷模是谢尔曼，而不是格兰特。

西点军校给学生灌输的又一思想，就是尊重总统的卓越地位。军官们不去考虑总统作为政党领袖的作用，而集中注意力于他担任的总司令的职务。总司令是从他开始一直伸展到士兵的这根神圣不可侵犯的指挥锁链的总头。对比之下，国会是党派的政治舞台。“如果说军校学员学到了什么信念的话，”艾森豪威尔的一位教官说，“一般他说，就是蔑视十足的政客和这些政客欺骗性的行事原则。”艾森豪威尔一生中几乎有 20 年时间在华盛顿与国会议员们共事，他一再激烈地表示他对政客们的蔑视。对他来说，就像对大多数的军官一样，喧闹和鼓噪声总是来自国会山，而下达明确命令的则是白宫。后来，艾森豪威尔背离了早期的诺言，走上了他自己曾经厌恶过的党派政客的道路。

四年学习结束后，1915 年 6 月 12 日西点军校考试委员会作出决定，授予毕业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美军尉官军衔。他在军队的前途并不特别令人乐观，因为学习结果所得的评价并不高，受重伤的膝盖也不见好转。艾森豪威尔甚至认为，对他来说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到阿根廷去，在那里当一名 20 世纪的牛仔。但是，德怀特不失为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坚信会被委派去菲律宾，甚至会得到去热带服役所需的白色制服。但是艾森豪威尔的希望落空了，不是派他去遥远的菲律宾群岛，而是到距圣安东尼奥（堪萨斯州）不远的萨姆休斯敦港口去服役。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三章 壮志难酬

西点军校四春秋，膝盖受伤志难酬；

从军本意为打仗，战机错过煞风流。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怀着“要干一番事业”的雄心离开了军校。然而，由于过去膝盖受伤，他被分配去的却是个清静悠闲的地方。壮志难酬，这使他苦恼极了。

1915年9月15日，西点军校毕业生艾森豪威尔少尉抵达服役地点休斯敦萨姆堡。这使他回到了出生地、熟悉的西部草原。对于这位年轻的少尉来说，在堪萨斯州一切几乎都像在家里一样，这里有着一望无际的辽阔地带，有着像在阿比伦一样的牛仔、气候和景观。德怀特在公务之余喜欢在广阔的草原上骑马奔驰。与同僚的交往和他十分喜爱的桥牌，暂时缓解了他对壮志难酬的苦恼。

休斯敦萨姆堡，是最令陆军羡慕的地方。因为那里的生活从容悠闲，服役意味着享福。任何能力强的军官在中午前或更早些，就可以把当天的任务完成，在余下的时间里可以到处骑马驰骋，去猎取野鸡和野鹿。可以参加愉快的社交活动：舞会，进行正式或私人拜访，单身汉联欢会，玩扑克牌。这些恰好与艾森豪威尔爱好交际的性格不谋而合。

艾森豪威尔是西点军校体育运动健将，在他本人还未到时，而他橄榄球教练的名声却早已传开。在他抵达休斯敦不久，当地的一所军事学校就聘请他当该校的橄榄球教练，比赛季节薪金150美元。艾森豪威尔推脱说，军官上午要执行任务，下午也有事要干，婉言谢绝了。隔了几天，萨姆堡要塞司令弗雷德里克·丰斯顿对他说：“如果你愿意接受聘请的话，我将非常高兴，而且对军队来说也是莫大的荣幸。”艾森豪威尔回答说：“遵命，司令。”那年秋季他就当上了教练，有了胜利的记录。在下一个1916年的比赛季节里，他被提升为大学队的教练，在圣路易斯学院任职。该校在以前五年内没有胜过一场。在艾森豪威尔的指导下，球队第一场打成平局，后连胜五场，只是在最后争夺联赛冠军时，才被击败。

后来局势发生变化，1916年至1916年冬，美国和墨西哥在边境上发生了军事冲突。就像大多数新毕业的西点军校的学生一样，艾森豪威尔申请参加约翰·潘兴将军率领的远征军。他的申请遭到了拒绝。相反，陆军部把他派到国民警卫队在边境流动的一个团去担任训练工作。不久，又调他去一个新成立的陆军正规部队的一个团，第五十六步兵团，任军需官。有3000名新兵要来到萨姆堡边上的威尔逊军营，上级给了他三天时间作接待准备。艾森豪威尔懂得在军队里办事的最基本的诀窍，他与军需主任交上朋友，于是领到了更多的帐篷、步枪、军鞋、军服等。并注意改善军队的伙食，经常深入连队听取战士们的意见，结果受到官兵们的欢迎。

就在这年秋高气爽的10月，爱情撞入艾森豪威尔的心扉。这位少尉开始恋爱了。原来德怀特并不是女性特别热烈的爱慕对象，他也不愿结婚，而且还是不喜女色者之类秘密的协会的成员。参加这个协会的除德怀特外，还有他的两个同学。但他们三人都在西点军校毕业一年之后结了婚。

说来也巧，那天是个星期天，艾森豪威尔是值星官，他身穿笔挺的新军装，皮鞋擦得光亮，挎着一支左轮手枪，从单身宿舍出来查岗。在街对面军官俱乐部的草坪上有一些女人坐在帆布椅上晒太阳。其中鲁露·哈里斯夫人，

是亨特·哈里斯少校的妻子，她看到艾森豪威尔便喊道：“艾克，怎么不过来呀，我想介绍你认识几个人。”“对不起，”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我在值勤，还没去查岗呢！”哈里斯夫人转过身来对艾森豪威尔重新喊道：“我们并不打算请你过来就把你留住不放，只要你过来一下和我的朋友见见面就行了。”

艾森豪威尔越过马路向这些女人彬彬有礼地问候。“有一位姑娘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后来回忆说，“她是一位活泼可爱的、富有吸引力的少女，个子比一般人小，脸上和仪态流露出一种愉快、潇洒的神情。”她穿着一套浆过的洁白的亚麻布套裙，戴一顶黑色的宽边帽。她刚来到得克萨斯度假，正在重访萨姆堡的许多旧友。她年方18，有两个妹妹。她的姓名是玛丽·吉尼瓦·杜德，不过大家都叫她玛咪，艾森豪威尔双肩宽阔，穿着军装容光焕发；踏着坚实的步伐从单身军官宿舍走出夹时，给她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个彪形大汉”。当他走近时，她又想，“他差不多是我见过的最漂亮的男子。”艾森豪威尔邀请她一道去查哨，她答应了。

18岁的玛咪给艾森豪威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艾克作出的决定是迅速和最后肯定了的：这个姑娘应成为他的妻子。但是这个目的并不是轻而易举能达到的。美丽而富有的玛咪有许多倾倒她的人。年轻的少尉必须能造访自己意中人的家。第二天当玛咪散步回来时，仆人报告说，“每隔15分钟就有一位姓氏不详的先生来电话。”姑娘对艾森豪威尔要求去她家拜访的建议有礼貌地回绝了。这样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艾森豪威尔热烈地追求下，姑娘终于被征眼了。艾森豪威尔喜欢杜德家所有的人，这使玛咪很高兴，因为她与母亲姐妹非常亲密，尤其崇拜父亲；而约翰·杜德也喜欢艾森豪威尔，由于膝下无子，不久就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了。艾森豪威尔非常尊重杜德夫人，即使玛咪不在家也去看望夫人，他的热情影响了杜德全家。原来除了父亲以外，杜德家的人对体育都不感兴趣，但艾森豪威尔不厌其烦地谈论他担任教练的那个球队，以至于全家也开始去观看比赛。不久连女孩子们也疯狂地为“艾克的孩子们”欢呼叫好。

1916年的情人节，玛咪接受了艾森豪威尔的求婚。当艾克正式向杜德先生提出要娶他的女儿时，他表示同意，唯一的条件是要等到11月份让玛咪满20岁才结婚。杜德是一位有钱的巨商，他告诉艾森豪威尔，婚后他们夫妻将独立生活，并告诫说，玛咪过惯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可能难以适应去当一个军人的妻子。她习惯于有女仆服侍，而且花钱随便。杜德先生对女儿也作了一次同样的谈话，向她指出，她将接受这样一种生活：一直要到处为家，经常要和丈夫分离，还时常为他担心。她回答说，她都了解，并期待着过这样的生活。

1916年春，由于欧战愈演愈烈，军队几乎进入战时状态，再加上美国参加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日益增加，艾森豪威尔和玛咪决定于1916年7月1日提前举行婚礼。杜德一家都同意这么办，就在结婚这一天，艾森豪威尔得到了与众不同的结婚礼物，他被授予中尉军衔。

婚后，杜德的司机把他俩送到科罗拉多州埃尔杜拉多温泉去度蜜月。但两天后，他俩便搭乘火车去阿比伦，与艾森豪威尔家的人见面。德怀特在此之前焦虑的是，母亲将会怎样接待这位儿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一直盼不来个亲生女儿的双亲对玛咪既热情又亲切。德怀特和玛咪清晨4时到家。戴维和艾达早已起身，正等着他们。双亲立即喜爱上玛咪，而玛咪也同样爱

上了公婆。特别是他们对她说，他们太高兴了，终于有了个媳妇。当德怀特的两个弟弟厄尔和米尔顿走下楼时，玛咪说了句使他们高兴的话：“我终于有了兄弟了！”

德怀特结婚时，世界局势正处于一个非常时期。当艾森豪威尔穿上少尉衔的军服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进行了一年。孤立主义者和反对美国参加欧洲战争的人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参战意味着美国垄断资本家能取得巨大的利润，以致这个问题在实质上早已决定了。而美国统治集团之不忙于卷入世界大战，只是认为分享战利品的时机尚未到来。

欧洲战事对美国的影响是重大的，大西洋把美国和欧洲战区相隔开，但是这种影响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领域里却在一年年地增加。美国的参战是不可避免的，在遥远的欧洲战场上的战局发展情况，迫使每个军人决定自己的地位。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决定参加空军——刚刚建立起来的崭新武装力量。他属于当时预见到空军具有远大前途，“具有实用价值”的为数不多的军人之列。

艾森豪威尔在结婚前夕接到了为参加空军进行体检的通知书。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指出的，吸引他参加空军的不只是与空军有关的新的没有体验过的事物，指导他的纯粹是平淡无奇的想法——空军军官的贡献要比步兵军官的贡献大出一倍。但是德怀特注定不能成为飞行员，在杜德的家庭会议上作出了决定，这是个冒险的职业，而且无论玛咪，还是她的双亲都同意这种看法。杜德先生直截了当地向艾森豪威尔宣布，如果他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那么杜德将收回对女儿婚姻作出的允诺。艾森豪威尔对未来岳父的建议，经过一昼夜的考虑后，他投降了，为了家庭的幸福，牺牲了当空军的愿望。这是玛咪第一次，看来也是最后一次干预了军人性格的德怀特作出的决定。

艾森豪威尔夫妇俩生活简朴。他们虽能从玛咪双亲那里得到一些物质上的支援，但是衔级较低的军官的菲薄薪响，难以保证杜德家女儿过惯了的生活条件。物质上的困难是很大的，最初在艾森豪威尔简陋的军人宿舍里，连个厨房都没有，在食堂用餐的费用对这个小家庭是个很大的负担。但是，一切都慢慢地适应了。玛咪学会了做饭，德怀特也常常显示自己的烹调手艺。夫妇过着安静、平淡的军队生活，但是不论他们到哪里，到处都能建立起“艾森豪威尔俱乐部”。容易与人相处、好结交朋友的德怀特总有许多朋友。而富有魅力的、和蔼可亲的女主人在家中创造了一个令人愉快、不受拘束的环境。入夜，同僚们总是来到艾森豪威尔家消磨时光。甚至在1917年9月24日生下长子戴维（为了纪念祖父取祖父名）后，尽管年轻的父母因有了孩子与朋友交往有所限制，但“艾森豪威尔俱乐部”仍继续存在。

1917年4月6日，美国对德宣战。在美国职业军人面前呈现出新的前景。美国参战后过了几天，艾森豪威尔被授予上尉军衔。德怀特所在的第五十六步兵团，准备渡过大洋作战。这是艾森豪威尔的宿愿。参加作战能使他“前程似锦”，并为实践所学作战艺术创造必要的条件。

艾森豪威尔为准备参加欧洲战场的战斗而紧张工作。德怀特在第五十六步兵团第一次显示出他的组织能力。艾森豪威尔的领导才能，令人信眼地表现在他的部下处于高度战斗准备状态中。距离该团开赴欧洲的日子已是屈指可数。但是1917年9月20日，他突然被派往佐治亚奥格尔索普港的军官训练营任教官。在佐治亚工作一段时间后能去前线的希望，仍没能实现。1917年12月1日他又得到了新的任命，到教导营培训军官。美国陆军极需培养后

备军官这一使命，决定了艾森豪威尔的命运。年轻上尉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容置辩的才能，未能逃过上级的注意。

艾森豪威尔一次次向陆军部请求去海外服役，全都遭到拒绝。为此，驻地司令把他召来，向他宣读了陆军部副官署署长的一封信，责备艾森豪威尔屡次要求调动。司令本人也开始责备起他来。艾森豪威尔打断了他的话。“司令，”他忿忿地说道，“我只是请求让我上战场，别无其他；看来冒犯上级的罪名——如果这也算是犯上的话——在我由您指挥之前就已经有了。如果要给我以任何惩处，也该由陆军部按情况处理，而不应劳您大驾。”司令想了一想，认为他言之有理，便派他去执行一项“特殊的训练任务”。

使艾森豪威尔感到沮丧的是，分配给他的任务是监督部队进行体育锻炼——刺杀、柔软体操和操练，这项工作甚至不如橄榄球教练那样富有对抗性和乐趣。不过他还是认真地干了，再次给上司和受训者留下了好印象。有一个受训者这样写道：“我们那位新来的上尉，名叫艾森豪威尔，我认为他是最能干、最好的陆军军官之一。他教给我们出色的刺杀功夫，他激发起大伙的想象，大声吼叫，使我们又跺脚又呐喊，直至像真的白刃战一样猛烈刺过去。”

在这之后，艾森豪威尔参加了组建美军第一批装甲部队的工作。他预见到有远大前途的不只是飞机，而且还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首次出现在战场上的坦克。德怀特面临的是，“作为美国第一支坦克部队的组织者，要在机械化战争的新时代条件下表现出自己的才能来。”

然而，当艾森豪威尔来到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的米德军营时，更大的失望取代了原来的兴高采烈。这是一座旧的、弃置不用的兵营，是伟大的南北战争的遗址。陆军部决定组建装甲部队，坦克手都在这里进行训练，由艾森豪威尔指挥。这个决定虽然符合他的心意，但初来这里，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工作困难重重。年仅27岁、又无实战经验的艾森豪威尔，负责指挥几千人，全部都是志愿兵，他将与未来的武器打交道，但这里却没有一辆真正的坦克，没有训练手册，没有有经验的坦克军官。他后来承认说：“我当时的心情是焦急的，是暗淡的。”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德怀特决心排除困难。当务之急首先是稳定部队的情绪。为此，他利用所能搞到的一切材料，把南北战争时期皮克特将军发起冲锋的古战场，从一片麦地改变成为第一流的兵营。他为部下弄来了帐篷、食品和燃料，教他们操练，建立一所通讯学校和汽车学校。

到了6月中旬，艾森豪威尔手下已拥有一万名士兵和600名军官，不过仍然一辆坦克也没有。他跑到华盛顿去同陆军部纠缠，要求拨给几门老式的海军加农炮，供部下操练使用，直至他们能熟练掌握为止。他又设法搞到了一些机枪，不久士兵们蒙着眼睛都能拆装。他把机枪安装在平板卡车上，教士兵们在活动的平台上进行射击，他把大帐篷改成靶场的后障，不久这里的火炮射击比55年前的南北战争时更猛烈。而且，战士们对坦克的性能也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

就像所有的司令官一样，艾森豪威尔也遇到士兵喝酒的麻烦事；他发现城里有一个旅馆老板违反他的命令，私下卖酒给士兵。老板答应以后不再卖了，艾森豪威尔就宽恕他一次。可是老板再次违反禁令，艾森豪威尔就派卫兵包围旅馆，这样不仅挡住了士兵，连平民百姓也不来了。旅馆老板第二天由当地议员陪着来到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艾森豪威尔拒绝撤去卫兵。那位

议员威胁说：“我们是有办法的。”他说，“我们可以到陆军部去，如果你一意孤行的话，我就不得不考虑撤换你的问题。”

“悉听尊便。”艾森豪威尔反唇相讥。那位议员惊呆了，艾森豪威尔说：“把我撤掉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了。我想到欧洲去。如果他们撤掉我在这里的职务，说不定我就可以到海外去了。”议员确实上访了陆军部，但是结果出乎他和艾森豪威尔的意料之外。艾森豪威尔收到了陆军部部长助理写来的一封信，表扬他为士兵们的利益所作出的不懈的努力。

尽管玛咪对这里的生活不感兴趣，她还是前来陪伴着丈夫，并热心地支持他的工作。由于坦克是一种新式武器，成立坦克部队也是一种试验，故而科尔特兵营吸引了各种重要人物，有议员。高级军官和工业界人士。艾森豪威尔一家便在那幢租赁来的大院里款待他们。房屋坐落在葛底斯堡学院的校园里，原先是大学生联谊会的会址。吃的是家常便饭。音乐节目是由玛咪弹奏钢琴，唱些流行歌曲；而由艾森豪威尔负责的谈话，都是关于坦克和战争的。与第一批三辆雷诺坦克一起抵达的有两名作为顾问的英国军官，他们都是坦克的热爱者，向艾森豪威尔介绍了一位名叫温斯顿·丘吉尔的英国政治家，他对生产出第一批坦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艾森豪威尔训练坦克部队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了上级的注意。1918年6月17日他被授予少校军衔，同年10月14日，他晋升为坦克军团中校。为了表彰他的工作，陆军部奖给艾森豪威尔奖章一枚。在表彰令中指出：“艾森豪威尔中校表现出了苦心孤诣、预见的才能，以及对远涉重洋作战的坦克军团全体人员进行组织、教学和训练方面的行政管理能力。”德怀特确实胜任教官的职责。

“他训练的部队以美军中最优秀的一支队伍而闻名。”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善于钻研，他不只预言这种新型部队有远大的前途，而且能正确指出坦克部队发展的途径和制订出改进坦克这种强大武器所需要的方针。艾森豪威尔在《步兵杂志》上曾写道：“坦克尚处于幼年阶段，但它们已经在技术改进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它们在这方面还可以作更多的改进。需要把动作迟钝、拙劣的战车忘掉，应有快速的、可靠的、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坦克取而代之。”

在战时身处后方的真正职业军人，不管他的工作对前方是多么重要，显然常常感到某种道义上的不满足。艾森豪威尔不时递上一份又一份的报告，坚决请求派他到作战部队去。他的请求终于如愿以偿，德怀特获得上级的批准。1918年10月14日艾森豪威尔28岁生日那天，陆军部命令他于11月18日启程去法国指挥一支装甲部队，同盟国第一次统一了指挥，由福煦元帅任最高统帅，正在为1919年春季大反攻作准备，届时将由坦克开道，艾森豪威尔乘坐在第一辆坦克上。他把妻子玛咪和儿子艾基送上去丹佛的火车后，便去纽约为他的部下作好启程的准备，保证工作不发生丝毫差错。但11月11日德国人签署了停战协定。当消息传来时，他非常沮丧，情绪十分低落。他几乎不相信自己遇上了这种事——他是一个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中失去作战机会的职业军人。他从未听到过满腔怒火地射出的枪声。他不知将来儿子问起他在战争中做了些什么时，该怎样回答。若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有参战时，只有老天爷作证。他想象同僚们在班级联谊会上谈论战争经历和战功时，他只得默默地坐着。当他在本宁堡遇到一位曾去过法国的年轻军官抱怨在那儿得不到晋升时，他怒气冲冲地打断他说，“好了，你到过欧洲，参加过第

一次世界大战，这一点就该抵得上晋升了。”

过去，艾森豪威尔整天忙于紧张的备战、训练，如今却忙于复员和收拾摊子的工作了。他心烦地处理着数千名士兵的遣散工作，拆毁科尔特兵营，把坦克部队剩余的一切——包括三辆雷诺坦克，运到佐治亚州的本宁堡。

1919年，艾拉·韦尔伯恩上校提名奖给他优秀军功勋章。奖章直到1922年才颁发下来。表彰了艾森豪威尔在训练工作中的“非凡热忱和突出的组织管理才能”。这对艾森豪威尔来说，与其说是受奖励，还不如说是对往事苦涩的回忆。

战争结束时艾森豪威尔28岁。他的雄心壮志遭到了挫折。他是实际上正在解体的组织中的一员。士兵们大批地匆忙脱下戎装，速度之快使内战结束时的退伍工作也相形见绌。不到六个月的时间，总共有260多万名士兵和12.8万多名军官收到了退伍证明书。到1920年1月1日，军队服役人数只有13万。在整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队还在继续缩减。到1935年，军队中已没有一支任何规模的、能立即投入战斗的部队。军队人数在世界上名列第十六位。

随着军队的缩减，艾森豪威尔的军阶也降了下来。

1920年7月30日，他恢复正式军阶上尉，三天后擢升为少校。他以后保持这个军衔达16年之久。美国经济日益繁荣，兄弟们个个事业发达，而艾森豪威尔却依然故我。在战争时期，尽管他没有能实现上战场的愿望，但至少他担负着重任；而在20和30年代，除了当一名橄榄球教练外，却什么也不是。在28岁至51岁之间，他呆在一支很小的军队里尽力工作。没有提升的现实希望，但他很满足。他随遇而安，集中精力尽其所能完成上级交付给他的各项任务。

在此期间，艾森豪威尔家庭还遭到重大不幸。

1921年1月2日，三岁的戴维（又名艾基）因患猩红热而夭折。孩子死在医院中德怀特的怀里。遭受丧子之痛的玛咪因严重神经性障碍卧床不起。德怀特在医院里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

在这以后的20年中，艾森豪威尔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他当了三次研究生。在巴拿马、华盛顿、巴黎和马尼拉生活过。他的家眷通常和他在一起。遗憾的是，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但是除了他不在国内，他几乎年年总是设法至少回阿比伦省亲一次。1926年时，他们几个兄弟团聚在一起，每个兄弟挣的钱都比德怀特多。阿瑟当上了在堪萨斯首屈一指的堪萨斯市银行的副总裁；埃德加是华盛顿州塔科马的名律师；罗伊在堪萨斯当药剂师；厄尔在宾夕法尼亚当工程师；小弟米尔顿是农业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好像他们的前途都比艾森豪威尔少校的光明。然而，戴维和艾达对五个儿子都一样疼爱，但也曾寄希望德怀特会时来运转。

但是，德怀特却满不在乎。全家团聚时拍摄了许多照片，每张照片上艾森豪威尔少校都显得特别健壮，肤色黝黑，充满自信，是所有男孩中看上去最神气的，显然也是身体最强壮的一个。虽然他不妒忌兄弟们所取得的成就，小时候比体力的劲头却并没有忘记。他急于找埃德加比拳击，以报复小时候挨埃德加的痛打，但是埃德加机智地避开了艾森豪威尔的挑战。还有，使艾森豪威尔感到满意的是，虽然他在经济收益方面不如他的兄弟们，但他到过的地方却比他们加在一起的还要多。而且他有着更多的学习机会，解决过更多的棘手问题，曾与更多的有趣的人打过交道。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正像他父母所希望的那样，终于时来运转，1922年他被派往巴拿马运河区，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24年9月19日。职务和任职地点是最寻常不过的，但使他走运的是，他能在美军中最有学问的将领之一、康纳将军的领导之下工作。康纳相信，“艾克很有发展前途”。将军在得出结论后，对艾森豪威尔的关注是不借时间和精力。康纳深信新的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康纳在回答战争将在什么时候发生这个问题时说：“也许要过15—20年，也许要过30年。”老将军引用了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确凿的论据。他的信心也影响了艾森豪威尔，既然战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军队服役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充实了新内容。

在巴拿马，如同服役期间德怀特所到之处一样，他们的家成了吸引同僚的中心。1923年8月3日，玛咪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名叫约翰。这时，他的家接待来客更是特别热情、亲切。德怀特是个桥牌名手，据他的许多传记作者证实，是在美国牌坛上没有能与之匹敌的对手。但是在巴拿马他不常玩牌，钻研军事论文成了他新的、更强烈的癖好。

与康纳将军的交往，使艾克受到了巨大的教益。根据将军的推荐，他阅读了大量军事著作。随后又围绕所阅读过的材料与康纳将军进行长时间和详尽的交谈。在这个过程中，博学的康纳是德怀特探索军事艺术的导师。经康纳将军推荐，艾森豪威尔少校于1925年被利文沃思港的参谋学院录取。这所学校是总参谋部的直属院校，1926年他毕业于这所当时最有权威的军事学院，学习成绩于275名学员中名列榜首。在陆军部和参谋部谈起艾森豪威尔，都认为他是个有才能和有前途的军官。上级的评语，使他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德怀特现在生活有了目标，感到自己具有进一步钻研和提高军事知识的天赋。但是他在精神上还不能得到满足，在部队服役11载，他仍然是个小小的少校。

艾森豪威尔在指挥参谋学院毕业后，经康纳将军介绍，到法国长期出差。在那里编写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参加过战斗的那些地方的手册。德怀特不止一次地到过这次大战进行过重大战役的地方。差不多过了20年，当1944—1945年艾森豪威尔指挥盟军在法国登陆时，由于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这些地方进行的战役的许多细节都记得起来，使他的同僚大为惊讶。熟悉地形有助于他在复杂的战局中作出正确的决定。

回到美国后，艾森豪威尔继续进修深造。

1928年6月艾森豪威尔从陆军大学毕业。在几乎38岁时，他才完成了一系列的军事正规教育。政府在对他的培养方面投了一大笔钱，而他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战争的准备工作中，并以此作为报答。

从1929至1933年，他在陆军部和参谋部机关任职，美国正处于世界经济危机十分艰难的岁月。自然美军军官并没有生活之虞，艾森豪威尔有固定的薪金，相当好的住宅。他远离政治，一次也没有参加投票选举。欲知他在总参谋部的工作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章 参谋长助理

世界风云起苍黄，法西斯蒂猖且狂；
二次大战烽火起，艾克心里有主张。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从欧洲回来后，就在美国陆军部和总参谋部任职，当时世界风云骤变，本平洋的复杂局势加剧了世界经济危机；在欧洲，德国法西斯上台执政。国际舞台上政治力量越来越清楚地形成新的对比。事态的发展促使已经建立的集团和联盟发生了新的变动。有一点是明显的，即如果发生世界性冲突和美国参战的话，那么美国必须解决动员美国的军事经济资源这一复杂问题。陆军部在这些年间在研究美国军事潜力方面，其中包括一旦战争开始，经济方面的情况如何，做了大量工作。

1930年秋季，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接替史沫莱尔担任参谋长。麦克阿瑟依据复杂的国际局势，表示反对政府进一步裁减兵员：他强调，国际形势的发展，“重又证明了条约是不可靠的，对于和平毫无保障可言”。同年，美国国会成立了战争政策委员会，研究“一旦发生战争时应遵循的政策”和“如何平均负担费用以及把战争牟利减至最低限度”。建立这个委员会的决议，要求委员会“研究并考虑修改宪法”。支持者谈到在战争动员时征用私人财产和征募兵员的问题。一般的希望是，政府应排除花费大量资金的、鼓动美国参战的运动。委员会由陆军部长赫尔利担任主席，其他五名内阁官员，四名参议员和四名众议员任委员。陆军部的动员计划显然是委员会关心的中心问题。麦克阿瑟得到通知，将由他负责提出迄今为止“秘密的”工业动员计划的工作。

麦克阿瑟通知艾森豪威尔和莫斯利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到1930年底他们提出了一个计划，内容包括对外贸易、征用工厂，以及成立专门的政府高级机构以对工业、人力、征兵和公共关系实行集中领导这个最重要的问题。

1931年春，委员会举行公开听证会。工业家到陆军部来预先讨论他们的证词。这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一次重要的经历。直到1930年，他对美国工业的生产能力以及组织情况都不甚了解。现在，他和工业界某些巨头进行日常的工作接触。艾森豪威尔发现，这些人都“直接反对”在战时征用一切产业的主张。艾森豪威尔出席听证会，对了解美国的国情、经济实力、资本家的心态以及各界人士对战争的态度甚有帮助。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参加这一工作的再一好处是，可直接与麦克阿瑟接触。艾森豪威尔与工业家们和谐的合作，对详细情况的掌握，行文风格以及反映上司的态度和意见的能力，给这位参谋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开始利用艾森豪威尔的才华，请他为自己起草一些演讲稿、信件和报告，并亲自任用艾森豪威尔为参谋长助理。麦克阿瑟在一份报告的批语中对这位助理备加赞扬道：“亲爱的艾森豪威尔：你完成的工作很出色，远比我本人写得精彩，深为感谢。”麦克阿瑟还在艾森豪威尔的考绩报告中说：“在军队中，在该军官的同辈中，没有一个能胜过他……在精力、判断能力和接受任务等方面尤为突出。”

麦克阿瑟是艾森豪威尔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两个领导人之一，另一个是乔治·马歇尔。能结识这两位总参谋长，并在他们手下工作，是艾森豪威尔的幸运。两人都是美国有权威的将军，他们的领导艺术截然不同，麦克阿瑟夸夸其谈，服饰华丽，以自我为中心，好吹捧、奉承人，有着强烈的党派

观念，很喜欢介入政治争论。马歇尔说话平稳，衣着保守，为人谦逊，不轻易赞扬人，严格地超党派，不愿意介入政治争论。两人都当过罗斯福的参谋长；但是，他们对军队首脑与总统的关系的看法，却大相径庭。麦克阿瑟认为军队首脑与总统之间是对抗的关系，而马歇尔则认为军队首脑对总统应持完全支持的态度。他们还在欧洲和亚洲对美国的相对重要性的根本战略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其结果之一是使军队和参谋部分成麦克阿瑟派和马歇尔派。前者主张“亚洲第一论”，后者主张欧洲问题应放在首要地位。

艾森豪威尔在 37 年的军事生涯中，有 11 年是直接在这两个人手下工作，在麦克阿瑟手下 7 年，在马歇尔手下 4 年。这两位将军都喜欢并敬重艾森豪威尔。德怀特工作做得很出色，总是按时完成。他忠诚地执行上司的决定。他在时间安排上和其他想法上都适应上司的心意。无论麦克阿瑟还是马歇尔都表扬过艾森豪威尔的这种品质。麦克阿瑟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一份鉴定报告中谈到艾森豪威尔时说：“这是军队中最好的军官。当下一场战争来到时，他应当立即登上领导岗位。”1942 年马歇尔总参谋长以推荐艾森豪威尔担任盟军欧洲远征军总司令的行动，来表明他同意上述评价。

不过，艾森豪威尔与麦克阿瑟的私人交往要比与马歇尔亲密得多。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经常互相打趣；而艾克同马歇尔则很少这样。马歇尔是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毕业的，对陆海军的体育比赛谁胜谁败不大关心，而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都毕业于西点军校和陆军参谋学院，又都是体育爱好者，因此他们对西点军校橄榄球队的胜败异常关切，每年秋季他们都热烈讨论陆海军比赛的前景和结果。艾森豪威尔和玛咪同马歇尔夫妇几乎没有什么社交往来，却经常和麦克阿瑟及其夫人琼一起参加舞会和宴会。

艾森豪威尔对麦克阿瑟的评论也比对马歇尔深刻，他在回忆录中把麦克阿瑟描绘成“果断、很有风度、知识渊博和有着非凡记忆力”的一位将军，说他把演讲稿或报告读过一遍后，便能逐字逐句地背出来。麦克阿瑟骄傲自大，脾气古怪，除了他之外，“决不能见到天上还有另一个太阳”。当麦克阿瑟在某个问题上采取了某种立场以后，他便固执地坚持这种立场，特别是涉及到陆军时。他掌握问题的全部细节，总是用合乎逻辑地摆事实的方法来坚持自己的论点。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者斯蒂芬说：“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艾森豪威尔在战时和担任总统时，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辩论中总是效法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并不像马歇尔那样去教育和训练艾森豪威尔，使其成为自己的门徒。相反，艾森豪威尔是通过观察麦克阿瑟的行动来学习他的。麦克阿瑟确实是位引人注目的人，无论他走到哪里，记者们便迫随到哪里。他发表的见解和活动常常成为报纸的头条新闻。他故意对当前最富有爆炸性的、激动人心的问题发表公开谈话。他严厉斥责共产党人、主张新政者、和平主义者、社会党人和不符合他对于百分之百的美国人所下的定义的一切政党和团体。他从不拒绝挑战，他爱好投入战斗。麦克阿瑟毫不隐讳自己的政治野心，人们都知道他和潘兴将军不一样，他愿意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麦克阿瑟是将军中最喜欢搞政治的，但从没有在政治上取得成功，麦克阿瑟爱接受有争议的问题，而艾森豪威尔则回避这些问题。注视着 30 年代的麦克阿瑟政治活动的结果，使艾森豪威尔更坚定了他“超脱政治”的决心。

1932 年发生的美国退伍军人请愿事件，是艾森豪威尔在总参谋部期间所经历的最惊心动魄的事件之一。这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战士为

要求改善物质状况举行了有名的游行进军，聚集在华盛顿街头的两万多人，他们都是失业的退伍军人，想提前领取答应在 1945 年才支付给他们的参战退役金。平均每份金额为 1000 元。这些退伍军人都住在宾夕法尼亚街上弃置不用的财政部楼房里和安纳科西亚沼地上“用捡来的材料、铅皮桶和旧木板搭成的可怜的小棚屋里”。在被包围的胡佛政府看来，这些退役金请愿者是“在国会所在地向政府发起进攻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威胁”。麦克阿瑟肯定“这次运动的意义和危险性，实际上远远超过想从濒于枯竭的国库索取金钱的作为……红色组织者渗入了退伍军人组织，并立即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领导人手中，接过了指挥权”。这位参谋长认为，通过退伍军人的这次进军游行，“共产党人希望煽动革命行动”。作为这位参谋长助手的艾森豪威尔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事实上，”他写道，“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尽管可能受到一些煽动者的蛊惑，但都是安分守己的，他们进军游行，都是为生活所迫。”

然而，麦克阿瑟设法证明请愿与共产党有联系。他要求全国各地的高级军官向他提供与退役金请愿者一起进军华盛顿的、已知的共产党人的名单，答复来了，结果没有一个人知道。尽管缺乏证据，但是，参谋长和胡佛政府，仍决定用暴力把聚集在财政部楼房里的 1100 名左右的退伍军人赶走。7 月 27 日，政府命令华盛顿警察局长把他们驱逐出去。第二天，7 月 28 日，正规军又接连采取行动，他们开赴首都的中央大街宾夕法尼亚街，阻挡示威游行的人们。正规军向饥饿的、衣衫褴褛的、手无寸铁的老战士开枪，这是美军史上的奇耻大辱。两名老战士被打死，50 名受伤。麦克阿瑟将军自告奋勇领导这一讨伐行动，他说，“爆发了革命”，军队就应当整顿秩序。麦克阿瑟命令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军官穿上制服，排列在队伍的首列与士兵一起行进。这样，艾森豪威尔从实际上懂得了资产阶级国家军队的社会职能。为表彰参加这次讨伐队，授予他一枚奖章。

但是，当麦克阿瑟参谋长和艾森豪威尔少校等人出现在宾夕法尼亚街头时，形成了一幅引人注目的画面，几十个摄影师都抓住了这个机会。艾森豪威尔和其他一些下级军官，外套上都没有佩缓带和勋章；麦克阿瑟的胸前却挂满勋章，相比之下，显得特别神气。麦克阿瑟身穿礼服，腰系武装带，下身穿马裤，足登锃亮的马靴。在所有拍摄的照片上，艾森豪威尔情绪沮丧，而麦克阿瑟则兴高采烈。

美国军警对退伍军人的残酷的镇压，受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但麦克阿瑟却在记者招待会上说：“那班暴徒，看上去叫人讨厌，不安分的天性使军警激动起来。”麦克阿瑟把不利于他的宣传归咎于共产党人，拒绝承认他犯了错误。艾森豪威尔观察到麦克阿瑟有着这样一种顽固的想法：“一个高级指挥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其在公众中的形象，决不可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次事件使艾森豪威尔更害怕极端主义，更本能地回避各种争论。

血洗老战士是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参加的唯一的“军事”行动。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说：“那时艾森豪威尔少校已经显示出逐渐成熟的品质。他曾多次劝说麦克阿瑟不要指挥这次镇压行动。事后，他又巧妙地躲避了记者对他的采访。”

在这一事件过去七个月之后，1933 年 2 月，麦克阿瑟让艾森豪威尔当他的私人助理。德怀特给麦克阿瑟起草演讲稿到国会演说，并帮助准备参谋长的年度报告。这些报告都是些调子低沉的文件，甚至在“新政”于 1933 年 3 月开始以后，军队仍是根据难以忍受的大为削减的预算进行工作。

1933年的军事预算为3.04亿美元，1934年为2.77亿美元，1935年为2.84亿美元。年度报告悲叹，在一个迅速重新武装起来的世界里，在德、意、日法西斯疯狂扩军备战和肆意进行侵略的情况下，美国军队几乎完全缺乏准备。艾森豪威尔在报告中列举了军队的缺陷。第一次世界大战剩下的预期用来打一场小型局部战争的装备不仅陈旧，而且实际上在不断地损坏；陆军由于没有钱，无法订购新研制的伽兰德半自动步枪，所以仍使用1903年型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1934年军队只有12辆一次大战后的坦克在服役。麦克阿瑟要求政府拨款购买更多的坦克和更新装备。但是，在经济危机的困扰下，罗斯福政府仍决定军队是实行节约的最重要的部门。

艾森豪威尔热爱军队，热爱自己的职业。如果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少校的名字不为一般的公众所知晓，却受到来陆军部采访的记者们的高度重视。一家报纸请他当军事编辑，他曾大为动心。这个工作使他能继续留在华盛顿和接近军队里的朋友。他能准确地对美国的军事和海外的威胁作出评价，而且每年薪金为15000至20000美元，对一个每年只拿3000美元的人来说，不啻是一笔财富。他作了考虑，并同玛咪和弟弟米尔顿商量，差点儿辞去军职，经过反复考虑，艾森豪威尔对职业的热爱战胜了高薪的诱惑，最后决定还是留在军队里。

德怀特记着福克斯·康纳将军对他说过的话：时间不会太长将爆发另一场战争，其规模比上一次战争还要大。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重新武装的事实，使他确信那场战争已为时不远了，他不想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去报道那场战争，他要作为一个战士、一个军人去投身于那场战争。他也想离开华盛顿和总参谋部，作为战斗兵种的军官，到部队里去干，但是麦克阿瑟不让他走。1935年，麦克阿瑟的参谋长的任期届满，艾森豪威尔盼望着派他到野战部队中去服役。但是，接着麦克阿瑟当头给了他一棒。国会通过给菲律宾以“联邦”地位的决议。菲律宾于1946年完全独立。曼纽尔·奎松和国民党领导的新的菲律宾联邦政府，需要一支军队，奎松邀请麦克阿瑟到马尼拉去当他的军事顾问，负责建立一支军队。麦克阿瑟接受了邀请，并坚持要艾森豪威尔继续当他的助理。

从头建立起一支军队，是一件有趣的工作。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这项工作还有额外收入。顾问代表团的成员，担任美军派遣任务，国内薪金照领，另外菲律宾联邦政府还支付一份薪水。麦克阿瑟每月为3000美元，艾森豪威尔为每月980美元，再加上一切开销的费用。由于有这样的收入，加上雇用仆人的费用低，艾森豪威尔一家在马尼拉可以过一种比较豪华的生活。

1935年9月末，艾森豪威尔和麦克阿瑟一起登上西行的火车去旧金山，并从那里搭船去马尼拉。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已住了六年，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他没有晋升过：他和其他任何一名军官都没有能说服政府开始重建国防；他没有在战斗部队里干过，看来命中注定要永远当一名参谋军官。然而，他能引以为荣的是麦克阿瑟对他的工作和能力的评价。

1935年9月30日，参谋长给他一封信，赞扬他“成功地完成了不少艰难的任务”，麦克阿瑟感谢艾森豪威尔“愉快地和有效地致力于有局限性的、困难重重、而且常常必须全力以赴的任务，尽管你本人希望的是指挥部队和从事军队生活中其他扎实活动方面的工作。对此，你的特质是完全适合的”。他向艾森豪威尔保证，他的经验对他将来当司令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所有向你提出的问题，是必须从高级指挥机关的观点来解决的”。

在菲律宾，艾森豪威尔积极参加了建立军事学校，组建空军，组织城市居民进行军事训练和制订岛国的国防计划以防发生战争等工作。鉴于太平洋战争日益迫近，他们所进行的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

艾森豪威尔在工作之余还能挤出时间从事自己习惯了的娱乐，打桥牌和玩高尔夫球。菲律宾总统奎松是个牌迷。被邀往总统那里去度周末的人员中，几乎总有艾森豪威尔的名字。但是，博得总统好感的不只是艾克的牌技，艾森豪威尔吸引总统的是，他熟谙军事，容易与人接近，能博得别人的好感。“在他的全部优秀品质中，”奎松说，“我最称颂的是，我不论何时向艾克征求意见，总会得到答复。”

1936年7月1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后过了21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终于得到了中校军衔。在菲律宾，他仍没放弃成为空军的夙愿。他掌握了复杂的飞行业务，飞行了必须的300小时，在48岁时取得了飞机驾驶证。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竟带着儿子飞行。这是个莫大的冒险行动，尤其是在一次这样的飞行中，飞机差一点坠毁。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虽然战争对艾森豪威尔将意味着在事业上的进展，虽然他一直致力于准备对付这一挑战，但战争的到来是一场大灾难。9月3日，宣布战争的当天，他写信给弟弟米尔顿：“经过月复一月地极力安抚这个统治德国的疯子之后，英国和法国看来被逼进了死胡同，他们只有通过战斗，才能走出来。对欧洲和整个文明世界——虽然长期把这个世界称为文明世界似乎是荒谬的——这是一个不幸的日子。如果战争拖长，我相信战争中残存下来的国家很难辨出他们参战时原来的模样。”但他预言：“除非希特勒用暴力征服全世界，否则最后的结局将是德国被肢解。”

德国人征服波兰后，德军与西方盟军隔着马其诺防线僵持着，这时，战争被称为“静坐战争”，或叫“假战争”。

1939年10月，艾森豪威尔向他的朋友杰罗说：“这场战争使我感到非常迷惑……很明显，没有一方愿意进攻堡垒坚固的防线。如果阵地配备着现代化武器，使战斗防御的优势大大超过进攻，我们就倒退到中世纪末期，在当时军队守卫在筑垒的营地内，非常安全，不受骚扰。”艾森豪威尔感到疑惑，“答案是什么？”

1939年12月13日艾森豪威尔决定回国。他深信，美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这场战争。他认为，现在他的位置是在祖国，是在他的美利坚合众国。艾森豪威尔在谢绝了菲律宾总统提出的待遇上非常有诱惑力的建议后，返回美国。

他的预见被证实了。全国正处于作出最重大的军事和政治决定的前夕。国内各种势力对战争的态度意见纷坛，和平主义、孤立主义势力十分猖獗。欲知在此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中校的去向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五章 珍珠港事件前后

日军偷袭珍珠港，战火烧到太平洋；
孤立主义受批判，举国上下备战忙。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愈来愈大。艾森豪威尔于1940年2月回到美国，被委派到驻加利福尼亚的第十五步兵团担任副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美国不可避免地将参与战争的迹象越来越明显，需要立即训练后备军。他在加利福尼亚根据指挥部的命令，开始训练国民警卫队，以提高这些新编部队的素质，使之达到正规军的要求。

历史又重演了。这是艾森豪威尔从事军旅生涯以来“最称心如意的一年”。7月1日，他在写给好友奥马尔·布雷德利的信中说：“我现在过得非常愉快。像军队中别的人一样，我们大大小小的工作和问题成堆，但是这种工作很有趣！”他在写给另一位朋友杰罗的信中说：“我经常带领部队在野外演习，工作十分紧张……我晚上冻僵了，从来没有连着睡过一小时三刻钟的觉。有时确实累极了，但是这种生活真美！我属于部队，与部队在一起，我总是快乐的。”

艾森豪威尔的家庭生活也是幸福的。玛咪很高兴回到了美国，她的健康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她又在款待客人。爱子约翰被选派到西点军校学习。他在入学考试时，获得92分，名列第一。艾森豪威尔在写给休斯的信上说：“约翰的这次成就，使我挺起胸膛，脸上增光，给玛咪每天谈论她的儿子时，增添了新的内容。”

然而，艾森豪威尔几乎没有必要去挺起胸膛。50岁的年龄，身体还非常结实。大多数人认为，他看上去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部队工作和野外生活，使他保持着旺盛的精力。宽阔的胸脯和肩膀，他仍有着运动员的健美体型。他生气蓬勃。行走时步履轻松，双目炯炯有神。他的头顶差不多全秃了，只有几缕浅棕色头发披在后脑勺和脑袋两侧。有人说艾森豪威尔秃顶，反使他的相貌显得更英俊，也许是因为这对他大而表情多变的嘴起着陪衬作用。他思想活跃，思路敏捷，说话滔滔不绝，表现出充分自信。

为了适应战备需要，美国军队在加紧进行扩充和训练。在1939年至1942年之间，军队由19万扩充到500多万。这支军队几乎采用全新的武器装备，并且进行彻底的组织、纪律和战术方面的改革。原来军队的13000名军官，成功地适应了这一转变。在组建新军中，艾森豪威尔恪尽职守，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他制定出训练时间表，进行视察，给新任命的下级军官上课，领导野外演习，研究欧洲战争的经验教训，并以此改进部队的装备和战略战术。他主张部队尽量从实战需要进行训练，军队不能娇生惯养，因为这样不能培养士气，只能宽容和鼓励无能。

艾森豪威尔反对拖拉懒散作风，要求部队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和战斗力。他认为：“军官中无能的人淘汰得越早越好。”他发现很多军官在和平时期工作得很好，但在战时却不符合要求。他们经受不了战时体力和精神上的严峻考验。艾森豪威尔驱使他的部队进行艰苦的训练，原因之一是要发现哪些军官在一连多少天很少睡眠，吃不到热饭菜，不断地作出决定和执行决定后，仍能使自己的部队保持饱满的情绪和旺盛的斗志。艾森豪威尔渴望在建立一支国民的军队工作中尽一份力量。他关心士气，尽他所能地鼓舞和保持高昂的士气。他确信：“只有美国人了解下达命令的原因和目的，他们才愿意，

或能够最有效地进行战斗。”他经常对官兵们说：“法西斯军队到处行凶作恶，肆行侵略，国际形势要求我们去战斗，而不是有人将把我们带进这场战斗。”他号召大家努力克服孤立主义、和平主义的影响。艾森豪威尔相信：“一旦美国人民真的被激怒起来，他们就像自信的、不顾一切的、飞速倾泻的雪崩……而我们的任务是加速准备我们的力量！”

至于他自己，艾森豪威尔多次要求到正规部队中去，并随时准备到海外去作战。

1940年9月，艾森豪威尔感到很高兴，驻本宁堡的第二装甲旅旅长巴顿写信告诉他，很快要成立两个装甲师，这在美军历史上是第一次。巴顿说他希望指挥其中的一个装甲师。他不知道艾森豪威尔是否愿意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艾森豪威尔立即回信说：“这太好了。我想，在你的师中指挥一个团，这或许是奢望，因为我差不多还有三年时间，才能得到上校军衔。但是我想，我能很好地指挥一个团。”巴顿回信说：“我要请你或者担任参谋长，这是我所希望的，或者当团长。你可以告诉我，你想担任哪一种职务，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在一起会成功的。”

艾森豪威尔开始关切自己的前途。他知道在全军中，他享有“卓越参谋军官”的声誉。许多在各地任职的朋友告诉他，这位或那位将军，曾寻求他担任师的甚至军的参谋长。想到他可能两次像1918年失去参加战斗的机会，他就痛苦得几乎不能忍受。

10月底，他向在华顿盛的马克·克拉克透露，他的志向是在巴顿领导下指挥一个装甲团，而不要抽调他去做参谋工作。

1940年11月1日，当巴顿再次写信劝他快点申请调动时，他焦急万分，巴顿说：“如果你有门路，就要走门路，因为很快这个军将有十个新来的将军。”十个将军！一个仅仅是中校的人怎能与一位将军竞争？艾森豪威尔申请调动，但是他几乎肯定会遭到拒绝，因为他的军衔太低了。11月份，他写信给陆军部的一个军官发牢骚说：“对军衔这类事情这样苛求，使我感到吃惊，至少可以说有点好笑。”“当一个人到了50岁，已经毕业了25年多，而且离得到他的银鹰肩章只差两年半左右的时候，似乎可以调整一下军衔，以便陆军部可以把他调到他们想要调的地方去。”

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实际上很清楚艾森豪威尔的名声，对他的工作能力也有一定的了解。这位总参谋长决定派艾森豪威尔到第九军担任参谋长。这个军驻地包括整个西北地区。在3月11日，他晋升为上校。没有一次晋升比这次更使他高兴。由于成为上校，他最大的志愿得到了满足。三个月后，他接到新的命令。1941年6月11日，沃尔特·克鲁格中将写信给马歇尔将军，说他的第三集团军需要一位参谋长，他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高瞻远瞩……对掌握一个部队这样重大的问题有深刻了解，积极主动，足智多谋。”克鲁格认为艾森豪威尔是最合适的人选。两天之后，马歇尔同意这项任命。

1941年6月底，艾森豪威尔一家动身到第三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休斯敦萨姆堡。他们在7月1日抵达，这一天是他们结婚25周年。艾森豪威尔送给玛咪一块白金手表作为礼物，他是用他在菲律宾积蓄下来的钱买这块手表的。玛咪后半生一直戴着这块表。她高兴回到熟悉的、有着美好回忆的地方，特别由于她的丈夫现在是上校，是第三集团军的参谋长，使他们有资格住一幢萨姆堡漂亮的旧式砖房，四周有着遮荫的走廊和一个大草坪。

艾森豪威尔在第三集团军任参谋长期间值得一提的是，在 1941 年 8、9 月间举行的路易斯安那演习。这是美军进入战争之前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克鲁格的第三集团军进攻本·利尔将军的第二集团军。克鲁格的 24 万人正在“侵入”路易斯安那，而利尔以 18 万之众“保卫”着美国。马歇尔坚持进行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演习，因为他想找出训练中的不足和装备上的缺陷，又因为他需要去发现军官中有才能的人。

艾森豪威尔渴望得到这次考验。这是自 1918 年以来，美国投入“战场”最大的一支部队，比南北战争时规模最大的格兰特军队大两倍。艾森豪威尔从他设在龙尼斯的司令部写道：对参加演习的军官们所“要求的精神力量、技术能力、魄力是巨大的”。实际上对第二集团军发动一次侧翼进攻甚至更为困难。艾森豪威尔为了筹划这次军事演习几乎几天没睡觉。他发现排、连领导不称职，这使他很伤脑筋。于是，他花了很多时间，从一个单位跑到另一个单位，这里作指示，那里下命令；当可能时，用表扬来鼓励年轻的中尉和上尉，当需要时，也进行批评。他们对他们“愚蠢地不顾空袭的危险”，忽视必要的伪装的倾向，蹩脚的交通管理能力，感到恼怒。每天清晨，他把主要负责的军官们召集在一起，进行讲评。他清楚地知道，实际的作战会更艰苦。

在军事演习期间，参谋长的帐篷“成了高谈阔论的场所。军里每一个人似乎都到这里来进行严肃的讨论、大笑或发牢骚”。艾森豪威尔总是欢迎他们。军官们对他的品格，他的鼓励，尤其对他的专业领导能力，都有良好的反映。他后来写道：“在发完牢骚以后，他们工作得更好，这使我常常感到惊奇。”因此，他把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不断改进工作，作为他的领导艺术的主要部分。

通过这场军事演习，艾森豪威尔的声誉提高了。克鲁格的第三集团军按照艾森豪威尔制订的计划，包抄了利尔的第二集团军，迫使其撤退。《纽约时报》军事记者汉森·鲍德温报道说：“如果是真的战争，利尔的部队就被消灭了。”在专栏《华盛顿巡礼》中，德鲁·皮尔逊和罗伯特报道说：“是艾森豪威尔构思出和领导制定了击溃第二集团军的战略。”他们说艾森豪威尔“思想敏捷，加上非凡的精力，对他来说，军队这一行是一门科学”。九月下旬，在克鲁格的推荐下，艾森豪威尔晋升为准将。

在总结演习的教训时，艾森豪威尔把注意力集中在训练、装备。通讯和下级军官的问题上，但是他没有忽略高级指挥。他写信给总参谋部的杰罗：“在这支军队中，每一位高级指挥官都面临着巨大的工作。”“带领一支大部队达到高水平的训练标准，所需要的精神力量和魄力是巨大的；只有经过高度专业训练和具有毫不动摇的决心的人，才能成功。”不幸的是，这些品质难得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有些军官很有魄力，但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可是另外一些军官的情况却是相反。他说高级指挥官应当有“铁石心肠”去开除不合格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多是老朋友，“但是必须如此”。他说这是个难题。而事实上在他成了高级指挥官后，他才认识到这有多困难。在整个战争中，他感到最痛苦的某些时刻，就是他不得不解除他的同学和朋友们的作战指挥职务。

就在这次军事演习三个月之后，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了珍珠港。这是战争开始后继 1941 年 6 月 22 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进攻苏联之后，发生的又一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战火烧到太平洋，战争的规模愈来愈大了。

早在 1941 年 7 月，日本开始向东南亚发动攻势，占领了印度支那，其中包括在金兰湾的重要港口，它距新加坡只有 750 英里。华盛顿认为，日本的挺进是最终向菲律宾、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发动进攻的序幕。

7 月 24 日，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海军上将被召到白宫，罗斯福总统向日本发出严厉警告。当时在他身旁的，一边是在赫尔生病期间代理国务卿的韦尔斯，一边是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上将。罗斯福断言，如果日本试图夺取东印度群岛的石油，荷兰人就会抵抗，英国人就会对他们进行援助；“鉴于我们自己援助英国的政策，结果立即会出现一种极为严重的局面”。如果日本从印度支那撤军，那个地区将实现中立，并可以保证日本人自由地购买该地区的大米和原料。罗斯福对日本人接受这项建议不抱什么希望，但认为这是“为避免日本向南太平洋扩张再次做出的一种努力”。

过了两天，由于没有得到东京的任何答复，罗斯福总统对日本的经济进行了致命的打击。他下达命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大约 1.31 亿美元的财产，从而结束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在美国实行禁运之后，英国人和荷兰人也紧接着拒绝向日本出售石油。然而，罗斯福并不想勒死日本，为了缓和双方关系，美日仍在继续谈判。

日本内阁首相、战争狂人东条英机 10 月 23 日召开军政要员联络会议，集中讨论了有关日本与美国谈判的问题和同美国开战的前景。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东乡外相主张最好从中国部分撤军，但却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会议相持不下，东条随即提出三种方案让大家裁决。一是即使蒙受巨大的困苦，或者用木户的话说就是“卧薪尝胆”，也要避战；二是立即决定开战；三是在继续谈判的同时，作好必要时开战的准备。日本陆军总参谋部坚持认为，与美国谈判已进入死胡同。陆军总参谋长杉山回答说：“只要美国仍顽固不化，那就没有必要继续会谈下去，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战争！”海军代表永野加重语气说：“立刻开战！日后再不会有开战的良机！”杉山却主张应在 12 月初开战，不过仍要继续同美国谈判，玩弄外交骗局，以便给日本带来军事上的好处。

为了确保这次偷袭成功，日军大本营采取了大量的欺骗和伪装措施，并进行了周密的组织准备。偷袭珍珠港的计划长时间内只有山本和一二个军官知道，就连海军参谋长也直至 1941 年 10 月才第一次得知这一计划。为了隐蔽它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企图，日军大本营于 1941 年 7 月，在中国东北地区举行了代号为“关特演”的大规模演习，并将关东军 11 个师增加到 20 个师，总人数由 40 万增至 70 万，制造准备进攻苏联的假象。在航线选择上，日本研究了北、中、南三条航线，选定了虽然距离较远、气象不好、补给困难，然而便于隐蔽的北航线，并规定在航行过程中保持无线电静默。突击时间选在星期日早晨美舰周末返港停泊疏于戒备的时刻。部队的演练、集结都是在严格的保密条件下进行的。已调动集结的部队，其通讯联络保持平时状态，以便造成日本舰队主力仍在内海的假象。

进行反复的演练，着重解决偷袭的战术和技术问题。担任突袭的部队除了多次进行图上作业和沙盘演习以外，还在 1941 年 8 月中旬，选择了和珍珠港地形相似的日航空基地樱岛进行战术、技术训练。在此期间，日军专门研究了各类舰只的海上加油问题，抓紧利用风大浪高的天气进行海上加油训练，以适应在北航线的航行和作战。为了解决在浅海实施鱼雷攻击的技术问题，还专门设计了装有稳定器的鱼雷并进行了浅海攻击训练。11 月中旬，各

编队又在佐伯湾进行了综合攻击演习。

日军为了确切掌握情况，对珍珠港进行了不间断的侦察，日军利用各种手段，广泛搜集珍珠港美军的防御部署、兵力分布、活动规律、泊港军舰位置等情报。日本驻夏威夷领事馆积极搜集目标区情况，及时进行汇报。日军还派出大批间谍，并以潜艇进行侦察和监视，使突击部队及时掌握美军动向，以便适时下定决心。

制订和执行这一偷袭计划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原任海军次官，是一个身高只有5英尺3英寸的传奇式人物。他的双肩宽阔，胸部又像个圆桶，身材还算魁梧。他早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后来在华盛顿担任日本大使馆的武官。他亲眼看到了美国的工业实力。他断言，如果不消灭在夏威夷水域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日本在同美国的一场战争中就没有获胜的希望。山本极力主张出动航空母舰对停泊在珍珠港的美国战列舰和航空母舰发动突然袭击。这样的行动将充分利用日本在太平洋上占优势的海军力量——10艘战列舰对9艘战列舰，10艘航空母舰对3艘航空母舰。进行这样的袭击已有足够的先例。日本已对苏联和中国发动了大规模的突然袭击；1940年11月，几架英国鱼雷飞机摧毁了停泊在塔兰托的意大利作战舰队。

这位日本联合舰队司令坚持认为，如果摧毁美国舰队，日本就能够在没有美国干涉的情况下征服菲律宾、马来亚和东印度群岛。然后日本就可以撤退到从千岛群岛到澳大利亚边缘牢固的防线后面，并且利用防线内的交通和供应线击退对这个屏障的进攻，直到西方国家被迫接受日本对大东亚共荣圈的控制为止。山本实际上是靠他自己的个人名望压倒了海军内部的反对意见。发动这场突然袭击的准备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对飞行员的实际训练是在1941年9月开始的。

在从石油禁运到珍珠港事件这四个月的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令人厌倦的活动，以便赢得时间。罗斯福本想作出最后的努力来制止逐渐走向战争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趋势。他建议同日本人和解，或者达成暂时的解决办法，目的是使远东局势恢复到1941年7月的状况。这样，美国将取消石油禁运，中国和日本将开始会谈。作为回报，日本将不再向印度支那或者向中国东北同苏联交界的边境一带派遣部队，并同意即使在美国同德国和意大利交战的情况下，也不执行三国轴心协定。实际上这只是罗斯福的一厢情愿罢了。

日美谈判没有取得丝毫进展。相反在和谈的掩护下，日本法西斯却加紧调兵遣将，蠢蠢欲动了。

11月6日，也就是早在赫尔11月27日照会之前，山本五十六就根据东条的指示发布联合舰队绝密的作战命令。11月10日，特遣舰队司令南云中将发布了他的实施山本计划的第一号命令。总参谋部和外务省达成了一项这样的谅解：如果与美国的外交谈判哪怕在最后一刻得到成功，对珍珠港的袭击也要取消，进击部队将回到北纬42度、东经170度的集结地待命。但是，在东条英机决意推行战争政策的情况下，这种谅解是无法实现的。相反，调兵遣将和临战之前的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12月6日，罗斯福仍亲自向日本天皇裕仁呼吁和平。他在电报中说：“我们两个人都有恢复传统的和睦，防止人类进一步死亡和毁灭全世界和神圣义务，这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的伟大国家的人民，而且也是为了邻邦的人民。”

就在罗斯福向日本天皇呼吁和平的当天，日本报纸根据东条的指令，继

续指责西方准备开战，为日军南进大造舆论。各报的标题是：“美国徒劳地拖延谈判，无意与日本和解”，“美国领导人商讨对日政策，但未有改变固执态度之迹象”，“恶意中伤，包围日本，践踏日本之和平意图，四国同时开始军事准备”……

虽然罗斯福总统看过截获的日本“停止谈判”的照会，军政官员们也预感战争就要来临，但就在12月6日星期六的晚上，美国上下到处都是歌舞升平，欢度周末，海军部长诺克斯仍在国家剧场观看《学生王子》。陆军情报局长谢尔曼。迈尔斯将军认为日本那份电报“没有多少军事意义”，因此并不特别忧虑。他给他的远东问题专家布拉顿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没有理由发布戒备令或布置夜班”。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正与夫人在迈尔斯堡度周末。那天夜里，在华盛顿的军政高级官员，无论是总统罗斯福，还是国务卿赫尔、海军部长诺克斯、陆军部长史汀生：或是陆军参谋长马歇尔，都没有料到一大清早日本人会袭击他们的珍珠港。

在瓦胡岛，那里的情况也和华盛顿一样，夏威夷海、陆两军司令根本就未想到珍珠港会遭到袭击。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将军，在檀香山出席私人晚宴后，就上床睡觉，准备第二天上午要同陆军司令肖特将军去打高尔夫球，消除人们所传他们互不说话的流言蜚语。金梅尔和肖特都认为没有必要发布长期戒备令。因此港内86艘舰艇上的大部分人员，除少数人值班外，都已安然就寝，那不过又是一个懒洋洋的太平无事的热带夜晚而已。

正当美国人经过周末的狂欢沉入酣睡之际，停泊在风光明媚的柱岛附近的日本联合舰队，已进入待命状态，准备在必要时驶入内海接应机动部队。山本已经下达最后一道命令。于是在和谈的烟幕下，一场来势凶猛的突然袭击就要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就要降临了。

12月7日清晨，珍珠港风和日丽。当天，美国太平洋舰队泊港舰只共86艘，其中战列舰8艘，巡洋舰7艘，驱逐舰28艘，潜艇5艘。瓦胡岛上各机场共停放飞机387架。舰上的水兵有的刚刚起床，有的在用早餐或在甲板上散步，7时30分，一个水兵发现有20架飞机向珍珠港飞来，他认为可能是进行演习的飞机而没有在意。稍后，有人看见一架飞机从北低空飞过福特岛，并听到一声爆炸，人们仍认为是一次什么事故。直到日机对美军机场和舰只实施集中突击时，珍珠港的美军才如梦初醒，看清了飞机的标志，发出了警报。福特岛美军司令部广播：“飞机袭击珍珠港，不是演习！”

日军第一突击波飞机183架，于7时55分开始攻击，首先轰炸了希卡姆、惠勒机场和福特航空站，同时对福特岛东西两侧停泊舰只进行攻击。日机还对瓦胡岛上其他机场进行扫射和轰炸。珍珠港刹那间浓烟滚滚，烈火熊熊，爆炸声、警报声响成一片。第一突击波历时45分钟。8时45分，日军第二突击波171架飞机开始攻击，以扩大第一突击波的战果，持续时间约一个小时。驻岛美军由于毫无准备，因而在日机开始攻击时惊慌失措，难以进行有组织的抗击。空袭五分钟后，高炮才零星射击，岛上32个高炮连，仅有4个连开火。8时15分，才有4架战斗机起飞迎战。此后虽陆续起飞了25架，但由于仓促应战，协同不好，因而不是被日机击落，就是被自己的高射炮击毁。日军经过约两个小时的狂轰滥炸，共炸沉炸伤美军各种舰艇40余艘，其中炸沉战列舰5艘，巡洋舰1艘，驱逐舰2艘；炸伤战列舰3艘，巡洋舰3艘，驱逐舰1艘，辅助舰5艘。击毁飞机260余架，毙伤美军4500人。日军仅损失飞机29架，潜艇6艘，死伤200人。日军这次作战组织严密，行动果

敢，代价小，战果大，是战争史上成功的突袭战例之一。

但是，日军这次突然袭击并未完全达到预定的目的。突袭的主要目标——美国太平洋舰队的3艘航空母舰当天不在港内。其次，日机忽视了对修船厂和油库的破坏，这些设施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尔后的恢复和作战活动都起了很大作用。担任日舰主攻任务的南云司令，在两次攻击得手之后，已是大喜过望，他拒绝了实施第三波轰炸的建议，匆忙收兵溜回日本。

历史证明，美国这次遭受打击，完全是咎由自取。美国统治集团对于日本侵略者长期以来实行绥靖政策，对于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采取纵容态度，妄图利用日本军阀的刺刀来镇压中国人民的革命活动，并纵容日本北进去攻打苏联；在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不仅不去制裁日本侵略者，反而为日本大力输血。正如美国历史学家米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所写的：“日本多年来一直利用从美国得到的物资建立海军和陆军以打击美国——当它反对我们的作战计划完成时，它就用这些东西反过来对准我们开枪。”美国姑息养好，纵虎贻患，到头来自食其果。

最使美国人和西方人感到震惊的是，日军在袭击珍珠港的同时，对东南亚展开了全面进攻，而且“旗开得胜”。12月8日（东京时间）拂晓，山下奉文将军率领的日军在马来亚半岛东海岸三个地方同时登陆。进攻时，虽然浪高6英尺，但进展顺利，到日暮时，哥打巴鲁机场已经在日军手里了。就在这一天，日军还对香港、关岛、菲律宾群岛、威克岛和中途岛等地展开了进攻。

在马尼拉，麦克阿瑟的远东航空大队遭到毁灭性的轰炸。

12时25分，27架三菱制造的新式高空轰炸机隆隆飞到了克拉克机场北面只有20英里的打拉上空，对美国的“空中堡垒”和P—40B飞机进行了疯狂的扫射。随后，刚扫射了邻近一个战斗机机场的44架零式飞机也赶来助战。曳光弹点着了油箱，巨大的“空中堡垒”一架接一架爆炸。机场上到处浓烟滚滚，所有的战斗机以及30架中型轰炸机和观测机都在燃烧。“空中堡垒”只剩下了3架，其余全部被摧毁。日本轰炸机全部安全返航，战斗机也仅仅损失了7架。这是“珍珠港第二”。

至此，能用以阻止日本在东南亚迅速取胜的三股最强大的威慑力量，一天之内就被摧毁了两股。这就是太平洋舰队和麦克阿瑟的空中力量。那第三股威慑力量是英国海军上将“大拇指汤姆”菲利普斯将军指挥的强大舰队，但时隔不久，3.5万吨的大型战列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也被日本鱼雷轰炸机击沉了。从此，东条英机更加趾高气扬，耀武扬威，他命令海陆军尽快占领东南亚各国和太平洋主要岛屿。

珍珠港事件促使了美国人的觉醒，罗斯福总统深感内疚。他认为这是美国历史上的奇耻大辱。他决心把这一事件诉诸美国国会，并以此教育美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击法西斯侵略者。

第二天上午，12月8日（美国时间），罗斯福总统身披蓝色海军斗篷，乘车来到国会大厦，要求向日本宣战。当总统由他儿子詹姆斯上尉搀扶着缓步穿过大厅时，欢呼声像暴风雨般地爆发了出来，罗斯福接受过无数次欢呼，但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在欢呼声里，人们有着一种发狂似的快慰之感，似乎他的出现使人们一下子从恐惧中解脱出来。更重要的是，似乎所有这些人，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在向他，并且通过他，向他们的祖国表达他们的赤胆忠心。

罗斯福说：“昨天，1941年12月7日，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受到了日本帝国海空军突然的蓄意的进攻。”

“作为陆海军总司令，”罗斯福说，“我已指示，为了我们的防务采取一切措施，但是，我们整个国家都将永远记住这次对我们进攻的性质。”

罗斯福强调指出：“不论要用多长时间才能战胜这次预谋的入侵，美国人民以自己的正义力量一定要赢得绝对的胜利。我现在预言，我们不仅要作出最大的努力来保卫我们自己，我们还将确保这种形式的背信弃义永远不会再危及我们。我这样说，相信是表达了国会和人民的意志。”

“敌对行动已经存在。无庸讳言，我国人民、我国领土和我国利益都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罗斯福说，“信赖我们的武装部队——依靠我国人民的坚定决心——我们将取得必然的胜利，愿上帝帮助我们！”

罗斯福总统最后要求国会宣布：“自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日本发动无端的、卑鄙的进攻时起，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处于战争状态。”

罗斯福的演说，历时六分钟多一点。现在讲话结束了，他抬起头，微笑着向人民挥手致意。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这个简短的演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于1917年要求国会对德宣战的演说，份量重得多，影响深远得多。参议院以82票对零票，众议院以388票对1票通过了罗斯福的宣战要求。从此，美国正式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且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日军偷袭珍珠港那天，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早晨，他不顾玛咪的反对，到办公室去处理完日常文件。大概在中午时分，他告诉副官特克斯·李，他疲乏极了，他想“自己应该回家去睡一会儿”。回到家里，他告诉妻子，他不想被打桥牌的人打扰，说着便去睡了。一个多小时后，副官在电话上报告，珍珠港事件发生了。他听到这一消息既震惊，又愤慨。他知道战争迟早是要发生的，但日本采取这种不宣而战的卑鄙方式却出乎他的意料。

在罗斯福对法西斯宣战五天后，总参谋部来电话，马歇尔将军要艾森豪威尔火速赶到陆军部。当天下午他乘了一架飞机离开圣安东尼奥去华盛顿。恶劣的气候迫使飞机降落在达拉斯。然后艾森豪威尔转乘火车，经过堪萨斯城，转向东行，火车行驶在他30年前从阿比伦到西点军校去的同一条铁路上。一路上，他尽力为与马歇尔会面而作准备。他知道这是他为国家，为反法西斯战争服务的好机会。欲知艾森豪威尔到总参谋部后的情况，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章 艰难岁月

初战艰难失利多，菲律宾岛遭折磨；
艾克拼搏不知倦，力挽战局献计策。

1941年12月14日早晨，艾森豪威尔抵达华盛顿联邦车站。他立即去宪法大街陆军部向总参谋长报到。马歇尔神情严肃，在宣布艾森豪威尔负责总参谋部作战处远东科的工作后，就抓紧时间简要地向他叙述了太平洋上海军和陆军的总形势。

当时形势十分严峻，由于战前缺乏准备，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舰队在几个月内无力参加大的军事行动。在日军袭击珍珠港时，虽然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因当时不在那里而未受损失，但支援它们的军舰很少，以致大大限制了它们的军事行动。而且海军认为，这些航空母舰应当留作侦察和防御之用，只有发生某种重大事件，才许调作别用，此外，对于日本人是否会对夏威夷甚至美国大陆迅速发动大规模的两栖进攻，当时还没有把握。

夏威夷的驻防部队十分薄弱，以致陆军部和海军部一致同意，必须尽快地加强那里的空军力量和地面部队，并把这项工作置于太平洋地区其他工作的首位。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进行了改组。尼米兹接替金梅尔指挥太平洋海军。这位头发斑白但看上去精神抖擞的将军，一到舰队就发现了他怕发现的东西——悲观失望的情绪。士气“低到不可再低”的程度，不少人患了“恐日病”，他甚至看到珍珠港事件的打击已经使几位高级将领的头发都白了。尼米兹召见了原来的参谋班子，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还在遵医嘱吃镇静剂，“不会有任何调动，我对各位完全信任。”尼米兹说，“我们挨了一次猛揍，但是我对于最后的胜利毫无怀疑，当前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紧整顿军队，修复军舰，准备反击。”

在东南亚方面，当日本人进攻时，美国在菲律宾的陆、空军总数为三万人，其中包括菲律宾侦察部队，该部队虽然并入了美国陆军，但其士兵和某些军官却是菲律宾人。美军为科雷吉多岛及其一些小的支援要塞提供了驻防部队。其他美国部队被编入菲律宾师，该师由菲律宾侦察部队和第三十一兵团组成。国民警卫队的部队，包括三个野战炮兵团、一个高射炮兵团、一个步兵团、两个坦克营以及后勤部队，也作为援军调到那里。

空军力量在1941年也有所增强，当日本人进攻时，在菲律宾驻有35架B—17型新式轰炸机。此外，还有220架战斗机型的飞机。马歇尔将军虽然知道这支空军分遣队在日本开始进攻时就受到攻击，并遭到严重损失，但他没有收到有关这次战况的报告。同样，12月10日，正位于马尼拉外边的卡维特海军船坞遭到日本轰炸机的袭击，损失极为惨重。这里有一支中等的机动舰队，它主要由若干潜艇小分队组成，但也包括部署在马尼拉及其附近海域的亚细亚舰队，其最大军舰是停泊在伊格诺诺克的重型巡洋舰“休斯顿”号。

很显然，要抵抗猛烈而持久的进攻，像这样一些兵力是不能无限期地坚持下去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日本人想尽快占领菲律宾。当时美军要解决的问题是该怎么办。马歇尔参谋长大约用了20多分钟向艾森豪威尔说明了这一切，接着突然向他问道：

“你认为，当前我们的行动方针应该是什么？”

艾森豪威尔吃了一惊。他刚刚抵达总部，知道的情况比从报上看到的多

不了多少，而且马歇尔刚才告诉他的并不是最新的太平洋作战计划，他又没有参谋人员帮助他作出回答，他想了片刻，镇静地回答说：“让我考虑几个小时。”马歇尔说：“好吧！”

文森豪威尔带着问题回到新分配的陆军部的作战计划处办公室。处长是他的老友伦纳德·杰罗将军。很明显，如果艾森豪威尔要在陆军部对马歇尔将军有所帮助，就一定要取得他的信任。因此，艾森豪威尔认为，对参谋长问题的回答必须迅速及时，而且答复的逻辑必须是无可指责的。在他考虑了敌我友各方的情况和军事实力后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菲律宾没有救了。军事上比较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将军队撤到澳大利亚，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反攻基地，可以从那里设法增援菲律宾。他指出：“速度是最重要的。”他力主立即将飞机、飞行员、弹药和其他装备从西海岸和夏威夷运到澳大利亚去。他还建议，必须努力确保通过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群岛和夏威夷的这条空中生命线。

艾森豪威尔回到马歇尔的办公室时，已经是黄昏。当把书面建议呈上去时，艾森豪威尔说，他认识到，在当前情况下，不可能及时增援菲律宾使它击退日本的侵略。他说：“将军，对菲律宾的大规模支援还需要等一段较长的时间，在此以前，如果敌人用大量部队来侵占该群岛，驻防部队在微小的援助下是不能坚持到底的。但我们一定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帮助这个群岛。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人民将会看着我们。他们会原谅失败，但不会宽恕遗弃。他们的信任和友谊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的基地必须是澳大利亚，我们必须马上扩充这个基地，还要取得我们通向那里的交通线。在最后一点上，我们只能胜利不许失败。我们必须冒巨大风险，而且还要不惜一切代价。”

马歇尔听着艾森豪威尔的回答，满意地笑了。他说：“我同意你的意见。尽你所能去拯救他们。”于是艾森豪威尔就肩负起作战处有关菲律宾和远东作战地区的筹划工作。

在以后的两个月中，艾森豪威尔的首要责任是向菲律宾增援，这使他处于困难的境地。由于美国缺乏战争准备，没有多少东西可以送出去；由于日本的疯狂进攻和严密封锁，救援工作是非常困难的。艾森豪威尔的首批行动是，从旧金山向布里斯班进行两次运输，命令两架泛美大型客机载着军人飞往澳大利亚，命令15架重型轰炸机从夏威夷转场到布里斯班。为了使一批急用的军事物资运往前线，他不用1000万美元的现金在澳大利亚雇用私人船主，来突破封锁线，从澳大利亚驶往菲律宾。但这只是杯水车薪。

1942年1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至今还是坚决认为，远东局势是严重的，在空军和陆军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以前，任何枝节问题都不应予以考虑。然而与此相反，我们却正在采取‘磁性’行动和‘体育家’行动，等等。”三天以后，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又写道：“我们终于运送了一些物资去澳大利亚。空中计划包括运送四个大队的歼击机、两个大队的重型轰炸机、两个大队的中型轰炸机和一个大队的轻型轰炸机。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船只，并且现在我们就急需！”

1941年12月22日，在彭萨科拉护航舰队到达布里斯班时，艾森豪威尔就开始建立美军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基地。他说，这一行动所以开始得这样快，主要是因为这场灾难的结果。在袭击珍珠港的那天，美国有一批运送部队、飞机和物资的军舰正在驶向菲律宾的途中。海军经过研究，认为它们应被召

回美国或在夏威夷隐蔽起来，因为当时谁也不能断定日本人不会对它们布置一个拦截网。因此，那些离港才几天的军舰都奉命返航了。但陆军部坚持要由五艘军舰组成的一个护航舰队以最快的速度驶往澳大利亚。在这五艘军舰中，“霍尔布鲁克”号和“共和国”号载着 5000 名士兵，“梅格斯”号和“布罗姆芳但”号装着各种物资和装备。这就是这个巨大军事基地的开端，这个基地终于成了麦克阿瑟将军日后解放菲律宾的起飞台。

在整整一个冬天，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艾森豪威尔他们把增援物资源不断地运到澳大利亚基地，和通向这个基地的一些用作踏脚石的岛屿。到 1942 年的 2 月 21 日，美国在海外的官兵总数超过了 24.5 万名，其中绝大部分集结在太平洋。这时，在太平洋的总兵力为 115877 名，但不包括驻守在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 29566 名官兵。在加勒比海的驻防部队为 79095 人。在欧洲战区，当时只有 3785 名官兵，但有两个师正在途中。

在那个时期，战争形势全面吃紧，在东南亚尤为严峻。日本法西斯在“珍珠港大捷”之后，得意忘形，不可一世。在占领马来亚、新加坡等地之后，在菲律宾的日军，正按照东条的命令向马尼拉进军。那时，本间率领的部队离马尼拉只有 70 英里左右。菲律宾战役是日本南进的重要战役之一。日本侵略者在战役初期的任务，主要是占领首都马尼拉和南部大岛棉兰老的政治军事中心达沃。马尼拉是美国在远东最大的海军基地。日军进攻菲律宾的部队，为陆军第十四军和第五飞行集团、海军第三舰队和第十一航空舰队。陆海军共拥有飞机 500 架。

在菲律宾群岛，麦克阿瑟上将指挥的美国部队有 19000 人，菲律宾武装部队有 112000 人，但后者大多是招来不久的新兵，装备不全，训练很差，在美、菲军队中，有 8000 名空军人员，他们拥有 200 架飞机。此外，美国在这里还有一支小小的亚洲舰队。

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东条横扫东南亚。日本飞机连续对马尼拉附近美国的空军基地进行了狂轰滥炸，基本上摧毁了麦克阿瑟的空军。接着，日军就在吕宋北部的阿帕里登陆。此后，又在吕宋西海岸的维甘和东南部的黎牙实比登陆。美军节节败退，损失惨重。麦克阿瑟估计到，日军主力将在仁牙因湾登陆，由于美国空军已损失殆尽，陆军也减员一半，美军将无法阻挡。因此，美菲军队便主动撤退到巴丹半岛，凭借科雷吉多尔要塞进行防守，并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的城市，虽然这时日军离首都还有 150 公里。

1942 年 1 月 2 日，日军进入马尼拉。

东条英机的侵略野心很大，但兵员不足，力不从心。就在日军进入马尼拉的当天夜里，东条又命令南方军司令向巴丹半岛发动进攻。日军因兵力不足，未能得逞，且损失惨重。在美军方面，困难更多，不仅士气低落，而且粮食已成了头痛的问题。前线部队每天的口粮只有平常的 1/3。艾森豪威尔几次想突破日本海上封锁线向巴丹和科雷吉多尔运送给养的努力都遭到了失败。骑兵的马已经没有什么饲料可喂了，温赖特将军含着眼泪下令把所有的军马都杀了，包括他自己心爱的良驹约瑟夫·康拉德在内。

1942 年的第一个星期结束之前，大约三万名菲律宾和美国的士兵，在一道坚固的天然防线后面挖壕固守，这道横贯巴丹半岛的阿布凯防线，穿过沼泽地和纳蒂布山上的两座火山峰。在这道防线之后约 20 英里，荒凉的马里韦莱斯山坡上的退却阵地正在进行战备。这是“桔色作战计划”设计的防御。由于有 15000 名美国部队和 65000 菲律宾部队可供调遣，麦克阿瑟预料能够

在六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内阻止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但是，麦克阿瑟必须为他的灾难性的海滩防御战略付出沉重的代价。军需官透露，撤退时带的大米还不够吃 20 天，面粉只够吃 30 天。这些食品供给 8 万部队和 2.6 万名涌向巴丹的平民，还不够吃一个月。各种医疗用品的供应，从治疗疟疾的奎宁到外科手术用的纱布，都很缺乏。这一切使他们更困难了。到了 2 月中旬，军内病倒的人多到惊人的程度。巴丹是世界上疟疾最猖獗的地区之一，而奎宁已几乎断了来源。由于饥饿和疟疾，兵员身体虚弱，仅 3 月份第一个星期就有 500 多人患疟疾住院。医生们担心疟疾即将大规模流行。尽管一支“一英里长”的船队满载给养和增援部队正在驶来，但由于当时敌我力量悬殊，在日军的严密封锁和狂轰滥炸下，支援行动都遭到了失败。面对这些，艾森豪威尔十分焦急！

麦克阿瑟试图重振军队士气，他在 1 月 15 日颁布了一道命令：“美国的援助正在途中。数以千计的兵员和数以百计的飞机正在调运……我们在巴丹的部队比进攻我们的日军还要多……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御将挫败敌人的进攻……我们战斗，就会赢得胜利；我们撤退，就会毁灭。”但是，勇气和决心还不足以挫败日军的猛烈进攻。当“数以千计的兵员和数以百计的飞机”未见到的时候，一股致命的无可奈何的情绪在前线散兵坑里滋长起来。疲惫不堪、饥肠辘辘的美国士兵，用粉笔在头盔上划了 V 字——不是代表“胜利”（victory），而是代表“炮灰”（victim）。昼夜战斗，快把他们的锐气、精力消磨光了。白天，敌人从空中和地面向他们发起无情的攻击；晚上，扩音器不停的嘲骂和鞭炮的噼啪作响，吵得他们不得安宁。绝望的情绪在蔓延，睡眠不足，食品、药品缺乏，伤亡率直线上升。美国兵的忿恨情绪蔓延到菲律宾人中间。二次大战期间，最动摇军心的歌词发泄了这样的情绪：

我们是巴丹的孤零兵，
没有妈，没有爹，没有山姆大叔，
没有婶，没有叔，没有侄儿和弟兄，
病无药，战无飞机和大炮，
哪有人把我们放在心上来关照。

1 月 20 日晚上，日军突破了纳蒂布山坡右翼阵地，麦克阿瑟的阿布凯前沿防线开始崩溃。第二天，温赖特将军的左翼阵地遭到猛烈空袭，也开始崩溃。后备部队紧急调上去支援那摇摇欲坠的前线。“我亲自选择和准备了这个阵地，它是固若金汤的。”他发电向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作出保证，“我打算血战到底，誓与阵地共存亡。”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士兵们仍在奋力拼搏。

东条英机为了尽快解决菲律宾战场的僵持局面，3 月间又增派两个步兵师团和两个炮兵团对麦克阿瑟展开新的进攻。就在这时，美国人为了保全面子，免得麦克阿瑟将军当了日军的俘虏，艾森豪威尔以总参谋部的名义起草了一项命令，经罗斯福总统批准发到菲律宾前线，命令麦克阿瑟把军队交给温赖特中将指挥，让他自己到澳大利亚去担任新成立的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军总司令。3 月 11 日晚，麦克阿瑟携夫人和四岁的儿子，乘着巴尔克利上尉的鱼雷艇偷偷地离开了科雷吉多尔。在尔后紧张的 45 小时里，巴尔克利指挥的 PT—41 艇穿过被日军控制的海面，于 3 月 13 日天亮的时候，在棉兰老岛北岸靠近台尔蒙菠萝罐头厂附近靠岸登陆。下船时，麦克阿瑟脸色苍白，眼圈发黑。他对巴尔克利说，他要为他和艇上的人申请银星章。“你们把我从虎

口中救了出来，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麦克阿瑟的临阵脱逃，在美国军队中也引起了对他的蔑视。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老麦把他们抛弃了，所以当时军队中流行着一首用《共和国战歌》的曲调写的讽刺歌曲：

老麦老麦不窝囊，
做事谨慎不能算胆小，
罗斯福造的金星他得保护好。
四星上将和巴丹的美味一样少，
可知他手下的士兵饿得心直跳。

东条英机这位战争狂人，为了污辱美国人，原准备把麦克阿瑟生擒后，弄到东京游街示众，不料麦克阿瑟却溜之大吉了。为此，他恼羞成怒，随即命令本间将军再次发动声势更大的进攻。4月2日，夜幕降临时，五万名日军已集结待命，准备大举进攻。在他们后边，150门大炮、榴弹炮和追击炮，准备进行这次战役开始以来最猛烈的炮击。在前线的另一边，是78000名饿得发慌的美军和菲律宾军，其中只有27000人是列为“有战斗力”的人员，而这些人中间，却有3/4的人因患过疟疾而身体虚弱。第二天，4月3日10点钟，炮击就开始了。在日军强烈炮火的攻击下，美军和菲军乱作一团，纷纷弃阵而逃，有的走小路，有的翻山越岭，有的则沿着海岸公路跑。到处是混乱，这些精疲力尽的人在恐怖的驱策下迈动着脚步。

在日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下，4月9日，吕宋部队司令爱德华·金少将率部投降，76000名美军和菲律宾军作了日军的俘虏。科雷吉多尔要塞守到5月6日。到了7日深夜，美远东军司令温赖特将军通过马尼拉电台命令菲律宾所有的美、菲军队无条件投降，拒绝投降者以逃兵论处。尽管如此，棉兰老岛的36000名军队，只有7000人（主要是美国人）向日军投降，其余29000人拒绝服从命令，带着武器上山打游击去了。至此，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菲律宾所有重要的城镇和港口，菲律宾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入艰苦的抗战阶段。

面对美军在菲律宾的悲惨处境，艾森豪威尔痛苦不已。在这支美国驻军中，他个人有很多亲密的朋友。他也对他曾经帮助建立的菲律宾部队的失败负责。最难以忍受的是麦克阿瑟的指责，他说陆军部有意牺牲菲律宾群岛，而最使他痛心的是，这个指责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他本人也是深感无能为力的。

在这期间，艾森豪威尔虽然没有什么显著的成就，但他的工作非常繁忙。经常工作到深夜，没有星期天。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最使他心烦的是，每天从前线收到的都是令人沮丧的失败消息。他想上战场，和部队在一起，不愿意坐办公室。他抱怨说：“天啊，我多不愿意按照任何迫使我依赖别人的方式去进行工作。”对于整个战时华盛顿的情况，他说：“这里常常高谈阔论，拍桌子，但是没有几个实干家。他们轻率地预先宣布结果，而且虚张声势，但是结果常常没有实现，而做实际工作的人却倒霉。”

3月10日，艾森豪威尔的父亲戴维·艾森豪威尔老人去世。他的儿子不能前去奔丧，仅仅有时间把这一件事记在日记上。第二天艾森豪威尔写道：“战争并不是温情脉脉的，没有时间去沉溺于甚至是最深沉、最圣洁的感情中。”那天晚上，他在7时30分停止工作。他说：“我没有心情在今晚继续工作。”3月12日是在阿比伦举行葬礼的日子，他把办公室的门关了半小时，

来悼念他的父亲和写一篇悼词。他称赞父亲“诚实、朴素、勤劳”的高尚品质，和“不好表现、谦逊和沉着的举止”。“我以他是我的父亲而感到光荣，”艾森豪威尔写道，“要让他知道我爱他有多深，总是那样困难。”

艾森豪威尔感到精疲力尽。他对于他的国家对这场战争毫无准备，对麦克阿瑟和海军金上将进行这场战争的方法，对陆军部把他拴在华盛顿，感到愤怒。有一天他几乎对马歇尔大发脾气。他在日记上写道：“想到战争中在华盛顿消磨时间，又一次失掉作战机会，气得使人发疯。看来是太不公平了。马歇尔的冷漠、不近人情的态度使人更为恼火。”他咒骂马歇尔捉弄他，咒骂战争和他的运气不好。第二天早晨，艾森豪威尔读了自己写的日记，摇摇头，把它从日记本上撕下毁掉了，他发誓遇事要沉着冷静，绝不要放纵自己。

过了一个星期，马歇尔推荐艾森豪威尔晋升为少将（临时任命），实际上马歇尔一直在提拔艾森豪威尔，不断加重他的责任。1942年1月，这位参谋长带着艾森豪威尔作为自己的主要助手，出席与英国举行的第一次战时会议，并交待艾森豪威尔草拟表明美国对于全球战争的组织 and 战略的基本立场的文件。2月中，他派杰罗将军回到战场去指挥一个师，任命艾森豪威尔为作战计划处长，从而艾克成为他的主要制订作战计划的军官。3月9日，作为重建陆军部的一部分，作战计划处改为作战处，职权扩大，艾森豪威尔担任处长，作战处有107名军官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人员，尽管努力工作，但前方战局并没有得到明显的好转。在南亚，日军占领菲律宾后，又侵占了荷属东印度。就在爪哇投降的第二天，日本夺取了仰光，切断了滇缅路的入海通道。用澳大利亚外交部长赫伯特·伊瓦特博士的话来说，当时的局势“简直绝望了”。日本的太阳旗真的在南洋各地升起来了。不到半年日本侵占的领土已达380万平方公里，超过日本本土面积的十倍多，人口达15000多万。而这些地方的安全，原来多半是靠大英帝国的力量来维持的。目前，这个传统的力量在苏伊士以东显得异常脆弱。当时美国的困境，是罗斯福做梦都想不到的。

在那个时期，海上的运输情况也十分不妙。向苏联输送军需品，以及向英国运送军火和支援非洲与中东的作战，由于大西洋战争的新发展而严重地复杂化了。1月中旬，德国向美国发动攻势。德国在这一方面唯一适用的武器就是潜水艇，它现在已成为十分令人恐怖的有效武器了；而防御办法的差劲实在是令人寒心。德国潜水艇竟然钻到可以望见纽约百老汇光芒的地方，在距离东海岸几百码的范围内，击沉了许多船只，使美国蒙受了重大损失。

损失的数字从这多灾多难的冬季所公布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来。德国潜水艇在一、二月份，在大西洋击沉了132艘轮船。这种损失的意义在哈佛大学历史教授莫里森从一本海军训练手册中摘引的材料里，可以得到深刻的说明：“德国潜艇1942年在我们大西洋沿岸肆虐的恶果，有如我们最大的6个战备工厂遭到怠工者摧毁后所引起的全国性灾难……如果一只潜水艇击沉两艘载重6000吨的轮船和一艘3000吨的油船，我们的全部损失大约像下面的统计：坦克42辆，六英寸口径榴弹炮8门，弹重25磅炮88门，弹重两磅炮40门，装甲车24辆，履带式小型装甲车50辆，弹药5210吨，步枪600支，坦克补给品428吨，军需品2000吨，汽油1000桶。”

艾森豪威尔对海军不够重视大西洋战争生气，他曾多次向罗斯福总统和国防委员会建议，加强陆海空兵种的协作，采取积极、灵活的进攻战略，改变目前到处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令人伤脑筋的事还不只这些，恐日病、

害怕战争、机构不灵等所引起的混乱也足够使人犯愁。最典型的一次是，当一艘德国潜水艇在圣巴巴拉附近的海面出现，向一个牧场发射了几发炮弹之后，南加利福尼亚州又发生了另一次骚动。洛杉矶附近忽然响起空袭警报。驱逐截击机行动起来，高射炮砰砰地作响，结果是一场虚惊。可是，好像陆、海军在一次麻烦之后还嫌不够劲，出事的第二天晚上，华盛顿竟然响起两次空袭警报。这样一来，罗斯福总统才不得不直截了当地质问陆军部，到底是谁负责放空袭警报，又是谁负责向报界解释这几起事件，并让他们采取有效措施，坚决杜绝这类荒唐行为。

正是在灾难一个接一个、不愉快的事情连续发生的日子，英国首相丘吉尔于圣诞节前夕抵达华盛顿。这位精力充沛的政治家一来到美国首都就到处发表演说。他对美国议员们说：“我们并无窥测未来奥秘的天赋；但是我仍然要声明，我的坚定不移的希望和信心。这就是在未来的岁月中，英美两国人民，为了他们本身的安全，也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将要庄严、正直与和平地并肩前进。”

圣诞节过后，丘吉尔及其随行人员与以罗斯福为首的美国军政要员，举行了以“阿卡迪亚”为代号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建立一个联合指挥体制，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总部设在华盛顿。“确定希特勒是主要敌人，认为太平洋战争暂时必须是一场固定阵地的战争，目前主要是阻止日本人的进攻。”为了便于联合作战，统一对敌，会议还决定在太平洋地区建立 ABDA（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联军司令部，由英国韦维尔将军任总司令。“阿卡迪亚”会议持续了两周。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宣言》，对加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有着重要的作用。

艾森豪威尔参加了“阿卡迪亚”会议，他和英国总参谋部的将军们建立了和谐、友好的关系，他对世界战局情况的介绍和分析，给罗斯福和丘吉尔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会后，马歇尔让艾森豪威尔起草发动第一次进攻的计划。艾森豪威尔把2月份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件工作上。他的总的看法是简单明了的：“我们必须使苏联打下去，并且守住印度。然后我们准备好通过英国打垮德国。”他主张动作要快，因为德国人肯定在1942年春将对苏联发动另一次攻势，英美应在西欧尽快地开辟新战场。

“如果要快，那么向哪里呢？”艾森豪威尔建议“向西欧进攻”。他指出当前盟国最主要的问题是缺少船只；而进攻西欧的海上路线是最短的。无论如何，必须维持驶往英国的海上通道，因此不要分散护航的军舰。他强调，美军在英国建立基地这件事本身，将对法国沿海构成威胁，从而迫使德国保持并增加他们的防务。西欧的铁路和公路网“比可以对敌人发动进攻的任何地区中可通行的铁路和公路网都优越”。英国已经有着空军大部队可以起飞作战以取得空中优势的一些机场，这是进行成功的攻击必不可少的条件。

到了3月下旬，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人员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具体计划，代号是“围捕”，计划要求有一支5800架作战飞机的空军，和最后总数达到48个步兵师和装甲师的部队，其中半数是由英国的。在1943年4月1日对塞纳河口东北，勒阿弗尔和布伦之间的一段法国海岸发起攻击。与此同时，应在海岸沿线发动突然袭击和空袭以扰乱德国人。

美国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把艾森豪威尔的计划递呈罗斯福。美国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这个计划，并要马歇尔飞往伦敦，取得英国的同意。马歇尔4月7日动身，在伦敦举行了为期六天的会议。英国最后同意了“围

捕”计划，虽然马歇尔归来时告诉艾森豪威尔，很多英国军官“持保留态度”。艾森豪威尔在他日记中写道：“我希望，经过几个月由于这种分歧而引起的斗争后，终于我们全都肯定地保证接受同一个作战概念。如果我们能在主要目的和目标上意见一致，我们的努力将开始协调一致，我们就不会只在黑暗中摸索。”

为了便于贯彻实施这一计划，5月23日艾森豪威尔前去英国实地考察。在英国的十天中，艾森豪威尔与英国各界人士，特别是与军界进行了广泛的接触。6月8日，他将一份对欧洲战区司令的指示草稿呈交马歇尔。欧洲战区（European Theatre of Operation）是艾森豪威尔为伦敦司令部所起的名字。艾森豪威尔极力主张“战区司令应实施绝对统一的指挥”，战区司令应组织、训练和指挥派往该战区的美国陆、海、空部队。艾森豪威尔把草稿交给马歇尔时，他请求参谋长仔细研究，因为这份草稿可能成为进一步进行战争的一个重要文件。

马歇尔接过这个文件，思索了片刻，然后问道：“艾森豪威尔将军，你认为谁担任欧洲战区司令合适？”

“我认为麦克纳尼将军最合适。”艾森豪威尔说，“我知道他以前在伦敦工作过几个月，对英国三军军部的工作非常熟悉，并在那里还结识了许多军政要员。此外，很明显，从大不列颠发动最初的军事行动将限于空中袭击，因为从进攻计划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强大的空军部队建立后的初步行动，将是发动一场持久而猛烈的轰炸战役。最后，我知道，麦克纳尼将军坚决相信，空军有力量使盟军从陆地进攻法国成为可能。”

但是，总参谋长没有接受这个推荐。过了三天，马歇尔将军经总统兼三军总司令罗斯福批准，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欧洲战区总司令。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章 出任欧洲战区司令

西欧战场欲动兵，艾氏受命总司令；
战备训练抓紧行，但愿早日庆战功。

艾森豪威尔将军被任命为欧洲战区美军总司令，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当他初次抵达华盛顿时，他最大的希望是指挥一个师的兵力。

马歇尔总参谋长是根据哪些理由任命艾森豪威尔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呢？毫无疑问，这纯粹出于工作上的考虑。与艾克共事使他深信，这是一位十分内行的军事领导人。艾森豪威尔沉着、稳健，是一位令人产生好感的将军，是解决英国和美国将军之间复杂的外交问题的合适人选。要知道，一个大国的武装力量实际上完全归外国的军事长官指挥，这样规模上的军事联合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在选择由谁担任欧洲战区总司令时，罗斯福和马歇尔就担任这个要职的几个人选，向英国的同僚征求意见。英国人答复说，艾森豪威尔是最合适的人物，和他容易合作。罗斯福和马歇尔考虑到相互关系问题确实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艾森豪威尔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

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对战争的战略问题有许多共同的见解。但是，这两位将军之间的私人关系从来没有越出过上下级从属系统规定的范围。马歇尔从来不像多数美国人通常所做的那样，对这位较年轻的同僚以“艾克”相称。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总参谋长常常称“先生”，表示对他的尊敬和保持他们之间的距离。马歇尔在1942年把艾森豪威尔送往英国的时候，却没有料到艾克会在司令官这个职位上直待到德国无条件投降为止。

1942年6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到新的、深信能有所作为的任命后，着手解决临行前有关的许多问题。他把自己在陆军部的工作，移交给汉迪将军。为了便于有效地展开欧洲战区的工作，他还分别拜访了陆军部长、海军部长和三军总司令罗斯福总统。陆军部长史汀生希望艾森豪威尔很快开始积极的军事行动，在集结军队和武器装备方面，他将给予坚定的支持。海军金上将，是一位斗志旺盛、性格坚强、做事果断而又举止粗暴的海军统帅。在谈话中他强调指出，艾克去英国进行的“这次冒险”，标志着美国三军第一次有意识地试图在战场上为这一无限期的战役建立统一的指挥。他保证将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支持这位名副其实的欧洲战区美军总司令。这位海军上将还诚恳地对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你认为海军有意或无意地违犯了战区司令部的规定，希望你随时和我进行个人联系。”无疑，这些活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那时以前，《指挥战地陆海军联合规定》曾强调说：在决定哪一军种拥有指挥职权和指挥责任时，应服从“最高利益”的原则。

稍后，艾森豪威尔拜访了罗斯福总统和正在白宫作客的丘吉尔首相。这次谈话虽然没有军事上的意义，但却是他第一次和他们两位的个别交谈。当时非洲沙漠地带的托卜鲁克刚刚沦入德军之手，忧郁笼罩着盟国世界。然而这两位领导人却没有一点悲观失望的表现。令人鼓舞的是，他们正在考虑的是进攻和胜利，而不是防守和失败。罗斯福要求欧洲战区在日后反攻方面，特别向希特勒巢穴进军时“发挥主力军的作用”。

为了使欧洲战区司令部迅速开展工作，艾森豪威尔要求把经验丰富、做事审慎的马克·克拉克将军带到伦敦去，马歇尔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当艾森豪威尔还是个优秀的参谋人员的时候，他知道伦敦使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由谁来主持他的参谋部工作。他看上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秘书沃尔特·史密斯将军，马歇尔也同意了，并任命史密斯作为欧洲战区的参谋长。艾森豪威尔还邀请早些时候同他一起工作的陆军部的李少校和海军军官哈里，巴瑟同他前往伦敦。所有这些人无论从工作，还是从私交来说，都是他十分熟悉的。他完全可以指望他们协助他来完总统或统帅部交给他的新的重大任务。

正当艾森豪威尔准备起程前往伦敦的时候，突然传来了他49岁的弟弟罗伊猝然去世的消息。艾森豪威尔因公不能前去参加葬礼。与此同时，19岁的约翰从西点军校来到华盛顿与父亲告别。儿子探亲的时间并不长。军纪和不愿有损父亲的威望，都不允许约翰在首都久留。第二天，他亲吻了母亲，与父亲握手话别后就返回军校了。

德怀特在家门口与妻子告别。他不让玛咪去机场送行。“但是，我想在旗杆旁看到你。”他说。在约定的时间里，当飞机在华盛顿近郊，迈尔堡要塞的艾森豪威尔家上空掠过时，在旗杆的底座旁，德怀特看见了小小的人影，飞机向西飞去。

6月24日，艾森豪威尔抵达伦敦。在机场上没有乐队欢迎他，他没有发表演说，没举行任何仪式。在他的一生中，这差不多是他最后一次不声不响地到达一个地方。艾克在抵达英国首都的第二天，为英美记者举行了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从那时起，他的生活起了巨大变化，他突然变成了世界性的重要人物。第二天，他的名字，他的任命，成了伦敦报纸上的头版头条消息。

在记者招待会上，艾克的举止谈吐质朴自然，对记者的友好态度，和颜悦色的微笑，给与会者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他们对他讲话的内容感到相当失望。正如《纽约时报》记者报道的，艾森豪威尔“出色地表现了有声有色的谈吐艺术，但是有关日后的军事行动，他什么也没有透露”。

当时驻在英国本土上的美军还很少，只有55000多人。为准备美国参加进攻欧洲大陆而开辟欧洲美国战区，是英美两国政府一致同意的击溃德国的主要战略行动。“欧洲战区指挥将领的任务将是在欧洲战区准备和实施军事行动，以反对轴心国及其同盟。”美国政府关于建立欧洲战区的指令进一步说，“欧洲战区的指挥将领，将指挥现在和以后派往欧洲战区的所有美国陆军，包括被派遣去与陆军协同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在内。”

指令说：“在海军部和陆军部的同意下，指挥将领将对指定在这个地区参加战斗的所有海军实行计划指挥和作战指挥。”

指令最后强调：“欧洲战区的指挥将领在英伦三岛应服从防止损害英国主权所必需的一些限制，担负起战区司令官在战术、战略、地区防卫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职务。”

艾森豪威尔的欧洲战区，面临着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他要把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组成一支能够完成重大战斗任务的武装力量。德国占领的一系列国家新编反法西斯部队的代表人物，应该在未来登陆部队中发挥相当的作用。民族的特点和传统，代表各国的将军之间不可避免的竞争，更不用说军队进行战斗训练的方法、装备和语言的不同，所有这一切都对艾森豪威尔提出了严重的问题。他在回忆录里提到了他对于在英国将要遭遇的困难是完全清楚的。

他认为，当时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加强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团结，不允许激起强烈的民族感情。而这种危险却是完全存在的。艾森豪威尔在到达

伦敦后不久，就在美国军人中间进行教育工作。他甚至不惜采取这样坚决的措施，将那些有伤害英国人民感情行为的美国军官送回美国去。有一个美国上校同英国军官发生争执后，艾森豪威尔对他说：“我同意你的证据，承认在争论中你是对的，甚至对于你骂他是坏蛋，也可以不予追究。但是，你骂他是英国坏蛋，为此，我要把你送回家去。”

许多人认为，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这个具有如此重大意义的职务的人选，从业务角度来看也是合适的。他在未来的登陆战役中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实现这个复杂的军事行动，要求做大量的准备工作，需要艾森豪威尔这位参谋人员的多年经验和他的组织能力。在面临的战斗中，空军的作用非常大。艾克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对于与空军有关的问题是熟悉的。装甲部队应该成为进攻的联合部队的主要支持力量，而艾森豪威尔是美国坦克部队最早的组织者和创建者之一。但是，无论从业务还是声望上来说，他还面临着许多困难。他不仅在英国军队中，而且连在美国军队中，也鲜为人知。战前，他只是个中校，而且没有任何战斗经验，在战时甚至从来没有指挥过一个连。最后，艾森豪威尔不久前才临时被授予少将军衔。当德怀特来到伦敦时，由他管辖的有 366 名将军，他们的军阶都比他高。

当艾森豪威尔布置他那设在英国的参谋部的工作时，他显然想起了麦克阿瑟的官僚主义作风，于是他对部下说：“我们将在最大限度地不搞形式主义的条件下进行工作，不是为了向上级写工作报告，而是为了获得战争胜利。我始终将竭力做一个对你们有用的人，但是我要求你们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依赖我。”

通过他的勤快和朴实的办事作风，他逐渐与英国同僚们建立起了联系。但是还有不少难处。这首先是与英国军事长官蒙哥马利的关系。艾森豪威尔初到伦敦时，就与蒙哥马利发生了不愉快的事情。德怀特被邀去听他的讲演。在这位英国将军开始讲话不久，嗜烟的艾森豪威尔烟瘾上来就抽了两口。报告人立即用愤怒的声调大声问道：“谁在抽烟？”艾森豪威尔回答说：“我。”蒙哥马利严厉地申斥道：“不准在我的会议室里抽烟！”德怀特默不作声地把烟掐灭了。这件小小的、不愉快的事情没有使艾森豪威尔对待蒙哥马利的态度产生不良的影响，并没有因此动摇他对这位英国将军的看法。他说蒙哥马利是“性格坚毅、精力充沛、具有良好的职业修养的人。”但是在 1944—1945 年的欧洲战斗中，固执的蒙哥马利未按统一布置行动，另行其事，把艾森豪威尔气得够呛。

来伦敦后，艾森豪威尔到礼仪讲究的俱乐部去过几次。他了解到，许多俱乐部禁止吸烟，对光顾者的举止有极严格的详细规定。有一次艾森豪威尔白白浪费了整个下午时间。他认为拒绝与挪威国王共进午餐是种失礼。但是，却发现谁也无权先于国王离席而去。国王显然兴致很高，怎么也不想离去。而参谋部有急事等他去处理。7 月 4 日，美国的独立日，艾森豪威尔由于职务关系去美国大使馆。这天他握手 2600 次。这大多了，以后他就有意回避这类礼节。对于任何礼宾会见的邀请，他喜欢这样作答：“我不能去，我们在柏林见！”

但是，艾森豪威尔和新闻界却有着良好的密切关系。他经常举行记者招待会。艾克在 51 岁那年第一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以后 20 年中，举行了 500 多次记者招待会，取得很大成功，他很快证明，他不仅在与记者打交道的方法方面，而且在谈话内容方面，都是一个天才。

艾森豪威尔善于处理公共关系，而且他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对他的事业有着重要的意义。他随便和不拘礼节的风度，像他的绰号“艾克”一样，很有感染力。当他坦率地谈到前面的困难，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时的态度，以及生动热情的话语，同样感染着听众。他的传记作者安布罗斯说，艾森豪威尔习惯使用立刻表明他是普通人的身分的措词。他会谈到谁“晓得来龙去脉”，谁是老滑头，或者他会说“我告诉他不要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他称他的上级是“大亨”，是“老板”。他无数次提到“我的老家，阿比伦”，并把他自己说成是“头脑简单的乡下佬”，对问题叹息着和皱起眉头回答说：“对一个像我这样笨手笨脚的家伙来说，简直是太复杂了。”

公众听到关于艾森豪威尔的事情越多，也就越喜欢他，报纸上关于他的报道也就越多。关于他喜欢简朴的故事广为流传。当他到达伦敦时，在当时伦敦最豪华的克拉里奇斯宾馆为他留出一套房间，最大的方便之处是离伦敦美国区心脏地带格罗夫纳广场 20 号他的办公室只有三个街区。格罗夫纳广场是美国使馆所在地，广场周围大部分的办公楼，或者由美国国务院占用，或者由陆军或海军人员占用。因广场上的美国人多，英国人称该广场为“艾森豪威尔广场”。艾克初来到这座豪华的贵族宾馆很不习惯，坐卧不安，感到住在这里是活受罪。一个星期后，他搬到一家比较朴素的多彻斯特宾馆。在这里用不着走多远就可以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迁到海德公园街对面。当时海德公园到处布满高射武器。在多彻斯特，他有三个房间，一个为多用途的起居室，两间简朴的卧室，艾森豪威尔住一间，他的联络副官布彻住一间。德怀特勤奋工作为部下作出了榜样。这位将军早晨 6 点一刻起床。他每天工作不少于 12 个小时。他常常过了午夜才就寝。通常在睡前喜爱看描写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西部生活的小说，玛咪定期从美国将这种最新小说给他寄来。艾克认为这是最好的读物，因为看牛仔史“不用思考”。

艾森豪威尔的家庭出身引起了记者们的广泛兴趣。记者们聚集阿比伦，访问艾达和艾克童年时代的朋友。他们对自己所找到的东西感到高兴，读者也是一样。这是一个穷孩子成名的美国传统主题。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是出生在一间木屋，得克萨斯州丹尼森的那间棚屋根本无人知晓；如果他的家不是那样贫寒，他的家也就不会出名。玛咪也受到记者的包围。她寻求并遵从米尔顿的劝告。米尔顿说，美国人民有权了解带领他们的孩子上战场的人。玛咪有责任与记者合作。玛咪力图将她所同意的采访限于她丈夫的问题上，但是关于她的情况也不少。她被拍摄不少照片，成了知名人物。

艾森豪威尔的公共关系意识，远远超越他自身范围。他利用报界来宣传盟国团结的思想，他认为美英友谊是最后胜利的绝对必要的条件，并尽力使之成为真正的和持久的友谊。1942 年夏天，他的主要努力是处理好英国公众与来到英伦三岛的美国士兵、飞行员和水手之间的关系。人数不断增长，最后有 200 多万美国年轻人来到英国。在一个只比科罗拉多州稍大的岛上，这些人的住、吃、训练和装备问题，都要在已经住得很挤、营养不良的本地居民中间解决。

除此之外，美国士兵把自己看成是前来解救英国的勇士，而英国人则把自己看成是曾坚守住堡垒的人。美国兵的军饷在世界上是最高的；他们大部分没有结婚，他们毫不在乎地花钱。英国人看到这些年轻人任意挥霍，而他们的女孩子极力追求一些年轻人，大为恼火。伦敦人普遍认为，美国兵钱多，吃得好，并对他们的浪费感到震惊。

艾森豪威尔着手改善这种形象。他命令他的指挥官们，发起一场整顿纪律的运动，说服士兵们把一部分钱购买战争公债，以减少乱花钱。他要美国士兵知道英国人民过去和现在所作出的牺牲。他制定了以英国风俗习惯来教育部队的计划，他命令组织参观伦敦，重点放在被炸成废墟的地区。他要他的指挥官们整顿美国士兵的军风纪，并加强对士兵们进行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教育。他说：“要使英国人相信，我们到这里来不是糊里糊涂地混日子，而是肩负重任的反法西斯战士。”

艾森豪威尔对于派到他这里来的年轻人的实际情况和作战能力，比对他们的外表和军人举止更为担心。他主要关心的是纪律和士气，大部分美国士兵受过良好教育，有独立思考能力，但他们缺少军事训练，吃不了苦。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视察在野外的部队，监督他们的军事训练，向军官和士兵们解释演习的目的。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指挥官们，他要在英国建成一支“美国勇于投入战场的最优秀的部队，他们不仅有良好纪律，而且具有强大的作战实力”。为此，艾森豪威尔的职责之一是挑选优秀的指挥官。他的选拔标准是：首先指挥官要具有坚强的意志，通晓当今的军事技术，勇猛顽强，多谋善断，在艰难的条件下能带领部队打硬仗，打胜仗。对于那些沽名钓誉、油腔滑调、花言巧语、作风不正的人，一经发现，就立即把他们清洗出去。

基于这样的原则，艾森豪威尔组建了一个短小精干的领导班子。他的参谋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是“一个得心应手的人”。史密斯善于处理日常事务，也长于清醒地理解重要问题。艾森豪威尔说：“由于史密斯认真、勤奋和忠诚，他既能处理麻烦的协商，又能从事专业工作。他性格坚强、举止果断，对人既不迁就，又能融洽相处，这些优点使他在欧洲的军界和政界赢得了令人羡慕的声誉。他于9月7日到达伦敦，从那时起，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一直维持着个人友谊和公务联系。”

当计划清楚地表明参战兵力最后要达到数百万时，艾森豪威尔决心避免使地面部队在一开始就发生机构臃肿的弊病。最初，他只把第二军调到伦敦附近来，把该军司令部作为地面部队的最高一级司令部，并委派克拉克将军负责指挥。克拉克是一位有经验的司令官，由于他的高超的组织指挥才能，避免了部队大量集中、突然出现许多高级军官而引起的混乱现象。

约翰·李少将负责供应处。他一到职，就马上开始进行一系列繁重的工作，如准备港口，修建仓库，平整机场，建盖营房，修理设备，这些都是从英国基地发动进攻前所必需的。在约翰领导下，后勤工作井井有条，取得了十分令人瞩目的成就。两年以后，盟军在横渡英吉利海峡发动进攻时，英国已成了一个巨大的前进基地。当时有人开玩笑说：“只有在英国上空经常飘浮大批防空气球，才能使英伦三岛免遭沉海之灾。”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1942年7月7日，美国政府授予艾森豪威尔中将军衔。他的官运亨通是没有先例的。这是16个月中的第四个军衔。约在一年前，他当上了准将，这是当时他最大的奢望，而今已经是美军16名中将之一。

当时苏联战场打得火热，希特勒以266个师的兵力集结在苏德战场上。苏联军民浴血奋战，继粉碎德意法西斯军队对莫斯科的重点进攻后，又向敌人展开了有力的反击，所有这些为从西方对德国进行战略性突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1942年，美英的军队约有1000万之多，而军事政治形势要求它们最终给法西斯德国以决定性打击。这是给肩负战争主要重担的苏联以有效的援

助，加速击溃法西斯轴心国和减少损失的唯一可行的办法。

根据早先盟国之间达成的协议，1942年7月中旬，罗斯福总统派总参谋长马歇尔、美国海军总司令厄内斯特·金和总统顾问霍普金斯飞抵伦敦，商谈尽早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在英美参谋长联席会上，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主张强渡英吉利海峡，直接打击德国。由艾森豪威尔负责拟订的“大锤”计划，建议在法国勒阿弗尔附近登陆，由英国人指挥，美国两个师参加，其余为英国部队，目标日期是1942年9月15日。这一计划提出后，遭到英方的断然拒绝。英国参谋总长布鲁克将军当面顶撞马歇尔，嘲笑“大锤”行动。他轻蔑地指出：“如果这一行动失败，对俄国人没有好处；而即使六个师这样的规模能够成功，也不会把德国部队从东线吸引过来。”马歇尔坚持必须采取一些行动来帮助俄国人，而“大锤”行动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双方争持不下。

那天，艾森豪威尔没有参加会议，他为会议的结果坐立不安，焦躁地等待着会议的结束。他在日记中写道：“有待作出的决定不仅是非常机密的，而且是极其重大的。”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人员彻夜未眠，等待着会议最后的消息。他们认为：“要做一些事情向俄国人表明，西方盟国真正是站在他们一边；要做些事，使英美人民感到他们在努力做些有积极意义的事，”在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争论中，布鲁克坚持认为“大锤”行动风险太大，得不偿失。因此，他争辩说，法属北非是理所当然的进攻目标。

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认为布鲁克的这种想法是荒谬的，德国大量部队驻扎在离多佛不到25英里之处，可是为什么要赶到伦敦以南将近1000英里之外去寻找敌人作战呢？马歇尔公开表示，进入北非将会分散许多力量，从而使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大大推迟。7月22日，马歇尔致电罗斯福，承认他和英国人已经陷入僵局，罗斯福复电说，由于英国不愿参加“大锤”行动，美国将不得不在进攻北非方面和英国人合作。丘吉尔给这次新的行动起了个代号：“火炬”。这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的英美首次联合进攻。

“大锤”计划的被否定，使艾森豪威尔感到十分沮丧。7月23日早晨，他告诉他的地面部队司令马克·克拉克：“哎，我真不知道日子怎么过。”他认为1942年7月22日星期三，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他所以反应这样强烈和采取这样极端的观点，因为他认为进行“火炬”行动的决定，否定了“盟国可能做些事情来帮助俄国人的想法”，并且到北非去的行动，代表着消极的、防御性的作战思想。

在那些日子里，艾森豪威尔的情绪非常不好，他写信向玛咪诉苦说：“我感到孤独，我常常受到人们的包围，因为我生活在金鱼缸里。我无家可归，我感到奇怪：为什么玛咪不在这里？”像在第二次大战中千百万其他美国人一样，艾森豪威尔也不得不碰到同自己妻子的通信问题，由于安全原因，不能打电话，不能同她商讨工作，写信时只能说“我爱你”，或者像艾森豪威尔自己所说的那样：“我手里拿着笔，心里想着：我除了告诉她我身体好，还是像以前一样爱她外，我还能说些什么？”在整个战争期间，他一共写了319封信给玛咪。在她46岁生日时，艾森豪威尔告诉她，“我26年来一直爱你”，“你的爱和我们孩子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

就是在这前后，凯·萨默斯比渐渐地进入了艾克的生活圈子。她是个高个儿、身材匀称的黑发姑娘，英国人暂时把她派到艾森豪威尔这里当私人司机。当凯初次驾车接送艾森豪威尔的时候，姑娘感到十分失望，因为她的主

人只有一颗星。凯的女伴们的主人军阶都比较高，这使她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但是，艾森豪威尔对司机的关注使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好转。后来，将军的迅速升迁满足了司机的奢望。她现在可以在自己的女伴面前，炫耀“自己”的主人有较高的军衔和他的待人和气。何况她还不只一次地驱车接送过温斯顿·丘吉尔本人。当首相情绪好的时候，喜欢开几句玩笑。有一次首相对凯说：“别把艾克将军弄丢了。”但是，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凯“没有把艾克弄丢”，她与他在一起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当她得到了军官的衔位后，成了西方盟国武装力量总司令的秘书。

在准备未来的战斗时，盟国将有主力量和技术装备运往不列颠群岛。到了8月底，盟军总部的组织问题解决了。经罗斯福和丘吉尔商定，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为盟军总司令，负责筹划和指挥“火炬”战役的工作。一场在北非登陆的战役就要开始了。正是：“大锤”行动被否定，“火炬”战役开始行，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八章 运筹“火炬”

火炬战役总司令，精心策划巧用兵：

团结盟军齐破敌，静听北非报捷声。

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进行“火炬”战役以代替“大锤”行动之后，丘吉尔就建议罗斯福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担任这一战役的总指挥，亚力山大将军担任副总指挥。双方商定这一计划提前执行。英美联军将于1942年11月8日在法属北非登陆，然后再由西向东对德意发动进攻，以彻底歼灭北非的德意军队，控制地中海，巩固中东，为尔后在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军事行动创造有利条件。这是丘吉尔梦寐以求的事情。

“法属北非”，包括法属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端，东面和东南面与阿尔及利亚为邻，南面与西属撒哈拉接壤，西临大西洋，北隔直布罗陀海峡与西班牙相望，是扼地中海入大西洋的门户，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1912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北部狭长地区和南部的一个地区划为西班牙的“保护地”。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的西北端，北临地中海，隔海与西班牙、法国相望，东部与突尼斯、利比亚接壤，南部与尼日尔、马里、毛里塔尼亚交界，西部与西属撒哈拉、摩洛哥相邻，面积约238万平方公里，1930年起沦为法国属地，突尼斯位于非洲北端，北面 and 东面临地中海，隔突尼斯海峡与意大利相望，东南与利比亚接壤，西与阿尔及利亚相邻，面积约16万平方公里，1881年为法国的“保护国”。法国投降后，维希政府在“法属北非”约有军队20万人，飞机500架。在法国的土伦和“法属北非”各港口尚有4艘战列舰，12艘巡洋舰，约40艘驱逐舰，20多艘潜艇和其他舰艇，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法兰西在北非的军政官员受维希政府管辖。他们以叛徒哲学为自己辩护，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认为1940年他们向希特勒投降是遵照合法的贝当政府之命行事的，因而也是合法的。相反，在他们心目中，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戴高乐将军和法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抵抗运动，倒反而是非法的，因而把他们视为仇敌。同时，由于英国政府支持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并且曾同维希的武装力量发生过几次冲突，所以北非法国当局的反英情绪也很强烈。鉴于这些情况，盟军的这次登陆作战是打着美国旗号，形式上表现为纯粹是美国的军事行动。对流亡伦敦的戴高乐将军也是严守机密，因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他抱有成见，怕他参与其事会引起北非法国当局的反感，同时也怕他泄密。11月5日，罗斯福总统给丘吉尔的电报说：“任何使戴高乐参与‘火炬’计划之举，均将对我们的努力争取在非洲的大部分法军归附我方远征军这一大有希望的工作，产生不良影响，我对此深感忧虑。因此，我认为你在登陆成功以前，还是不把有关‘火炬’计划的任何情况告知戴高乐为宜。登陆成功后，你可告诉他说，经我同意，英美远征军的美国司令官，坚持对此事严守秘密，这是一种必要的安全措施。”

且说艾森豪威尔，自从任命他担任“火炬”战役的总指挥后，他感到身上的担子沉重。这是一场大规模的两栖登陆战役。他的第一项任务是挑选美英军官来充实进攻非洲所需的指挥机构和参谋机构中的各个关键职位。由于他所指挥的是一支多国部队，因此在筹划组织参谋部的过程中，他尽量使每一个部门既有美国人，又有英国人。号召大家互相尊重，友好相处，为胜利

完成“火炬”战役而竭诚合作。

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道：“考虑到1942年8月初我们在伦敦所遇到的问题，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决意要在那一年发动一场认真的进攻，在进行准备工作时就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因为夏季已接近尾声，适合于作战的天气即将消逝，各项工作必须分秒必争。”在所有问题中，首先必须解决部队的运输和集中问题，直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个政府曾经试图完成那样一次从基地跋涉万里，并以一场重大的进攻为归结的海外远征。

作为总指挥，艾森豪威尔最早碰到的、也是一直存在的问题之一，便是确切判明哪些陆、海、空部队能在这次军事行动中加以利用。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司令官随着一项总的目标的确定，接到一份具体的部队分配情况的报告，然后据此可拟订他的战略计划，并辅之以详细的战术计划、编制计划和后勤计划。而在这一次，形势不清楚，兵力和供应的总数不知道，最终目标不明确，整个事情中唯一的肯定因素是美英两国统帅的进攻指令。但是，有关大兵团的战略、战术，登陆艇和船只的获得，海军后援部队的分配，空军部队的编制，出国部队集中地和训练基地的准备，前期与后期给养的安排，对每一支进攻的部队的每一个单位的实际组合，所有这些问题必须尽快地作出正确的处理。哪一环节出毛病，必将影响全局，因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在制定计划中，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部，第一件必须做的事是决定进行攻击的地区和动用的力量。早在1942年1月，英美两国政府曾考虑过一项称之为“体育家”的计划，即由美国仅仅进攻卡萨布兰卡的计划，可是后来把它撂在一边了。那项计划的目标仅仅是让西非充当纳粹的潜艇基地。后来，把最初的“体育家”计划的范围扩大到和英国一起对地中海区发起一场进攻，即是现在要进行的“火炬”战役。在为这场远征选定登陆地点时，艾森豪威尔首先考虑的是“从我们的护航舰队进入敌轰炸机航程内直至登陆完成为止的这一时期，能否为它们提供适当的空中掩护”。当时盟军航空母舰很少，提供空中掩护的重担，几乎全部得由以陆地为基础的飞机来负担，而为“火炬”战役唯一可资利用的基地只是直布罗陀。同时，由于海军护航和后援船只的不足，又只能把进攻的范围限制在几个主要点上。

经过反复研究，艾森豪威尔他们，在力所能及的最大范围内，最初指出了四个重要港口或港口地区作为理想的目标。它们从西往东依次是：大西洋海岸的卡萨布兰卡、奥兰、阿尔及尔，以及地中海的波尼地区。他们也曾考虑，对宾泽特—突尼斯城地区作一次成功的直接登陆将会获得巨大成果，可是那个地区远远超出了战斗机支援的航程，而且由于英国驶往马耳他的护航舰队曾经有过几遭覆没的经验，这项特别计划就被认为是超出了正当的冒险范围而很快地被放弃了。然而，若能尽早占领宾泽特—突尼斯地区，还是极其有利的，因为那样英美联军便能救援马耳他，并从陆海空三方面袭击隆美尔的供应线，这样就能保证非洲之战取得最后胜利。

艾森豪威尔说，对位于这条线另一端的卡萨布兰卡所以给予特别的重视，在当时其理由有两点。第一，卡萨布兰卡是蜿蜒于阿特拉斯山脉的那条向东穿过奥兰、阿尔及尔，最后直到突尼斯的漫长而破旧的铁路的终点。这条铁路的运输量虽小，但若德军决定从同它友好的西班牙挥戈南下，并以轰炸机和大炮使直布罗陀海峡不能被盟军用于给养的目的，那么，这条铁路却能为盟军提供一条微弱的生命线。如果没有这条破烂的、从卡萨布兰卡到奥兰的铁路，所有进入地中海的部队都会被截断归路，甚至想突围都要冒极大

的危險。

“卡萨布兰卡之所以重要的另一理由是，在那个地点强行登陆必然会对西班牙和摩洛哥的部落民族产生影响。”艾森豪威尔继续说，“要是我们不在那里登陆，那么法国的维希政权就很可能把那些好战的部落引向同我们发生公开冲突，而这种局面几乎肯定会给西班牙更有力的理由去站到轴心国一边进行干涉。”

根据上述理由，可以清楚地看出，不管哪种作战计划，奥兰和阿尔及尔两地是势在必夺。这两地都是重要港口，而且奥兰附近的飞机场对于日后的作战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对从直布罗陀直到前线一带——不管这些前线可能会在什么地方——施用短程战斗机时更为必要。阿尔及尔是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活动的中心，在战略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因此，如何确定突击的侧翼，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艾森豪威尔说，“一个方案是可以进攻卡萨布兰卡、奥兰和阿尔及尔；另一个方案则是进攻奥兰、阿尔及尔和波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真研究了很久。我个人终于赞成把全部兵力开进地中海。我相信，突尼斯城这个战利品如此之大，以致我们一开始登陆就应尽量选一个位于东面的、像波尼那样的地方。无可否认的是，著不在卡萨布兰卡建立起一个基地而想开进地中海，必然会冒额外的风险。可是我觉得既然我们已经在冒着不小的风险，那么不如孤注一掷，相信卡萨布兰卡在其东路被切断之后会自行陷落，要不就会被从奥兰沿铁路转回来的纵队攻克。我脑子里也很想避开在卡萨布兰卡登陆必然会碰到的自然条件方面的巨大危险。”

这一计划报送参谋长联席会议审批。美国参谋部反对从原先的进攻计划上抹掉卡萨布兰卡。他们认为尽管卡萨布兰卡——奥兰铁路的容量有限，盟军还是一定要迅速占领它，以作为万一轴心国对直布罗陀这条狭窄通道下手时的部分补偿。而且他们还相信，除非马上派一支强大的部队在摩洛哥登陆，不然的话，西班牙非常可能参战，或者允许德国人利用西班牙作为过道来包抄盟军的后方。他们反对在波尼作战的另一理由是，怀疑盟军在距离驻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轴心国空军部队如此近的地方，缺乏足够的空中掩护能力。按照这项决定，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的：“早日占领突尼斯城的可能性已从眉睫之下推移到远处去了。”

进攻地点问题决定后，下一项重大的问题是决定进攻的时间。气象报告指出，从初秋开始，天气将不断恶化。因此，时间就自然而然地成为重要问题了。一切都要按尽可能早地发动进攻来作准备。为此，甚至海、陆、空部队达不到所期望的实力时也应有所不顾。因为若要获得更强大的实力，就会意味着贻误战机。当时，轴心国对地中海的英国护航舰队的攻击不断地传来噩耗。有一支严加防卫的、由 14 艘货船组成的运输船队企图把物资运送到马耳他，可是在到达那里时，只剩三艘货船能继续航行，而其中一艘又在船坞沉没了。曾被划拨给“火炬”计划使用的航空母舰“鹰”号被鱼雷击沉了。海军参谋部接二连三地带给艾森豪威尔这类消息，而每次得到这样的消息，都使他对计划作进一步修订。然而，最使艾森豪威尔这位总指挥担心的是时间问题。非洲的西北海岸，在整个晚秋和冬季气候险恶，大西洋的滚滚波涛在海滩上翻卷，就连天气比较好的仲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不能等待“万事俱备”，必须及早行动。

在组织这一战役时，除了在军事上、物质上进行充分准备外，还必须考

虑到北非的复杂的政治因素。鉴于法国维希政府及其军人对英国怀有恶感，英美两国政府都认为，远征部队应该尽可能做到从表面上看上去完全是美国人。不过又认为同样重要的是，要让远征部队在人力方面多到足以使当地的法国政府和军事司令官们，能合乎逻辑地向维希政权和它的纳粹主子诉说遇到了“压倒优势的兵力”，从而以此为理由立即向盟军投降，并在以后实行盟军所希望的合作。

从开始设想进攻方案时起，两国政府就仔细考虑了让当时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参与“火炬”计划的可能性。他统率的部队曾经参加过那次倒霉的达喀尔远征，到头来进攻部队面对着当地维希法军的抵抗，不得不在一场混乱中撤退。英国人一直认为这场溃败的原因是伦敦的戴高乐司令部泄了密。艾森豪威尔说，“两国政府给我们的指示也许已染上了早些时候那次不吉利的经验的色彩”，要求在任何情况下，有关拟议中的远征的任何消息都不准传达给戴高乐将军。

不管怎样，据艾森豪威尔的情报人员了解，在北非是存在着有一股强烈的反对德国和反对维希政权的情绪，甚至在某些陆军军官中也是如此。人们相信，如果盟军在一开始的进攻中就充分显示了力量，那么所有这些军官都可能在进行了象征性的抵抗而自尊心得到满足后，顺乎潮流地参加到抗击曾在1940年屈辱过他们的传统敌人的战斗中来，形势是复杂的，有些情况还是模糊的，可是把远征计划向伦敦的法国人严格保密，却是盟国政府的既定方针，这伴做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动机是，只有完全出其不意，才能使远征成功。关于这场远征行动，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部在拟订这一军事行动的计划时，几乎每天都遇到新的困难。其中之一是船只短缺，海上运输能力严重不足。同时，最早由美国运到英国的军事装备，都是准备供给最后横渡英吉利海峡作战时用的。由于当时迫在眉睫的考虑是迅速卸货以便加速船只的周转，那些装备都被扔在仓库里和露天货场上，而没有顾及把它们分门别类和编造清册。现在急需利用这些东西，可是缺乏一份可以据以在最短期间把所需的装备挑选出来装箱，并搬上船的记录。此外，艾森豪威尔还经常接到有关敌人的潜艇击沉或击伤盟军舰艇的报告。这些舰艇是已被列入他们运送军队、装备的计划的。每沉掉一艘船只，都迫使他们对作战计划和战术计划重新修订。

所有这些事情都要求经常举行会议，通常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部同美国驻英国的战术参谋部和战术服务处的成员一起举行，可是也时常同英国首相丘吉尔一起举行。在这段时期，在丘吉尔的要求下，艾森豪威尔习惯于每星期同首相会晤两次。每星期二他们在唐宁街十号一起用午餐，通常在场的是英国参谋部或战时内阁的一些成员。每星期五晚上，艾克同首相在首相的契克斯乡间住宅共进晚餐，有时候这一会晤延长到使这位盟军总司令整夜都留在那里。在那段时间内，往往会同军政官员举行一连串的会议，解决战时一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经过大约六个星期的紧张筹划后，艾森豪威尔接到通知说，美国国务院驻北非高级官员罗伯特·墨菲将对他作一次秘密访问，同他讨论那一地区的政治局势和动向——这些因素在全部军事行动中仍是个很大的问号。维希法国标榜“中立”，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是与这个政府维持外交关系的。英美两国政府都认为，北非公众舆论是支持同盟的，如果有可能，他们还想使事情看起来好像盟军是应邀而来到非洲的。

曾经长期在非洲担任美国总领事的墨菲，早就获得了罗斯福总统的信任，并被告知了在那一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同他的一批助手一起，不仅持续不断地进行着民意测验，而且还联络了一些对轴心国持敌对态度的军政高级官员。1942年9月16日，墨菲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来到伦敦，同艾森豪威尔将军举行了长达24小时的会晤。

墨菲是个皮肤黝黑、身材高大魁梧、相貌堂堂的人。他详尽地向艾森豪威尔介绍了法属北非的复杂的政治情况。墨菲说，艾森豪威尔可以用转向局外人亨利·吉罗将军的办法，绕过戴高乐的自由法国、贝当元帅的维希法国和法国殖民部队中的各种派别之间的斗争。吉罗是一位退休的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战争中失去一条腿；1940年从战俘营中逃跑出来。当时他正住在没有被德军占领的法国南部。墨菲告诉艾森豪威尔，驻阿尔及尔军团司令的参谋长查尔斯·马斯特将军向他保证，如果吉罗到阿尔及尔，所有法国殖民部队都会集结在他的周围，因此如果吉罗出面，盟军登陆时不会抵抗。除了马斯特的话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去相信那些已经拒绝戴高乐邀请他们参加自由法国的职业军人，会不会服从他们指挥官的命令，而投靠在法国军队中没有地位的吉罗。

艾森豪威尔察觉到一些问题，并不完全信任吉罗。他告诉墨菲，如果维希法国军队真的进行战斗，他打算以足够的兵力强行登陆，攻破法军的防线，并且拒绝把墨菲的地下组织考虑进去。当墨菲请求给他的抵抗组织武装时，艾森豪威尔置之不理。当墨菲询问战役开始日期，以便使地下活动配合登陆作战时，艾森豪威尔拒绝告诉他登陆日期。他说，你可告诉法国人，我们将于二月的某一时间来到。墨菲指出，吉罗希望由他指挥“火炬”战役，因为他的军衔比艾森豪威尔高，而且是在法国的领土上进行这次战役。所有这些，艾森豪威尔都断然拒绝了。事后他电告马歇尔，墨菲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对他提供的情况不能“完全相信”。

在与墨菲会见之后的那些天里，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人员每天工作14个小时，制订运输计划，收集海潮和天气情报，研究空中掩护和许多其他细节。这对于以前从未参加过、或者甚至没有研究过两栖作战的军官们，都是新问题。有时进展看上去这样慢，以致艾森豪威尔有时表现出不耐烦和暴躁。虽然如此，他还是相当满意。他告诉马歇尔，他希望计划“最后几乎万无一失”。

10月16日，墨菲返回阿尔及尔后，发来了两份电报。一份是关于人物问题。马斯特将军再次报告说，除非让吉罗担任最高统帅，否则他不会参加。墨菲说，除吉罗外，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儿子，曾找到墨菲向他保证，海军上将愿意和盟军合作。由于达尔朗是维希部队总司令，而吉罗手下无一兵一卒，因此抛弃吉罗而代之以达尔朗，对艾森豪威尔来说是很吸引人的。但是，达尔朗诡诈多端，名声很臭，不可轻信。

经过反复考虑，艾森豪威尔暂时决定任命吉罗为整个法属北非的总督来掌握“微妙的局势”。然后要求与达尔朗进行“恰当的接触”，并准备任命他为武装部队总司令。艾森豪威尔知道，盟军迟早将不得不作出决定，究竟是要达尔朗还是吉罗作为“我们主要的合作者”。但是，他希望两人都愿合作，以“取得对我们更有利的好处”。然而，这类事情与军事无关，而是政治和外交政策问题。在采取行动前，艾森豪威尔需要得到他的上级的权威性指示。因为这天是周末，丘吉尔在契克斯别墅。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他，请

他立即回伦敦开会。丘吉尔勉强同意了。

达尔朗的问题的确是非常棘手的，这位海军上将有着很不光彩的经历，他是纳粹的热心合作者，是维希反犹太法令的主谋，并持强烈反英态度。正如罗斯福和丘吉尔所说的，他几乎完全代表着盟国正在与之斗争的欧洲反动势力。他还是戴高乐将军的死敌。戴高乐从法国逃到伦敦后，他在1940年6月指控戴高乐叛国。关于战争性质的重大问题，和如何对待达尔朗这样一个反动人物问题，的确是值得认真考虑的。丘吉尔思索了一会儿说：“若是你一定要把法国海军搞到手，就得去拍达尔朗的马屁！”但是，这终究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问题，考虑到政治影响，会议没有做出决定。要求盟军总司令，视情况发展，再临时决断。

现在一切准备基本就绪，就要开始行动了。当艾森豪威尔离开伦敦时，这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进入一个作战地区，显然他不会在前线直接带领部队作战，但是作为战役的总指挥，他确实想到前方去视察，并且他的总部将成为空袭的首要目标。考虑到这些，就在飞离伦敦前，他给妻子玛咪写信道：“我希望你不要烦恼和忧虑。战争不可避免地给人带来危险，但是就我的情况来说，我的运气一直很好，这件事你必须永远记着。有者，即使我遇到最坏的情况，请不要过分悲伤。”他指出他在部队已经31年，到目前为止，他已经避免了一个战士总有可能要遇到的危险。他提醒妻子，他曾很可能在1918年到法国时而在那里牺牲。他接着写道：“我真正感到美国和全世界今天面临的局势，比我们任何人所能理解的要严重得多；因此不应让个人的牺牲和损失把我们压倒。”

11月5日，艾森豪威尔冒险飞抵直布罗陀。丘吉尔把这个要塞置于他的指挥之下，作为这次英美首次大规模作战行动的统帅的临时司令部的所在地。

自1939年9月以来，直布罗陀就采取了军事防御措施，以防受到围困，面对西班牙边界，如今这里已建立一个强大的防御体系。在它上边就是直布罗陀岩壁，岩壁上已爆破出许多坑道，以便安放控制地峡的大炮。另外，还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防备来自空中、海上和空降部队的进攻。这里最需要的是水，到1940年，在坚固的岩石中已建成了几座蒸馏水工厂，从而提供了足够的供应和储备。这是一桩浩大的工程。

直布罗陀对反法西斯战争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它的新飞机场的发展和利用。它最初仅是由跑马场改成的一个小型降落场，从1942年起，不断扩建，最后成为一条一英里多长的宽阔跑道。它的西端一直伸到直布罗陀海湾，是用开凿坑道时挖出的碎石筑成的。“火炬”计划所使用的大批飞机就集中在这里。整个地峡挤满了飞机，共有14个战斗机中队集中在那里待命出击。这一切活动不得不在德国的监视下公然进行。德国人因而错误地认为，这些飞机是支援马耳他岛的。艾森豪威尔将军说得好：“倘若没有英属直布罗陀，就不可能进攻西北非。”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准备，战斗就要打响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叙述了他在11月7日到8日那一晚上和以后的那几天中的焦急不安的情形。这场战役规模之大，天气之变幻无常，法国人态度之复杂以及来自西班牙的危险……所有这一切，对这位司令官来说，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九章 登陆北非

北非登陆敌寇惊，乘风破浪展威风；
维希头目死为敌，身败名裂可怜虫。

话说艾森豪威尔来到直布罗陀后，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责任感。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着指挥一个战役，而且是如此巨大规模的战役。总司令焦急万分。“火炬”能够使他在军事上扬名，而想到可能遭到失败的后果，难免不寒而栗。

总司令的大本营安置在山岩中，四个房间的上方，矗立着一大块花岗石。文森豪威尔抵达直布罗陀后写道：“我的指挥所在直布罗陀、不列颠帝国强盛的象征之中。”伦敦政界人士认为，现在帝国的命运是掌握在可靠者的手里。丘吉尔给艾森豪威尔打电报说：“直布罗陀的岩壁掌握在您的手里是不会发生危急的！”

艾森豪威尔来到直布罗陀的第二天，就向参加两栖作战的部队发出命令，确定登陆日期为11月8日。参加“火炬”作战的英美军队共有13个师，665艘军舰和运输舰，其中包括3艘战列舰，7艘航空母舰，17艘巡洋舰，64艘其他作战舰艇，分别编成“西部”、“中部”和“东部”三个特混舰队。首批登陆的兵力为7个师，其中有美国的4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英国的1个步兵师，共约11万人。此外，还有几个空降营将参加这次行动，其任务是占领敌防御纵深内的机场和要地。这次登陆的空中保障，将使用1700架飞机，其中绝大部分都驻守在直布罗陀。

在总司令抵达直布罗陀以前，英美的庞大舰队已驶近目的地。他们决计不借任何代价保证舰队的通行。由英国港口开出的护航队大部分都必须驶过比斯开湾，穿过所有德国潜艇横行之处。他们必须做到，不仅使从10月份初起就开始集结在克莱德湾和其他英国西方港口的大批船只不被敌人发现，而且要使护航队的实际出航时间也瞒过敌人的耳目。盟军做得非常成功。德国人根据自己的情报，误以为盟军的目标又是达喀尔。到10月底，已约有40艘德国和意大利的潜艇布防在亚速尔群岛以南和以东的地方。它们使一支由塞拉利昂驶回英国本土上的庞大的运输船队蒙受重创，共有13艘船只被击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损失是算不了什么的。第一批“火炬”运输船队于10月22日驶离克莱德湾。到26日，所有快速的运兵船只均已出航，美国部队也由美国直接乘船驶向卡萨布兰卡。这支由650多艘舰只组成的远征军现在全部出动了。它们悄悄地渡过比斯开湾或大西洋，无论是德国的潜艇和空军都没有发现它们。

在一项军事计划完成之后，直到行动开始之前的那段漫长的、几乎是无法忍受的等待期间，就随着那乏味的时钟的滴嗒滴嗒声，一分一秒地打发过去了。当时在地中海，盟军除了直布罗陀之外，没有安身之处。可以用来对非洲西北部实施进攻的地点只有英属直布罗陀。如果没有它，就不可能在北非战场迅速建立必需的空中掩护力量。在进攻初期，直布罗陀的那个小机场既要充当作战用的机场，又要充当自英国飞往非洲大陆的飞机的中途机场。甚至直到进攻开始日之前数星期，那里还堵塞着战斗机，并暴露在敌人的侦察机面前，连想伪装一下都做不到。

更糟的是飞机场本身地处西班牙边境，只有一排铁蒺藜网把它同西班牙领土隔离着。从政治上讲，西班牙是倾向轴心国的，不可胜数的轴心国特务

们经常窥视着这个铁蒺藜网。艾森豪威尔他们每天都准备着敌人轰炸机的袭击；而当每天都平安无事地消逝过去时，他们都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希望敌人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认为盟军是在再一次“以非凡的雄心试图增援面临困境已达数月之久的马耳他”。

虽然敌人的任何空袭都会带来某些后果，虽然周围环境阴郁沉闷，虽然在即将发动的这个巨大的冒险行动中无数事情都极易出差错，可是在司令部内部，却呈现着一种既紧张又欢快的气氛，这在每一个临时充作办公室的小洞穴里都感觉得到。那是自然的。不出几个小时，盟军就会知道他们在战争中的第一次联合攻势的初步命运了。除开已经在西部沙漠中进行了两年之久的拉锯战，以及在瓜达耳卡纳耳岛上的战斗之外，盟军竟未能在世界任何陆地上进行过超出防御战范围的战争。就拿防御战来说吧，也是充满了悲惨的败绩，其中的敦刻尔克、巴丹、新加坡、泗水和托卜鲁克等地的失败，是令人沉痛难忘的。

就在艾森豪威尔在直布罗陀的洞穴中来回踱步的那些日子里，数以百计的盟国舰艇所组成的快速或慢速的护航舰队正在横渡北大西洋，驶向非洲西北海岸上的一个共同点。三支主力远征队伍，正在纳粹潜艇出没的大海中破浪前进。11月8日，艾森豪威尔接到的第一份交火的报告是令人沮丧的。美国军舰“托马斯·斯东”号载着美军的一个加强营在驶向阿尔及尔的途中，距目的地仅150英里处，于11月7日被德国的鱼雷击中。可是，在军舰被拖曳到就近的港口之前，舰上的官兵都不愿默默等待着。当他们的司令官宣布都上救生艇以争取准时赶到原定发动突袭的海滩时，他们都报以欢呼。然而，自下午弥漫起来的浓雾密云使他们的宏图未能实现，他们无可奈何地登上了驱逐舰和其他护航舰，终于在距原定时间约20个小时之后被送上了岸。可喜的是，这些部队的迟到并没有明显影响部队的登陆计划。

1942年11月7日—8日，英美联军的三个特混舰队分别驶抵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地区，准备强行登陆。正在这时，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达尔朗海军上将巡视北非回国后，他的儿子突然得了小儿麻痹症，在阿尔及尔住了医院，由于病情危急，促使这位海军统帅于11月5日飞回北非。因此，正当英美即将大举进攻之际，他恰巧在阿尔及尔，这是一个奇怪而麻烦的巧合。罗伯特·墨菲希望他能在盟军登陆前离开。可是达尔朗由于关怀他儿子的病，在阿尔及尔多逗留了一天，住在一位法国官员费纳尔海军上将的别墅里。

近几个星期以来，盟军在阿尔及尔的主要希望寄托在法国军事长官朱安将军身上。他与墨菲的关系一向很密切，但是墨菲并没有告诉他登陆的具体日期。11月7日午夜稍过，墨菲访问了朱安，告诉他盟军登陆的时刻已经来临了。一支强大的英美联军，在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的帮助下，即将开到北非，几小时之内即可登陆。朱安闻讯不禁大吃一惊。他原以为他可以控制阿尔及尔的全局。但是，他知道，由于达尔朗在此，他的职权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他知道得很清楚，军政府的一切领导大权都已转移到这位身为维希政府副元首的海军上将手中。只要达尔朗在此，一切手握实权的效忠于维希的法国人，决不会再听从他的命令。

经过商议，墨菲与朱安决定打电话给达尔朗，请他马上到他们这里来。在清晨还不到两点钟的时候，朱安将军打电话唤醒了达尔朗，声称有要事需要面谈。当达尔朗听到了英美联军即将登陆的消息后，他暴跳如雷，气得满

脸胀红。他说：“我早就知道英国人是愚蠢的，但是我一直认为美国人要比英国人聪明一点。现在我开始认为你们美国人所犯的错误之多，也不亚于英国人。”

达尔朗对英国人的反感是人所皆知的。长期以来，他一直投靠轴心国。1941年5月，他不但同意把达喀尔供德国人使用，而且同意德国人假道突尼斯向隆美尔的军队运送给养。魏刚将军当时制止了这一叛逆行为。魏刚将军当时是北非的负责人，他说服贝当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希特勒由于当时正在全神贯注于即将进行的对苏战役，所以尽管他的海军参谋人员对此提出反对意见，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却没有认真。同年11月，德国人认为魏刚不可靠而将他免职。现在事过境迁，苏联红军节节胜利，其他反法西斯战场也有新的起色，希特勒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达尔朗的态度虽稍有改变，但他依然是彻头彻尾地效忠于卖国投敌的贝当元帅。因此，尽管墨菲和朱安百般劝说，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他也只是答应发电报请求贝当允许他自由行事。一连串无情的事件，使他陷于极端困难的处境。

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11月8日上午7时40分，达尔朗给贝当发去这样一封电报：

“上午7时30分的情况如下：搭乘英国舰只的美军已于阿尔及尔及其邻近地区实行登陆。守军在几处地点，特别是在港口及海军司令部两地击退了进攻。在其他地点，由于是突然袭击，登陆获得成功。局势在日益恶化，守军不久即无法支持。各方面报告表明，大规模登陆正在酝酿中。”

截止11月8日午夜，美英联军的三个特混舰队分别在阿尔及尔、奥兰、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东部”特混舰队，在英国海军少将布罗斯的指挥下，于8日凌晨1时开始在阿尔及尔及其东、西两面登陆。在西面，英军第十一旅顺利地占领了滩头；在东面，载运美军的船只被意外的浪潮冲离海岸数公里，在黑暗中造成了一些混乱。耽搁了时间。但在天亮后，也就很快地控制了局势。上午11时30分，达尔朗又给他的上级发了一封电报：“阿尔及尔可能于今晚失守。”下午5时，他又发出一封电报说道：“我军虽尽力阻挡，美军业已进入市区，我已命当地驻军司令朱安将军就阿尔及尔城投降一事进行谈判。”下午7时，阿尔及尔投降了。由这时起，达尔朗海军上将就落到美国人手里，朱安将军在盟军的领导下重掌大权。

“中部”特混舰队，在美军弗里登少将的指挥下，也于8日1时许在奥兰登陆。法军在这里的抵抗比在阿尔及尔较为猛烈。登陆部队虽在开始时较顺利地占领了阿尔泽湾和安达鲁斯，但在向奥兰实施向心突击的过程中被阻于半路。两艘载运美军的英国军舰，在强行驶入奥兰港时被击毁，乘员和部队死伤过半。直到9日，美军的进攻仍无进展。

“南部”特混舰队，由美军巴顿少将指挥，在11月8日拂晓前抵达摩洛哥海岸。由于夜间行驶，而且航程较远，所以登陆时间比原计划晚三个小时。美军分别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费达拉、利奥特港和萨菲登陆，一开始就牢固地占领了立足点。有些地点，登陆部队并未遇到抵抗。但随后战斗一度相当激烈，特别是在利奥特港附近。11月9日，美军一面巩固自己的登陆点，一面向纵深推进，但因弹药、油料还堆积在滩头，来不及运给战斗部队，所以部队前进的速度极为缓慢，而法军的抵抗开始加强。在其他地区的战斗也在激烈进行。

11月9日早晨，克拉克将军和吉罗将军飞往阿尔及尔，企图同法属北非

当局达成某种协议。他们的使命是要求结束战斗，并希望法国人在进行计划中的对德战争时能给予协助。出乎意料的，非洲的法国人对吉罗将军的冷淡接待，给艾森豪威尔原先的期望泼了一瓢冷水。吉罗根本没有被重视。他作了一次广播讲话，宣布他将领导法属北非，并命令法军停止对盟军作战。可是他的演讲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在此期间，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同阿尔及尔之间的无线电联系非常困难，可是最后终于收到了一份电报，证实了早些时候的这个消息：达尔朗海军上将正在阿尔及尔！

“达尔朗是法国战斗部队的总司令：一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是把他逮捕起来。”艾森豪威尔心想，“可是只要达尔朗能够对在土伦和达喀尔的大量法国舰艇发一道必要的命令，我们就有希望立刻减轻地中海的潜在的海军威胁，同时可以随便增添我们自己的水面舰艇。”他又想起在离开伦敦之前，丘吉尔首相曾诚恳地说过：“如果我能见到达尔朗的活，尽管我极恨他，但我若能以爬行一英里路来使他把舰队带到盟军这边来，那我也欣然照办。”

艾森豪威尔说，克拉克将军在同法国官兵打交道时，很快就发现法国人有一个传统，即他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这在法军中视若神圣。他们断言，他们在1940年的投降仅仅是忠诚的军人服从上级的合法命令的行为。曾与克拉克将军再三会谈的每一位法国司令官，都毫无例外地拒绝采取任何行动使他们的部队投向盟军，除非他们能接到叫他这样做的合法命令。他们的每一个人都曾作过效忠于贝当元帅的宣誓；当时贝当元帅的名字，对北非的思想和行动的影响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深。这些司令官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可以不受自己的宣誓的约束或者可以发布任何停火命令，除非他们的合法总司令，那位被他们视作贝当元帅的直接代表和私人代表的达尔朗给他们以必要的指示。

克拉克将军向盟军司令部发回的电报说，如果没有达尔朗参加，就不可能达成和解，而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吉罗将军的支持。11月9日那天，克拉克将军奉总司令艾森豪威尔之命，在阿尔及尔圣乔治大饭店会见达尔朗，要求他发布停火令。克拉克身材高大，他俯视着瘦小的达尔朗海军上将。克拉克生气地说，他要强迫达尔朗合作，高声喊叫说，海军上将要不合作，就坐牢。达尔朗坚持要等候贝当的命令。克拉克又发起火来。朱安把达尔朗拉到一边，对他说，抵抗是毫无意义的。达尔朗被迫同意在卡萨布兰卡和奥兰命令停火，但是，他仍然拒绝指示突尼斯的维希法国部队抗击德国人。

11月11日，希特勒也开始调动部队进入以前没有被占领的法国南部。于是，达尔朗宣布，这意味着贝当是“一名俘虏，失去了行动自由”。接着他说：“我得到贝当的秘密命令，授权我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行动。”达尔朗的声明对许多维希法国军官来说，是一个关键因素。因为这一声明使他们可以执行他的指示与盟军合作，而同时保持他们是在服从正式命令的假象。达尔朗的权力就在这里，并且成为艾森豪威尔急于与他达成交易的主要原因。艾森豪威尔相信，达尔朗能够说服突尼斯的法军抵抗德国人，能将法国舰队交给盟军。时间就是生命，因为德国人正在以惊人的效率作出反应。希特勒很快从最初的震惊中清醒过来，正在空运精锐部队和运送坦克去突尼斯。

到了11月11日，艾森豪威尔沮丧地认为“火炬”获得战略胜利的可能性已经消失。一切都决定于在突尼斯的法国人。艾森豪威尔说，只要他们“此刻头脑清醒过来，我们可以避免以后好几个星期的作战，并且在付出许多生命和物资后，我们将得到正是我们想要的东西”。为此，艾森豪威尔命令克

拉克急于和达尔朗达成协议。克拉克应当使达尔朗担任北非高级专员，并坚持要吉罗当法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朱安当副总司令，负责指挥地面部队。艾森豪威尔最关心的是向突尼斯进军，和德意法西斯军队作战。为此，他需要一个可靠的后方。为了得到这样的后方，他准备与维希法国当局合作，不管它的法西斯名声多么狼藉。他警告克拉克，不允许在阿拉伯部落中引起纠纷，“或者鼓励他们与现行的统治方法决裂”，因为艾森豪威尔不希望发生“任何内部的骚动和麻烦”。在11月13日，艾森豪威尔从直布罗陀飞到阿尔及尔，会见了达尔朗，完成了这笔交易。

当达尔朗协定的实情公之于世后，在英国国内，在自由法国内部，在美国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不满。许多人认为，这是一桩卑鄙龌龊的勾当，而其对象“乃是一位与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因此在他们心目中，在北非登陆的胜利，还有阿拉曼战役的胜利，已因此黯然失色。这一强烈反应使艾森豪威尔吃惊，他已经失去了通常良好的公共关系意识。他感到难过，倒不完全是由于协议被抨击，这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预见到，而是由于抨击的猛烈程度。更令他难受的是，人们攻击他是一位头脑简单的将军，在政治的汪洋大海中没了顶。他转而为达尔朗协议辩解，他写信给他的兄弟埃德加说：“唯一使我对此事有点气恼的是，竟有人认为我是这样令人难以置信地愚蠢，竟没有意识到我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他给他的儿子写信说：“我被称为法西斯分子，甚至几乎是希特勒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场战争，专制压迫和独裁统治的势力如此明确地与维护人权和个人自由的势力相对垒。我是坚决站在反法西斯这一边的，作为一个战士，我唯一的目标就是尽职粉碎希特勒匪帮。”

他写信给他的妻子玛咪说：“阿拉伯人是十分难以捉摸的，他们具有爆炸性，充满偏见。这里所做的许多看起来是古怪的事情，正是为了不使阿拉伯人激怒起来暴动。我们是坐在火山上！”为了稳定后方，艾森豪威尔非常害怕发生暴动，他一直只限于婉转地督促达尔朗对反犹太法作些微小的修改。达尔朗要求时间，他辩解说：“如果采取急剧步骤，来改进犹太人的命运，就会出现法国不能控制的穆斯林的猛烈反应。”艾森豪威尔同样认为治理部落是棘手的事情，最好由法国去处理。

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仍在伦敦，是他首先把英国强烈的敌对反应告诉艾森豪威尔的。丘吉尔称这一协议简直是“晴天霹雳”，而英国外交部说达尔朗的历史这样丑恶，不能考虑让他当北非的常任首脑。英国人说：“首先我们有自己的道义上的立场。我们正在为国际的体面而战斗，而达尔朗却是它的反面。”人们对艾森豪威尔的军事行动也进行种种批评，说“迄今为止，由于犹豫不决而丧失良机。‘火炬’在战略上已经失败”。

艾森豪威尔对这些来自英国官方的责难十分不满，他迅速地作出反应。11月14日早晨，他给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了一份很长的电报，为他的行动辩护。电报说：“可以理解伦敦及华盛顿由于与北非法国当局谈判而引起某些混乱。要知道北非生活的第一个现实是，贝当元帅是很有影响的人物。全体法国军官都试图造成这样的印象：他们是在贝当元帅这位人物的保护下生活和行动的。法国人同意只有一个人有权继承贝当元帅，而这个人就是达尔朗。如果不同达尔朗合作，我们将不得不对北非全部进行军事占领。这在时间和人力、物力方面的耗费将是巨大的。”他在另一份电报中，告诉丘吉尔：“请放心，我经常地听从你的明智忠告，我没有完全被这里如此之多的

骗子们捆住手脚，蒙住眼睛。”

丘吉尔看了艾森豪威尔的申辩电报，11月17日致电罗斯福说：“我应该让你知道，与达尔朗所签的协定引起了强烈的愤怒。我越考虑这个问题，就越相信它只能是一种仅仅由于战事急迫而不得已才采取的权宜之计。人们会以为我们愿意和当地的吉斯林之流妥协，这种看法不仅在法国而且会在全欧洲给我们的共同事业带来不良的政治影响，我们对此决不能忽视。达尔朗声名狼藉。正是他，提拔他的下属来指挥法国海军，从而使法国的海军对我们怀有恶意。正是他，派法国海军到卡萨布兰卡附近的海面与你的舰队作战，才使这些海员送了命。此事恍如昨日，如今为了权位，达尔朗又倒向我们这边了。和达尔朗签订一个永久性的协定，或在法属北非成立一个达尔朗政府，将是无法为千百万普通百姓所理解的，而他们的一片至诚之心就是我们的力量。”

电报给罗斯福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与此同时，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总参谋长马歇尔却要求罗斯福支持艾森豪威尔。此外，马歇尔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严厉批评美国记者。他说，计划估计“火炬”的登陆作战，美国的损失将高达18000人，但事实上只有1800人，这样达尔朗协议使美国少伤亡16200人。他告诉新闻界，他们对艾森豪威尔和达尔朗协议的抨击是非常愚蠢的，这会上英国人的当，他们会要求由一个英国人来代替艾森豪威尔。如果这种抨击继续下去，会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声誉处于从未有过的低下地位。

根据各个方面反映的情况，罗斯福总统于11月18日，也就是在收到英国首相电报后的第二天，发表了一项公开声明。罗斯福代表盟国强调指出：“未来的法国政府决不能由法国本土或海外的任何个人来成立，它只能在法国人民被同盟国的胜利所解放后，由法国人民自己来成立。目前在北非和西非所作的安排，仅是由于战事紧迫而不得已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

罗斯福的声明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人们的忧虑，同时也使艾森豪威尔感到宽慰。

11月20日罗斯福写信告诉丘吉尔说：“昨天我私下对报界讲了一个流传在巴尔干的古老的希腊教会的格言，因为它似乎适用于我们目前的达尔朗——戴高乐问题，这句格言是：‘我的孩子们，在大难临头之际，你们可与魔鬼同行，直到你们下桥为止。’”

然而，达尔朗协议所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艾森豪威尔个人的不安和对他的声誉的损害。这个协议造成了长期的影响。苏联领导人怀疑英美和法国维希分子背后有默契。法国抵抗运动领袖戴高乐也对此强烈不满。他说：“如果盟军在‘解放’一个国家与现在投敌的官员们签订协议，抵抗还有什么意义？！”这个协议不仅伤害了抵抗运动成员的感情和士气，而且对日后戴高乐与美国的长期合作也产生了严重影响。

由于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被政治问题所纠缠，使他不能及时向突尼斯进军，而这时德军却继续在突尼斯集结。结果盟军强行攻占突尼斯城的打算遭到严重失败。到了12月份，在艾森豪威尔指挥下有将近15万人，但仅有3.1万人在前线。他自己估计德军有3万人在突尼斯城内和附近，其中作战

吉斯林（1887—1945）挪威法西斯党党魁。1931—1933年任挪威国防部长。1933年建立民族统一党（法西斯党）。1940年协助德国侵占挪威。1942年充当傀儡政府元首。1945年法西斯德国在挪威的统治瓦解后，以战犯罪被处决，吉斯林一词后成为年奸的代名词。

部队是 2.5 万人。盟军向突尼斯推进的速度过慢，当他们抵达时，双方交锋，吃了败仗。

军事上受挫，使艾森豪威尔大伤脑筋。他写信向妻子诉苦说：“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拼命工作过，但却没有取得好的结果。”为了扭转战局，12 月 22 日，艾森豪威尔出发上前线，他亲自了解情况，他希望发动一次攻击。圣诞节前夕，他和安德森将军视察作战部队。连日阴雨使农村变成一片沼泽。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车辆都不可能离开公路行驶，而在公路上行驶也是够困难的。艾森豪威尔决定推迟发动进攻。他向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说：“目前暂时放弃全力出击的计划，是迄今为止我最失望的事情，是一项痛苦的决定。”抢先到达突尼斯的竞赛已经输掉。他面临着一场持久战。

圣诞节前夕，当夜幕降临时，艾森豪威尔在安德森野战司令部食堂吃晚饭。当他开始用餐时，一名通讯兵送来一份电报：“达尔朗被刺身亡。”达尔朗这个维希头目，虽然口口声声说忠于他的祖国，要真诚与盟国合作，但他却继续为非作歹，不听忠告。达尔朗继续任用维希官员，甚至那些同纳粹密切合作而声名狼藉的人。另一方面他把阿尔及尔的戴高乐分子关入监狱，封闭了他们的《战斗报》，这就更加激起法国人民对他的仇恨。

1942 年 12 月 23 日，达尔朗被年轻的戴高乐分子邦内·德·拉·沙佩勒刺杀身亡。此后，吉罗便掌管北非的军政事务。

达尔朗之死，大快人心，完全是咎由自取，正如克拉克将军所说的：“在我看来，达尔朗上将之死是上帝的旨意……把他从政治舞台上清除掉，就像刺破脓疮一样。他起到了他的作用。”达尔朗之死，也为艾森豪威尔解除了一个政治上的包袱。

12 月 22 日马歇尔命令艾森豪威尔：“授权你的部下去处理国际外交问题，集中你的全部精力于突尼斯的战斗。”由于达尔朗已经去世，艾森豪威尔觉得他可以这样干了。欲知突尼斯之战的详情，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章 突尼斯大捷

捷报频传震天响，北非大地获解放；
德意主力全歼灭，将军美名天下扬。

虽说达尔朗遇刺身亡，稍稍缓和了政治紧张局势，但并没有完全消除法国爱国人士和当地人民群众，对英美和通敌者合作、特别是对维希分子在法属北非全部留任的强烈不满。

人民最不满意的是，虽说“解放了”，但是反对法西斯德国和维希政治制度的积极分子，仍然没有被释放出狱。在盟军当局的默许下，在阿尔及尔的中央监狱里，还在监禁着 27 名共产党人——法国国民议会代表。艾森豪威尔只对法国抗战力量对维希分子的镇压表示抗议，而对被监禁的共产党人的呼吁却置之不理。只是到了 1943 年 2 月，迫于世界进步舆论的压力，这些反法西斯人士才被从监狱和集中营里释放出来。

然而，在北非当地的居民，仍处于无权的地位。他们迸发出来的愤怒情绪使反希特勒同盟各国大为震惊。盟国的第一次进攻战，竟然落得与附敌分子公开进行合作。罗斯福和丘吉尔连忙推卸责任。他们试图把艾森豪威尔变成替罪羊，迫使他把盟国在北非的政策的全部责任承担下来。其实，艾森豪威尔在阿尔及尔采取的任何实际步骤，都是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指示。可是，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处境。对采取与附敌分子进行合作的不受欢迎的决定，所应负的道义和政治责任实际上落在他的身上。他对因公前来阿尔及尔的弟弟米尔顿说：“如果我是个普通营级指挥官，在敌人的火力下率领士兵投入战斗，一切就要简单得多。”

艾森豪威尔决定在突尼斯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攻势，来转移国内外人民的注意力。在 1943 年 1 月底，西方盟国在北非集结的军队有 50 多万人。但由于盟国武装力量在突尼斯动作迟缓，使德国统帅部得以调集大量的部队，为盟国后来的攻势造成一定的困难。

从华盛顿传到盟军总部的谣言说，为平息民愤，美国总统将要牺牲艾森豪威尔。丘吉尔对突尼斯前线进展迟缓感到不快。据说罗斯福认为保留艾森豪威尔“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当艾森豪威尔在一月初任命马塞尔·佩鲁顿为阿尔及利亚总督时，又掀起了另一次抨击的浪潮；因为佩鲁顿曾任维希政府的内政部长，是一名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人民群众怎能容忍这样的人担任他们的总督呢？但艾森豪威尔却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佩鲁顿的任命在国内引起了一片痛苦的咆哮。他们想要谁？他是一位有行政经验的人，而天晓得，在非洲法国人当中，很难找到许多像他这样的人。”与此同时，吉罗又逮捕了戴高乐在北非的自由法国分子，引起又一次抨击浪潮，以致玛咪写信警告他，“头头们正在准备把你撤职”。他的联络副官布彻在记录上也这样写着：“我告诉他，他的脖子已经套在绞索上！”

而最有可能的是，当艾森豪威尔的部队与向西跟踪追击隆美尔部队的英军会师时，在沙漠作战的英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将军，可能成为盟军总司令。这样艾森豪威尔就将回到英国，或者回到华盛顿。确实，看起来出现这种情况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亚历山大比艾森豪威尔的军衔高，并且打了大胜仗，有着丰富的经验；再者，就是英国将有第八和第一两个集团军在突尼斯作战，而美国仅有一个军。

在地位不稳的压力之下，又加上不可能完成的工作进度的沉重负担，艾

森豪威尔的情绪很坏，经常发脾气，很容易冲动。在他的影响下，盟军总部的士气是低落的。他在圣诞节从突尼斯前线赶往阿尔及尔时，又患了重感冒。有一个多星期，整天躺在床上，吃饭很少，滴酒不沾，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这使他的感冒和病痛加重。

艾森豪威尔的前途将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决定下来。从1943年1月14日至24日，罗斯福、丘吉尔各带一批军政要员，前来这一新解放的海港城市开会，以便对1943年的战略取得一致的意见，并对英美联军指挥权的问题作出适当的安排。1月15日，艾森豪威尔到卡萨布兰卡去了一天，报告他的战区的形势。开始，他给罗斯福的印象不好。罗斯福对他的顾问霍普金斯说：“艾克看上去紧张不安。”霍普金斯解释说，这是由于他乘坐的飞机出了问题。飞越阿特拉斯山脉时，艾森豪威尔乘坐的B—17飞机两台发动机失控，他几乎要跳伞。再加上他的感冒尚未痊愈，以及对在突尼斯的竞赛中失败感到失望，他给罗斯福“紧张不安”的印象也就不奇怪了。

艾森豪威尔对他前途的担心很快就消失了。因为经过英美两国首脑的讨论，丘吉尔和罗斯福一致同意不仅让艾森豪威尔继续指挥“火炬”行动的部队，而且待英国第八集团军开抵突尼斯边境线后，也归艾森豪威尔指挥。他们作出这一决定有许多原因。马歇尔仍然是艾森豪威尔坚定的支持者，这对罗斯福是很有份量的。丘吉尔和罗斯福都知道，他们至少同艾森豪威尔一样，要对达尔朗协议负责。他们两人对艾森豪威尔在卡萨布兰卡的汇报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对艾克工作感到满意的是，他继续致力于同盟的事业，他使一个混合参谋班子在一起工作的神奇办法。虽然英国在突尼斯投入优势的兵力，但丘吉尔知道，法国军队是不会接受一个英国人来指挥的。因此突尼斯战役，非得由艾森豪威尔继续担任盟军总司令不可。

为了加强突尼斯战役的统一指挥，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任命亚历山大为地面部队副总司令，坎宁安海军上将为海军副总司令，空军元帅阿瑟·特德为空军副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则为负责全面工作的总司令。这样解决指挥方面问题的办法，使马歇尔感到高兴，因为艾森豪威尔继续担任盟军最高指挥官；这也使带头提出这样安排的布鲁克高兴，因为这样一来，便把日常作战活动控制在艾森豪威尔的英国副手们的手中。这位英军参谋总长直率地承认：“我们把艾森豪威尔推到高高在上的统帅宝座，这样他就可以不受约束地将他的时间用于解决政治和盟国间的问题，而我们则把我们的司令官安插在他的手下，处理军事局势和恢复严重缺乏的必需的干劲和协调。”

英国三位副总司令的军阶都比艾森豪威尔高。艾克的实际军衔仍然是中校；他佩戴三星中将军衔是临时性的，而他的副手们都是佩戴四颗星。但是艾森豪威尔从不被军衔吓住，他与他们建立了亲密的个人关系，彼此合作得很好。在卡萨布兰卡，他和亚历山大作过一次长谈，印象很深。丘吉尔称之为亚历山大的“从容大方、面带笑容的风度、和有感染力的信心”，使艾森豪威尔如同使任何人一样，感到有吸引力。英国参谋总长布鲁克希望这三位副总司令会使艾森豪威尔靠边站，但是他的希望破灭了。这首先是由于艾森豪威尔本人。他抵制了将英国的委员会指挥制度强加在地中海作战指挥上的一切企图。1月20日，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出指示，由副总司令实际掌管作战。艾森豪威尔口授一份措词激烈的电报，反对这样侵犯他的指挥体制，并且坚持维护统一指挥的原则。他的参谋长史密斯要求把电报写得缓和一些，但是艾森豪威尔只允许改变语气，不能更改电文的内容。只要他在位一

天，他决心行使他的职权。

为了帮助艾森豪威尔维护统一指挥，美国参谋总部准备推荐他为上将。2月10日传来晋升的消息。四颗星的军阶在当时美军中是最高的。在1943年时，只有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才是上将。二年前，艾森豪威尔当时是一名临时任命的上校；他告诉他的儿子约翰，他预期将以这个军衔退休。对他的参谋人员，他压低新军衔的重要性，而对他的妻子则表现出恰如其分的谦虚。他对玛咪承认说：“任何配得上担任高级指挥职务的人，对于他肩负的巨大职责深为担心，而他自己的能力又如此经常地显得与他的职务不相称，因此对世人所称的成功或晋升并不特别介意”。他说，身居这样职位的人，“孤独是不可避免的”。此外，在他这一级的地位上，“风险总是非常大的，而惩罚是以丧失生命或者给国家造成大大小小的灾难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总之，他告诉玛咪，“晋升的结果使我觉得十分自卑，但是我并不认为我已经功成名就，而仅仅是开始”。他保证，要永远尽最大的努力来履行他的职责。

卡萨布兰卡会议的结果。不仅使艾森豪威尔没有丢官，反而得到晋升。他指挥的范围和规模有了扩大，但也给他带来了新问题，尤其是同法国人的关系问题。在达尔朗被暗杀之后，北非法国人与维希方面的唯一联系中断了。艾森豪威尔在让吉罗接替达尔朗时明确指出，实际上他是北非的唯一当权者，但他必须“自愿地忠诚地与盟军合作”，吉罗利用他的权力，在监狱中关满了反维希的法国人。罗斯福由于受到报界几乎一致的对在北非实行维希统治手段的不断抨击，而感到为难，他要求艾森豪威尔加强控制，并使政权自由化。

罗斯福的强硬政策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没有人可用来取代吉罗，戴高乐是明显的人选，但他一直在愤怒地攻击达尔朗协议，而罗斯福又对戴高乐持“不信任”的态度，因此双方隔阂很深。在卡萨布兰卡，艾森豪威尔，还有丘吉尔，请求罗斯福不要去触发一场危机。罗斯福作了让步，同意丘吉尔把戴高乐从伦敦带到卡萨布兰卡来和吉罗和好，举行“强迫的婚礼”。其结果是一张两位身材颀长的法国将军握手照片登在英美报纸上，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戴高乐空手回到伦敦，双方关系没有得到什么改善，美国仍然重用吉罗统治北非。

为了进行突尼斯战役，艾森豪威尔不愿激怒法国人。为此，他不惜破坏他自己统一指挥的原则。1942年12月末，朱安指挥的法军在位于北面的英军和位于南面的美军之间，进入在突尼斯的阵地。艾森豪威尔想由安德森来指挥三国部队，但是朱安和吉罗两将军坚持法国人不能接受英国将军的命令。后来艾森豪威尔放弃自己的想法，允许法国人自行作战。由于法军装备陈旧，战斗力很弱。整个一月份，德国人利用这一形势，对法国人发动好几次小规模试探性进攻，不断逼着他们后退，迫使艾森豪威尔零敲碎打地派遣增援部队。

1月24日卡萨布兰卡会议结束之后，艾森豪威尔加紧积蓄力量，整顿部队，准备向隆美尔发动一次强大的攻势。这时，美国的军用物资、装备源源运抵前线。随着飞机数量不断增加和使用前方机场，盟国空军开始从德国人手中夺取了制空权。造成的直接结果是，德国人感到越来越难以切断盟军的供应线，或保卫他们自己的供应线。此间，艾森豪威尔最担心战线的南端。部分由于这是隆美尔的防区，部分由于这是他的脆弱的漫长供应线的末端，

但主要的还是由于这一地区是由没有流过血的美军防守。在这里布防的美国第二军团的四个师，除了在 11 月间同维希法国部队有过一两天交锋之外，都没有作战经验，都是匆促组成派到北非来的。他们在美国没有时间进行认真训练，他们战备观念极差。

在一次视察时。艾森豪威尔吃惊地发现，一支部队已经进入阵地两天，但是仍然没有布雷。军官们说，他们准备在第二天解决。艾森豪威尔狠狠地骂了他们一顿，然后指出，当德国人进入防御阵地时，他们必须布雷，机枪进入掩体，部队在两小时内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使艾森豪威尔同样感到生气的是，他发现部队撤出前线时，军官们允许士兵到附近的村庄去休息。他了解到，每当英国军队撤离前线时，甚至对他们最有战斗经验的部队也都进行长时间的实战训练演习。1 月 15 日，艾森豪威尔给他的主要美国部属们发了通报，告诉他们加紧战备，严格训练，随时准备向敌人发起进攻。

1943 年 2 月 11 日，盟军总部的情报处长，英国的艾里克·E·莫克勒一弗里曼准将报告说，阿尔尼姆正从隆美尔非洲军团那里得到增援，将在短期内在第二军防线北端的丰杜克发动主攻。艾森豪威尔闻讯即驱车至 A 战斗群司令部，部署战斗。在月光下的沙漠中漫步，他往东看，刚可以分辨出黝黑山峦中一个隘口，那就是法伊德山口。在山口的那边，隆美尔的非洲军团正在集结，但是在山口里毫无动静。在凌晨 3 时 30 分左右，艾森豪威尔驱车前往弗雷登达尔的司令部。他在两个小时后抵达时才知道，他到法伊德山口半个小时后，德国人通过山口向 A 战斗群发动进攻。艾森豪威尔仍认为，主攻的方向在北面，这可能是佯攻。他决定驱车回到他的君士坦丁前进指挥所，在那里他可以密切注视整个战线。

当他在 2 月 14 日中午前后到达君士坦丁时，他获悉从法伊德发动的进攻是主要方向。隆美尔的坦克部队消灭了美军一个坦克营，击溃一个炮兵营，并且孤立了美军残余部队。艾森豪威尔要安德森调丰杜克的 B 战斗群投入战斗，可是安德森坚持莫克勒一弗里曼的情报是正确的，德国的主攻将在北面，而拒绝这样做。艾森豪威尔花了一天时间，试图派别的援军到法伊德地区，但是由于距离较远，公路情况不佳，根本不可能支援被围的 A 战斗群。2 月 15 日，隆美尔继续进攻，摧毁美军坦克 98 辆，半履带车 57 辆和大炮 29 门。2 月 16 日，敌非洲军团扑向另一山脉和穿过其中的卡塞林山口时，安德森调出 B 战斗群的一个营，向南进攻隆美尔的侧翼。结果这一营也被德军吃掉。艾森豪威尔在日记中写道：“所有这一切结果，都成了零敲碎打的行动，而敌人前进是由于在坦克数量上大大超过我们。”美军在第一次战斗中打得很糟糕，既不能恰当地加固阵地，又在慌乱中放弃阵地。

虽然损失沉重，但是艾森豪威尔并不灰心。通过和敌人主力的几次交锋，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敌人。2 月 21 日，隆美尔率部越过卡塞林山口。艾森豪威尔认为，敌人此举构不成威胁，反而更多地造成挨打的机会。因为此时，艾森豪威尔已在进攻点上集中了大批兵力，特别是大炮火力方面的优势。现在隆美尔仅有一条漫长的、通过狭隘山口的补给线，隆美尔暴露出了弱点。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保证：“我们有足够力量阻止他前进，并准备歼灭他。”

艾森豪威尔催促安德森和弗雷登达尔立即向隆美尔的侧翼发动进攻，抢占山口，切断非洲军团的后路，然后消灭它。但是，安德森和弗雷登达尔不同意艾森豪威尔认为隆美尔已成强弩之末的结论；他们期待着他发动另一次

攻势，坚持采取守势来对付隆美尔进攻。隆美尔接受了必然的事实，当晚开始退却。退却是成功的，盟军丧失了稍纵即逝的良机。从战术意义说，隆美尔取得了胜利。他以不大的代价，使美军伤亡 5000 多人，摧毁成百辆坦克和其他装备。但在战略上一无所获，而且实际上帮了艾森豪威尔的忙。

艾森豪威尔统率的英美大军，在完成作战准备后，于 1943 年 3 月下半月发起进攻。这时亚历山大指挥的第十八集团军群，至少有 20 个师又两个旅，人员和装备齐全。而德意联军只有 14 个师又两个旅，人员和装备的缺额很大，每个师平均人数不超过 5000 人，且又处于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两支大军之间，态势十分不利。隆美尔认为，轴心国的军队若再留在非洲，就等于“明显的自杀”。3 月 9 日，隆美尔请他的属下阿尔林将军代理指挥军队后，便返回欧洲养病，并向其“元首”要求迅速从北非撤军。结果隆美尔成了希特勒眼中的“悲观主义者”，从而失去了对非洲军团的指挥权。

3 月 20 日，英美联军以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为主力向敌人的主要阵地——马雷特防线展开进攻。这条防线是法国人在战前防备意大利入侵突尼斯而修筑的一条长达 20 英里而且组织严密的防御系统。现在意大利人竟在此防守，以对付英国人！在它临海的末端，陡峭的瓦迪济佐是主要防线，正面一道防坦克战壕和铁丝网，从前线直到马特马塔的山丘为止。没有可能进行迂回行动，除非取道通往特巴戈山和梅拉布山之间那条峡道的一条弯路。如今，敌人已在这个隘口修筑了工事，并由德国装甲师和意大利步兵占领着。

但是，鉴于马雷特阵地前线的实力，即由包括两个德国师的六个师防守，并有第十五装甲师作为后备，蒙哥马利便决定在他的计划里包括一支侧击纵队，以便突破这个隘口，并在敌军主要前线后方站住脚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在 3 月 20 日午夜以前，由第三十军在马雷特防线的沿海地区发动了一次主要进攻。第五十师跨过了瓦迪济佐，并且取得了立足之地。但攻占这里的隘口要塞的确比预期的还要困难。次日全天，这个师守住了阵地。但在 3 月 22 日，德国第十五装甲师和德国步兵的猛烈反攻迫使他们撤退了。当晚他们撤到了瓦迪济佐的对面。

4 月 6 日，英国第八集团军又为一次新的进攻作好了准备。瓦迪阿卡利特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北面有群山居高临下，因此整个战线形成了一条自然的强固的防御阵地。蒙哥马利以他特有的风格利用了炮兵。在黎明前，英国第五十一师和第五十师以及第四印度师，在密集的炮火支援下，不顾强烈的抵抗而发动了进攻，敌军也进行了坚决的反攻，所以直到傍晚才攻克这一堡垒。就这样，在盟军的连续打击下，德意军面临被合围的威胁，不得不北撤马雷特防线的守军，并于 4 月中旬退至突尼斯北部，终于成了“瓮中之鳖”。

1943 年 4 月 19 日，盟军集中优势兵力发起总攻。英军第八集团军自南向北实施突击，美英联军自西向东发起进攻。4 月 25 日，艾森豪威尔的副官布彻写下这段话：“艾克目前的情况有点像母鸡在孵蛋。他在等待鸡蛋孵化，而心里在嘀咕，能不能破壳而出。”这个壳是德军在比塞大一突尼斯的桥头堡，而三支强有力的部队，英国第八和第一集团军以及美国第二军，正在企图突破它。尽管敌人的补给日益短缺，英国两个集团军却没有多大进展。这就要看美军的了。在 4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艾森豪威尔巡视了前线，他所见到的情形使他高兴，他断定美国第二军军长布雷德利将军“干得很不错”，他很高兴听到一名英国老兵说，美军第一步兵师“是他所见到的最好的作战

部队之一”。第九步兵师和第一装甲师也打得很出色。然而第三十四步兵师可就是另一个样子了。它的士气低落，在卡塞林山口战役中表现不好，需要振作起来。

为了在战火中锤炼这支部队，并从实战中转变它的战斗作风，艾森豪威尔要布雷德利分配给第三十四步兵师一个重要目标，并务必保证它拿下这个阵地。布雷德利军长遵照执行。他把 609 高地这个战略要点派给第三十四步兵师。这一阵地不仅受到它本身的高度和炮火的掩护，还受到邻近高地炮火的掩护，这使盟军在通往高地的山坡遭受交叉火力的封锁。

4 月 30 日，攻击向前推进。战士艰难地一步一步向上爬，在交叉火力前倒下去。艾森豪威尔对亚历山大说：“我真诚地希望第三十四步兵师今天攻占 609 高地，这对该师和整个战役都会有很大好处。”到了第二天上午，美军该师占领这一高地。德军疯狂地反击，但是第三十四步兵师恢复了自尊，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艾森豪威尔坚持使用第三十四步兵师的决心得到了良好的结果。不仅在突尼斯战役，而且在整个战争中，第三十四步兵师立下了功勋。

随着 609 高地的攻占，英军开始运动。到 5 月的第一个星期，阿尔尼姆的桥头堡已缩小到紧挨着比塞大和突尼斯两市的周围地区。5 月 7 日，安德森的部队进驻突尼斯；在同一天，布雷德利的第二军攻占比塞大。在这一战斗中，盟国空军又作出了一次十分出色的努力，一天之内，竟出动飞机 2500 架次之多。几个星期以来，轴心国空军已逐渐溃败，在这一危机面前，只能出动飞机 60 架次作为报复。战事的高潮已近在眼前。在海上和空中已经建立了彻底的无情的封锁。敌人在海上的活动已经停止，空军的努力亦已告终。守军在向德国最高统帅部报告中哀求道：“守不住了！在敌人的胜利中，英美空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在突尼斯导致德意桥头阵地的毁灭。现在我们已经到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愿上帝保佑！”

就在对敌人展开围歼的日子里，艾森豪威尔在前线度过了这个战役的最后一个星期。这使他难以忘怀。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每当我感到烦恼时，我会想到战士们浑身泥浆，坚持在突尼斯寒冷的山地上、在寒冷雨水和污泥中战斗，奋勇冲杀的情景，就使我心情平静下来。”五月份，他在美国报刊上读到一篇关于他母亲的文章。这篇文章强调艾达的和平主义信仰，以及冷嘲他儿子成为将军。艾森豪威尔对这些所谓“和平至上”的报刊文人的议论十分反感。

为此，艾森豪威尔写信给他的兄弟阿瑟，信中说他们的母亲“在信仰上所得到的幸福快乐，比报界所发表的任何令人生厌的俏皮话，对我来说更有意义”。他接着谈到和平主义者，他说，“我怀疑他们这些口上空谈憎恨战争的人，是否会像我这样地痛恨战争”。他说，和平主义者“也许没有看到过在战场上腐烂的尸体，没有闻到腐烂的人肉的恶臭。他们没有到过挤满重伤员的野战医院”，艾森豪威尔说，他同和平主义者的区别是，他憎恨纳粹更甚于战争。还有“我对战争的憎恨，永远比不上我这样的信念：当出现战争危险时，我们每人都有责任……去执行我们政府的命令”。或者，正如他对他的儿子所说的那样，“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唯一不可宽恕的罪行，是不尽你的责任”。

5 月 13 日，在盟军的强烈打击下，轴心国在突尼斯的残余部队投降。艾森豪威尔统率的盟国武装部队，共俘虏敌军 27.5 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德

军。这一胜利，与三个半月前苏联红军的斯大林格勒大捷，遥相辉映。各方贺电向艾森豪威尔飞来。

1943年底，他被选为“美国第一父亲”。艾森豪威尔在评论这一决定时说，他对此表示感谢，美国的父亲们可以为在突尼斯取得胜利的儿子们感到骄傲。

5月19日，丘吉尔应美国众议院议长的邀请，为突尼斯大捷，在美国国会发表了演说。他说：

“在北非，我们的建树比我们预期要好些。取得出人意料的胜利，因而结果是事半功倍。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感谢希特勒的军事知识。如我三个月前在下院预言的，我们这次可以看看这个军事专家的本领如何了，使冯·保罗斯陆军元帅和他的部队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毁灭的无理性的顽强执拗，现在又同样地使我们的敌人在突尼斯蒙受新的灾难……”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两位独裁者的非洲远征，使他们的国家伤亡和被俘的士兵达95万。此外，近240万吨的船舶沉没了，近8000架飞机击毁了，这两个数字都不包括被击伤的船舶和飞机的数目在内。敌人还损失了6200门大炮，2550辆坦克和7万辆卡车……在达到战争的这一里程碑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挽回了一个大陆的局势’。”正是：非洲光复众欢腾，全球酝酿大反攻！

欲知突尼斯大捷后，艾森豪威尔统率的英美远征军下一步如何行动，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一章 向意大利进军

盟军挥师意大利，墨氏抱头大哭泣；
若知当初有今日，岂敢充当万民敌！

突尼斯大捷之后，盟国远征军的进军矛头究竟指向哪里，在英美之间为此发生了分歧，而且愈演愈烈。

在基层，美国与英国士兵之间滋长了一股强烈的敌对情绪。在上层，英国军官对双方作风上的差异感到吃惊，尤其对美军军官乱搞女人感到不理解。一名英国军官说：“我们没有美国人的那种原始需要以证明我们是男子汉。”而美国人则模仿英国人的音调，在英国人从容不迫、落落大方的态度面前显得局促不安。英国人似乎总是棋高一着。一个叫本·索布里奇的美军上校在1943年独立纪念日的一番话概括了美军的态度。他说：“我们应该庆祝7月4日，这是我们打败英国人的唯一记录，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什么运气了。”

那一年在突尼斯，当英美军队为进攻西西里而作好一切准备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紧张起来了。战区指挥官艾森豪威尔曾试图使双方的激动情绪冷却下来，但美军第七军军长乔治·巴顿却嘲弄了他的这种作法。一次在与战区副指挥官埃弗雷特·休斯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巴顿曾指责艾森豪威尔太糊涂。“在战场上过于亲英，”巴顿说，“我曾告诉艾克，总有一天会有记者回到美国捅你一家伙，说你与英国的合作是按着他们的调子行事。”休斯本人对英国人也是疑虑重重。他在日记中提到巴顿受到很大的限制，只能过问计划的制订，不能过问其他。双方对进军的矛头早就存有不同的看法。后来巴顿还向休斯抱怨两名高级英国将领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和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态度傲慢。休斯说：“巴顿不喜欢亚历山大，也不喜欢蒙哥马利。上帝，我希望我们把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忘掉一会儿。”

在两国总参谋部之间，对进军的重点也存有不同意见。1943年4月，当突尼斯战役快结束时，艾森豪威尔开始考虑西西里以及西西里以外的问题。他告诉马歇尔，攻占西西里后，他打算进攻拉丁岛和科西嘉岛，利用它们作为进攻意大利西部的跳板。他知道扩大地中海攻势范围，直接违背马歇尔和陆军部作战处人员的战略部署。确实，要是他仍在作战处，他毫无疑问也会同意结束地中海的作战行动，以便集中力量集结部队进行横越海峡的进攻。但是作为一位战区司令官，他不能不倾听英国人、特别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意见。但马歇尔却认为，击败意大利将是弊多利少，因为盟军的船只必须用来支援居民，单是用煤一项，每年需要1000万吨，还有大量的食品。意大利一旦被盟军占领，可以提供轰炸德国南部的机场，但这远远不值得去花这么大的力气。马歇尔对艾森豪威尔说，“早晚必须作出决定性的努力，从英国进攻欧洲大陆”，如果在地中海西西里战役之后不再发动攻势，实施“围捕”行动就会更快些。

同年5月，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华盛顿开会决定这一问题。他们争论了两个星期。参谋长们最后同意在1944年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欧洲大陆，但是没有对西西里战役后在地中海的行动作出决定，这一问题留待艾森豪威尔去解决，由他酌情制订出最好能使意大利退出战争，并牵制大量的德国部队的作战计划。

既然由艾森豪威尔司令官决定，丘吉尔就飞到阿尔及尔，劝说艾森豪威

尔对意大利发动进攻。布鲁克和其他参谋军官，还劝说马歇尔陪着首相一道前往，形成了上级来恳求下级的奇特场面。

首相在这里逗留了一个星期，不断对艾森豪威尔施加影响，要求他不去进攻撒丁岛，而进攻意大利本土。丘吉尔说，进攻撒丁岛“只是为了方便”，而进攻意大利本土才是“一场光荣的战役”。光荣来自占领罗马，这将是“非常伟大的成就”。艾森豪威尔在5月30日抱怨说：“昨晚首相用三种不同的方式三次重申他的意见。”那天晚上，丘吉尔打电话问，他是否能去拜访。这时已经是晚上11点。艾森豪威尔想睡觉。他说，他不想再翻来覆去地谈这件事情，丘吉尔坚持要来，艾森豪威尔说，好吧。

15分钟后丘吉尔来了，谈了足足两个小时。随同首相前来的英国参谋总长布鲁克将军说：“在这一周内，我看到艾森豪威尔非常疲倦，他经常受到丘吉尔这样的折磨。”

马歇尔既不想进攻撒丁岛，也不想进攻意大利本土。他敦促艾森豪威尔一旦西西里战役结束，就开始在地中海减少兵力。他不信任英国人，怀疑他们对横渡海峡发动进攻的决心。而英方却坚持盟军应把他们的海、空军用来封锁德国，而“地面战斗让俄国人去干”，盟军乘机扩充在地中海和巴尔干半岛的势力。对此，艾森豪威尔感到左右为难。

在这一段期间，艾森豪威尔还受到法国问题的“折磨”。达尔朗被刺后，罗斯福把法国局势说成是“可怕的一团糟”。美国企图削弱戴高乐的力量，但没有成功。五月中，在被德国占领的法国内部，抵抗运动成立委员会，并宣布效忠戴高乐，在沙漠中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过、支持戴高乐将军的法国部队，渗入阿尔及尔，在吉罗的人中间进行争取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居住在阿尔及尔的法国知名人士要求由戴高乐取代吉罗。六月间吉罗屈从于他的顾问们的压力，会见戴高乐。他们同意成立一个法国全国解放七人委员会，由吉罗和戴高乐两人共同担任主席，吉罗保留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职务。不久，两人便发生了争吵。戴高乐想用他的人来代替维希政府的旧官员，并要求废除反犹太法律，而且还要从吉罗手中把军队的控制权夺过来。

6月10日在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戴高乐说明他的立场，未能争得多数，从而蓄意发作起来，他“非常遗憾”地宣布，“他不能再与委员会发生任何联系”，并且辞职。戴高乐的辞职使罗斯福高兴。他认为现在这位自由法国的领导人被排除在外了。罗斯福总统告诉艾森豪威尔，“戴高乐这种情况早晚要出现的”，而现在就出现，比晚出现好，因为“戴高乐变得使人几乎难以容忍”。但是，在阿尔及尔的戴高乐追随者们认为，在当时的法国不可能没有戴高乐。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对戴高乐辞职的反应是，将委员会扩大为14名委员，戴高乐重新担任两主席之一，对武装部队的控制权由戴高乐、吉罗、朱安和其他两人组成的小组委员会掌管。在新的委员会中，戴高乐占有多数，看来他正在完全控制法国的政务。

对于这一现状，罗斯福非常不满。他打电报给丘吉尔说：“戴高乐使我受够了，我们不可能和他在一道工作。”丘吉尔不同意，并说盟国必须找到与戴高乐一起工作的办法。这就是通过艾森豪威尔。丘吉尔认为，可以利用艾森豪威尔来控制戴高乐。

艾森豪威尔不同意美国总统的意见。他一想到同戴高乐决裂就胆战心惊。在阿尔及尔，他能够在他的周围到处感到戴高乐的政治力量。他担心，如果戴高乐被迫退出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北非会出现内战。他正在准备进

攻西西里，不能在他的后方出现混乱。他设法使罗斯福冷静一些，他请求总统不要再弄出新的危机，并答应去会见吉罗和戴高乐，坚持仍然要吉罗指挥法国的武装部队。

结果，戴高乐的傲然态度完全出乎艾森豪威尔的意料。会见时，戴高乐开门见山地说：“我是以法国总统的身份到这里来的。如果你有意向我提出请求，请放心，我事先已准备使你满意……”艾克于是很有礼貌地要求戴高乐，让吉罗指挥法国武装部队。戴高乐非常气愤地回答说：“法国军队指挥权的问题，是法国政府权限范围内的事，不是你们的事。”艾森豪威尔重申他的立场，对此戴高乐问道：“你是一名军人，你认为一位领袖的权力，如果要仰仗某一外国的鼻息，还能存在吗？”他承认艾森豪威尔在经管着用美国装备重新武装的法国军队的工作，处于有利的地位，但是戴高乐提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军使用的是法国的大炮，驾驶的是法国卡车和法国飞机。他问：“我们因此而要求过美国任命这名或那名领导人，或建立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制度了吗？”

说实在的，艾森豪威尔对提出这一要求是感到为难的，这只是由于罗斯福的压力才这样做的。本来，他不想过问法国的政治，他比丘吉尔，更比罗斯福清楚地知道戴高乐在法国人民中的影响。他对戴高乐，正如戴高乐对他一样，有着一种“无可奈何的钦佩”。他们两人从来没有成为密友，但是他们互相尊重。戴高乐钦佩艾森豪威尔的直率和诚实；艾森豪威尔钦佩戴高乐的能力和他毫不动摇地献身于解放法国的事业。

在进军西西里之前，6月22日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送去一份关于“当前形势”的长篇分析报告。他强调进攻西西里时拥有一个巩固后方的重要性。他请马歇尔注意，不要让罗斯福的行为酿成危机。他建议承认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是法国临时政府，认为这个问题比吉罗的地位更重要。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们也都认为，承认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是罗斯福给艾克发去了一份严厉的指责电报，警告他“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承认这个委员会”。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某种有限的承认”将会是有益的。在8月，罗斯福终于对艾森豪威尔所提的方针作了某些妥协。在毫不隐讳地宣称不会“给戴高乐一匹白马让他进入法国，成为法国政府的首脑”之后，罗斯福采取承认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对承认其统治权的法国的海外领地施行政权”的立场。

法国问题这样解决后，艾森豪威尔就着手实施代号“哈斯基”的西西里作战计划。在进攻该岛之前，艾森豪威尔主张先攻占位于突尼斯和西西里之间的班泰雷利岛。这座岛屿有意大利的重兵把守。海岸都是岩石，没有沙滩，唯一的通道是一个狭窄的海港。艾森豪威尔想把这个岛作为盟军的机场和前进基地。副总司令亚历山大根本反对攻占这座岛屿。海军司令坎宁安起先同意亚历山大的意见，认为太冒险了，空军司令特德也这样认为，但是特德想要飞机场，他是艾森豪威尔的副手们中第一个率先支持这一行动的。

经过盟军的飞机对这个岛屿实行三周的猛烈轰炸之后，坎宁安的意见改变了，他同意艾森豪威尔的看法，意军士气低落得不堪一击。但是亚历山大还是反对。负责指挥突击的英国将军也反对，他说艾森豪威尔的计划行不通，而伤亡将是巨大的。他说班泰雷利是一个小型的直布罗陀，到处布满枪炮，认为这一计划充满了“阴郁不祥的预兆”。艾森豪威尔则坚持不借任何代价，必须占领这个岛屿，但是反对意见异常强烈。因此他决定在突击前亲自侦察一下。6月7日晨，他和海军司令坎宁安乘坐皇家海军“曙光号”，驶往班

泰雷利岛。这艘军舰一直开到海岸，然后向敌人打了几炮。只有两门意大利海岸炮回击，而且都打歪了。艾森豪威尔对坎宁安说：“安德鲁，如果你和我坐上一艘小艇，我们自己就能占领这个地方。”艾森豪威尔回到阿尔及尔，就命令按计划发动攻击。经过一昼夜的激战，守军 11000 多人就投降了。盟军没有任何伤亡。

首战成功，艾森豪威尔兴高采烈。7 月 7 日，艾森豪威尔飞往马耳他坎宁安的指挥所，亲自指挥“哈斯基战役”。7 月 10 日凌晨，3200 艘大小军舰和运输船只，载着 16 万英美军队，在 1000 架飞机的掩护下，对西西里岛东南部发动进攻，实行两栖登陆。7 月 10 日，守卫西西里的意军是 23 万人，德军 4 万人。意军有 11 个师，但他们编制不足，其中 7 个师是海岸防卫队，多半是胡子兵，士气沮丧，战斗力很低。德军有两个坦克师，其中一个精锐的戈林党卫师。由于 7 月 9 日下午刮起七级西北风，海上波涛汹涌，所以士兵们晚上都趁机睡大觉去了。他们在床上翻身时得意地说：“谢天谢地，今天夜里他们无论如何来不了。”

英美军队出奇制胜，登陆相当顺利。只是由于美国飞行员缺乏两栖作战的训练和经验，在朦胧的月光下把一些海上沙洲误认为海岸滩头，过早地打下了一些伞兵战士，使他们葬身海底，作了无谓的牺牲。

盟军登陆以后，岛上德意军队的抵抗加强了，尤其是德军拚命抵抗，以掩护他们的主力撤退到意大利本土。在东海岸，英军遭到德国法西斯军队的猛烈抵抗，进展缓慢，到 8 月 5 日他们才攻克卡塔尼亚。此后，整个英军战线向前推进到埃特纳火山南面和西面的山坡。在中部和西部，美军进展较快。7 月 23 日攻下巴勒莫以后，巴顿将军挥戈东进，于 8 月 16 日先于英军占领了西西里首府墨西拿城。第二天，8 月 17 日上午 10 时，最后一名德军已被驱逐出西西里。在这次攻占西西里的战役中，英、加、美官兵伤亡和失踪者共为 31158 人，其中美军损失 7445 人。意德军的损失共 165000 人，其中被俘 132000 人，逃亡意大利本土的有 100000 人以上。

在巴顿进入墨西拿的当天，艾森豪威尔的军医递给他一份医生的报告。报告说，一个星期前，巴顿在视察一所野战医院时，大发脾气。当时他看到一名青年士兵，显然没有病。巴顿想知道为什么他来住院。那个士兵回答说：“我神经有毛病。我再也受不了炮弹的爆炸声。”说完便哭泣起来。巴顿又叫又骂，打了他两个耳光，骂他是胆小鬼，命令医生们不准他住院。

艾森豪威尔读了这份报告，给巴顿将军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开头就说：“我清楚地懂得，为了达到预期的目标，有时采取坚定和断然的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原谅粗暴，不能辱骂伤员，也不能在下级面前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艾森豪威尔命令巴顿写深刻的检查，并向挨打的士兵道歉，向医院里的护士和医生道歉。艾森豪威尔为了保护这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将医生的检举报告没有交军法部门，而保存在自己的秘密档案中。巴顿按照艾森豪威尔的要求道了歉，随后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我无法用言词来表达我使你很不愉快的悔恨和忧伤。你是我感激不尽的人，我心甘情愿为你献出我的生命。”

西西里战役结束后，在丘吉尔的要求下，接着向意大利本土进军，艾森豪威尔心想：进攻发动得越早越有利。按照和达尔朗达成的协议的方式，若预先和意大利作出安排，便可能减少、甚至不必经过艰苦的战斗。1942 年 11 月，在“火炬”行动刚开始时，艾森豪威尔错过了不需要付出大的代价、

趁热打铁攻占撒丁岛和突尼斯的机会。如果在意大利出现这种机会，他说他一定要抓住。

7月19日，盟军对罗马进行首次空袭，对其军事目标和铁路车站造成了严重破坏。本来，意大利在北非、地中海、西西里岛接二连三的惨败，就早已加深了墨索里尼政权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危机。这样一来，人心更加慌乱。

意军兵员缺乏，士气低落，兵力分散。在国内担任防御的47个师战斗力很差。在苏德战场上作战的意军在第八集团军的22万人，只剩下8万人。在法国和巴尔干担任占领任务的意军，在当地游击队的打击下，已不能自拔。它的“盟友”纳粹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惨败后，无力对意军进行大规模的支援，反而对意大利横征暴敛，意大利人民怨声载道。

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日益恶化，1942年意大利的工农业生产分别比战前下降了35%和20%。进口额减少了78%。国债从1460亿里拉增加到4050亿里拉。国家预算赤字大增。

1939年是120亿里拉，1943年上升到870亿里拉，收入只敷支出的36%。由于严格的控制，物价形式上只上涨了一倍，但全国各地黑市猖獗，食品匮乏，民不聊生。早在1943年3月，米兰、都灵等地的工人就举行了大罢工，参加者达30万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身患胃溃疡病、性情暴躁且有神经质、意志颓丧、反应迟钝的“领袖”墨索里尼，还决定动员100万人，强迫14岁到70岁的男子和14岁到60岁的妇女为国家服役。但人民厌倦了，军队士气涣散，反战情绪普遍增长。贫穷的意大利帝国已无法继续进行战争了。在这种形势下，意大利统治集团内部决定抛弃墨索里尼来摆脱危机，维护资产阶级政权。

早在1943年5月初，沉默寡言、谨小慎微的意大利国王埃曼努尔就在估计形势，伺机行事。他暗自作了如下的笔记：“德国在进入战争的第五年时是疲倦而沮丧……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是军心颓丧……南斯拉夫处于全面暴动状态……丹麦和挪威的全体人民都是反德的……俄国看来很强大，有丰富的资源和人力，有很好的军事和民政领袖。”“盟国无疑是了解意大利军队的可怜状况的，除了几辆德国坦克以外，没有装甲部队。”他还说：“我们决不要忘记对英美政府领袖作出各种有礼貌的姿态。”现在国王觉得时机已到，便同总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和巴多格利奥元帅等人联系，成为酝酿推翻墨索里尼的政治势力的核心。同时，在法西斯党内，一些元老也对墨索里尼不满，准备召开从1939年以来就一直没有举行过的法西斯党的决策机构——最高委员会会议，以此作为向他们的领袖提出最后通牒的手段。随着败局的发展，两个密谋集团加紧了他们推翻墨索里尼的活动。

这时盟军的进攻和希特勒的要挟又加速了事态的发展。

1943年7月17日，盟国飞机轰炸了罗马等城市，并散发传单，号召意大利人民抛弃法西斯和纳粹“领袖”，向盟军体面投降。7月24日下午5时，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开会。这是一次与墨索里尼摊牌的会议。该党的元老、前外交部长和驻英大使迪诺·格兰迪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内容包括要恢复宪制，国王应掌握更大的权力，指挥军队；墨索里尼只是党的领袖，不应再主持国务等。经过激烈的讨论，7月25日凌晨2时30分通过了决议案，19票赞成，8票反对，1票弃权。投赞成票的包括墨索里尼的女婿、外交部长齐亚诺。这时墨索里尼站起来说：“你们挑起了政权的危机。简直糟糕透了！”他愤怒地宣布会议到此结束。但是墨索里尼没有想到，不仅会议到此结束，他在意

大利 21 年的独裁统治也在这一天结束了。

7 月 25 日下午 5 时，国王埃曼努尔在萨沃伊宫接见了墨索里尼，宣布废黜他的一切军政职务，由巴多格里奥组织新政府。国王说：“事情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军队反对你，阿尔卑斯山轻步兵在唱一支歌子，歌中说他们不再以墨索里尼的名义去打仗。”然后国王继续说，在他看来，巴多格里奥可以应付局势，并将组成一个新的政府。墨索里尼争辩说，军队将在最后考验中支持他，他的去职将是“丘吉尔—斯大林集团的胜利”。但是，国王非常坚决，一再重复说：“我很遗憾，没有别的解决办法，只能如此。”墨索里尼就这样被拘禁了。虽说后来他被希特勒解救，当了一个时期的傀儡，但是大势已去，法西斯的末日就要到了。

次日，巴多格里奥在电台上宣布墨索里尼下台的消息，并声明“战争在继续进行。意大利……信守它的诺言”。但是这一声明既不能使德国人也不能使盟国相信，只是把意大利人民弄糊涂了。大家都希望意大利脱离战争。

如何利用“意大利的背叛”成为艾森豪威尔将要考虑的问题。他想急于利用这一机会进行谈判，但是罗斯福不想采取主动。罗斯福电告丘吉尔，他认为应当使意大利人接受“尽可能接近无条件投降”的条款。如果这一方案起作用，就不会再有达尔朗协议，而已多格里奥是意大利的达尔朗，美国总统对英国首相说：“没有你和我的批准，我们的战场指挥官绝对不能规定任何一般性的条款。”丘吉尔倾向于不提任何条件与意大利谈判。他给罗斯福回电说：“现在墨索里尼已经垮台，我愿意与能履行诺言的非法西斯的意大利政府谈判。”但是他也坚持要限制艾森豪威尔的权力。7 月 28 日，罗斯福在电台发表广播演说，强调说：“我们对意大利的条件仍同我们对德国和日本的条件一样不变，这就是无条件投降。我们将不同法西斯主义以任何形式打交道。”

就在罗斯福和丘吉尔商谈时，希特勒行动了。墨索里尼垮台的当天，德国人立即赶调部队进入意大利北部，其中包括从法国调来的两个师，计划占领罗马以南的意大利。此间，艾森豪威尔也想立即采取行动，脑子里装满了计划和打算，要利用墨索里尼垮台所造成的有利局势。如果协议能帮助他迅速地、不付出多少代价就占领意大利半岛，他愿冒个人风险和另一名欧洲的反动将领再做一次交易。

在此之前，丘吉尔就抱怨他的进攻计划过于小心谨慎。“雪崩”行动（进攻的代号）计划在那不勒斯以南的萨莱诺登陆。丘吉尔希望更往北，更靠近罗马。艾森豪威尔曾向丘吉尔解释，进攻部队要有以陆地为基地的战斗机掩护，这是非常重要的，而萨莱诺是以西西里为基地的战斗机最大航程的极限。艾森豪威尔向丘吉尔保证，他要避免零敲碎打，以便直接扑向敌人的要害，但是部队的上空必须要有战斗机。现在墨索里尼垮了台，只要能对意大利采取适当措施，使艾森豪威尔部队在德军大批部队进入“不朽之城”（罗马）之前赶到那里，就使奔袭占领罗马有了可能。这将如八个半月前在突尼斯一样，又是一场竞赛。

抓住这个时机，艾森豪威尔想通过无线电直接向意大利提出建议，答应让他们得到体面的和平，并强调盟军是作为解放者来到意大利，“使你们摆脱德国人，并从战争的恐怖中拯救出来”。在墨索里尼垮台的那天晚上，他起草的投降条款上，就“准许意大利得到和平，和允许萨沃伊王朝和巴多格里奥继续执政”。这些条款比无条件投降优厚得多。因此，所有艾森豪威

尔的上级都不高兴，每一封电报都说艾森豪威尔必须在投降条件上增加这一条或那一条。麦克米伦指出：“可怜的艾森豪威尔在受到折磨。”夹在两国政府之间、左右为难的艾森豪威尔向玛咪承认：“在我年青的时候，我常常阅读关于军队将领们的书，我羡慕他们享有我以为是行动上和决策时的自由。多美的想法！而对我提出的这些必须予以满足的要求，使我成为奴隶而不是主人！”但是，等到艾森豪威尔拟订出他的上级可以接受的协定时，德军已把 19 个师调进意大利。耽误战机的这笔帐，是用鲜血来偿付的。

艾森豪威尔原想利用意大利人的合作，加速战争的进程。9 月 6 日他决定派第 82 空降师司令泰勒少将秘密前往罗马，同巴多格·利奥作最后安排，视情况需要作些变动，并要巴多格利奥遵守诺言。后来，泰勒安全抵达罗马，结果发现意大利军队吓得要死。他们坚持认为，派来罗马的盟军力量太小，抵挡不住德军的进攻，意大利不能给盟军第 82 空降师提供机场，他们也不能公开发表与盟军合作的声明。当艾森豪威尔看到这一电报时，非常愤怒。他满脸通红，嘴绷得紧紧的，两眼闪光，全身肌肉收紧。他抓起一支铅笔，把它折断，又拿起另一支，又折断。咒骂，喘了口气，接着开始口述给巴多格利奥的答复：

“我要按原定时间广播停战协定。”这一时间就是当天晚上 6 时 30 分，离当时不到 12 个小时。“如果你不能按原先同意的那样合作，我要向世界公布这件事情的全部记录。你们不执行已签署的协议所规定的全部任务，将对你们的国家造成最严重的后果。你们今后的任何行动都不能恢复对你们的信任，因而结果将是你们的政府和国家的解体。”

在晚上 6 时 30 分，艾森豪威尔按计划阿尔及尔的无线电台上发表广播演说。“我是盟军总司令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意大利政府已经使它的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我以盟军总司令的身份，已批准军事停战协定。”

“停战立即生效。”他敦促意大利武装部队“帮助盟军把德国侵略者从意大利本上驱逐出去”。当他讲完后，在阿米尔卡的无线电技术人员立即收听罗马电台。巴多格利奥没有发表声明。过了十分钟后，艾森豪威尔将巴多格利奥声明全文通过阿尔及尔电台广播出去。声明命令意大利武装部队停止一切对盟军的敌对行动，敦促他们去同德国作战。一个小时后，巴多格利奥才被迫在罗马电台广播了同一内容的声明。艾森豪威尔才勉强感到满足。他“耍了一点手腕，可是他赢了”。但是，他不知道他赢了多少，因为没有人能说出意大利的帮助起多大作用。现在艾森豪威尔处于进攻前的等待时期，这是很使人恼火的时期，而他只能祈祷。

英美联军在向滩头阵地进发。德军准备控制罗马。9 月 8 日，当盟军司令部和巴多格利奥政府公开发布停战宣言后，驻意大利的德军，奉希特勒的命令立即包围了罗马，解除了意军武装，占领了意大利大部分领土。意大利王室和巴多格利奥内阁阁员，仓皇乘坐两艘潜艇于 9 月 10 日清晨从罗马逃往布林的西避难。以后在盟军占领区成立了一个反法西斯的意大利政府机构。

10 月 13 日，巴多格利奥政府对德宣战，同时英、美、苏三国政府发表宣言，承认意大利为共同作战一方。

由丘吉尔起草的后经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意的英美苏三国联合宣言如下：

“英国、美国和苏联三国政府，承认巴多格利奥元帅所声明的意大利王国政府的立场，并且接受意大利国家和武装部队的积极合作，将它们看作在对德战争中的一个共同交战国。9 月 8 日以来的军事事件，以及德国人对待

意大利民众的残暴行为，终于导致了意大利对德国的宣战。事实上，这已经使得意大利成为一个共同的交战国。美、英、苏三国政府，将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同意大利政府一道工作。三国政府承认意大利政府关于把德国人驱逐出意大利以后，服从意大利人民的意志的诺言。不言而喻，意大利人民通过宪法手段，来决定他们最后所希望的民主形式的政府这一绝对的和充分自由的权利，决不容许遭到任何损害。

“意大利政府和联合国各国政府之间的共同交战国关系，不能自行影响最近签订的条件，这些条件仍然保持充分的效力，而只能由盟国政府根据意大利政府对于联合国家的事业可能提供的援助，在彼此间取得协议后进行调整。”

墨索里尼的垮台和意大利退出战争并对德宣战，标志着法西斯轴心国的解体和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又一伟大胜利。酝酿已久的横渡英吉利海峡的“霸王”行动（前称“围捕”）就要提到议事日程了。但就在这时候，艾森豪威尔的私生活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议论。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二章 将军与情人

将军风流爱美女，战场结下情和谊；
有朝一日凯旋时，上帝拆开两情侣。

就在艾森豪威尔向意大利进军时，他和妻子已经分别整整一年了。玛咪一个人被留在美国的家里，感到孤独、苦闷。她怀念在军校的儿子，但更牵挂在前线的丈夫，她弱不禁风，常常生病卧床不起。她的胃口不好，体重掉到 112 磅，用她自己的话说，她“过着无头绪的生活，整晚阅读惊险小说，在日以继日、月以复月地等待着。”

其实，玛咪所真正关切的是凯·萨默斯比，她是艾森豪威尔的司机，也是艾森豪威尔的私人秘书。玛咪似乎觉得，凯总是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站在他的旁边，或紧靠将军的后面。特别是她听到丈夫和凯的流言蜚语后就更加不放心了。她忧心忡忡，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也流露了自己的不满。她认为丈夫不再是她“个人的财产”。但艾森豪威尔在信里却一再向她保证。“不管人们怎么说，”他写道，“你说我不再属于你和约翰，那是十分错误的……作为一个人，至今我仍牢记在心，我是这个家庭里（你的、约翰的和我的）三分之一的成员。因此你没有必要对目前这种状况感到烦恼，至少我还没有因政治工作而头脑糊涂。”

当时有关艾森豪威尔和凯·萨默斯比的流言，在伦敦，在华盛顿，可以说是满城风雨。但是，艾森豪威尔和这个英国女士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个谜底后来在凯·萨默斯比所写的一本回忆录里，才算彻底揭开了。书名是《难以忘怀——我和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恋爱故事》（PAST FORGETTING — My Love Affair With Dwight D·Eisenhower）。这本书 1976 年出版后，昔日这位盟国远征军统帅的罗曼蒂克故事，也就愈传愈远了。

1941 年珍珠港事件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以美国陆军代表的身份来英国考察，一见钟情地爱上了给他开车的这位美貌动人的英国女士。随着岁月的推移，在战争的环境中，他们朝夕相处，患难与共，日益建立了亲密真挚的感情。后来，作为欧洲盟军最高指挥官的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曾想方设法让凯参加美国陆军妇女队，并授予少尉军衔，旋即当了他的秘书和私人副官，并使她加入了美国籍。

战争结束时，艾森豪威尔开始考虑和凯结婚，并着手做了一些准备。关于这件事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的口述传记中曾经提到，当时曾在美国报刊上掀起轩然大波。然而，现实是无情的，在艾森豪威尔凯旋回国，青云直上，最后登上总统宝座后，一切都变了。他们之间的真挚爱情只在双方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凯不得不沉痛地感叹：艾克为了他的事业而牺牲了爱情。

凯·萨默斯比撰写她和艾森豪威尔的恋爱史，是在她生命的晚年、医生对她宣判死刑后写成的。

1973 年下半年，她被诊断只能活 6 个月，但凯的生命延续了一年多。她每天照常兴趣盎然地生活着，直到生命的最后的一瞬。她说：“生命没有停顿的时刻。”

她始终不断从事各种工作。她最后的工作是为电影《后妻》当服装顾问。每当周末，她常驾着破旧的沃尔克斯车去汉普敦斯，同老朋友们打桥牌，偶尔也打高尔夫球。她还写作。她写这本书是为了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世。

“我一向非常谨慎。”她说，“现在将军过世了，而我也活不长了。一

旦我死后，希望这本书能为我澄清事实。我希望世人了解我和艾森豪威尔爱情的真相。”

“漫漫长夜，追忆往事，历历在目，犹如昨天的事使我难以忘怀。我谨向将军——艾克，我所钟爱的人致以真诚的告别。”凯·萨默斯比在书中写道，“我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大事，有时发生了大事也往往要很久以后才领悟。我遇到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是这样的。那时他是少将，两颗星没有给我什么印象。”

当时凯是英国汽车运输队的成员。运输队是在对德宣战后由初出茅庐的已参加工作的妇女志愿组成的。在美国对德意日法西斯宣战后，成批的美国高级军官经常到英格兰和苏格兰活动。有的看飞机场，有的视察海防，还有的整天整夜地同英国军政领导人会谈。大使馆需要司机及时把这些军人送往他们要去的地方，这在当时，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德国飞机经常狂轰滥炸。伦敦，实际上整个英国都处于高度保密状态。街上没有路牌，公路上没有标志，一切都没有了。德国伞兵不可能得到援助和启示（德国人的进攻令人惶恐不安）。夜间实行全部灯火管制。公路上的汽车只准使用前灯最微弱的灯光，加上伦敦讨厌的雾，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人每次参加晚会总是不能正点到达。白天的情况也不好。美国陆军的司机很不熟悉伦敦，经常迷路，坐他们汽车的美军高级军官的血压常常升高。

凯·萨默斯比被选中为美国在伦敦的军官开车。那时，她和一个名叫理查德·阿诺德的美国军官在搞恋爱。他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长得非常漂亮，是个上尉，有人说他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当时战争条件还不允许他们结婚，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紧张地为战争服务。他们约定打败法西斯后再举行婚礼。理查德对凯说：“只有全世界赢得和平，我们才能过甜蜜生活。”

一天，凯奉命将到车站去接一位美国将军。那天，别的女司机已经抢了好差事。负责分配运输任务的中尉军官抱歉地对她说：“凯，我希望你不要介意。这位艾森豪威尔是仅仅剩下的一位了。”分配任务的军官知道凯想要一位地位显赫的将领，而不是一位微不足道的两星将军。于是，她做了一个鬼脸，说：“好吧！”

几天后，将军们到了。他们的飞机因天气关系在普雷斯特韦奇受阻，两天之后，他们从苏格兰改乘火车来伦敦。不料火车也晚点。最后，在五月的一个明媚的早晨，将军们终于抵达了，并同约翰·怀南特大使同住在格罗斯文诺尔广场。下达给司机们的指示是等候命令。汽车排列在穿军装的人群中。他们等了又等，时过中午，凯饿极了，就偷偷地溜出去吃了一个三明治。当她闲逛回来，看见大使馆的其他两部汽车都已开走，不禁大吃上惊。路旁只孤零零地剩下一辆军用“帕卡德”汽车，两个美国军官站在车旁等候。这时，凯丢掉女人的自尊心，跑过去抱歉地说：“哪位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我是你的司机，先生。”

“我们去克拉里奇旅馆，请开车吧！”艾森豪威尔说。从此，凯就与这位美国将军结下了不解之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他们始终工作、战斗在一起。

艾森豪威尔身为远征军的总指挥官，他承担着千钧重担。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他加快节奏安排他的生活，除了建立了一个短小精干的司令部，还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小家庭”。他知道他需要的不是五光十色的社交生活，而是一个家，一个充满温暖欢笑和富有感情的家庭。他临时凑了一个战时之家，

那是一个和谐的小群体，其中有布彻、特克斯和米基，以后凯也加入了这个小群体。

哈里·布彻，才华横溢，是艾森豪威尔多年的朋友。他们两家关系非常密切，艾森豪威尔夫人和布彻夫人在华盛顿同住一套公寓，而布彻在伦敦又住在将军的旅馆套间里。布彻富有魅力，长得十分标致，微笑起来使人入迷，朋友遍布各地。他是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副经理，现为艾克掌管公共关系事务。更为重要的是，他协助将军保持头脑清醒。艾森豪威尔曾多次对别人说：“有时我只想像一只病狗似地蜷缩在角落里休息，而布彻不让我那样，这就是我离不开他的原因。他不让我干蠢事。”布彻是个轻松、愉快的人，在他不同意将军意见时，说起话来也是直截了当的。他是艾森豪威尔不可缺少的“家庭伙伴”。

特克斯上校，是负责将军办公室的一位副官，他工作效率极高，责任心很强。他一天不到办公室就会坐卧不安。有人认为特克斯冷酷，而事实上他非常腼腆。除了他的嗓门粗外，他平时非常沉默。特克斯与将军的关系不像布彻那样亲密。

米基军士是艾森豪威尔的勤务兵，米基给将军刷鞋，擦铜纽扣，系鞋带，换刮脸刀片，把牙膏挤在牙刷上，帮他穿衣服脱衣服，整理和收拾行装，并认为做这些事是他的荣幸。米基为长官效劳是不遗余力的。他每天在将军的桌上要放巧克力、口香糖，准备好大量的“新西方”香烟，以及消遣的读物。此外，米基每周还给艾森豪威尔夫人写一封信，汇报将军的身体状况。

凯·萨默斯比，自从进入这个“小家庭”并变成“正式成员”后，每天进进出出，除给将军开车外，还帮助将军守电话，处理信件和安排约会。凯同艾森豪威尔在一起的时间，实际上比别人都多。清晨要送他去办公室，他做完一天的工作后要接他回旅馆。

艾森豪威尔对他的“家庭成员”们采取严格的保护措施，明确规定布彻、特克斯和凯只能为他工作。“特别是你，凯，”将军意味深长地说，“我知道机关里有的军官经常要你去干这干那，我不同意这么做。你们是我的工作班子，任何人都不得支使你们。”

凯与将军相处的时间越长，交谈越多，彼此的了解也就越深。有一次艾克说：“凯，我听说你母亲的这么多事，我真想见见她，你为什么不找一个晚上请她来同我们一起吃饭呢？”于是，凯的母亲同将军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晚上。艾森豪威尔希望知道她的家庭成员的情况，而凯的母亲也非常愿同他交谈。她把凯的姐姐埃维和她丈夫的情况告诉了他，还谈到凯死去的妹妹希拉。她还向他谈到凯当工程人员的弟弟谢默斯，眼下他正在温盖特将军麾下进行战斗。

晚宴结束时，将军用双手握着凯的母亲的手说：“我们后会有期，我还想多听些你们爱尔兰的故事。”这次相会，彼此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凯高兴地对人说：“那次宴会后，我真觉得我好像成了将军家庭的一员，或者说将军成了我的家庭成员了。”

有一次凯出车回来，艾森豪威尔对她说：“凯，你知道吗？我们生活中缺少乐趣。怎样才能使我们生活得更快乐？我知道，你一周工作七天很累，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近来很少看你的未婚夫理查德。”

“哦，理查德和我还能凑合。”凯说，“这毕竟是战时，我们不得不这么做。”

就在这天晚上，将军约凯和他一起打桥牌，这是他们夜生活的开始。无论在北非，以后在意大利，在法国，在德国，一直贯穿在整个战争期间。晚上只要将军有空，他们就打桥牌。经常凑足四个人，布彻是打桥牌的能手，克拉克将军、戴维将军也是艾森豪威尔打桥牌的常客。他们还在一起骑马，打高尔夫球。

沉浸在创造性劳动过程中的男女，不论是打仗、恋爱、绘画、怀孕，都是人生具有的特征。凯和艾森豪威尔开始踏上穿越战争隧道的行程。这场战争是正义之战，是一场十字军反对邪恶的战争。战争加深了司机和将军的友谊，凯时时刻刻都感觉到将军在关注她，而艾森豪威尔也感到，盟军最高指挥部，特别是在他身边，有这样一位美貌活泼的女性，打破了他和妻子长期分离后的孤独和寂寞，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乐趣。

他们彼此心心相印。这是将军和凯都知道的事情。他自己的家离得很远，他很少提到家人。这倒不是他不关心家，而只因为他们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局外人是了解这些的。战争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催化剂，势不可当，加深了相互间的关系，因此平时需要几个月发展的亲密关系，在战争时期几天之内就成熟了。

晚上打桥牌，使艾克和凯有许多机会碰到一起。一开始打牌就配合得很好，不久就达到了心领神会的程度，成为配合十分默契很有战斗力的一对。凯从来没有与别人有过这样直接的感情交流。作为打桥牌的搭档，使他们超过了长官与司机的关系。一天早上去伦敦，艾克对她说：“真怪，和你想的完全一样。你知道，即使在打完牌后回想叫牌的情况，我相信也不会有任何问题。我们从来没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们的关系，用凯的话说是：“正如一个人在寒冷而阴湿的夜里，忧心忡忡地爬上床时，突然发现有人在被子里放了两个暖水袋一样，会在这出其不意的温暖中，即刻感到轻松愉快。”

艾森豪威尔叫人的信号是，一声铃响是找秘书，两声找特克斯，三声找布彻，四声铃响便是找凯·萨默斯比。

“坐下，”艾克对凯说，“我有事同你谈谈。你知道这几天我们将收拾行装去北非了。凯，你愿意跟我去吗？”

“我一定去！”凯高兴地要跳起来。

“那末，就这样决定了。你跟我们去，也许要一个月时间，局势才能稳定下来。凯，这是你不应知道的绝密，一个字也不能告诉别人。”

“请放心，长官。”凯站起来说，“在战争期间，我要为你服务到底。”

然而，出人意料的，凯一到北非就受到一个噩耗的打击。她的未婚夫理查德在一次视察布雷场时，不幸触雷身亡。这一消息是艾森豪威尔告诉她的。

一天傍晚，凯执行任务回来，将军对她说：“凯，我告诉你一件很不幸的消息，希望你在精神上能够顶得住。理查德死了，他是在一次事故中死去的。这一消息是今天下午刚刚从电台上收到的。”

凯听到这一消息，有如五雷轰顶，半天没有反应过来。当她弄清楚理查德已经牺牲的消息时，大哭一场。艾克把手搭在她的肩上，让凯在沙发上坐下。“哭吧！”他说，“继续哭吧，除了哭还有什么办法呢。把眼泪全都哭出来，这样比憋在心里或许还要好些。”

然后，艾森豪威尔劝凯到外地休养几天。他说：“我认为你应该去水手乐园住几天。那里没有人，你可以单独待在那里，清理一下思绪。去骑骑马，活动活动，这样对你有好处。”

凯十分感激将军对她的关怀。她从水手乐园回来，又投入紧张的工作。有时她也在想，她和理查德的恋爱是战时罗曼蒂克。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了，而每次见面就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激动。理查德对她的了解，甚至不如艾克对她的了解。艾森豪威尔见过她的母亲和弟弟，而理查德对她的家人了解很少。她对理查德的家庭更是毫无所知，用凯的话说，他们好像是在真空中相逢相爱。现在当她悼念他时，凯发现她对自己所哀悼的人并不真正了解。他们见面最多也不过五六次。

一天早晨，凯去圣·乔治饭店将军办公室向艾克请示工作，他面露微笑地说：“你想做新军装吗？我看你可以做两套。”

“谢谢你，我只要一套就够了。”

“你不知道，我是多么愿意为你做点事。”

艾克说话的声音带有一种难以捉摸的意味。他紧紧地咬着嘴唇看着她。那样的表情使她不知所措。两人沉默不语，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凯愣住了，坐在桌子旁边呆看着他。接着将军摘下老花镜，伸出手来说：“凯，你和别人不一样。”她顿时热泪盈眶，深深感到将军对她和别人不同。

他把手放在她的手上，脸上带着微笑，这种微笑同他有名的咧嘴而笑不同。这是一种温情的、近乎震颤的，甚至带点悔恨的微笑，充满激情，而又满怀钟情。他们相视坐着，凯感到是那样的不自在，无地自容非常害羞。两人没说一句话，一双眼睛注视着另一双眼睛。他们终于心心相印，真诚相爱了。

凯想，这就是恋爱。过去她恋爱过，但从来不像这样顺乎自然，这样情投意合。一年多来艾克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比其他人多，他们在一起工作，打桥牌，骑马，一起分担烦恼，在不知不觉中感情发生了变化，彼此的依恋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的确，凯爱上了这位头发稀疏、戴着眼镜，面容消瘦而疲倦的中年人，她想把他搂在怀里，紧紧贴着他，使他高兴。她想躺在草坪上，让他的躯体压在她的身上，领会他眼睛里流露出来的深情。她简直要高兴地喊出来：“上帝啊！我真的爱上了这个人。”

无疑她也感到羞怯，结果又控制了自己的感情。她回到座位上，假装清理文件，凯想抓紧工作，以掩饰她那纷乱的心绪。据凯自己说，那天早晨，生活中出现了几乎承受不了的甜蜜气氛。她像飘浮在一朵云彩上而悠然自得。她没有去想未来，只反复思考那感情中的插曲，回忆她和将军在爱情道路上的每一细节，他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有过什么表情。然而这里是总部，现在正在打仗，做白日梦是不行的，将军的信件堆在她桌上需要处理。现在还有几分钟她就该送他回家吃午饭了。

将军坐在车上，也在稳定自己的心绪。他说：“凯，今天早晨我对不起你，我不该说些不太严肃的话，请不要记在心上。”凯没有吭声。

“我真该死！”艾克又自言自语地说，“你难道不知道那是不可能的。我真傻，我要你把它忘掉。”

“将军，我不理解你的意思。”凯故意装作无动于衷地说。这一天就默默地过去了。

第二天，突然间铃响了四声，这是将军叫凯的信号。她马上镇定自若地抓起铅笔和本子走进去。

“我想告诉你，明天早晨裁缝来这里，首先给你量衣服。布彻可以开车

送我去办公室，你量完衣服再去。”

“哦，我不想量了。”凯冷冷地说。“我现在的衣服完全够穿。谢谢你，我想我不该量了。”

“你真该死，是个顽固的爱尔兰人，你得去量衣服，这是命令。你难道不知道，我想你都想疯了？”

这是一次感情上的大爆发。他们情不自禁地突然拥抱起来。他的吻彻底揭开了所有的奥秘。他的吻如饥似渴，迫不及待。而她的每个反应也像开了闸的河水。他停下来，用双手捧着凯的脸颊。“该死的，我爱你！”

真是情侣的运气，这一次谁也没有闯进办公室来。将军的脸上染上了口红，凯用手绢使劲地给他擦，担心万一有人进来。

将军把手搭在她的肩上。“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谨慎，我不想使你受到非议，我不想让任何人说你的闲话。”

“我认为一切都将是奇妙的。”当凯从将军办公室出来，似乎感到惊慌，想到她的头发是否乱了，或者有什么泄露秘密的迹象。总觉得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当时战争正在紧张地进行。但是，爱情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住了。在这种特殊的环境里，他们只能忙里偷闲抽点时间幽会闲谈。狂热的拥抱没有了，当初那种感情冲动的情景再也没有了，到处都有耳目。

一天晚上，他们在农场吃晚饭，在夕阳西下时坐在阳台上喝了两三杯饮料，没有说多少话，只是欣赏平静的美景。后来，艾克说：“看见你的表情，看到你的风姿，我就感到难受。凯，我年纪太大，太晚了。我们相差20多岁，不过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

除了爱情，我没有什么东西给你。”

“我爱上你很长时间了。”他嗓子沙哑地说，“我要告诉你一些事，这样你就不会再怀疑我的感情，听到‘斯特拉赛勒’号被击中的那天夜里，我觉得好像天崩地裂了一样。后来知道你和船上的人得救了，我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过了两天，艾克又送给凯一张有四片叶子的三叶草卡片。“家里给我寄来两枝四片叶子的三叶草，”他说，“我想送给你一技。你知道，这种草会带给你好运。”他把四片叶子的三叶草粘在一张小卡片上，在卡片背后写道：“祝凯好运。”然后是他的缩写签名D·E。凯经常把这张卡片放在她的钱包里，在她去世以前一直珍藏着。

艾克喜欢搞突然袭击。一天晚上吃饭前，他对凯说：“我收到几张新唱片，我想你一定喜欢《我将再见到你》这一张。”说着他把唱片放在唱盘上：

当我回忆我们在一起的时刻，
为什么愚蠢的眼泪，
这些年一直在流淌？
我为什么那么悲伤，
珍惜那岁月的回忆
永远？
我将再见到你。
每当春天来临时，
事过境迁勾哀思，
难以忘怀的是

逝去的往事。
甜蜜的回忆
多少年后仍留在我心底：
尽管我的生命要结束，
但我心中将永远留下
叹息的回音，
再见。

“啊，美极了，多么富于浪漫色彩。”凯感叹地说。

“这首歌的确很美，但过于伤感，”艾克说，“我不喜欢再见和叹息之类的词句。”

“我不在乎。”凯反驳说，“当一个人脑子里对一首歌曲的主题酝酿了几个月，突然间写出歌曲时，那是富有浪漫色彩的。我觉得这首歌曲很有感情。也许当我们发现我们的爱情像又苦又乐的蜜月，像晴天霹雳一样时，才感到其间的苦与涩。”

圣诞节那天，艾克和凯从前线回到阿尔及尔。他们在办公室吃午饭，晚间玩了一会桥牌，就早早地睡觉了。他们正忙于结束在阿尔及尔的工作，艾克将要回美国休假几个星期，然后飞回伦敦建立盟国远征军最高指挥部。艾克走后，凯感到十分寂寞和孤独。她也妒嫉，妒嫉将军的妻子有这么一个好丈夫，她儿子有这样一个好父亲。他们是多么幸运啊！凯还有其他一些想法，一些深藏心底不那么光彩的想法，一想到将军要回家，要回到他妻子的身边，她就感到烦恼。

将军动身回华盛顿以前的那天晚上，他们在一张双人沙发上相互拥抱着话别。“两个星期对我说来太长，”凯情意绵绵地说，“尤其是这次要走这么远。”

“不是两个星期，是12天。”艾克纠正着说，“你将始终同我在一起。亲爱的，难道你不知道？你了解，你必须了解，我心里想什么，你了解我要说什么，我没有权利呀。但你要想着我，我也会想着你。我们的心是永远在一起的。”

果真，过了12天，将军从美国回来了。那天夜里，凯从机场把他接回来。看上去，艾克经过长时间飞行，显得十分疲倦。凯把他安顿好，说：“你累了，早一点休息吧，我也该回去了。”

“不，我不累。凯，留下喝点酒吧。”他说，“我不困，不想睡觉。”

“我有多少话要对你讲，”艾克说，“到这里来。”凯坐在他身边，艾克用手紧紧地搂住她。双方互讲了一些离别后想念的话，还讲了美国国内的一些情况。

“哦，上帝，我几乎忘了。我在华盛顿见到了罗斯福总统，他向你致意，并给你带来了一些东西。”将军一面说着，一面去大厅叫米基。

“从白宫带回来的大信封在哪里？”他向睡眼惺忪走下楼来的米基问道。米基立即拿了那个信封来，“还有其他事吗？”他问道。“没了，没了！”艾克说，“睡觉去吧。”可怜的米基又步履艰难地走上楼去。

凯打开大信封，里面装着罗斯福总统送给她的签名照片，她真受宠若惊。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她的房子里陈列着名人的照片。其中，有艾森豪威尔将军、丘吉尔首相、罗斯福总统的签名照片。不管她住到哪里，这些照片总是庄重地挂在她的起居室。

艾克好几次往杯子里斟酒。他们纵情地热烈拥抱，他们确实发狂了。将军把脸偎依在她的怀里说：“上帝，凯，对不起，我没有给你任何好处。”

“将军，不能这样说。你给了我爱情，这就足够了。你太疲倦了，你需要好好地睡一觉。”

“我真不想让你走，”他把掉在地上的衣服拾起来，似乎有点遗憾地说，“但你不能待在这里。上帝，真对不起。我甚至不能送你回去。”

“不要担心，”凯告诉他，“我行，一转弯就到了。将军，晚安，明早我来接你。”她穿好衣服，敬了一个礼就走了。

欧洲盟军最高指挥部，不久搬到了布希公园。艾克的“小家庭”也随之搬到这里。在整理房间时，将军的爱犬泰利克在屋里跑来跑去。指着它，艾克对凯说：“在华盛顿的家里，这条狗给我找了很多麻烦。我因为想念你，始终把它叫做凯。事情就坏在这上头。”

“什么？”凯听着这些十分好奇。

“最大的麻烦是，每次张口对玛咪说话，我总叫她凯，她为此很生气。”

凯听到这里，既高兴又感到惭愧。只有现在，她才对将军的夫人玛咪寄予极大的同情。妻子发现丈夫脑子里有另一个女人占了上风，必然是痛心的。但那时她是一个被冷落的，远离丈夫的妻子，而凯却成了她丈夫热恋的女人。

“我感到遗憾，”凯说，“那一定使玛咪心烦意乱，我对不起她，而你也是一样吧。”

“上帝！你根本不了解我的意思。”艾克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把一支支香烟从头燃到尾，然后把烟头扔到火炉里。“我很想你，”他说，“你知道我睡觉前喜欢想什么吗？”

凯摇摇头，说：“我怎么能知道你内心的秘密呢？”

“我第一次用眼睛盯着你，是在车站广场遇到你的时候。你看起来很有魅力，很美。突然间，你向我跑来，好像你领会了我内心的情感似的。接着你气喘吁吁地停下来，问我们谁是艾森豪威尔将军。是啊！我当时像是在做梦，简直想不到车站离总部这么近，我多么失望。我希望车子开个不停，永远看着你。”

“你可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件事。”

“我多少次看到你，想告诉你，但总有什么东西阻挠我。你知道我是个将军，是远征军司令，正是这些紧箍咒使我不敢轻易向你倾吐我的爱情，何况又是在战时环境里。不过，我是真心实意地爱你。”

他的声音低沉，大部分时间靠着椅子凝视。“凯，我要告诉你，我不应该是你的情人。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想到要谈情说爱。然而我现在身不由己地遇到了，经过几次的接触，我败阵了，我老了。亲爱的，难道我不是败了吗？”说完，掏出手帕，蒙着脸抽泣起来。

看到这种情景，凯再也忍不住了。她把艾克抱在自己怀里，抚摸着他的胸脯说：“亲爱的，你不老，你没有败阵，是我对不起你。请你放心好了，只要你不嫌弃，我愿永远跟随你。”

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从北非迁回伦敦后，就忙于筹划“霸王”战役了。当时将军的工作十分繁忙，有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他去解决。劳累了一天，傍晚，将军约凯一同去散步，他们在外面的草坪上坐了一会儿。艾克突然问道：“凯，你想要个孩子吗？”

凯知道将军喜欢孩子，而且她也喜欢孩子，因此，她毫不迟疑地回答：

“是的，我很想要个孩子，不是随便一个孩子，而是你的孩子。我尤其想要个男孩子，样子同他父亲一样。在草坪上蹒跚而行，当孩子跌倒时，引起你咧嘴大笑。我想到以后，孩子坐在马背上，你教他骑马。我还想到，当我们的儿子八九岁时，我们三个人在野地里骑马，回到家里有说有笑……我幻想有这一天啊！”

“这不可能，这不可能。你不认为我太老，生不了男孩子吗？”

“不，你不太老。你不老，永远不会老。”

那天晚上，他们始终含情脉脉，好像他们亲昵的行为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之后，一场规模巨大的两栖登陆战役就要开始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三章 “霸王”行动之前

运筹“霸王”费心计，战略分歧已久矣；
东线红军奏凯歌，英美首脑心才齐。

1943年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加拿大魁北克会晤。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日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的转折点，英勇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过去。伟大的库尔斯克战役刚刚结束。苏联红军正信心百倍地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漫长战线上展开进攻。盟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必要性越来越迫切了。魁北克会议通过了在1945年5月底到6月中旬期间，英美军队在法国北部登陆的决定。

随着战局的发展，意大利战场已成为次要战场，而为跨越海峡发动进攻的集结兵力的工作正在积极进行，盟军总部关于更换司令官的事，传说纷纷。流传得最多的说法是，马歇尔到伦敦来担任总司令的职务，而艾森豪威尔回华盛顿接替他的工作。有一天在进早餐时，布彻和史密斯谈论文森豪威尔可能成为陆军总参谋长时，艾克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他“在气质上不适合这种工作”。他担心这一工作要毁了他，他对政治家们没有耐性，因为他不能在“逻辑上已经证明对方的立场站不住脚后”，还耐着性子继续争论，而且他对议会那一套烦人的程序也受不了。

这时，离总统选举还有一年，艾森豪威尔的前途出现了另一个可能性。共和党在寻找总统候选人和罗斯福竞争。麦克阿瑟显然是一名候选人，于是掀起一场争取选他作为候选人的浪潮。不可避免地，艾森豪威尔的名字也开始突然出现。艾森豪威尔的哥哥阿瑟写信告诉他，麦克阿瑟的声誉之所以受到危害，是因为他拒绝否认他有政治野心。他敦促艾森豪威尔强烈否认他有政治野心。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哥哥，他看到“报纸上漫不经心的、没有经过很好考虑的”关于所谓他当候选人的报道，他觉得这种情况对于其名字“比较经常在报刊上出现”的任何人都可能发生。他认为没有必要发表声明，因为这样做，反而显得幼稚可笑。他要做的，是消极的抵抗，他不容许把他的名字同任何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

艾森豪威尔明白，马歇尔是完成像横渡英吉利海峡和在法国登陆这样重要任务的最合适的人选，所有在他周围的人，在各自的回忆录中都谈到这一点。他认为任命马歇尔担任这个工作是唯一正确的决定，但同时对于他回去搞参谋工作则不合自己的心意。他认为参谋长的工作并不使他感到仰慕。他相信在这个活动场所会遭到失败，因为他不是政客。然而，在华盛顿，参谋长联席会议领导人坚决反对任命马歇尔为欧洲盟军统帅。海军、空军和其他兵种的司令蛮有道理地认为，在战争最重要时期，替换马歇尔对西方盟国今后军事力量的发展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后果。在最后解决统帅问题时，罗斯福最终还是重视美国武装力量的多数指挥人员和顾问的意见。

就在这个时候，罗斯福在去开罗参加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途中，来到地中海。艾森豪威尔飞往奥兰迎接总统，然后陪同他到突尼斯。他们在那里乘车巡视了最近的和古代的战场，并作了一次长谈。罗斯福迅速地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有一次他提到“霸王”行动。罗斯福说，他不愿想象在华盛顿没有马歇尔。但是他又说：“你和我，艾克，都知道内战时期参谋长的姓名，但是不干这一行的美国人，就很少有人知道。”他认为完全应该让马歇尔有机会作为野战部队司令而名垂史册。

11月21日，罗斯福一行飞往开罗。他们在那里同英国人对1944年的作战和未来指挥上的安排争了三天。英国人坚持必须加速地中海作战地区的军事行动，但美国人却主张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按原先商定的计划，实施“霸王”行动。在德黑兰三巨头会议上，斯大林关心的仍是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罗斯福向他保证，1944年春天肯定要开辟第二战场。斯大林要求知道由谁担任这一战役的总司令。罗斯福回答说：“美国还没有任命‘霸王’战役的统帅，但我相信在最近三四天内，当我们一回到开罗就会任命的。”

果然，在德黑兰会议结束的第二天，罗斯福在同有关方面商量后，就要求马歇尔为他给斯大林发电报。罗斯福口授，由马歇尔记下。“总统致斯大林大元帅，”开头是这样写的，“已经决定立即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霸王’行动。”接着罗斯福签了名。这是在战争史中最令人垂涎的指挥职务。这给艾森豪威尔创造了绝好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机会，他很可能只不过是许多著名的盟军将领之一，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统帅之一，和后来成为美国总统。

罗斯福所以挑选艾森豪威尔担任盟军总司令，除了马歇尔不能长期离开国内外，还有许多原因。“霸王”行动，像“火炬”行动一样，将是一次联合作战行动，而艾森豪威尔已经表明他能建立和领导一个统一的参谋班子，成功地指挥英美部队联合作战。没有别的将军曾做到过这点。英国海军上将坎宁安，现在是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英国海军大臣，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把两个国家的部队合在一起，编成一支队伍，他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因为两国部队的组成、人员的素质不同，对参谋工作的看法不一样，而且有着基本的“显然不可调和的主张”。坎宁安说：“我认为除了你，没有人能干得了。”

罗斯福作出这一选择的另一个有关的因素是，艾森豪威尔颇率众望。每一个人都喜欢他，甚至当他们不同意他的决定时，对他的开朗性格也作出积极的反应。他开怀大笑，有感染力地咧着嘴笑，随和的态度以及一贯的乐观精神，是极富魅力的。同样重要的是，他身体强壮，足以经得起长时间的艰苦作战的磨炼的压力。他53岁，身体结实，晚上只睡四五个钟头，对感冒或流感能挺得过去，能在精疲力尽的时候振作起来，并保持乐观的情绪。

有人说，艾森豪威尔的言词、举止、动作，尤其是他的眼睛，都能显示出他的机智。当他听他的副手讨论未来的战役时，他的眼睛带着询问的神情，很快从一张面孔移到另一张面孔。他的注意力非常集中。他的眼睛常常流露出他的心情。当他生气的时候，他的眼光是冷淡的；高兴时，眼光热烈；在思考时，眼光尖锐逼人；当心烦时，眼光呆滞。首先，他的眼光表示他的高度自信，这种自信既不是盲目的，也不是自高自大的。在“火炬”和“爱斯基摩”战役前，他是他自己所作决定的尖锐的、有洞察力的批评家。像有成就的橄榄球教练研究前一星期比赛的相片一样，他的自我批评是探索性的和积极的，目的在于消除错误，改进工作。他已经作出，并将不得不作出无数的决定。这些决定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命，关系到战役的胜败。为此，他极为谨慎小心，他必须把一切情况估计在内，考虑到种种可能的后果，然后采取行动。这就是他指挥的实质。

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霸王”行动总指挥的消息，使盟军总部的广大官兵和同事们大为兴奋。

1943年12月27日，艾森豪威尔为在阿尔及尔的盟国记者举行了最后一

次招待会。在回答他看来战争将在什么时候能结束这个问题时，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总司令说：“我相信 1944 年我们将打赢在欧洲的战争。”

一切结果是再好没有了。艾森豪威尔不只摆脱了调到华盛顿做参谋工作的不愉快的前景，而且有权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国最重要的战役。还有一件喜出望外的事在等着他。马歇尔给艾森豪威尔往阿尔及尔发了一个电报：“即刻起程回家，与夫人团聚，远征军总司令部的公务暂时委托他人代理。”艾森豪威尔决定飞回美国，度假两个星期。他在 1943 年最后一天中午启程。在他离开地中海之前，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我在这里度过了艰苦的一年，是该与家人团聚的时候了。”

1944 年元月 2 日清晨 1 时 30 分，艾森豪威尔匆匆抵达华盛顿。玛咪只是在几个小时前才知道他要回来：当她的丈夫急急忙忙赶往沃德曼·帕克饭店来到她面前时，她还没有入睡。艾森豪威尔夫妇谈了一整夜，谈到老朋友的情况，谈到艾森豪威尔的任命，谈到儿子的进步和许许多多其他事情。玛咪注意观察丈夫身上的变化，他比 18 个月前离家时明显的老了，但他比以前更持重，对战争的前途、对肩负的重任充满信心。早饭后，艾克要到陆军部去见马歇尔参谋总长，说完他就走了。这次他回国，名义上是休假，实际上是在运筹“霸王”战役。时间对他来说是珍贵的。在以后的两个星期中玛咪才知道，他已经习惯于突然结束谈话或会晤，这并不是因为他变得粗鲁，而仅仅因为他已经养成习惯，并且希望他周围的人理解，他必须接着去解决下一个问题。作为妻子，玛咪理解这些，她虽然一刻也不愿离开丈夫，但她必须以大局为重，全力支持丈夫的工作。

在陆军部，艾森豪威尔作为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电令他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提前去伦敦，研究英国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制订的计划，摩根把艾森豪威尔在 1942 年制订的“围捕”计划作为出发点。他被迫把开始突击的兵力的规模定为三个师，因为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答应供他制订计划用的登陆艇数量有限。艾森豪威尔大约在一个月前看过摩根的计划，当时他曾说过，攻击的正面过窄，应当加宽。史密斯得出相同的结论。他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说：“绝对必须扩大进攻正面。”史密斯说，如果必须为“霸王”行动获得登陆艇，就应当放弃原定在法国南部同时进行的代号为“铁砧”的登陆。艾森豪威尔在马歇尔的办公桌上复电说，他完全同意史密斯的意见：必须用五个师的兵力发动突击。但是他希望用临时拼凑和尽可能从别处压缩的办法，得到同时进行“铁砧”和“霸王”所必须的登陆艇。万不得已时，他才会放弃“铁砧”，但是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霸王”行动必须有五个师的突击力量。

这件事情办完之后，艾森豪威尔才和夫人到外地去度假。1 月 6 日艾克夫妇登上马歇尔的铁路专车，到“白琉璃喷泉”。马歇尔在那里为他们准备了一幢幽静的房子，完全不与外界来往。但是这不全是悠闲的轻松的假期，因为艾森豪威尔两次说漏了嘴，把玛咪称为“凯”，这使玛咪大发雷霆。艾森豪威尔红着脸解释，凯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他在一年半中看到的唯一女人；因此，自然地偶尔说出她的名字来。玛咪认为这种解释太不能令人满意。所以这次度假搞得非常不愉快。

三天之后，艾森豪威尔从琉璃喷泉乘飞机到堪萨斯州的里莱堡，然后乘一小段路程的汽车到曼哈顿去看望年迈的母亲和久别的弟兄们。玛咪不能坐飞机，回华盛顿去了。曼哈顿是堪萨斯州立学院的所在地，米尔顿刚刚担任

院长。艾森豪威尔的母亲艾达从阿比伦赶来，而阿瑟和他的妻子从堪萨斯城坐汽车前来。罗伊在 1942 年突然去世。埃德和厄尔住得太远不能来团聚。米尔顿提醒德怀特，自从他们的父亲戴维死后，他们的妈妈艾达丧失记忆力，因此不能对她希望过高，可是在艾森豪威尔拥抱她的时候，身材瘦小、满头白发的艾达使他们惊奇。“哦！是德怀特啊！”她喊了一声，又笑又哭。她又像以往喜欢开玩笑，并且和大家一起又说又笑。当天下午米尔顿的家中充满了欢笑声。艾森豪威尔的兄弟对他的老练、自制、沉着自信和坚定的决心留下很深印象。阿瑟说：“现在你看着艾克，就不得不为他的敌人感到一点遗憾。”

艾克和母亲、弟兄们作了短暂会晤后，于第二天飞回华盛顿。他为“霸王”行动拜会了三军的高级将领。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尚未决定空军部队归艾森豪威尔指挥。而且，这些空军将领又十分傲慢，各有自己的战略。哈里斯要通过德国城市进行轰炸来使德国屈服；而斯帕茨则是要通过有选择地毁灭某些重工业，特别是石油生产工业，来迫使德国投降。他们两人都不认为“霸王”行动是必要的。斯帕茨的部下曾说过，只需要 20 或 30 个整飞行日，他们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在艾森豪威尔看来，这简直是危险的无稽之谈。

艾森豪威尔认为，在德国放下武器之前，必须在陆地上打败他们。因此“霸王”行动是这场战争中有巨大意义的战役。在最初的阶段中，盟军地面部队在法国处于一比十的劣势；只有空中优势才使“霸王”行动有可能实施。艾森豪威尔想抽调深入德国作战的轰炸机，用于直接有助于“霸王”行动的目的。为此他必须亲自领导皇家空军轰炸机部队和美国空军第八航空队。他和马歇尔讨论局势，并指出，他认为哈里斯和斯帕茨，至少应当在发动进攻之前有几个星期受他指挥。马歇尔对此虽表示同意，但并没有真正的落实。

“霸王”行动主要是在法国的领土上进行，着想取得这一战役的胜利，必须得到戴高乐的有力支持和法国人民的配合。为此，艾森豪威尔又于 1 月 12 日，前往白宫拜访了罗斯福。他看到总统患流感，躺在床上。他们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关于法国和德国的事情。他看到华盛顿对戴高乐的态度，使他感到不安。就在离开阿尔及尔之前，艾森豪威尔曾与戴高乐举行了一次被称为“求爱”的会见。艾森豪威尔对戴高乐说：“我必须得到你的帮助，我来就是为了请求你的支持。”戴高乐说：“好极了！你真是个男子汉！因为你知道如何说‘我错了’。”在艾森豪威尔心中想的是法国抵抗运动。他指望抵抗运动在预定发动进攻之日进行破坏活动，提供德军的情报。他知道，抵抗运动只听戴高乐的。史密斯和戴高乐曾拟订出一份协定，抵抗运动将接受盟军司令的领导，而艾森豪威尔则答应法国部队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和由法国全国解放委员会负责管理法国解放区的民政事务。

然而，令人沮丧的是，艾森豪威尔发现白宫并不愿和戴高乐打交道。罗斯福顽固地认为：“法国人民不会服从戴高乐，把戴高乐强加于法国人民的任何企图会引起内战。”艾克认为总统的态度是不现实的，他很有礼貌地把这意见告诉总统，可是罗斯福不为所动。艾森豪威尔后来说，由于盟国，特别是罗斯福对戴高乐所采取的错误政策而造成的困难，是他在预定发起进攻之前不得不面临的“最使他伤脑筋”的问题之一。

与其说回国休假，不如说是同有关方面运筹“霸王”行动的问题。但使他遗憾的是，虽然到处奔波，有些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满意的解决。

玛咪对她的丈夫一心扑在“霸王”行动上，又急于返回伦敦，只有很少时间和她在一起而感到不悦。看着他收拾行装，又要作长期的离别，她的心几乎碎了。她说：“艾克，战争打完了就回来，我经受不起再次离开你。”一个星期后，艾森豪威尔写信给她：“尽管情况似乎有点恼人，但是我觉得回家还是很高兴的事。我认为，这正是因为我们分离时间太长。可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真正亲热，我却又要登上旅途，不过我的结论是：这次回家还是很有收获！”

一回到伦敦，艾森豪威尔就为“霸王”战役的一些问题所纠缠，但最伤脑筋的是，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战略问题上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对于罗马陷落后，在地中海采取什么行动有很大的分歧。英国想在亚得里亚海发动一次两栖进攻，从右面打击；美国则赞成在法国南部的里昂湾，从左面打击，美国人认为，从左面打击可以绕过阿尔卑斯山，使部队可以从地中海通过罗纳河谷向德国进军，而在东面，在亚得里亚海，只会遇到更多的山地。“铁砧”行动将从两方面直接支援“霸王”行动，既把德军牵制在法国南部，又打开马赛港，使盟国远征军得到极其需要的后勤支援，而且可使更多的美军和法军参加解放法国的战斗。但是，艾森豪威尔作为盟国远征军总司令，他最关心的是保证“霸王”行动的成功。他提醒马歇尔：“从铁砧预定发起进攻日期到该日之后的60天内，这个行动将把盟国可能投入的一切人力物力都吸收进去。”最后马歇尔经多次和英国人商量，在4月份同意推迟“铁砧”行动，从而把地中海的登陆艇抽出来，供“霸王”行动使用，满足了艾森豪威尔的要求。

空军的指挥问题，仍是艾森豪威尔和英国人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在这一场争论中，马歇尔支持艾克；而丘吉尔则支持哈里斯等人。艾森豪威尔向首相施加压力。最后丘吉尔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轰炸部队“配属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执行某些具体任务，但是最高司令部的飞行计划要得到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批准。艾森豪威尔强烈反对，并且拒绝一切不能完全指挥轰炸机部队和美国战略空军的作战行动。如果他的上级扣住轰炸机不放，拒绝把全部力量投入“霸王”行动，艾森豪威尔对丘吉尔说，他就“干脆回家”，这样一来，英国人又作了些让步，答应给艾森豪威尔以“监督”轰炸机部队的权力。马歇尔建议把“监督”改为“指挥”。英国人不接受。3月22日，艾森豪威尔通知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如果问题不能立即得到解决，他就请求解除他的指挥职务。丘吉尔把艾森豪威尔的观点带到英国战时内阁会议上。他雄辩地谈到艾森豪威尔的沉重负担，不要再给他增加压力。可是，他又说，他从没有想到空军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要对法国北部德军阵地以及防区实行狂轰滥炸，这样法国人民将遭受重大损失。于是，他要把这一问题留给罗斯福去解决。最后罗斯福答道，军事上的考虑必须是首要的。这样一来，艾森豪威尔将按照总统的意见去办。

在紧张备战中，艾森豪威尔的工作十分繁忙，他在伦敦居住经常受到打扰，因为丘吉尔，美国大使和其他“重要人物”觉得可以随便在什么时候打电话找他，而且总部的工作人员觉得伦敦夜生活的诱惑很难抵挡。为了排除干扰，2月份艾森豪威尔把总部迁到郊区的布歇公园。这里比较清静，他可以很好地工作、思考和休息，有时也可打一两场高尔夫球和阅读“西部”小说而不会受到打扰，甚至可以单独同凯亲热一番。

“霸王”行动是直接对敌人有准备设防阵地进行直接的正面攻击。德军

战线，或称为“大西洋壁垒”，是连成一气的。德军占有压倒优势的兵力和便利的陆地交通线，所以艾森豪威尔的部队不能希望去压倒他们。艾森豪威尔的有利方面是有制空权和制海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火相比，这次盟军轰炸机和军舰可以以更大的规模轰击敌人的战壕。他们还准备集中兵力，采取重点突破的办法，尽快在诺曼底登陆。

为了赢得这一战役的胜利，作为数百万大军的统帅，必须知己知彼，必须统筹兼顾。只有他的操心是没完没了的，只有他承担着指挥的沉重的负荷。他的联络副官布彻在5月12日写道：“艾克看上去精疲力尽，疲惫不堪，他显得过度劳累。自从我和他一起工作以来，他现在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衰老。随着预定发起进攻日期的临近，每天都出现数不清的问题——有许多是没有解决的，有些是不可能解决的——他的身体状况将会变得更坏。”但是布彻认为，最后一切都不会成问题，艾森豪威尔能够经得住。“幸亏他有一种能力，好好地睡上一个晚上，就恢复过来了。”

艾森豪威尔在写给妻子玛咪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临战之前他深藏在内心的一些感情。他憎恨战争，不愿意把士兵派去送死。他告诉玛咪：“我多希望这场残酷战争很快结束。”在空战中的伤亡已经是够大的了，而当“霸王”行动开始时，伤亡将更大。计算人员的损失是一件“非常难受的事情”。想到“多少年轻人与世永别”，就使他沮丧。虽然他锻炼出了一副“铁石心肠”，但是他绝不能“看不到这样的事实：发回家的消息，给全国各地的家庭带来痛苦和不幸。母亲、父亲、兄弟、姐妹、妻子和朋友们难于保持轻松的达观态度和对世事永恒公正的信念。战争要求人们具有真正坚强的性格，不仅要求英勇奋战的士兵们，而且要求必须牺牲他们最优秀的成员的各个家庭”。

随着战役的临近，艾森豪威尔的工作更加忙碌了。他号召将士们加紧训练，作好战备。他说：“战备工作多一分，将来的牺牲和损失就少一分。”他在预定发起进攻之前，花了很多时间到现场去视察部队。他要让尽可能多的士兵见到他。他设法亲自和成千上万的士兵谈话。从2月1日到6月1日，这四个月内，他视察了26个师、24个机场、5艘战舰和无数的仓库、工场、医院以及其他设施。他会让士兵们在他作简短讲话时，不按队列聚集在他的周围，然后绕场一周和他们握手。

1944年春，艾森豪威尔在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向即将毕业、出发上前线的军官们发表了即席演说。他谈到有关的重大问题，他使每一个人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幸福、美好的生活，直接与“霸王”行动的成功联系在一起。他要他们记住桑德赫斯特的伟大传统。他告诉这些新任命的军官们，必须像父亲一样对待他们的士兵，即使这些士兵的年龄比他们大两倍；他们必须为士兵们排忧解难，在士兵们有越轨行为时，不要冷淡他们。在回到他所喜欢谈的题目时，他说，连队必须像一个大家庭，而他们是一家之长，必须保证部队紧密团结、顽强、训练有素、装备良好，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为了领导这些士兵，艾森豪威尔需要50多个师一级的指挥官。他不插手英国或加拿大的将军们的挑选，但是他坚持要由他挑选美国将军。他认为师一级的指挥在战争中是最重要的。在他看来，这个位置比军或集团军一级的指挥，负有更大的责任，更能有所作为。师是能够作为一个单位作战的，是指官能够施加其个人性格影响的最大建制单位，是士兵们能够认为是自己的部队的最大组织。艾森豪威尔希望他的指挥人员尽可能有作战经验，但是要得到这样的人是不容易的，因为美军大部分成员都还没有参加过战斗。

因此，他选拔军官的原则，首先要忠于反法西斯战争事业，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第二，要有较好的组织才能和指挥才能；第三，要身先士卒，发挥战斗模范作用。由于艾森豪威尔的热心推荐，马歇尔推选布雷德利为美国第一集团军司令。艾森豪威尔挑选巴顿为后续部队的第三集团军司令。这些将领英勇善战，在“霸王”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15日，艾森豪威尔手下的司令官们在古老的圣·保罗学校开会，也是战前动员。圣·保罗学校在韦斯特·肯辛顿，是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总部所在地。这是一个隆重的、但规模不大的会议。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发出精致的正式请帖。出席会议的有英王、首相、元帅和其他显要。艾森豪威尔致简短的欢迎词，接着由地面部队司令蒙哥马利主持会议。

蒙哥马利向出席会议的指挥员们介绍了阵前敌军的情况。他一开始就提醒大家这样一个问题，德国人在法国有赫赫有名的隆美尔元帅指挥的60个师，其中10个是装甲师。蒙哥马利称他的敌手是“一位精力充沛和意志坚强的司令官。自从他在1944年1月份到职以来，情况起了很大变化。他最擅长发动破坏性攻击，他的专长是搞破坏，他对每一个战役都经过了精心布置，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将竭尽全力把他的坦克部队尽量靠前，阻止我们坦克登陆”。

“敌人认为，通过设置水力障碍物，固定的海岸防御工事和广泛的加强据守的战壕体系，可以将盟军遏止在滩头上。然后，隆美尔把他的增援部队调上来。”蒙哥马利说，隆美尔在这方面的能力是非常强的。据他估计，隆美尔第二天可能将9个师投入争夺诺曼底的战斗，而到第三天，将投入13个师，到预定发起进攻日之后的第六天，隆美尔将以全部10个装甲师进行反攻。与此相比，盟国远征军部队的集结是非常缓慢的，因此德国人期待着把“霸王”行动的部队赶回海里去。

“尽管有这些暗淡的前景，但是，我们对夺取这一战役的胜利，具有充分的信心。”蒙哥马利说，“突击滩头我们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在预定发起进攻的当天就深入内地，到处开花并迫使战斗向着对我们有利的方面发展。在第一天有可能深入内地32英里抵达法莱士，并派遣装甲纵队迅速向卡昂挺进。因为这样一来将打乱敌人的计划，在我们集结兵力时，使敌人不能接近。我军必须迅速抢占空间，并在内地牢牢站稳脚跟，然后沿着海岸向塞纳河推进。”

蒙哥马利讲话后，英王作了简短的讲话。接着丘吉尔要大家“按照开始缓慢但结束迅速的时间安排进行”。他说，勇敢、智慧和坚定是人类的优秀品质，比武器装备更为重要。

这次会议进一步鼓起了将士们的勇气，驱散了丘吉尔长期以来的疑虑。1944年初，丘吉尔还怀疑横渡海峡的进攻是否明智。有一次他对艾森豪威尔说：“当我想起诺曼底的滩头上挤满了英美两国优秀的青年时，我产生了怀疑……我产生了怀疑。”5月初，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共进午餐。他们分手的时候，丘吉尔首相变得感情激动起来。他含着眼泪说：“我和你一起把这件事做到底；如果失败了，我们一起下台。”但是，圣·保罗会议后，丘吉尔告诉艾森豪威尔：“我对这一事业正变得坚定起来。”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四章 横渡英吉利海峡

横渡海峡创奇迹，三军备战比高低；
天兵海将歼穷寇，试看天下谁能敌。

横渡英吉利海峡，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两栖作战。随着日期的临近，各种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

关于登陆地点，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部曾和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的商量和比较。当时，在法国西北部有三处比较合适的登陆地区，即康坦丁半岛、诺曼底和加莱地区，为了选择最佳方案，参谋情报人员曾多次深入现场进行勘察。从康坦丁半岛登陆虽易成功，但该岛地形狭窄，登陆后不易展开兵力向纵深发展。加莱地区距英国海岸最近点只有 33 公里，有其登陆的有利条件，但该地区距英国海港较远，运送人员和物资不便，同时又是德军重点设防地区，登陆必遭激烈抵抗。加之这一地区缺乏内陆通道，即使登陆成功，也不易向纵深发展。诺曼底地区与前两个地区相比，登陆条件优越得多。这里沿海地势开阔，可同时展开 26 个师至 30 个师，距英国西南海岸的各大港口较近，便于输送部队和物资，德军在这里兵力薄弱，登陆容易成功，这里虽然缺乏良港，但可用人造港补救。因此，艾森豪威尔在权衡利弊之后，决定把在法国西北部登陆地区选在诺曼底。

为了确保在诺曼底登陆成功，盟军已在英国南部地区集结了大量兵员和各种物资。到 1944 年 6 月开战前夕，盟军已准备好了大量的军队、飞机和舰只等，计有 39 个师，美国还有四五十个师正源源不断地运来。各种飞机 13000 多架，战列舰 6 艘，低舷重炮舰 2 艘，巡洋舰 22 艘，驱逐舰 93 艘，小型战斗舰 159 艘，扫雷艇 255 艘，各种类型的登陆艇 1000 多艘，连同运输舰只船舶共达 6000 多艘。总之，盟国陆海空三军及后勤人员总数是 287 万人。

在登陆前夕的一周内，盟国空军对敌人最重要的交通线中心进行了密集轰炸，炸毁了 82 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枢纽，这就使德国人无法迅速调配后备队和向告急的地区派出增援部队。在普利茅斯、波特兰、朴次茅斯，以及英国的许多其他大小港口，登陆艇准备开始作战。看来，为保证登陆成功的一切都已考虑周全。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强大的军队像卷着的弹簧一样绷得紧紧的，等待着释放它的能量和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时刻到来。”

但是，可以干预事件进程的有一个无法控制的因素——天气。因此艾森豪威尔从 3 月开始就进行了独特的登陆演习。每星期一他从气象站收到本周星期三的预报。最高司令官在收到必需的情况后，既向空军司令、海军司令，也向其他军事服务人员征求意见，假如在星期三登陆，天气对他们的行动计划要作哪些修改。到了 5 月，考虑到天气预报情况，对横渡英吉利海峡和进行登陆的行动应作哪些必要的修改。他们就此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这种经验远不能令人相信会获得成功。它再次证明了，这种预报工作远远不够十全十美。

天有不测风云。天气是无法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上计划最完善的战役，最后都取决于变化无常的风向和海浪。潮汐和月亮的条件是可以预测的，但风暴却不可能。从一开始，每一个人都指望在预定发起进攻之日，能有起码可以通得过的天气。没有准备应急计划。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倾向于不管天气如何，都按计划进行，而条件如变得确实很坏，则进攻可能失败。在大风中摇晃的登陆艇可能在没有靠岸前沉没；或者部队被浪

涛卷上海滩，士兵因晕船而不能有效地进行战斗；盟军将不能利用空中优势来掩护滩头阵地。如果“霸王”行动失败，将要另外用好几个月的时间来计划和发动另一次战役，这在1944年是不可能的。

从6月1日至5日，在每一次的指挥官会议上，因作出令人万分苦恼的决定使艾森豪威尔感到困扰。一种使人焦虑的低气压笼罩着海岛，实施空中行动的条件突然恶化。阴沉的云层密布，大风掀起了英吉利海峡的巨浪。尽管如此，艾森豪威尔在6月2日仍下令低速攻击舰起航。第二天，天气预报的消息仍很糟糕。凯·萨默斯比在她的日记中写道：“艾森豪威尔的心情非常忧郁，他延缓作出最后决定。”

6月3日夜晚，艾森豪威尔在索斯威克别墅的餐厅会见他的司令官们和皇家空军斯泰格上校，后者是艾森豪威尔的主要气象情报人员。斯泰格带来不好的消息，气象方面高压情况在消失，出现低压。6月5日的天气将是阴有暴风雨，云层0至500英尺，风力5级。更糟糕的是，天气在很快恶化，因而24小时以上的预报是非常不可靠的。要作出最后的决定还为时太早，但必须把命令下达给运送布雷德利的部队到奥马哈和犹他滩头的美国海军，因为他们的航程最远。

第二天早晨，十分寒冷，云层越来越低。凯·萨默斯比在记事本上写道：“气候没有好的变化。数千艘各型船只早已入海，现在又不得不再被召回。特德在指挥官们的特别会议上说，天气太坏，空中援助有困难。海军将领拉姆齐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蒙哥马利再一次主张马上动手。艾森豪威尔却又一次拒绝铤而走险。他乘车回到了自己的野外居室，阅读起星期日的报纸和最新的西部小说，借以转移和缓和自己的焦急心情。到了下午，港湾又开始被返回的舰艇挤得满满的。没有一个人把进攻又被推迟的事通知空军指挥官斯巴茨，尽管情报处长马洛里曾答应过他，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就亲自打电话告诉他。”

6月3日凌晨，布雷德利将军乘车从他在布里斯托尔的指挥部来到朴次茅斯，并见到了柯林斯将军。柯林斯的第七军团计划在卡朗敦附近的犹他滩头登陆。一艘专用汽艇把他俩送到了海军少将柯克的指挥舰——“奥克斯塔”巡洋舰上，布雷德利冷静沉着，谨慎小心，逻辑性强，富有自信心。

与此同时，乔治·巴顿将军也来到朴次茅斯。他看来更镇静自若，不为天气所困扰，对登陆充满信心。此人身材略显细长，皮肤晒得黝黑。由史汀生陆军部长派往英国报告登陆欧洲战役情况的上校W·H·S·赖特，在布里斯托尔的一个晚上，用了很长时间同布雷德利一起仔细地观察了巴顿将军的举止。赖特在报告中说：“巴顿给人的印象是：能驾驭自己时间，但却动辄大发脾气、任意训人，对自己的言行缺乏严格的控制。”

就在前两天，巴顿继打士兵之后，又陷入不愉快的事情之中。在布里斯托尔讲话时，他公开讲出了显然在为数不多的几个英美将军中间不止一次讨论过的话题。这位将军直截了当地说：“战后不列颠和美国将统治世界。”翌日，这位武夫的话被刊登在英美所有中央报纸的第一版上。最高司令官怒不可遏。艾森豪威尔绝对禁止巴顿会见记者和对报界发表谈话。巴顿郑重地允诺服从这个命令，并决心“修正”错误。他告诉记者说，在他所指的“统治世界的大国中”也有俄国，巴顿在世界政治中的“操练”，在外交上惹出了麻烦。

在焦躁不安的期待中，盟国远征军是箭在弦上。6月4日，星期天，上

午 4 时 30 分，艾森豪威尔在索斯威克别墅会见他的部下。斯泰格说，海上情况将比预期的略为好转，但是，阴天使空军不能出动。蒙哥马利仍然坚持说，无论怎样都应当干下去。艾森豪威尔指出，“霸王”行动是由并不占压倒优势的地面部队来进行的。这次战役之所以可行，只是由于盟军的空中优势。如果没有这一有利条件，登陆是太冒险了。他问在场的人是否有不同意的。当没有人表示反对时，他宣布推迟 24 小时。

6 月 4 日那天晚上，艾森豪威尔在索斯威克别墅餐厅再次和蒙哥马利、特德、史密斯、拉姆齐、斯特朗等高级军官会晤。这个餐厅很大，一边放着一张大桌子，另一边放着安乐椅。墙上挂着一张巨大的英国南部和诺曼底的地图，上面满是大头针、箭头和标出盟军和德军位置的其他符号。面对着风雨交加的天气，军官们懒洋洋地靠在安乐椅上，喝着咖啡闲谈着，斯泰格上校约在 9 时 30 分带着最新的气象报告走进来。他说：“天气出现转机！”斯特朗将军回忆说，大家对他的预报“发出一阵欢呼声。从来没有见过将军们这样高兴地欢呼”！斯泰格继续说，正在下着的倾盆大雨，将在两三个小时内停止，接着是 36 小时好转的天气，风力中等。虽然受到云层的妨碍，但轰炸机和战斗机可以在 6 月 5 日至 6 日间的星期一晚间出动。情报处长马洛里评论道，这看来对空军只是一个较好一些的夜晚。特德叼着烟斗，用力喷出一口烟同意说，使用重型和中型轰炸机是危险的。艾森豪威尔针锋相对地指出，盟军可以派出大批战斗轰炸机！

这的确是个千载难逢的时机！然而，风云莫测，艾森豪威尔无论作出什么决定都是有风险的。他背着手，低着头，在房间里踱步。突然间他抬起头来，盯住参谋长史密斯。史密斯说：“这是一场赌博，但这是一场可能最好的赌博。”艾森豪威尔同意地点点头。他接着又问蒙哥马利：“星期二不进行，你认为怎样？”蒙哥马利挺起身子，盯着艾森豪威尔的眼睛答道：“我说要干！”然而空军司令特德再次表示这是危险的。最后艾森豪威尔收住脚步，环顾一下他的司令官们说：“问题是你们能把这一战役在树梢上挂多长时间！”这时，史密斯作为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深深理解“完全知道成败取决于他个人决定的一位司令官，在作出重大决策时的孤独和寂寞”。窗外风雨交加，似乎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次战役。艾森豪威尔冷静地衡量着各个方案，到晚上 9 时 45 分时，他说：“我确信必须下达命令。好，让我们干！”

接着，艾森豪威尔就以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名义，向全军发出了如下的《进军令》：

盟国远征军陆、海、空三军的战士们：

你们就要出发去参加我们为之奋斗了许多个月的“伟大十字军远征”。全世界都在注视着你们。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们时刻期望着你们，并在不断地为你们祈祷。你们同其他战线上的英勇盟军和战友们一起，一定会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消灭纳粹对欧洲被压迫人民的残酷统治，保障我们自由世界的安全。

你们的任务不是轻而易举的。你们的敌人训练有素、装备精良、作战顽强。他们将要殊死搏斗。

但今年是 1944 年了！自从纳粹在 1940 年至 1941 年获得胜利以来，形势已经大变。盟军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已使德军遭到惨重失败，我们的空中攻势大大削弱了敌人的空军力量和地面作战能力。我们的国内战线，在武器和弹药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绝对的军事优势，并给我们准备了可以随意使用的

大量受过训练的后各部队。潮流已经改变了！全世界自由的人们正在共同走向胜利！

我对你们的勇敢精神、忠于职守和作战能力深信不移。我们必将赢得完全胜利！

祝你们平安！让我们大家祈求全能的上帝为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事业祝福吧！

命令发出后，各路司令官们从椅子中一跃而起，冲出门外赶往他们的指挥所。

30秒钟后，大厅里空荡荡的，只剩下艾森豪威尔。其他人的离开和他的突然孤独是有象征意义的。一分钟前，他似乎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人，千百万人的命运决定于他的命令。但是从 he 下达命令之时起，他就失去了权力。在以后两三天内，他几乎什么都改变不了。无论是他，或任何人都不能使进攻停下来。带领着连队奔向奥马哈滩头的一位上尉，或在犹他滩头的一位副排长，他们在眼前所起的作用比艾森豪威尔还大。

命令在1944年6月6日早晨4时15分发出。进攻开始了。艾森豪威尔始终作着成功和失败的两手准备。他细心地用铅笔写下了几行字。他当时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进攻不妙，他将忙得腾不出手来写公报。他开始写道：“我们在瑟堡—勒阿弗尔地区登陆失利，没有能占领一个令人满意的立足点，部队被迫撤退。”艾森豪威尔舔了舔铅笔，划掉了几个字并补上：“我把部队撤了下来”。他往下写道：“我决定在此时此地发起进攻，是根据所得的最好的情报作出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竭尽职能，表现出极为勇敢和献身的精神。如谴责此次行动或追究责任，应由我一人承担。”

当天晚些时候，凯·萨默斯比驱车把艾森豪威尔送到了索思西南的帕腊德—皮尔码头。艾森豪威尔想看看部队上船的情况。不巧的是，美国兵不在这里上船。但是，呼喊声“好心的老艾克”却此起彼伏。就这样，登陆西欧的舰队启航了，此次不会有变化了。

下午6时，艾森豪威尔离开朴次茅斯突然驱车去访问纽伯里附近的三个飞机场。在那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第一—空降师的穿着怪模怪样黑斑服装的伞兵们，正准备登上他们的飞机。虽然艾森豪威尔座车上的小五星已被遮盖了起来，但当他被人们认出来时，即刻爆发了一阵欢呼声。他喜欢这场面，跨步迈过背包、枪炮和装备，与士兵们交谈了起来。艾森豪威尔告诉他们不要担心，他们有最好的装备和指挥官。一名中士说：“我们才不担心，将军！现在该是德国佬担心的时候了。”一名二等兵尖声地说：“注意，希特勒，我们来了！”

看到这些生龙活虎、即将奋勇冲杀的战士们，艾森豪威尔想起马洛里昨天写下的预言：这些空降部队的3/4以上将立即遭受伤亡。但是，他们在瑟堡半岛上的行动计划对于成功地登上犹他滩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艾森豪威尔曾经明白地表明他的意见，同样地下达空降命令。凯·萨默斯比在日记中描述了机场上登机的情景：“泰勒将军几乎是最后一个登上他的飞机的人。艾克和他一起走向C—47型飞机的机舱门。此时，天色已变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和参谋机关的几个成员一起回到了第一—空降师的指挥部，喝了一些咖啡，接着爬上屋顶，观看在新建成的机场上空盘旋的飞机。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想看到的一种最激动心弦的情景。那夜，能见度极好，天空中群星闪烁。艾克在屋顶上耽搁了半小时左右。之后，我们开始驱车返回自己的指挥所，

到达时大约已是上午 12 点 3 刻了。”

华盛顿时间差不多是凌晨 5 点。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寐，他在朦胧中摸索着打开了收音机。随着电子管的灯丝炽热发光，从扬声器中传出了声音。一位广播记者在现场报道说，他是和第一批伞兵部队一起飞行并亲自看着他们跳伞的人。史汀生对此大为激动：这场战役开始了。对他而言，这是显示他个人胜利的好事。自从丘吉尔在 1941 年珍珠港事件之后，第一次访问美国起，他就为实施“霸王”战役而游说。实际上，这是他在那次会议上提出的议事日程中的首要问题。他和马歇尔等人就为促成这些战役而竭尽全力。就是这位史汀生，他在 1943 年 7 月访问英国之后，就建议罗斯福总统要毫不犹豫地取得美国的全面指挥权。

现在，经过长期的准备与绞尽脑汁的思索与激烈的争执之后，“霸王”战役总算按预定的时间开始了。它将使 20 万人登上舰只和飞机，横渡英吉利海峡。不管此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这件事情本身，却是一项伟大的壮举。在登陆日这天，艾森豪威尔为实施“霸王”战役拥有 39 个师的兵力。他拥有的空军可以投入 8000 架轰炸机对付敌人。由海军上将拉姆齐为他准备的海军有 284 艘军舰，以及 4000 多艘登陆艇和其他舰只。但艾森豪威尔手中最宝贵的财富却是人：陆海空三军几乎有 300 万人，时刻准备听取他的调动。一支难以想象的庞大的军事力量，将要去袭击一片小小的海滨地区。为此，部队的所有分队聚集起来，将要挤着穿过五个“针眼”——诺曼底地区被叫做斯沃尔德、朱诺、果耳德、奥马哈和犹他等海滩。

此时此刻，战斗的胜败取决于参加战斗的指挥官们。他们在前线与自己的士兵生死与共。一个名叫诺曼·科塔的美国陆军准将，就是这样的一位指挥官。他是第二十九步兵师的副师长。在登陆日的前一天，即 6 月 5 日下午的两点钟，他把自己的参谋人员召集在美国军舰“查尔斯·卡罗尔号”上的军官起居室内，向他们发出告诫：“这是一次与你们迄今为止所经历过的任何一次军事演习不同的行动。我们过去在斯莱普顿沙滩力图加以纠正的那些小小失误，将会扩大并酿成事变，你们乍一看，会把这些事变看作是混乱的……你们是会碰上混乱的局面的。登陆艇将不按规定的时间进入航线，士兵们在错误的地点登陆。有些人将根本上不了岸……总之，我们要把情况估计得严重些、复杂些，要随机应变，前赴后继，切勿不知所措。”诺曼·科塔被证明是一位有预见的军事指挥官。

在进军中，铁锚链条的嘎嘎声，铁锚投入英吉利海峡黑色水面时所击起的水浪声，很大很大，以至于在美舰“贝菲尔德号”上的海军少将唐·穆恩和约瑟夫·科林斯将军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此时，他们离法国海岸还有整整 12 海里，他们感到紧张不安，似乎难以做到不使上述的噪音惊醒犹他滩头上的德国守兵。科林斯和穆恩在四天之前就把自己的指挥所转移到了舰上。事前，他们对战士进行了充分的思想动员，对战备也进行了认真检查。现在战舰在波涛汹涌中前进。他的部队将在发起攻击时间——上午 6 点 30 分，也就是在 4 小时之后，天亮后一小时左右就去攻打犹他海滩。那时候，潮水将退落下去，这就使作战部队有可能冲在前面，扫除隆美尔设置的已暴露出来的滩头阵地障碍物。

当美国的运输机中队正从法国大陆飞回，几乎是从桅顶上低掠而过时，他们前面天空中轰响如雷鸣。这些飞机往返穿行，在敌人防线后方——犹他海滩后面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目标上空投下了伞兵。科林斯记得，在西西里岛

降落时，就有此类飞机 20 架被高射炮击落，因此，一阵恐惧的冷颤侵袭了他的心头。但枪炮寂然无声，飞机安全地飞了过去。

在古色古香的海军部大楼背后的城堡下 50 英尺处——伦敦作战情报中心，海军上尉麦克米金在 40 号房间值夜班。上午 3 点左右门打开了。进来的人身穿一件双排纽扣水兵短上衣，脚穿一双高出睡衣裤脚的高筒靴。他的脸清楚地表明，这是海军大臣坎宁安。他那幽灵般的眼睛睡意惺忪，很想睡上一觉。麦克米金说：“还有三个小时登陆艇才能按预定时间到达海滩。”这位海军上将说，“我回头再来。”

东方天际渐渐地泛出了鱼肚白。美国的部队运输舰“查尔斯·卡罗尔号”在浪头高达 20 英尺的海峡波涛中慢慢驶去。舰上的步兵部队来自科塔将军的第一一六团。他们早就离开了军舰，在离水面很高、悬挂在吊艇架上的 20 艘小型登陆艇中等待着。5 点 20 分，舰上的扬声器不停地广播道：“放艇！”于是，吊艇架的绞车嘎嘎地响了起来，小艇开始往下放。在那紧张的时刻，看上去仿佛是海浪把小艇从军舰的两侧掀了出去。接着，它们在水面上漂浮不定，直至螺旋桨发挥作用为止。它们在黑暗中上下翻腾，然后穿过一段漫长而波涛汹涌的海面，朝着预定集结的地区和奥马哈海滩驶去。现在，已经有更多的小型登陆艇聚集在运输舰的周围，以便运载第二批步兵部队。官兵们攀着粗糙而又潮湿的货网往下溜去，跳进登陆艇。此刻，登陆艇犹如野马，猛然弯背跃起，冒着敌人炮火在海浪中颠簸前进。

登陆行动的总计划是用海军和空军的轰炸来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从而掩护攻击舰向前推进。然后，一批坦克登陆，以直捣对方的滩头防御工事，并掩护战斗爆破组人员排除海滩障碍物、扫清通道。接着，一批批步兵、炮兵和卡车在每一条通道上，在海滩上，在横穿 150 英尺峭壁的山凹里，都挤得满满的。然后在海滩后面的一些道路上分路进击。

当科塔将军的小型登陆艇靠近那片透过能见度的薄雾而显露出来的海滩时，他看到了一片长长的、与海岸线平行的、由海滩障碍物与柱桩组成的地区，此时，他大吃一惊。这些障碍物尚未清除——第一四六水下爆破特别营的工兵们，却在预定地点以东 2000 码的地方登了陆。本来，16 条通道上的障碍物应该完全清除掉，但爆破队仅扫清了 5 条，而且其中 4 条还不能明显地看得出来，以致只有一条通道可供随时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要使任何人员和物资上岸，是极端困难的。一艘步兵登陆枢冲上了海岸，在放下登陆斜板之前，它就被火舌吞没了。一块炮弹片击中了一个等着下斜板的士兵身上挂的火焰喷射器。当 20 毫米口径的厄利肯式自动高射机枪子弹箱被击中时，这艘登陆艇就燃烧了起来，并像爆竹一样发出劈里啪啦的响声。一艘小型登陆艇企图冲过系有有线地雷的柱桩，对着它撞击了三、四次，终于使地雷脱开了柱桩。艇长再一次加大引擎油门，清除了障碍物，放下了斜板。迫击炮的炮火呼啸而下，尼贝尔沃费火箭爆炸成了铁铲大小的碎片，把部队分割成了两半，断绝了联系。

敌人的防御仍然十分有力。情报机关没有侦察出来的一个德国师——第三五二步兵师开到了这个地区。因而科塔的士兵在这片海滩上面对着敌军的两个团，也就是说，德国兵比盟军多一倍。科塔看到了突击队员头上戴着的铜盔的背面上的桔色钻石标志，对他们叫道：“你们是突击队员。我知道，你们是不会使我失望的。”于是，这个突击营的 500 名士兵冲了上去，占领了那个设防的高地。大约 18 辆幸存的 DD 型坦克，在相隔 100 码的地方，面

对内陆，对着敌人的阵地开火，掩护部队前进。

6月6日上午8点，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指挥所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报告。凯·萨默斯比写道：“除了杰罗将军登陆的海滩之外（那里十分猛烈的炮火使得难以登陆），其他海滩登陆的行动都按预定计划进行。”艾森豪威尔给马歇尔发了一份简短的电报，告诉他，看来一切顺利，并且说他前天所视察过的英美部队，士气高涨，能完成任务。“从他们眼中可以看出战斗的激情。”这一天，艾森豪威尔一直在房子里踱来踱去，他的情绪随着收到的情况报告而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安：英国和加拿大部队登陆的滩头遭到显然轻微的抵抗；美军在犹他滩头的阵地已经巩固；在奥马哈的部队则遭到德军惊人的猛烈炮火轰击而寸步难行。至6日晚，已有23000名空降部队空投到诺曼底。当日白天，57500名美军和75215名英、加军队士兵已经先后登陆。这样一来，第一天就有156000名盟军士兵已经突破希特勒大肆吹嘘的“大西洋壁垒”。

6月7日早饭过后，艾森豪威尔登上英国布雷舰“阿波罗号”去视察滩头阵地。“阿波罗号”紧靠奥马哈滩头下了锚。布雷德利到舰上来讨论形势。情况良好，部队从滩头阵地向内陆推进，但是还有使人担心的地方。德军在顽强抵抗，幸亏他们难以对战斗进行增援，因为桥梁和铁路运转中心都被炸毁。法国抵抗运动的贡献远远超出艾森豪威尔寄予的期望。可是空军并没有有效地压制海岸炮台，炮弹继续倾泻到滩头阵地，但是海军的炮火支援不断地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过了五天，6月12日，艾森豪威尔陪同前来视察的马歇尔总参谋长、英国国王和阿诺德将军，乘坐一艘驱逐舰，登上奥马哈滩头阵地。他们中午在布雷德利总部吃丙级口粮，同一些军长和师长讨论最近的作战情况。马歇尔称赞艾森豪威尔的胆略和指挥艺术，但不是当着他的面，这是他的特点。总参谋长向罗斯福总统报告说：“艾森豪威尔和他手下的人冷静而自信，以非凡的效率完成了无比巨大和复杂的任务。”

奥马哈之行象征着“霸王”行动的成功。这样多的重要人物能够安全地登上法国，清楚地表明滩头阵地是牢固的。盟军方面已经有十多个师投入战斗，而且每天还在增加。人工港湾已经就位和启用。虽然还有问题，但这伟大的进攻已经收到了效果。艾森豪威尔在6月5日上午作出的发动“霸王”行动的决定，其戏剧性已足以使任何人感到满足，但是还有更多事情在发生。6月19日，一场强烈的暴风雨袭击了法国海岸，摧毁一座人工港湾，使装卸工作陷于停顿。就在这时，气象专家斯泰格写信对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他在6月5日决定把进攻推迟到6月19日，他将遇到20年来最坏的天气。艾森豪威尔在这封信底下草草地写了几行字：“谢谢。感谢战争之神，我们在该出发时出发了！”并把信送给斯泰格。

艾森豪威尔在天气上的赌博已经得到报偿。丘吉尔说：“历史上最困难、最复杂的战役已使盟军重返欧洲大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五章 滩头受阻

旗开得胜众欢乐，大洋壁垒被突破；
困兽犹斗天气恶，争夺滩头险阻多。

盟军冒着恶劣的天气，以暴风雨般的行动突破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之后，再往前进就遇到了困难。位于右翼，也就是在西面的美军，发现他们在一个由灌木篱笆、河岸和坍塌的公路分隔开的许多小块田地的国家里作战。坦克部队不能展开，而步兵必须逐一地越过篱笆前进，进展十分缓慢，而且代价很大，蒙哥马利部队在左翼，他答应在第一天就攻占卡昂，但是到6月底，还没有攻下来。旗开得胜的欢腾不到两个星期就冷了下来。

“争夺滩头阵地之战”是一个不间断的、猛烈的战斗阶段，这场战斗除了攻占瑟堡外，仅仅能占领很少的地方。但正是这个阶段为以后辉煌壮丽的解放法国和比利时之战作了准备。蒙哥马利获悉他在沙漠中的老对手隆美尔将在战术上指挥防守部队，就预言敌人行动的特点是把从师一直到营、甚至到连的任何立即可用的部队都投入连续的攻击。

在那个时期，天公也不作美。6月19日新建成的人工港遭受了强风暴的袭击。在四天的时间内，它差不多使一切滩头上的登陆活动停止下来，因此严重干扰了所有的军事行动；风暴来势之猛，使攻击战的进展极为困难。当时联合王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海上交通完全中断，盟军在滩头阵地上修筑的小型跑道根本不能降落飞机。美军战区内奥马哈滩头上的“桑葚”人工码头被毁坏得无法修理。大量的船舰和小艇搁了浅，或者被刮到海滩上。艾森豪威尔说：“如果不是以前空军进行‘隔离战役’所收到的效果，那么这时候德军就有了理想的反攻条件。和以往一样，在这里还要强调空军威力对地面战斗的决定性作用。”

在风暴结束的那一天，艾森豪威尔乘飞机亲自察看了滩头战线的现场。他发现共有300多艘舰艇遭到毁坏，其中一些破坏得很厉害，无法修复。风暴袭击时，美国第八十三师仍在滩头附近的船上。大批士兵下船根本办不到，因此在整个风暴期间，这个师经历了最困苦和艰难的时刻。在他们最终都上了岸的那一天，艾森豪威尔巡视了该师的士兵，发现他们许多人还在晕船，疲惫不堪。攻下瑟堡后，立即开始重建港口的工作。德军已对港口进行了严重破坏，并在港口及其人口处布下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水雷。有些新型水雷必须要深海潜水员潜入海底拆卸后才能扫除。瑟堡港的扫雷兵和深海潜水员的工作，是战争中引人注目的、英勇的事例之一。

就在英美两栖部队在海滩推进受阻的时候，盟军的前进基地又遭到希特勒飞弹的袭击。1944年6月12日，叫做V—1的第一枚飞弹落在伦敦。V—1飞弹，是一架小型的无人驾驶飞机，它以很高的速度按预定路线飞行，并靠内部机械设备中止航程。它装有大量炸药，靠接触爆炸，其爆炸力非常大。第一枚V—2飞弹到8月初才使用。它是一枚火箭，射入高空，以很快的速度下降，它到来的最初警告就是它的爆炸。在飞行时，既无法听到它，又无法看到它，更无法阻截它。

V—2飞弹在它直接命中建筑物时，破坏力特别大。由于速度快，它深深地穿到地下，巨大的爆炸力直接向上发挥。因此落到空旷的地方效果较小，但命中一座建筑物时，其爆炸力大到可以把建筑物差不多彻底炸毁。

由于飞弹袭击，伦敦战区就变得比任何人所能预料的更为可怕。正是艾

森豪威尔从前线飞回的那天晚上，沿东南海岸出现了某些凶险的征兆。空袭警报器在多佛的峭壁上尖声鸣叫，那儿有几个加拿大师正待命进入诺曼底。加拿大人慌慌张张地跑出来，只见红色曳光弹，像喷泉似地在沿海岸数英里长的夜空中喷射。多佛的火箭炮立即发射，当弹壳碎片通过灌木丛雨点般落下时，士兵们发现一道亮光划破夜空，从海峡对岸迅速地朝他们射来，与探照灯的光柱恰恰画成三角形。当这种武器飞过时，天空中充斥着低沉的隆隆声，像一台空转的发动机，但声音要大数千倍。更多的飞弹飞来了，当它们下落时，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升空迎击，但用机关枪平射带有一吨烈性炸药的弹头，是冒险的举动。那天加拿大人就看到有一架喷火式飞机被炸得粉碎，掉了下来。

6月15日，盟军首脑们在他们下榻的都铎王朝宅邸中很早就上床休息了。快到半夜，响起了空袭警报。空军司令阿诺德开始并不在意，几分钟之后，轰隆一声，整座建筑物都摇晃起来。一刻钟之后，又这样来了几次。凌晨6点左右，他听到一阵响亮而有节奏的发动机声，类似风琴的和谐的旋律。越来越近了，这声音正好在头顶上方消失。到底是怎么回事？过了几秒钟，一阵可怕的爆炸把他震得掉下了床。

上午9点10分，有电话告诉阿诺德说，把他从床上震到地下的砰然巨响，是一枚飞弹爆炸。飞弹关闭发动机后，穿出云层，然后缓慢运转，在爆炸前大约飞行一英里半。希特勒的秘密武器的第一次袭击开始了。300枚飞弹射向伦敦，200枚已经命中伦敦及其郊区。到了9点30分，一切都探听清楚了。阿诺德跳上汽车，开车去看看飞弹有什么残留物。

飞弹在一个小村庄的百码之外着陆。一吨铝剂炸药爆炸的强大气浪，震坏了所有的窗子，屋顶像风吹稻草似地被掀落，树木折断，200多村民受伤，许多人伤势严重。弹坑周围散布着残留物。阿诺德估计这种武器大约有27英尺长。他那内行的眼睛，辨认出躺在一团柔软的控制电缆和绝缘套管中间的残破的陀螺仪罗盘，还有许多手指大小的干电池，有一块翼板的残片表明曾被防空火力击中，但因不需驾驶员操纵，这飞行器仍继续飞行前进。

阿诺德估计，这种飞弹大约需要2000人时制造一枚，大致需600美元。他的粗略估算，指出一个恶梦般的可能性：如果纳粹能每一分钟或两分钟发射一枚导弹，并有48个发射设施，那末他们就能每天向伦敦发射4万枚这种飞弹。他取出笔记本，在上面写道：“这就将造成恐怖、忧虑，最后破坏整个英国的正常生活秩序，并打乱作战部署。没有人能预料它们将要打击哪里。你能听到它们呼啸着飞来，而很难躲避它们。有一枚飞过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司令部，当时我们正在那儿。”

艾森豪威尔本人由于这种新武器的使用而感到沮丧。他一直为盟军在诺曼底进展迟缓而放心不下，对意味着希特勒可能重新赢得主动的每一个刺激都很敏感。此外，当飞弹从安在法国的发射设施飞来时，布歇公园（艾森豪威尔司令部所在地）位于这些致命的飞弹的飞行路线右方。第一次空袭警报持续了一整天。起先艾森豪威尔还保持镇静。半夜一点钟，警报器再次呼叫时，他正躺在床上看书。“我宁愿呆在这儿，”他对布彻说，“我不愿意整晚来回跑掩蔽所。”距离很近的一声巨大爆炸驱散了这种漫不经心。他只好躲入掩蔽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过夜。第二天醒来时，他咒骂希特勒搞出这种秘密武器，他的头脑被新粉刷的掩蔽所里散发的气味熏得昏昏沉沉。

英国战时内阁同样一片惊慌。丘吉尔极端关心这种以“弩”为代号的秘

密武器。6月19日他拉住艾森豪威尔谈了90分钟，请他除了最迫切的军需品之外，给秘密武器的发射地点予以最优先的注意，直至“我们能够肯定，盟军在这一特殊威胁方面取得明显上风”。的确，导弹折磨着人们的神经。布彻写道：“我所认识的大多数人，由于失眠而迷迷糊糊，听到关门声或者摩托车和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就神经过敏。”飞弹的95%都落在离斯特拉森12英里以内，斯特拉森是距伦敦只有5英里的属于伦敦的近郊区。

飞弹的袭击和风暴的破坏，大大影响了盟军向法国内地的推进。现在必须再次对卡昂发动进攻，但蒙哥马利又一次推迟出击日期。艾森豪威尔忍不住了。6月18日，他写信给这位将军：“我已经尽力加强战斗部队和弹药供应，抽调各种人员，从各仓库调拨军需物资给你。”但为了照顾两国关系，他又鼓励蒙哥马利说：“我完全理解，你需要储备适当数量的炮兵弹药，不过，我非常希望，一旦攻击开始，能有一股维持很久的势头。”

蒙哥马利送给艾森豪威尔一份请求书。请求书中写道：“我们将在今后两周或更长时间内艰苦作战，我衷心地请求你帮助，别让访问者前来。我要牢牢地掌握战斗，因为这是在这一时期里极其重要的战斗，要使事态按我们希望的方式发展，不能混乱，不要让我们自己被任意摆布。我没有时间接待来访者。”他的意思明显地是指艾森豪威尔本人，或许还包括戴高乐将军。

这时，加拿大第二军团仍在多佛附近待命渡海开往滩头阵地，延期是令人失望的，有点悲剧意味。大家都知道，在滩头阵地人员拥挤不堪，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早在6月20日，加拿大第二军团的参谋缪尔·甘布尔就接到电话说，他妻子马格丽特在前晚7点钟被V—1飞弹炸死了，这是许多军官都害怕的事。甘布尔茫然若失。他是在那天早晨刚从泰晤士河畔沃尔顿的家中返回部队的。

蒙哥马利力求部队保持冷静。他相信，只要能保证军队使用合适的装备，他们就会很好地作战，就不难击败德国人。6月24日他告诉他的参谋长：“我注意到了那些报告，它们散布关于英国装备、坦克等等的性能与德国相比较的种种流言。在目前这种时候，我们不能允许有任何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据点，我们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力量，明天我们要扑向敌人。任何损害自信心和士气的事都必须无情地予以粉碎。”

蒙哥马利这样讲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英国部队的士气在德军炮火下遭到挫伤。第四十九师的一个营被非常猛烈的迫击炮和榴弹炮的炮火完全轰垮了。两个星期后，该营军官只剩下12名。营长和班排长以上的军官在营指挥所里被炸死，有两个连队只剩下一名军官。3/4的人在炮击开始时或战友死伤时就引起歇斯底里反应。歇斯底里病蔓延开来，有些年轻士兵甚至在自己方面的大炮开火时也要发病。纪律也瓦解了，准尉和军官们不佩带领章和肩章。一名中校营长向蒙哥马利报告：“我有两次不得不站在一条道路的尽头，拔出我的左轮手枪对着往后败退的人……三天前一名逃跑的少校被打死了……因为我命令他帮我在迫击炮火密集时阻止士兵乱跑，而他自己却逃跑了。”接着他又说：“我拒绝再去断送那些好端端的生命了。”他强调说，有两位同僚也同意他的意见。蒙哥马利报告陆军部，他已解散该营，因为它不再适合战斗。他手书了一条附注：“我认为这个营长显示出失败主义者的心理状态，不是个‘合适的小伙子’。”蒙哥马利非常需要一次伟大的胜利来恢复他的部队对他的信赖。

6月25日，英国第三十军团终于在卡昂区开始取得了有限的进展。但是，

蒙哥马利却为此向艾森豪威尔报告说：“尽管天气极端恶劣，出现暴雨，云层很低，……战斗将整天整夜继续进行，我准备在东翼向敌人摊牌，决一死战。”但是，不知是因为拖拉还是出于需要，蒙哥马利在出击前等了很长时间，以至对方又增加了两个装甲师，并使纳粹有时间挖战壕。经过激烈战斗，英国第三十军团的进攻沿维莱博卡日到卡昂一线停顿了下来。同时发起的第三师对卡昂北部的进攻也在6月27日停止。

艾森豪威尔对此十分不满，但他却能克制自己，没有大发雷霆。可是蒙哥马利却为自己辩解说，他从来没有打算在直通巴黎的道路上的卡昂突破滩头，他的战略是固守他的左翼，而让布雷德利在右翼突破。批评他的人都指责他由于在卡昂失利而改变计划；而蒙哥马利自己坚持认为，他一直计划把德国装甲部队牵制在卡昂前，而让布雷德利迂回包抄他们。关于这一点，军事专家们之间掀起一场激烈的争论。空军将领特德认为，蒙哥马利的说法是“弥天大谎，纯粹是胡说八道”。他敦促艾森豪威尔或者下令蒙哥马利向前推进，或者把他调走。

艾森豪威尔对此问题的处理却是十分慎重的。他不赞成蒙哥马利处理战斗的方法，但他在诺曼底不发布强制的命令，来保证战斗按照他要求的方式进行。美国根深蒂固的军事传统之一是，给战术指挥官以高度的独立性，艾森豪威尔对此坚信不疑。作为最高统帅，他只能指出大的方针政策，而不是指挥具体战斗。在整个6月后半月和7月，他鼓励蒙哥马利进攻卡昂，但他并不坚持。而蒙哥马利也不断允诺“突击”德军，但他的豪言壮语并没有化为有力的行动。艾森豪威尔对此很不高兴。蒙哥马利把进展不力的责任归咎于布雷德利，说美军应同时在北面进攻瑟堡和在南面进攻古当斯。蒙哥马利说：“布雷德利不想冒这个危险。”蒙哥马利又以他那种典型的高傲的绅士口吻说：“我不得不沉住气带动美军，让他们有时间去作好准备。”

6月27日，布雷德利攻克瑟堡，这又将了蒙哥马利一军。这样一来，盟军将领之间的相互斗争和背后攻击更为激烈。有人说，蒙哥马利所以迟滞不前，主要是保存实力，让美军承受重大伤亡；其次是，希特勒V—1飞弹对英国的神经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六七月间，V—1飞弹使5000人死亡，35000人受伤，击毁3万多幢房屋。更糟的是，盟军情报机关预料，德军将很快把V—2飞弹，世界上第一枚中程洲际导弹，投入使用。盟军对其发射场的轰炸没有产生满意的结果。要想摧毁德国人的发射场，必须从地面上把它清除掉。丘吉尔对飞弹非常恼火，以致在7月初建议使用毒气袭击发射场。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拒绝成为一个使用毒气的人：“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提醒自己，使用我们的理智。”但是必须立即采取某些措施。

7月1日，艾森豪威尔赴诺曼底，看看他能做些什么来激励司令官们。他对布雷德利说，他只带着一床铺盖，一名副官和一名勤务兵。他“只需要一条遮着一块油布的战壕”。他待了五天，视察部队和战场，同布雷德利和军长、师长们交谈。他们都不愿意艾森豪威尔在他们那里，因为他们的军、师司令部都是德军零星炮火的目标。艾森豪威尔的老朋友、第十丘军军长韦德·海斯利普，干脆要艾森豪威尔离开。他说，“不要认为我担心你可能死亡。我只是不想让人说，是我让最高统帅在我这个军的区域内遭到不幸。你想被打死，请别死在我的阵地上。”

有一次艾森豪威尔征调了一辆吉普车，由他的英国副官詹姆士·高尔特和一名勤务兵陪同，没有人护送，亲自驾车在乡间转来转去，甚至设法在德

军防线后面转了一会儿。没有发生意外的事情。可是他不知道他曾深入险境，直到他抵达第九十师师部后，别人才告诉他到过什么地方。美国士兵很高兴看到他们的总司令来到前线，当艾森豪威尔的汽车经过时，士兵们欢呼跳跃，大大地激发了战士们的情绪。

总司令来到前线的第四天，在一个战斗机场得悉，空军要执行一次飞行任务。艾森豪威尔说，他想一道去，从空中青看这个灌木丛生的国家。和他一起来的布雷德利不同意，但是艾森豪威尔坚持要去。他爬上野马式战斗机时，最后说了一句：“好，布雷，我不飞往柏林去。”但是他却飞越了德军防线。《纽约时报》对此写了一篇特别报道，标题是：《艾森豪威尔飞越纳粹防线》。当他回到布歇公园时，他对灌木丛中没有什么进展感到失望，甚至感到没有希望从这个可怕的国家中脱身。特德和史密斯两人都对他说，这完全是蒙哥马利的过错。他们坚持要艾森豪威尔迫使他采取行动。特德埋怨说，蒙哥马利不公正地把他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空军，他还说：“陆军看来没有准备自己去打仗。”艾森豪威尔也请丘吉尔“说服蒙哥马利骑上自行车开始登着走。”巴顿见此情况，意见更大，他在日记中写道：“艾克被英国人捆住了手脚还不知道。可怜的人！”在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普遍不安地感觉到艾森豪威尔根本管不了蒙哥马利。

然而，蒙哥马利总是不断保证要发动巨大攻势，取得巨大战果。7月12日，他对艾森豪威尔谈到另一次代号为“快活林”的攻势。他要求空军予以全力支援。7月18日“快活林”战役打响。在开始阶段，由于空军的大规模轰炸，进展顺利，但是蒙哥马利在损失401辆坦克和伤亡2600人之后停止了进攻。英国第二集团军已经攻克卡昂，占领了几平方公里土地，根本不像一次突破。艾森豪威尔对此甚感不快，大发雷霆。他说：“花了7000多吨炸弹，才占领7英里。每英里要付出1000吨炸弹的代价。像这样，盟军很难有希望越过法国。”特德指责蒙哥马利要对“英军这次失败”负责，而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军官们嚷嚷着，为什么不把蒙哥马利封为贵族，送进上议院，或者让他当马耳他总督。

在史密斯和特德的敦促下，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信给蒙哥马利。他说：“时间就是生命。”他催促蒙哥马利恢复进攻。许多美国军官认为蒙哥马利之所以踌躇不前，是由于英国人力紧张。英国不再能补充第二集团军的人员损失，因此承担不起一次全面进攻的伤亡。艾森豪威尔认为，现在发动进攻从长远来看会减少伤亡，并指出美国在欧洲的部队最终会比英国多，“但是在我们部队的数量上相等时，我们必须并肩前进，共享荣誉和分担牺牲”。实际上，艾森豪威尔已把突破前沿阵地的任务，寄希望于布雷德利身上。欲知战局如何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六章 全面突破

滩头阵地一突破，千军万马如穿梭；
进军矛头指前方，比赛杀敌看谁多。

诺曼底战役的一个首要的紧急任务是，在瑟堡和奥恩河口之间的地区建立一个有适当供应线的可靠滩头阵地，然后向敌人发动大规模进攻，把战事推向前进。

原来艾森豪威尔希望在 6 月 23 日，或者说在进攻欧陆开始日之后的第 17 天，控制住敌人在格朗维尔—维尔—阿尔让唐—法莱士—冈城的主要侧面，并使这个地区牢牢地掌握在盟军手中。结果这一计划，由于天气恶劣和德军的顽抗，连连受挫。

“这虽是事与愿违，”艾森豪威尔说，“但必须承认，打仗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这是战斗，是一再反复的互相较量，因为作战双方都想占领阵地和夺取其他有利条件，从而使各自的对手遭受最大限度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冈城地区在敌人看来是重要的，所以敌人使用重兵防御。因此，要夺取这个地区暂时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定要夺取，那么至少要进行一场代价非常高的战役。”艾森豪威尔进一步指出：“自然，形势的发展造成了困难。如果我们在突击一开始就成功地取得了冈城南部的广阔地带，那么，美军向阿弗朗什地区的进攻，将仅仅是一场对德军的追击战，而不像当时那样成为一场艰巨的战斗。这就是说，如果一开始在我们左翼取得较大的胜利，那么在右翼就能较容易地取得一条满意的冲击线，从这里发动这个大旋转进攻。”

7 月 20 日，希特勒总参谋部的一些人员企图谋杀希特勒，可他幸免一死。于是，希特勒立即命令部队发射他的“复仇武器”——V—1 型飞弹。他们准备用双倍数量的飞弹袭击伦敦，以便不使任何人认为希特勒当时地位虚弱。

当晚，逼近伦敦的飞弹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使盟军总部的参谋人员直到次日凌晨 5 点才入睡。艾森豪威尔感到很烦恼。他让那些他喜欢的将军们在掩体中睡上一觉，就像休斯把几箱威士忌分给了他那些在非洲的老朋友们一样。7 月 21 日，艾森豪威尔给他的妻子玛咪写信说：“炸弹，炸弹，还是炸弹啊！”

自 7 月初以来，奥马尔·布雷德利就在潮湿的乡间小树林里顽强战斗，但进展甚慢。真是寸步难行！德军猛烈抵抗，美国第一集团军的伤亡已达 62000 人，其中死去的近 11000 人。露天墓地上停放着一长排一长排的尸体，正等待着穿黑衣服的收尸队来埋葬。这就是僵局的含义。大约在 7 月 10 日，布雷德利告诉柯林斯将军，他为打破这种僵局有了个主意。他计划用饱和轰炸来为柯林斯的第七军团通过敌人的防线开出一条路来。这一想法使他的参谋人员不以为然地挑起眉毛，因为英军最近已作过类似的尝试，结果发现他们的炸弹坑给坦克的前进带来了麻烦。柯林斯却同意冒险干一下。

就这样，一个“眼镜蛇”行动的计划产生了。7 月 20 日，下达了决定性的战斗命令。他们计划投入 4 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进行地面攻击，并将得到大量的美国空军支援。在部署作战计划的那些日子里，在北面乔治·巴顿将军带着一支实力雄厚的部队正在待命，这些兵力将用来在德军防线内扩大缺口。布雷德利对柯林斯将军说：“乔，此事如按期进行，一周后我们就可到达阿弗朗什。”

布雷德利和他的战术空军司令彼蒂·奎萨达一同飞往伦敦，以便同盟军空军指挥官们商议轰炸事宜。具体说，布雷德利的计划是以 2000 架飞机的炸弹量连续对 7000 码宽、5000 码长的矩形阵地进行轰炸，把德军战线炸成一片血红地毯。这个矩形的边缘离美国部队阵地最近也有 2000 码。三个步兵装甲师将穿过这个矩形阵地和美国阵地之间形成的空隙地带进行强攻。他们可以加固两侧兵力，来对付敌人的反攻，而两个装甲师则齐头并进穿越那个空隙地带，向南驰骋进入法国的开阔地区。这个计划听起来不错，但气候条件、保密情况、时间选择和轰炸目标的精确程度都必须无懈可击。然而，这四个条件很难同时具备。进攻的时间，原定 7 月 19 日，但因天气恶劣而推迟了。

就在当时，空军将领特德正在伺机指责蒙哥马利。代号“赛马场”计划的失败，为他提供了指责蒙哥马利的炮弹。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汇报了他刚获悉的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蒙哥马利非但没有加紧进攻，实际上却阻止了装甲师的继续推进。当艾森豪威尔还在朴次茅斯之际，蒙哥马利就为“赛马场”计划给他打过一份很乐观的电报。凯·萨默斯比就艾森豪威尔对此事的反应写道：“迄今为止，英军那边的大进攻颇为顺利。”“艾克只希望蒙哥马利继续往前推进。”当特德把事实真相告诉艾克时，由于蒙哥马利自吹自擂的战报而产生的愉快心情顿时变成恼怒。“赛马场”计划受阻于德国人。受阻和僵局之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正当蒙哥马利感到难受之际，丘吉尔给他发来了一份电报，脱要来视察。蒙哥马利立即给艾森豪威尔打了一份语气很果断的电报，说他不想让首相来此。蒙哥马利知道，他指挥的这次进攻不顺利，所以他不需要望而生畏的目击者。

就在这个时候，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在视察了瑟堡的美国部队后，就战局的发展同艾森豪威尔商谈了半个多小时。从史汀生未公开的笔记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视察有其潜在的意图。那年是总统选举年，他必须想办法来对付美国民众的下列看法，即美国现在被迫承受着不必要的损失，甚至是在孤军作战，或者说主要是在为英国利益而战斗。他本人一到欧洲就觉察到，美国人对英方的努力不能抱有幻想，并对计划把未来的第九军置于蒙哥马利的指挥之下深感忧虑。他也注意到，布雷德利和艾森豪威尔对此也颇感烦恼，但都极力忍耐和克制。他们期待蒙哥马利进行一场能经受考验和带动未来战局的进攻。史汀生指出：“我告诉艾森豪威尔，这决非是恐英者对英国的批评，而是由于英国限制兵力而产生的实际问题。”他还谈到了“在总统选举年里可能因此而产生的与美国民众的关系问题”。史汀生劝艾森豪威尔尽快把他的指挥部迁到瑟堡半岛，以防止国内对蒙哥马利这个角色份量产生过激的批评。

这天早些时候，艾森豪威尔获悉，参加“赛马场”行动的英国坦克，袭击了德军一支曾经狙击过他们并使其遭受重大伤亡的反坦克武器的掩护部队。蒙哥马利以一个戏剧性的记者招待会来掩盖他过去的行动。他在会上宣布，自登陆日以来，德国兵死伤已达 156000 名，但他没有提及他在“赛马场”行动中只俘虏 2500 名德国兵，或者说，他没有提及自己以对每英里扔下 1000 吨炸弹的代价只推进了 7 英里这一情况。事实上，“赛马场”行动已告失败。

对目前的战局，艾森豪威尔伤透了脑筋，他千方百计想突破德军防线，加快战事发展。其实，当时总的形势对盟军是非常有利的。到 1944 年 7 月初，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士兵已集结到 100 多万人。其中包括 13 个美国师，11 个英国师和 1 个加拿大师。在同一时期，他们把 566000 多吨物资和 171500

多车辆运上了岸。这虽是一项非常困难和耗费精力的工作，但一旦完成，将使盟军对敌人发动全面进攻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与盟军力量相比，此时，德军在诺曼底布置了 26 个师，其中 6 个是装甲师，用来抗击盟国远征军陆续到达的 30 多个师。由于盟军处于攻势，他们在地面上的优势是有限的。另外，德国第十五集团军由于“坚毅”行动的牵制，在加来海峡按兵不动。但是到了 7 月下旬，“坚毅”行动趋于暴露，这使德军的增援能力大于盟军。对艾森豪威尔较为有利的方面，是继续掌握了制空权。布雷德利计划利用这一点，在“眼镜蛇”战役中突破德军防线。一旦突破，艾森豪威尔便打算立即将部队从英国调来，正式成立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并派该集团军急赴布列塔尼，打开那里的港口。

空军受制约的是天气。只有在适当的条件下，才能使用这一武器。“眼镜蛇”战役第二次推迟于 7 月 21 日开始。艾森豪威尔将在该日飞往诺曼底，亲自观看战役的开始。天阴，空中只有他这架 B—25 在飞行。在他抵达时，雨下得很大。布雷德利告诉他，进攻已经取消，并且狠狠地说：“在这样的天气还飞行，简直不要命！”艾森豪威尔扔掉湿透的纸烟，微笑着说，他担任最高统帅的唯一乐趣是，没有人能不让他飞行。眼看一刻不停的大雨，他接着说：“当我牺牲的时候，你们应该在雨天保存我的尸体，然后在暴风雨中把我埋葬。这样的鬼天气真要我的命！”

第二天雨还在下，空战不可能进行，他又飞回伦敦。到了 24 日，他还在等待晴天。他打电报给布雷德利，催促他当天气许可时，全力出击。他说：“在这个时机突破，会使总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又说，他要第一集团军“以几乎不顾一切的干劲去寻找一切有利战机”。如果突破成功，“战果将是无法估量的”。

战役开始时，艾森豪威尔要求第二集团军率先进攻。他给布雷德利的电报发出后，就飞到蒙哥马利的司令部。正如参谋长史密斯所指出的，艾森豪威尔所要求的是，“整个盟军协同行动，全线出击，这将最后把我们的部队投入具有决定性的行动中去。他在整条战线上跑上跑下，像一名足球教练一样激励队员进攻”。这一切使蒙哥马利和英军总长布鲁克十分反感。蒙哥马利说，如果每一个人都要进攻，无人再有力量来进行决定性突破，或扩大战果。布鲁克抱怨说，艾森豪威尔“显然……有某种在整个战线上进攻的思想，这想必是美军的教条”。

为了推动战局的发展，以及他希望好好地看一下“一次巨大胜利”的开始，艾森豪威尔再次飞往诺曼底。大规模的空袭——将近 2500 架轰炸机投下 4000 多吨炸弹——这一场面令人难忘。但艾森豪威尔当晚回到伦敦总部时情绪低落。投弹不准造成好几百名美国士兵的伤亡。在前线视察的美国地面部队司令莱斯利·麦克内尔将军不幸遇难。此外，地面进攻看来进展缓慢。唯一令人鼓舞的消息来自布雷德利，他说他确信第二天部队将有重大进展。他把柯林斯的第七军摆在关键的地方，因为他认为柯林斯“有胆识，有雄心”，并且柯林斯不留一手，把他的预备队在第二天全部投入战斗。空袭已经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摧毁了敌人交通线。临睡前，艾森豪威尔写信给布雷德利说：“你已经得到堆积如山的物资，我们必须使敌人一刻也不能喘息，直到我们达到目的。然后，将他们粉碎。”到了 7 月 27 日，柯林斯已推进到古当斯，而在柯林斯右翼的第八军，在特罗伊·米德尔顿的指挥下，攻克了格朗维尔和阿弗朗什。

布雷德利的部队已经切入敌阵，很快就将取得完全突破性的胜利。布鲁克继续埋怨艾森豪威尔缺乏战略意识，但是艾森豪威尔坚持到处发动进攻，使法国之战进入关键时刻。如果德军不能恢复他们的防线，美军将通过缺口蜂拥而入，在他们后方自由活动。艾森豪威尔完全意识到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把巴顿的部队紧急调到欧洲大陆准备扩大战果。他还继续对蒙哥马利施加压力。7月28日，他告诉这位傲气十足的英国将军：“时间对我从来没有这样重要。我们不应等待天气或诸事齐备……我强烈地感觉到，现在用3个师进攻比5天后用6个师进攻更为有利。”他催促蒙哥马利一个小时也不要浪费。蒙哥马利开始也有了迫切感，命令丹普西要不顾一切，“不怕伤亡，加紧活动”。他说：“必须随时随地尽可能骚扰、攻击、袭击敌人。”

为了推动战局发展，乘胜扩大战果，艾森豪威尔决定在8月1日组建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到了那时，考特内·霍奇斯将军将接任美国第一集团军司令，而布雷德利将升任由第一、第三两个集团军组成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司令。直到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在欧洲大陆设立前进指挥所为止，布雷德利将继续接受蒙哥马利的作战命令。但实际上是艾森豪威尔在直接指挥陆上战斗。

8月1日，巴顿出动了，并开始横扫布列塔尼。死水一潭的前线恶梦结束了。艾森豪威尔十分高兴地说：“这是了不起的好消息。”8月2日，就在午餐前，布彻在布歇公园的大厅里见到艾森豪威尔。最高统帅笑容满面。他说：“如果截听到的情报是可靠的，我们要席卷布列塔尼并在诺曼底把德军分割开来。”于是他作出重大决定。在“霸王”行动前所作的计划，非常强调布列塔尼和它的港湾的重要性。巴顿的部队原来准备集中在布勒斯特，但是，由于德军左翼空虚，艾森豪威尔决定只派巴顿集团军中四个军之中的一个军，向布列塔尼挺进，而使“部队的主力，集中力量去完成消灭德国的任务，并尽可能扩大战果”。像布雷德利，巴顿不需要去特别催促，蒙哥马利却需要这样。因此，艾森豪威尔要蒙哥马利务必使所有的指挥官都知道，“在紧急情况下，我们会用飞机空投大量物资给他们”。艾森豪威尔强调，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许失去进攻势头。他在8月2日打电报给蒙哥马利：“只要你还有一颗子弹，我知道你就会继续打击下去，”

当英国的第二集团军和美国的第三集团军继续进攻、牵制和消灭诺曼底的德军时，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快速前进，在8月3日攻占雷恩，并在五天以后推进到离巴黎差不多只有一天路程的勒芒。空军尽力支援第三集团军，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保护两翼，而重型轰炸机则继续在德军防线后方封锁敌人的交通。法国抵抗运动的活动大大增加了德军的困难。德国人只能在夜间调动部队。他们的补给严重不足。

为了加强对盟军的反击，希特勒给接替隆美尔的根瑟·冯·克鲁格元帅增派部队（隆美尔在他的指挥车遭空袭时受伤）。希特勒亲自指挥，这迫使他使用无线电报，因此“超级”就能截听到全面计划和大部分具体细节。所以当克鲁格于8月6日夜进行攻击时，艾森豪威尔知道他有多少兵力和他的意图。六个德国装甲师攻击美国一个步兵师，即第三十步兵师，这个师的部队很快被包围了。如果没有超级情报，这个规模的进攻，如此微弱的抵抗，又是在这样的关键地区，会在盟军最高统帅部引起恐慌。然而相反，由于截获“超级”情报，艾森豪威尔把这次进攻看成是歼敌的一次好机会，根据他的看法，德军正在钻进他设计的圈套。

8月7日，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设立了前进指挥所，这是在苹果园中用

帐篷架起来的司令部，靠近格朗维尔，离莫丹不到 25 英里，几乎就在敌酋克鲁格的通道上。艾森豪威尔指示布雷德利利用少量部队固守莫丹，而将能调动的每一个作战师都火速调往南面。他们用美军炮兵支持突击部队的两侧，并调来战斗轰炸机。艾森豪威尔对布雷德利说：“如果德军暂时从莫丹突破到阿弗朗什，从而切断向南穿插的部队，我们将用空军每天给先头部队空投 2000 吨补给。”第二天上午，艾森豪威尔电告马歇尔：“敌人的反攻，使我们看来有极好机会包围和消灭大量敌军。”

8 月 13 日，艾森豪威尔以盟国远征军总司令的名义，向全军发出通报，号召他们英勇顽强，坚决歼灭敌人。命令说：

“由于只有用最大限度的热情、决心和快速行动才能抓住这个机会，所以我向你们提出最紧急的呼吁。

“我要求所有飞行员担负起自己的直接责任，日夜不停地打击敌人，不能使他们安全地作战或逃跑。

“我要求所有水兵保证不让任何一部分敌军从海上逃跑或从海面取得增援，并且保证供给我们陆地上的战友所需要的枪炮、船只和船员。

“我要求所有步兵，下定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决心向指定目标前进。土地一经占领，一英尺也不能放弃，战线一经建立，一个德国兵也不让逃跑！”

敌人面临全歼的危险。于是拼命地为保持行将封闭的包围圈缺口的畅通而战斗，企图尽可能免遭溃败的灾难。德军司令官特别注意解救他们的装甲部队，而当德军几个装甲师的一小部分逃回塞纳河彼岸时，损失了大部分装备。德军 8 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几乎全部被歼、被俘。

法莱士战场，无疑是德军最巨大的“死亡阵地”之一。所有的道路、公路和战场都被击毁的装备以及死亡的士兵和牲口所阻塞，所以要通过这个地区特别困难。在这个包围圈封闭后的 48 小时内，艾森豪威尔巡视了整个战场。他说：“那里的景象只有但丁才能形容。你完全在死尸和烂肉堆上一气行走几百码而没有踩到别的东西。”

这场胜利来之不易。艾森豪威尔知道，德军不到完全丧失抵抗力时，是不会放弃战斗的。他知道德国在 1944 年将比以前任何一年生产出更多坦克、大炮和其他武器，因而远征军要进行艰苦的战斗。在他给妻子的信中，一再提起这个问题。8 月 11 日，他告诉她：“不要轻信报纸。胜利虽然是美好的，但是，只有彻底消灭残暴的德军，战争才能结束。”法莱士战役之后，当人们更加盼望德国崩溃时，艾森豪威尔说：“我真不明白国内的人怎能这样自我陶醉于结束我们这里的战斗，我们还要经历很多苦难。上帝啊，我恨这些德国人！”

继法莱士战役之后，盟国远征军席卷法国。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沿着海岸线向比利时长驱直入，而第一和第三集团军向东直指巴黎。各路大军奋勇杀敌。巴顿将军的部队一马当先。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七章 虎将巴顿

猛打猛冲多立功，巴顿虎将扬威名；
横冲直撞入敌阵，摧枯拉朽众称颂。

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一到诺曼底，死水一潭的前线恶梦结束了。从此，巴顿威名传遍欧洲，传遍全世界。

乔治·S·巴顿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勇将之一，1885年11月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909年6月毕业于西点军校后，被调往美国第一集团军骑兵第十五团任少尉。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顿任美国远征军总司令潘兴将军的随从到法国。他曾负责组训美国的第一支坦克部队，并指挥一个坦克旅参加作战，获“优异服役十字勋章”。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顿回到美国，致力于坦克战的研究与训练工作。但随着美国孤立主义思想抬头及裁减军备，巴顿又被调回骑兵部队。

1920年到1940年的20年期间，巴顿多次调动，担任过十几个不同的职务，并被送入骑兵学校，指挥参谋学院和陆军大学深造。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总参谋部改组，马歇尔任参谋长，起用巴顿担任装甲旅旅长，后升任装甲第二师师长，负责组训装甲坦克部队。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加反法西斯战争。1942年3月，巴顿奉调到因迪奥训练中心，负责坦克部队军官的培训工作。

11月11日，率部下在北非摩洛哥登陆。攻占摩洛哥后，担任驻摩洛哥总督。1943年3月，调到突尼斯，接任第二军军长，扭转了战争危局。同年7月，调任美国第七军团司令官，在英国亚历山大将军指挥下，配合蒙哥马利的第八集团军在意大利的西西里登陆，攻占巴勒莫，夺取墨西拿，取得显赫战功。

巴顿虽然英勇善战，但作风粗暴，曾因两次殴打士兵引起美国军内和国内的舆论指责。在马歇尔、艾森豪威尔等人保护下才幸免撤职。

1944年春，在诺曼底战役开始前，经艾森豪威尔的推荐，出任美国第三集团军司令官。

巴顿接到命令后，在巴勒莫只用了一天时间来结束工作、举行告别和整理行装。他奉命只能带一名随从参谋，因此他挑选了查尔斯·科德曼中校。在那些阴暗的岁月里，科德曼中校成为巴顿的知己。科德曼是地道的波士顿人，他具有性格开朗而老练的波希米亚人血统，在知名人士中交游甚广。他的那种四海为家的气派和见识，正如他的冷静和精明的意见一样，在“打人丑闻”达到高潮时，对巴顿是颇有助益的。他不仅是一个随从参谋，而且是巴顿的大管家、礼宾官、社交活动中的指导人、知识顾问和患难时期分忧解愁的朋友。现在，科德曼的任务就是在米克斯中士的帮助下整理巴顿的行装运往伦敦。

巴顿的这次赴英之行是“保密”的。但是，这并不是出于纯粹的军事原因。实际上，他到英国一事最不需要向敌人隐瞒。巴顿在国内仍然是一个涉嫌很大的人物，艾森豪威尔觉得在这个时候公布他的新的任命将会引起“不仅是美国、而且还有英国的新闻界的批评”。但是，艾森豪威尔，力排众议，他对负责调查各方意见的体斯少将说：“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已决心把第三集团军交给巴顿指挥，而且最多再过几天或一个星期就公布他的任命。”

巴顿一来到伦敦就向艾森豪威尔报到。

“乔治，我猜想你知道你要干什么。”艾森豪威尔带点开玩笑的口气对他说。

“艾克，我确实不知道你要我干什么。”

“乔治，就是我自己的老部队，第三集团军，要交给你来指挥。”艾森豪威尔严肃地说，“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军队，乔治。霍奇斯即将离任去华盛顿等待新的任命，计划还在拟定之中，到适当的时候就会让你知道你的主要任务的。顺便说一句，据我了解，第三集团军的一支先遣部队已乘‘玛丽皇后’号在前来英国的途中。该部队预计在明天或后天到达，其他的部队也将陆续到达。”

就年龄和正式军衔来说，艾森豪威尔都低于巴顿。他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同情而又严峻地望着他的老朋友说：“乔治，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

“说吧，艾克，可要客气点，老伙计。我的伤疤还没长好呢。”

“我这儿有你的信，乔治，”艾森豪威尔说，“就是你从西西里给我寄来的那封。我要告诉你，我珍爱这封信，特别是其中的一段话。你说：‘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的悔恨和痛心，因为我使你感到不快，而你给了我一切，为了你我将万死不辞。’”

“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艾克。”

“我相信，乔治。可是你经常认为每个人都是反对你的，但在世界上你只有一个敌人——就是你自己。我并不想当一个唠里唠叨训斥人的人，但是我不知跟你讲过多少次，要你三思而行。你却总不听从我的劝告，现在我的话已经不再仅仅是劝告了。从现在起，它就是命令。要暴跳之前先思考一下，乔治，不然对于你的鲁莽所引起的后果，只能怪你自己，不能责怪别人。我希望你珍惜我们的友谊，并在这个问题上把我的处境也考虑在内。”

巴顿深受感动。他喜欢艾森豪威尔，他对于这个比他年轻的人凌驾在他之上并无怨言。他说：“艾克，拿我来说，我是一个糊涂的老傻瓜，真该死，我常常给自己招来麻烦。但是你不要担心，以后我要发脾气的时候，一定要更加克制，肯定不会在医院里发脾气了，更不会打人了。”

这次谈话之后，巴顿的心情是愉快的。虽然他将要指挥的第三集团军仍远在5000英里之外，而且在“霸王”战役的第一阶段，只是充当一个“配角”，但他并不为此沮丧，仍在积极工作，加紧筹组他的参谋班子。巴顿对他部下那种不动摇的忠诚给艾森豪威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种忠诚证明了掩盖在巴顿粗鲁和强硬的外表之下的内在的温情。

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载了一桩足以表现巴顿特性的事件：

“他有一次强烈要求我解除他手下80名军官的职务，因为据他说，他们不称职，胆小怕事近乎懦弱无能。他非常生气，十分坚持，因而我不得不同意，但我要他写一份书面报告，我的默许显然使他惊讶，他开始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借故推迟提交他的名单。最后，他有点不好意思地承认他已重新考虑，不想撤谁的职了。”就这样，“巴顿一方面要求他的下级对他绝对忠诚，另一方面他对部下也同样充分献出自己的忠诚和给予慈父般的保护。”

巴顿喜欢打仗，他常说：“为了打仗我愿意去指挥排以上的任何一支部队。”现在看来，巴顿将指挥美国在法国的一个集团军是确定无疑的了。在此期间他的所作所为，都不会使他失掉第三集团军。但是，该集团军并未内定用于“海王星”战役，这是整个战役的发动进攻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布

雷德利只把美国第一集团军划归蒙哥马利指挥。巴顿对于他的第三集团军在“海王星”战役之后应承担什么任务，仍旧只有一个大概的轮廓。眼下，他着重考虑的只是在迷惑敌人的一种精心设计的佯攻中发挥作用。

为了对德军隐瞒“霸王”作战计划，摩根将军设计了一个叫作“保镖”的计划；以假乱真，把盟军在欧洲的真正战略掩蔽起来，引诱德军统帅部对于他们称之为“霸王”的大举进攻作出错误的部署。同时，拟定出一个叫作“坚韧”的掩护计划，并付诸实施，以造成这样的印象，即主攻地点不在诺曼底，而在英伦海峡较窄水域对面的加莱海峡地区。其实，“坚韧”战役是一种虚构，即战役将从7月中旬从苏格兰各港口对挪威南部发起进攻揭开序幕，大概比最初制定的真正的进攻发起日迟45天。在“坚韧”战役中，巴顿是主要的“部件”。德国人已懂得尊敬他，甚至怕他。事实上，他是唯一能使他们注目的美国将领，而且在这个阶段唯有巴顿的名字能对他们起到作用。他们推测在主攻方面的美军将由他指挥，因而他出现的地方就是主攻方向。后来，到六七月间，当他很引人注目地在诺曼底出现时，德军的确在加来海峡保留了相当数量的部队——他们整个的第十五集团军——他们预期巴顿将率“巴顿集团军群”在那里登陆。

按着艾森豪威尔参谋部设计的计划，“霸王”战役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其代号为“海王星”，是发动攻击和占领一个最初的滩头堡，包括在卡昂地区开辟飞机场和占领瑟堡。第二阶段，或者说“霸王”战役本身，是扩大第一阶段占领的地区，包括布列塔尼半岛、卢瓦河以南的所有港口以及卢瓦河和塞纳河之间的地区。预计，完成整个战役的时间为90天。

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将在登陆开始日之后的第15到第60天之间越过科唐坦半岛登陆。该军的任务第一步要求占领布列塔尼半岛并打开布列塔尼各港口；第二步在扫除了布列塔尼半岛上的障碍之后，第三集团军将集中在美国第一集团军的右翼，“准备向东方作战，或者同第一集团军密切协作，或者在有可能实现一个更大的包围圈时向卢瓦尔以南迂回。”

巴顿在执行“坚韧”欺骗计划期间，一面密切注意“霸王”战役的发展，一面加强对第三集团军的战备训练。他所统率的这支部队，除了少数军官是老兵外，多是未参加过战斗、刚入伍不久的新兵。他们不仅缺乏军事知识、打仗经验，而且害怕打仗。为了消除士兵们对战争的恐惧心理，他反复进行了动员。他说：“你们大家都知道，战斗即将来临，但是，战争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得那样可怕。作家们夸夸其谈，说什么会思念你们的母亲、情人和妻子。这些作家们既没有听到过一声敌人的枪声，也从未耽误过一餐饭，他们不是按照战争的本来面目来描写战争，而是按照他们的想象来描写。”

“战争是人类所能参加的最壮丽的竞赛。”他说，“战争会造就英雄豪杰，会荡涤一切污泥浊水。所有的人都害怕战争。然而，懦夫只是那些让自己的恐惧战胜了责任感的人。责任感是大丈夫气概的精华。好男儿应当报效祖国。美国人可以为他们都是好汉而感到自豪。”

“要记住，敌人也和你们一样害怕，可能比你们更害怕。”巴顿说，“他们不是超人。我们已经消灭了敌人的精锐部队，我们在下次战斗中将要碰到的并不是他们的精华。此外，你们还要记住，无论是在肉搏中还是在战斗中，总是进攻者取胜。招架是不能打胜仗的。但是敌人不了解我们的意图，因而他们是必然要招架的。”

接着，巴顿用非常简洁清晰的语言，把作战的基本原则传授给这些毫无

经验的年轻士兵们。“不让敌人进攻你的办法，就是你去进攻他，”巴顿说，“不停地向他进攻。这样可以防止敌人重整旗鼓……战斗中的死亡是因为时间和敌方有效火力在起作用。你们应以自己的火力去压制住敌人的火力，以迅速的行动来缩短时间。”

“我们美国人是个喜好竞争的民族，”他在结束讲话的时候说道，“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下赌注。我们好胜。在下次战斗中，你们将参加一场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竞争。我们要同其他美国人和同盟国的军队竞争，去赢得最伟大的荣誉——那就是胜利。最先取得胜利，达到目标的人，也就是赢得荣誉的人。永远不要忘掉这一点。还要记住，上帝，无论用什么方式去思念他，他总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1944年7月份，诺曼底战局发展不利，巴顿为此烦躁不安。作为美军中一位最骁勇的将军，正当他的同僚们都在鏖战之际，他却被置于一边空让岁月蹉跎。这种焦急等待的滋味实在难受。“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他在进攻发起日说道，“在我投入战斗之前，战斗就会结束。”他开始在流动指挥车中睡觉，经常挎着枪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为了使自已进入正常的精神状态。

“时间的拖延对我不利。”他抱怨说。在这些艰难的日子里，关心地注意着他的科德曼说道：“自进攻发起日以来，将军的脑子里一直担心战争可能会突然结束。他心情急躁，坐立不安。现在他变得沉默寡言，几乎悲观失望。”

但是，巴顿内心的焦躁绝非完全出于个人因素。他认为，蒙哥马利正在诺曼底把事情搞得一团糟。几天来，他一直查看地图，密切地注视着战斗的进展。他所看到的迹象显然表明，战役正陷入僵局。当然，并不是事事都不好。比如，他已查看了瑟堡，该地已于6月27日由劳顿·柯林斯少将率领的美国第七军占领；而且他预计布雷德利现在会改变他的第一集团军西线各部队的方向，向南发动总攻。但是，他不满意在奥马哈战区和东部各点，特别是在卡昂周围英军地区所看到的局势。

心急如焚的巴顿现在认为，不仅蒙哥马利，而且连布雷德利也醉心于拖延时间。就在前一天，巴顿还得到通知说，第三集团军最后将于8月1日正午可以投入战斗，但巴顿的疑虑仍没有消除，就第三集团军而言，它正处在集结过程之中。其中有许多部队还在英国整装待发。将要由他接管的第八军，对第一集团军来说仍是非常需要的。在艰苦卓绝的15天中，攻势取得缓慢而吃力的进展。以三个师在西部揭开攻势序幕的第八军只能一寸一寸地向前推进，三天中只前进了6000码。经过12天最激烈的战斗，它只前进了8英里。它打得筋疲力竭。7月15日，在离开自己的目标库坦塞斯高地12英里远的地方，该军被迫停止前进。

美第八军的艰苦经历，在全线的战斗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圣洛于7月18日被攻克，但第二十九步兵师攻占圣洛标志着攻势的结束。一位军史学家写道：“圣洛的攻克结束了美军迄今为止所经历的最艰难的战斗阶段。敌军凭借无边无际的一行行诺曼底特有的灌木天然屏障，加上几乎天天下雨，使盟军的空中战术支援无济于事，能见度也降低了，因此尽管德军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供应和装备不足，但实际上却能够寸土必争。对美军来说，这一段时期弹药的消耗和步兵的伤亡是很大的。”巴顿对此感到痛心疾首。

巴顿等待的那一天终于来了。7月28日，布雷德利打电话给巴顿：“乔

治，现在是时候了。”巴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首先想到的是第三集团军。布雷德利叫他把第三集团军组织起来投入战斗。但布雷德利为他所作的安排又不完全是这样。

“你将在第八军战区督战，”布雷德利说，“身份是集团军副司令，还要尽快使第十五军投入战斗。”布雷德利还告诉他，他仍将是“霸王”战役中的神秘人物——甚至连他的新使命也是个高度机密——“使德国人捉摸不定”。

布雷德利解释说，这个安排是行政上的权宜之计。按第三集团军原来的组建，它配有4个军（第八、十二、十五和二十军），13个师。目前一部分部队正在海运前来，已经在诺曼底的其他部队已借给第一集团军。米尔顿将军的第八军已经过训练和装备起来，准备参加第三集团军的进攻，但目前正随第一集团军作战。

巴顿对布雷德利的召唤期待已久，因此他的反应是迅速的。一小时之内，他便开始履行职务。这是他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刻之一，但也只有这一次他牢牢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监督单独的一个军，而且同作战并无正式联系，同指挥一个集团军是大相径庭的事，但巴顿相当满意，因为他看出第八军可以成为奏出他的战争前奏曲的理想乐器，曲子的乐谱正在他的脑子里形成。

组建米尔顿的第八军的本来目的，是在科唐坦西部牵制德军，形成“直接威胁”，以支援第七军对德军的包围。现在第八军已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该军暂时由四个步兵师组成。该军还增加了两个装甲师，即第四和第六装甲师。巴顿全神贯注地倾听第八军作战处长里基上校的情况介绍。里基在地图上指出了步兵师的位置：第七十九师在莱塞，第八师在佩里埃，第八十三师在托特河彼岸，第九十师在赛弗勒河的一个桥头堡。

“你们的装甲部队在哪里？”巴顿问道。

“装甲部队在全军的前进中没有起多大的作用。”作战处长说，“第四装甲师从卡朗坦—佩里埃地峡西部出发，于7月15日被抛在那里，后来就作为该军的预备队。第六装甲师到了7月25日才调拨给该军，尚在勒梅斯尼尔—圣马丹一带集结。”

当时，敌军正准备全面撤退，而且布雷德利将军下令，“不要受‘眼镜蛇’战役中向库坦塞斯以北挺进的限制”，该军的步兵向南尽快前进，工兵为他们扫清道路。但是，由于撤退的德军在每条公路上都留下了许多破烂和焚烧着的车辆，路上人车拥挤，地雷遍地，要迅速推进看来是不可能的。这天晚上，德军仍据守着一条残缺不全的战线，战线像一条变形虫一样交错混杂，步兵的先头部队离阿弗朗什还有40英里之遥。影响第八军在北面取得进展的主要问题是路上的障碍，而不是德军的抵抗。混乱和拥挤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步兵究竟能走得有多快和多远呢？巴顿心急如火，当机立断，要改用装甲部队来做开路先锋，以便加速部队的推进。

巴顿不用步兵，而改用装甲兵来打头阵，不仅加速了第八军的前进速度，而且使整个战局大为改观，使敌人更加混乱和溃不成军。在第四装甲师开向塞朗斯的同时，第六装甲师在24小时之内就抵达第八军西翼西埃纳河上的罗克桥附近。巴顿与阿弗朗什之间的距离每分钟都在缩短，现在他只须再消磨两天时间就够了。

7月30日是一个星期天。就战争而言，形势大好，正向高潮发展。第六装甲师的第二战斗群，经过泰勒将军的第一战斗群拿下的桥头堡发动进攻，

沿通往格朗维尔的公路前进了约三英里。更重要的是，第四装甲师的第二战斗群冲进了阿弗朗什，夺取了塞厄河上的两座桥，占领了河流渡口，实际上是砸开了通向布列塔尼的大门。

巴顿决定让坦克做开路先锋，使得这场战役真是变成了一场各显身手的角逐。难以置信的进攻速度和变幻不定的进攻方向使德军不知所措。但是，美军自己也被剥夺了有计划和真正有目的行动，尽管他们的心目中有牢固的目标。

在流窜的敌人出没无常的这一地区，由坦克向前推进很快就完成了步兵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德军被打得晕头转向。装甲部队来得如此神速和逝其不意，以致德军还未弄清情况，德军第七集团军的几个主要指挥所就已陷入“敌人的防线之后”。在阿弗朗什以北约三英里的地方，第四装甲师第二战斗群的一支部队在戴格尔将军的率领下，从离德军第七集团军前进指挥所几百码的地方经过，当时那支迅速瓦解的德军的高级将领保罗·豪泽将军、冯·格斯多夫准将及其全体参谋人员就在指挥所里。他们为了逃命，没让戴格尔发现便从第二战斗群各路纵队的间隔落荒而逃，起先是步行，后来乘夺取的车辆，向东一直逃到莫尔坦。

星期一事态的迅速发展，使人“难以追踪和揣摩”。格罗的第六装甲师越过了格朗维尔，迅速向东南推进到阿弗朗什地区。第四装甲师的部队正从阿弗朗什向南搜索。巴顿将军作了最后一分钟的安排，终于要认真地投入“这场该死的战斗了”。这是他在内乌的最后一天，他准备在第三集团军投入战斗之前，在军用帐篷里召开一次指挥、参谋人员会议。同往常一样，他步履矫健地走了进来，脸色呆板，眉头微蹙，然而态度中有点难以捉摸的威严。他在前排坐下来，凝视着墙上的地图，倾听情报处长和作战处长的汇报后，向全军指挥员作了临战前的动员。

“诸位将士们，我们安排在8月1日12时正式进入交战。你们大家长期忍耐和坚贞不屈地等待这一伟大时机的到来，对此我要向你们表示感谢。现在我们就要开始行动，我相信你们的表现会同样出色。”

他停了一下，猛喷了一口雪茄烟，眯着眼睛继续说：“无疑，将会有人不时发一些牢骚，说我们逼得太紧。对于此类抱怨，我毫不在乎。我还是相信这古老的格言：平时多流一滴汗，战时少流一滴血。我们逼得越狠，就越能多杀一些德国人；我们杀敌越多，自己的牺牲就会越小。催逼意味着减少伤亡。我要大家记住这一点。”

“我还要你们记住另一点。不要他妈的去为我们的侧翼担忧。我们必须警戒我们的侧翼，但不能舍此而无所其他作为。不知哪个该死的笨蛋有一次说起要保障侧翼，从此以后，世界上所有那些狗娘养的都拼命要警戒他们的侧翼。我们第三集团军不做这种事情。让敌人去担心它的侧翼吧，我们不担心。”

“此外，我也不想有人向我报告说：‘我正固守阵地。’我们什么也不去固守！让德国佬去干那种事。我们要不断前进，除了揪住敌人以外，对守住任何东西没有兴趣。我们就是要紧紧抓住敌人不放，把它打得魂不附体。”

“我们的基本作战计划是前进，不管我们得从敌人的头上、脚下还是从敌群中穿过去，就是要一往无前。我们有一条座右铭：‘果敢，果敢，永远果敢！’大家要记住，从此时此地起，直至我们不成功便成仁，我们要永葆大无畏的精神。”

巴顿最后说：“你们已完成了杰出的工作，对此，我要感谢你们。我为你们感到非常自豪。但是，你们业已完成的事，毕竟只是在无所作为时期的表现良好。从现在起，我要你们表现得出色，要有所作为。”

7月31日上午11时30分，“幸运”（第三集团军的代号）进入托特河畔圣索弗尔—伦德兰附近的“幸运前进阵地”。巴顿一直等到通讯主任哈蒙德上校把所有的线路接通之后才动身再去视察前线。他打算在布雷亚尔过夜，格罗的第六装甲师在前一天攻占了该地，第八军的指挥所现在就设在那里。伍德将军的第四装甲师第二战斗群已进入阿弗朗什，占领了塞厄河上的桥梁。第六装甲师正向南疾进。

巴顿在第八军指挥作战的帐篷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雪茄烟，由于从前线送来的消息很少，因此感到索然无味。巴顿十分关心塞鲁河上两座水坝的情况。假如德军在这最后时刻炸毁水坝，使塞鲁河洪水泛滥，那就不可能立刻前进。差不多到晚上10时，前方发来战报：“先遣部队已经占领塞鲁河上的两座水坝。”巴顿已经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了，至少这一夜可以高枕无忧了。

然而，在7月31日—8月1日的炎热干燥的夜晚，人们几乎可以听到历史沉重地呼吸。整个西欧战场上，从希特勒在东普鲁士拉斯腾堡的司令部，到伦敦唐宁街10号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会议室，敌我双方营垒里都在进行着不寻常的活动。欲知今后战局的发展和巴顿将军如何横扫布列塔尼，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八章 横扫布列塔尼

布列塔尼大进攻，纳粹西线敲丧钟；
被歼敌军无其数，巴顿无愧当先锋。

诺曼底德军防线的被突破，使希特勒大本营十分惊恐。

1944年7月31日深夜，也就是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突击前夕，德军参谋长约德尔和副参谋长沃尔特·沃利蒙特为首的七名军人鱼贯走进地图室，去聆听纳粹元首希特勒长达一小时的训话。

这天夜里，希特勒情绪十分低落，一直面壁沉思，他再也不是凭那糊涂直观的可怕方式来指挥作战的梦幻式的战争巨头了。这一回，他终于能按照战争的实际情况来理解战争。现在希特勒以惊人的清晰头脑认识到在科唐坦半岛底部的交战预示着什么，他从美国第八军的隆隆坦克声中听到了给他敲响的丧钟。

希特勒沉思了20多分钟终于开口了。

“约德尔，假如我们丢掉法国战场，我们就丧失了潜艇战的出发点，丧失了我們正从法国取得许多对于我们战事极其重要的财富，包括我们所能希望得到的唯一剩下的钨。”希特勒停了片刻，又若有所思地说：“显然，我们必须优先考虑这一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在法国展开一场大战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已力不从心，只能设法重新组织力量，但也只能达到有限的程度。事实上，我们应当立即干脆撤出海岸，把我们的机动部队撤退到一条稳固的防线，进行坚守。但局势已经明朗……我们的力量已不足以防守哪怕是一条狭窄的阵线。”

“我们必须头脑清醒，”他说，“只有当我们能获得空中优势——哪怕是短短的一段时间，我们才有可能在法国争取局势的好转，然而，我认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在德国境内完整无损地保存我们新的航空部队，用来作为最后的一张牌，至于在何时何地把这最后一张牌打出，我还不能说。”

“因此，我们必须给西方集团军群的每个成员灌输一种思想，即无论如何必须以最坚韧不拔的意志来进行搏斗，处处寸步不让，因为对我们来说，打运动战已不可能了。”希特勒最后结束他的训话时，几乎是8月1日凌晨1点了。“啊！”他叹了一口气说，“我是多么想去西线！但纵使我有最真诚的意愿，我还是去不了。”7月20日，希特勒在腊斯登堡挨炸后，耳朵受伤，因此不可能坐飞机。惊吓之后，身体更加虚弱，他可以站一会儿，也可以说一会儿话，但必须很快坐下来。

这就是当时的希特勒。在1944年的夏季，他仍有权力指挥德国部队展开历史上一次决定性的战役。他已骨瘦如柴，只能顾影自怜。然而，他还能运筹决策，发号施令。尽管他意识到战争局势已发展到无法解决的地步，但他仍继续一意孤行。

就在这一天晚上，德军西线总司令冯·克卢格元帅在圣洛南面的前线临时指挥所里。他是德军统帅部中最先看清局势急转直下、已不可收拾的人员之一。克卢格心头的焦虑愈积愈重。早在7月21日，在同第五装甲集团军的汉斯·埃贝巴赫将军和纳粹党卫队第一装甲军军长泽普·迪特里希在法莱士召开会议之后，他在给希特勒的信中既是提出警告，又是承认失败。

“昨天我同卡昂战区的司令官们进行了讨论，”冯·克卢格写道，“很遗憾，有迹象表明，鉴于敌人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权，我们已束手无策，无法

抗衡敌军强大的歼灭威力，除非我们放弃战场。”他一针见血地作出结论：“尽管作出了紧张的努力，业已非常吃紧的这条战线将要崩溃的时刻已经临近。敌人一旦进入开阔地带，鉴于我军机械化程度不够，就不可能再进行有条不紊的指挥。我的元首，我认为我有义务及时提醒你注意这些结论。”

原德军西线总指挥龙德施泰特和隆美尔元帅，未能击退盟军的登陆，便赶紧向希特勒提出补救办法。6月29日，隆美尔提议德国第七集团军“回到塞纳河一带打一场后卫战，把法国南部的各军撤回，以便沿塞纳河直至瑞士境内建立一条新的防线”。

龙德施泰特本人的建议远远超过隆美尔的建议。希特勒的参谋长凯特尔问他，“我们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龙德施泰特回答说：“媾和，你这个笨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办法？！”

马屁精凯特尔把龙德施泰特的话报告“元首”后，龙德施泰特便被立即解除了职务，希特勒任命克卢格接替他。从表面上看，这位新任命的元帅似乎是个“杰出的人选”。

1940年，他曾指挥在法国的一个集团军直抵英吉利海峡；1941年，他又率领另一个集团军向莫斯科进军。在担任德军进攻苏联的中路集团军群总司令时，他因进行了“胜利的防御”而受到赞扬；当别人支吾搪塞时他却接受那蛮横的命令，因此得到希特勒的赏识。当他于1944年7月前来接替龙德施泰特时，对扭转战局“充满信心”。

如今，面对这危机四伏的局面，他也动摇了。7月30日，克卢格在他的西翼待了整整一天。他无可奈何地看着美军在科唐坦西部地带挥师直下，不断冲击他那已焦头烂额的九十一师。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美军的前进，美军正由巴顿的两个装甲师作为矛头对准他的残缺不全、混乱不堪的战线。战线左侧实际上毫无防卫，盟军把主攻方向对准那里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他拼命试图依靠所谓应急部队和其他特设部队来扭转战局，但为时已晚。阿弗朗什沦陷了。8月1日黎明之前，他致电希特勒说：“由于敌军以装甲部队作先锋进行突破，结果整个西线被冲开，左翼已经崩溃。”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正在伦敦唐宁街十号与丘吉尔共进晚餐，并商谈今后的作战行动，他们刚接到前方的报告说，巴顿的部队已突破进入布列塔尼半岛，而且从阿弗朗什向东，把土崩瓦解的德军分割成几段。艾森豪威尔对当时的详细情况了解不多，对巴顿将军在这些惊人的事态发展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一无所知。甚至到8月4日，巴顿所向披靡的部队已经向鲁昂进击，占领了雷恩，抵达富热尔，并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向瓦恩挺进，艾克还倾向于把胜利全部归功于布雷德利一人。

布彻的记录提到，艾克当时的注意力放在“维尔周围中央战区的德军”，这反映了“霸王”战役计划被突然打乱和计划的疏漏在盟军最高司令官头脑中引起的混乱。按布彻的说法，艾森豪威尔对巴顿的装甲部队插入布列塔尼半岛和巴顿介入这一战役“并不感到兴奋”，因为根据当时计划和布雷德利的安排，交给巴顿的任务有限，即占领半岛。完成这一任务现在看来乃是轻而易举之事。鉴于艾克看不到巴顿面前的大好良机，也看不到巴顿有能力充分利用战机，他自然就把注意力集中于既定计划所涉及地区以及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对该计划的谨慎实施。

由于卡昂是这次战役的焦点，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都从这一战略要冲出发，打开向西南的通道。艾森豪威尔正对维尔这个地方给以越来越大的注意。

维尔是奥恩河以西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似乎是德军防御的中心和神经中枢，对它一击就可能使德军全部崩溃。但是，这种估算是以假设德军仍能维持有组织的防御为前提的。盟军的指挥官们也设想敌人仍有能力在其崩溃的防线的任何地点维持一个抵抗中心。但实际情况是，德军在两个集团之间留下了大约六英里宽的缺口，维尔已失去了它的战略重要地位。

面对目前的形势，尽管巴顿心潮澎湃，但他还是相当镇定自若。他有上面给的命令，也为此作出自己的部署。上级的命令和他自己的部署总不是完全调和的，因为巴顿通常认为他自己的部署，“要比上级的命令高明得多”。在向敌人发动进攻时，他做起来雷厉风行，斩钉截铁，使那些盘旋在他上面的“胆小鬼”无法阻止他或改变既成事实。他把进攻的矛头直指昂热和更远的地方。

在进攻发起后的第98天，到了9月12日，第三集团军已位于原来预计到进攻发起后约350天才能到达的地方。从8月25日到9月12日，第三集团军从进攻发起后的第90天阶段线推进到进攻发起后的第350天阶段线。这样在19天的时间内便席卷了260天阶段线。巴顿将军及其第三集团军是后来者居上，他们把整个战役迅速向前推进。经过不到三个星期灵活机动的战斗，便把战争推到了全面胜利的边缘，这是他们的荣幸。

从巴顿雷厉风行的行动第一天起，布雷德利小心翼翼的影子，加上风云莫测的前景，或多或少地挫伤着巴顿的热情，不过这并没有使他气馁。“布雷德利将军只不过是想要在塞鲁河上取得一个桥头堡，”巴顿对他的参谋长加菲将军说，“而我想要的则是布雷斯特和昂热。”如今，布雷斯特这颗布列塔尼半岛的宝珠已不在话下了，巴顿的搜索目光已经指向古都昂热。这座城市位于阿弗朗什以南近100英里的曼恩—卢瓦尔地区。巴顿开始看到，在未来向德国边境大胆挺进和对巴黎进行大规模包围时，这是个必经之地。

在巴顿集团军猛烈的打击下，德军在布列塔尼的防务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深信，他所负责的战役决不会损失他的兵力。相反，他认为只需要用部分兵力便可解决布列塔尼，其余的人马可派到葱翠的平原地方。在一次布雷德利出席的会议上，巴顿对他的参谋人员阐述了他对局势的看法。但他又嘻皮笑脸地警告，不要让记者知道敌人在布列塔尼半岛上已如临风残烛，不堪一击，这是一个秘密。

巴顿是得其所哉。他照例在前线巡视，从一个部队飞快地到另一个部队，突然出现在人们面前，速度快得好像他可以同时出现在几个地方。“这老将军简直是着了魔，”巴顿的副官兼随从科德曼上校在给他妻子的信中写道，“他在那极狭窄的地带来来往往，上上下下地跑来跑去。先头装甲部队一辆接一辆日以继夜地从那里通过。后头跟着摩托化步兵……他又是推，又是拉，又是鼓劲，又是诱哄，又吼又嚷，非常热闹。”

“我确实愿意相信欧洲战区还会有别的指挥官在技术效能方面能与我们的指挥官相媲美。”科德曼继续写道，“可是，巴顿将军具有一种惊人的天赋，这种天赋能推动人们投入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做到，或是不真心想做，实际是不愿去做的事情。只有在这位独一无二、不仅熟悉自己非凡的事业并且热爱自己本职的军人的人格和天才的直接影响下，人们才能这样做。在这方面，我还没有见过或听说有谁赶上巴顿一个零头。”

这又像是重演向西西里进军的情景。科德曼说：“全军上下，从军长到普通士兵，都被一个人的巨大干劲带动起来。甚至他的上司也被情不自禁地

拖入他的磁场。原先在高一级司令部冷清的气氛中只准备拿下桥头堡的作战计划，大有可能发展成为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一场赛跑！”

在进军途中，巴顿不时地遇到他喜欢的法国人，即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国内武装力量的抵抗战士。在美国装甲部队过后，他们正在对付剩下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小股德军。巴顿每次碰上这样一帮大部分身着便衣、外衣挂着三色袖章作为标记的非正规军，他都要停下来用他荒废生疏但表达有力的法语同他们热情交谈。正像科德曼所说：“这些兴高采烈的法国人，满腔热情地向巴顿叙述他们与德国佬打遭遇战的毛骨悚然的故事，这些战斗往往是短促的，但一下子就解决问题。啊，老天爷，巴顿听得是多么津津有味呵！”

巴顿遇到轰炸、扫射、炮火轰击，却都活了过来，而且活得很好。一条狼狈不堪的公路通向一座小山的顶部，巴顿在山顶停下来，遥望那狼烟四起的战争场面。这以前是农庄的土地，现在是一片残垣断壁，田野里的草还在燃烧，躺着数以百计四腿僵硬的死牲口。他伸出双臂似乎要拥抱这个场面。他面对苍天喊道：“难道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更壮观吗？”一刹那，远处响起了一阵隆隆的炮声，巴顿不由得进一步提高嗓门，喊道：“与战争相比，人类的一切奋斗都相形见绌！上帝啊，我多么热爱反法西斯战争！”

8月4日上午11时左右，巴顿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位于梅尔德利亚克附近麦田里的格罗将军的指挥所。显然，集团军司令愤怒已极，正竭力抑制心头的怒火。格罗满脸堆笑地刚从自己的帐篷里走出来，他大声咆哮：“你坐等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向布雷斯特进军？！”

“进军奉命停止，将军。”格罗师长说着，脸色发白了。

“奉谁的混帐旨意？”巴顿怒吼道。

“奉军里的命令，将军。”格罗答道，这时他的参谋长递过来米德尔顿军长用铅笔写的条子。巴顿一看完条子，就把它塞进衣袋。然后，他转过身来对格罗轻声说道：“关于这件事，我会去见米德尔顿。你不要理会这个命令或其他任何要你停止前进的命令，除非这个命令是我下的。开路吧，一直开到布雷斯特为止。”

格罗的装甲师于8月7日到达布雷斯特，立即展开进攻。但守卫者挫败了他的首次袭击。这次袭击的自发性并不真正有助于任务的完成。尽管如此，德军发现第六装甲师出现在城市以北仍感到震惊。仅在一天以前，这个港口的防务虚弱，那时确有被格罗一攻即克的可能，可是由于耽搁了时间，敌人增加了兵力，再加上希特勒下了死守到最后一个人的命令，直到9月18日，耗时10天，动用了3个步兵师，付出几乎死伤1万美国人的代价，才攻克布列塔尼半岛上这个最大的港口城市。巴顿让大家记住“由于动作迟缓，失掉战机所造成的血的教训”。

巴顿怀着矛盾的心情关注着战局的发展。他以三寸不烂之舌来对付集团军群司令布雷德利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诫。“我觉得你用不着担什么忧，布雷德利将军，”他说，“战争就是敌我双方一场智力和体力竞赛，要想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必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巴顿此时的得意杰作是攻打另一个目标，他正热切地注视着这一计划的进展。这个计划就是出奇兵攻占昂热。8月8日，第五师包围了昂热和南特；9日，该师缩小了对昂热的包围圈；10日，拿下该城。在一场巴顿凭一时冲动而决定的进攻战中，沃克将军的求战心切的第二十军首先旗开得胜。

从诺曼底到布列塔尼，这是一场规模极大的战役，盟军已投入了200多

万部队。巴顿的传记作者拉迪斯拉斯·法拉戈说：“但是，在8月的前两个星期之内，它的规模似乎还不足以同时容纳布雷德利和巴顿两个人。巴顿在战役中的突然出现活像驯马表演场上那扣人心弦的一刹那——圈门突开，群马中的一头矫捷烈马一下子冲进场地。如果可以比喻的话，那么巴顿就是驯马场上乱蹦乱跳、试图把背上的骑马人甩下来的烈马；而布雷德利则是那位拼命想坐稳鞍垫的骑手。”

“在这些日子里，巴顿进展很快。”法拉戈说，显然，他是在以一种空前的速度和力量，并在很大程度上以随机应变的办法来左右这次战役，从而突破了“霸王”战役的预定界线。与此同时，布雷德利竭力设法使战役恢复一点“秩序”，并根据合情合理的模式，以谨慎的方式按部就班地展开既定战役。布雷德利虽然没有被自己的节节胜利冲昏头脑，但却逐步摆脱了那种过时的总计划，胆子愈来愈大。他力图用自己的计划取代原定方案，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适应瞬息万变的战局。

蒙哥马利把自己关在行军的旅行车里，甚至与司令部的参谋人员都完全隔绝。布雷德利则截然不同，他是一个爱接触人的司令官，有时间他就去巡视前线。现在，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四处奔走，力图赶上巴顿并把他拉住，尽可能以好言相劝，必要时就用命令或其他手段使巴顿就范，把他纳入自己的计划。

布雷德利是个深谋远虑的典范，他总是积极地想完成自己应尽的职责。这一点有助于使马歇尔将军决定把美军登陆的指挥权交给他，也使他博得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赏识。对这次反攻欧洲大陆的成败，艾克也负有最终的责任。他知道胜利后总是有很多人宠爱，但一旦失败就成了孤儿。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前景是由于他本人或是他部下某个指挥官在法国战场上的轻举妄动，而使自己不幸地成为一个被人遗弃的孤儿。尽管布雷德利的非凡的军事才能使他得以成为一名卓越的猎手，但他却宁可要一只稳握在手的麻雀，而不要在空中飞翔的凤凰。

巴顿意识到自己正在使布雷德利感到紧张不安，但布雷德利并未因此睡不着觉。他竭力安抚和迁就他的上司，根据不同情况和场合的需要，可以做到谦卑自制或不卑不亢。尽管他很自信，而且战果辉煌，但他意识到他仍然处于“留用察看”阶段。一旦他和布雷德利之间的冲突迫使双方摊牌的话，艾森豪威尔肯定会偏袒布雷德利而让他“解甲归田”。

巴顿作风粗暴，性情急躁。他虽然没有得到上司的青睐，但他所领导的第三集团军的8月进军，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人民对他的赞扬是当之无愧的。这支军队，有时在相距500英里的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并防卫卢瓦尔河一线480英里的侧翼。它在26天内前进了400英里，解放了47829平方英里的法国土地。到8月26日，第三集团军共毙伤俘德军136000人。

继法莱士战役之后，盟国远征军席卷法国。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沿着海岸线向比利时长驱直入，而第一和第三集团军向东直指巴黎。巴黎是一块磁铁，吸引着每一个人。每个师、军和集团军的指挥官都想得到解放巴黎的光荣。8月21日，艾森豪威尔决定让雅克·勒克莱克将军所统率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和美国第四步兵师进入巴黎。1944年8月25日，勒克莱克将军奉命光荣地接受了德军的投降。从此，被德国占领达四年之久、有法兰西荣誉之称的这一伟大城市解放了。

巴黎的解放标志着诺曼底战役的结束。德国第七集团军和第五坦克集团

军遭到决定性的失败，第一和第十九集团军大部分战斗力也被击溃。从盟军于6月6日登陆时起，敌人高级指挥官中有3个陆军元帅和1个集团军司令被撤职或被打伤，1个集团军司令、3个军长、15个师长和1个要塞司令被击毙或被俘。到8月底，西线德军已损失近50万人，其中多半是被俘的。盟军共缴获或击毁敌人坦克1300辆，军车2万辆，迫击炮500门，野炮和重炮1500门。西线大多数德军将领认为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了。

随着胜利的临近，盟军将领之间矛盾增多。欲知今后战局的发展，且看下文分解。

第十九章 盟国内部的分歧

德军败局虽确定，英美矛盾接连生；
贪图霸业鬼盘算，不顾大局闹纷争。

巴黎解放后，德军在西欧的最后败局已定，只是时间问题了。然而随着战局的胜利发展，英美之间的矛盾，争论也愈来愈多了。

自从1944年6月盟军渡海作战后，艾森豪威尔一直把他的时间分别使用在诺曼底和伦敦。在伦敦，他差不多每天忙于“进行在整个战争期间与丘吉尔首相之间最长的、最持久的争论”。这一争论在6月份就开始了，经过整个7月份，在8月份达到了高潮。争论的问题是“铁砧”行动，即在法国南部的登陆。早在春天，为了得到登陆艇，艾森豪威尔同意推迟“铁砧”行动，但是仅以这一战役将在以后进行作为谅解。这意味着取消罗马在6月5日占领后在意大利发动攻势。6月初，艾森豪威尔建议在马赛港登陆。但丘吉尔反对。他要求取消“铁砧”行动，而赞成继续在意大利和亚得里亚海作战。

争论的焦点是，继续实施“铁砧”行动是否明智的问题。“铁砧”行动当时已改为“龙骑兵”行动，这是德弗斯将军的部队进攻法国南部军事行动的代号。据艾森豪威尔说，在计划这个进攻时，最初的理由之一是想再得到一个港口，使在美国已准备就绪的增援师能由此迅速攻入欧洲。丘吉尔首相认为盟国远征军已经得到了及时使用布列塔尼半岛各港口的保证，当时还在地中海战区的部队可以经由布列塔尼进入，或者可以把他们更适当地用于意大利战役，以便最后通过亚得里亚海的顶部进攻巴尔干国家。

艾森豪威尔反对任何这样的改变，由于美国参谋部按照它的惯例，拒绝干预战地司令官作出的决定，于是艾森豪威尔就成了与英国首相直接进行辩论的对手。双方互不让步，各自陈述了自己的论点。

丘吉尔像连珠炮似的阐述了英方的立场。他说：“我们已经用不着马赛港以及由此向北的交通线，美军可以经由布列塔尼进入。

“通过法国南部实施的进攻，在地理上距离法国北部部队甚远，以致两者之间没有战术上的联系。

“在德弗斯将军指挥下用于进攻南方的部队，如果在意大利向前推进，进入巴尔干国家，并从南面威胁德国，这一行动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所起的作用，要比坚持原计划的行动路线更为有效。

“我们进入巴尔干国家将会点燃这个地区公开反抗希特勒的烈火，并能对于这些反抗部队提供武器和装备，使他们能更有效地进行反抗活动。”

面对丘吉尔的挑战，艾森豪威尔毫不让步，他心平气和地详尽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他说：“过去的经验证明，我们可能会对布列塔尼各港口的使用大为失望。我们不但要预料敌人会进行顽抗，而且我们断定，我们一旦攻占这些港口，它们将被有效地破坏。我们预料马赛不会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因为我们知道敌人的防御部队大部分为抵抗我军进攻已往北调动。我们应当迅速夺取马赛，不让敌人有很多时间去进行破坏。

“从布勒斯特到梅斯地区的距离，要比马赛到梅斯的距离远，连接前两个地点的铁路线要比罗纳河北面的铁路曲折得多，而且更容易遭到破坏。如果不能攻占马赛，我们将不能把美国的各师迅速从国内运来。一支相当数量的部队进驻法国南部，肯定会使我们自己的军事行动在战术上和战略上得到支援。

“首先，当我们继续不断地向德国的抵抗中心推进时，它将保护和支援我们的右翼。其次，这支部队如与我们的右翼连接起来，就会自动切断会合点以西的全部地区，俘获留在这个会合点后面的敌军，进而解放法国，使它能积极地协助我们。

“如果没有‘龙骑兵’行动（即“铁砧”行动）的进攻，我们就必须保护从布列塔尼半岛底部到我们进攻的先锋部队最前端的右侧。这将意味着为了仅仅保证我们自身免遭小股快速部队袭击而把大量的师置于右侧不能机动。这样，这些防御师就难以参加以后的进攻行动。

“我们迄今只有瑟堡这个永久性港口。由此出发的各条路线根本不能维持前线我们作战部队的需要。在我们取得北方的安特卫普和南方的马赛或与此相当的港口设备以前，我们的给养工作和后方勤务工作将永远赶不上最终征服德国的需要。但是，我们一旦取得了这些港口，我确信，我们就在德国边境配置足够的部队和物资，来发动最后和决定性的进攻，把德国彻底打垮。如果没有这些设备，我们必将耗尽我们的给养能量。那时，我们就会处于英军从埃及向西推进时经常遇到的那种困境，而隆美尔在最后占领阿拉曼之后也曾陷入英国的这种处境，以致使他在当时不能利用他的优势。

“另一个因素是美国政府花大量费用装备和供应了一批法国师。这些部队当然希望为解放法国而战。再没有别的理由能使他们这样热情和忠诚地战斗，也没有别的地方能使他们获得必要补充来补偿战斗损失。这些部队当时驻在意大利和北非，只有通过法国南部的开放，才能迅速投入战斗。

“我坚决认为，我们的部队应在瑞士边境和北海之间这个广大范围内进行最大限度的集结。因为在那里，我们能以最快的速度向德国心脏突进，并最终与来自东方的红军会师。”

双方争持不下，丘吉尔首相为了坚持他的论点，还为从南方进攻的部队描绘了一幅血淋淋的惨景。他肯定那支部队为摧毁沿海防御会苦战好多星期，并担心在三个月内向北的进展不会超过里昂。他认为盟军将会遭受巨大的损失，并且坚决认为这个地区的战场只会成为另一个安齐奥。但是，艾森豪威尔反驳说：“很可能首相并不相信我们情报部门的可靠性，但是我们相信，除了大部分不能调动的师外，很少德国部队留在南方。因此，我们断定，德国的防御外壳很快会被捅破，而德弗斯的部队将会以迅速的步伐向北推进。”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同意英国首相的意见。于是丘吉尔绕过他们，直接向罗斯福提出，这位首相向罗斯福总统抱怨说，他对美国人那种“专横”的口气觉得难办，他要求罗斯福在作出决定前，听听双方意见。丘吉尔声称，他愿意协助艾森豪威尔将军，但是不以完全葬送“我们在地中海的伟大事业为代价。我们觉得要求我们这样做是令人很不愉快的”。他认为“铁砧”行动，对诺曼底的盟国远征军不会有什么帮助。但是艾森豪威尔坚持认为，该行动会有所帮助，不仅通过对在法国的德军施加额外压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打开法国最良港口之一的马赛港，把另外的美国和法国师投入战斗，这是诺曼底那些堵塞的港口所不能完成的。罗斯福支持艾森豪威尔的作战计划，对丘吉尔解释道：“由于纯粹政治上的原因，若是人们知道有相当大量的部队转移巴尔干，即使是‘霸王’行动中的小小失败，我都逃不了罪责。”

丘吉尔再次要求艾森豪威尔把“铁砧”行动从马赛改为布勒斯特。他说，这样做的最大好处不仅是参加“龙骑兵”行动的部队能在法国西北部作出贡

献，而且亚历山大在意大利部队的消耗会比较小，因而亚历山大仍有可能在冬季前推进到里雅斯特。但这是一个荒唐的建议，“龙骑兵”行动要在11天内进行，而丘吉尔提议把这次战役的地点移动1600英里左右。超出空军掩护的范围，没有计划，不知道需要多少运输力量，对目前的军事行动或以后战役的影响也没有估计。丘吉尔夸夸其谈地说，历史将表明，艾森豪威尔如果不把“龙骑兵”的地点从法国南部移向布勒斯特，他就失去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艾森豪威尔喃喃地说，要改变已经太晚了。正是这样的论点使丘吉尔最不耐烦。他愤愤不平地说，美国扮演着一个“有实力的咄咄逼人的伙伴”角色，而不是去了解英国的立场，美国人“对英国的利益无动于衷”。

丘吉尔一语道破了这一问题的秘密。他最初以各种理由反对“霸王”行动，如今又反对向法国南部登陆的“龙骑兵”行动（即“铁砧”行动）。其目的就是拖延战争的进程，让苏联红军和德国军队去死拼，而他却利用远征军去攫取战后英国在巴尔干各国的特殊利益。

对于这一问题，艾森豪威尔在他撰写的《远征欧洲》一书中，曾记述了这样一段文字：

“虽然我从未听见首相这样说，但我感到，他真正关心的可能是政治上的问题，而不是军事上的问题。他可能认为，战后如果西方盟国在巴尔干国家有强大的力量，这在缔造战后的一个稳定世界方面，要比俄军一方占领那一地区有利得多。我告诉他，如果这是他主张向巴尔干国家进军的理由，他应该马上去找总统，把事实和他自己的结论都摆在桌面上。我知道得很清楚，战略会受到政治考虑的影响。如果总统和首相为了达到他们认为必要的政治目的，决定延长战争，并认为值得增加人力和财力的代价，那么我立刻会忠诚地相对调整我的计划。但是我还是坚持，只要他单从军事角度来辩论这个问题，我就不能承认他的论据是妥当的。”

“我认为，在这个具体问题上，”艾森豪威尔继续写道，“我个人必须是自己的责任和决定的主宰。只要这个改变出于军事理由，我就拒绝考虑。他不承认有政治的因素在影响着他，但我十分确信，一个有经验的军人，如果是严格地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对于坚持进攻法国南部的计划的明智性，是不会提出疑问的。”

美国总参谋长马歇尔，对丘吉尔阻挠“铁砧”计划感到恼火。

他发了一个被陆军部长史汀生描写为“撕裂者”的电报给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丘吉尔也向罗斯福总统发了一个火气毫不逊色的电报说：“我们首先希望的是，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方式帮助艾森豪威尔将军，但我们不认为这就必然要牵涉到完全毁坏我们在地中海的伟大事业，我们对此感到关切，那是我们所需要的。”罗斯福当天电复，他毫不含糊地支持他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铁砧”计划要在8月中旬开始行动的要求，并拒绝了威尔逊向巴尔干推进的计划。罗斯福向丘吉尔说：“我确实相信，我们应当加强我们行动的统一，而不是去分散它。”当晚，丘吉尔在一篇长得惊人的备忘录中，又对罗斯福进行了回击。与此同时，英国三军参谋长会议在一封补充电报中指出，如果放弃“铁砧”行动计划，英国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就有机会消灭德国陆军元帅阿尔伯特·凯塞林在意大利的全部军队。他们还尖锐地补充说：“我们承认，艾森豪威尔将军对‘霸王’行动计划本身的成功负有责任，但我们不能承认他对整个欧洲战略有任何责任，这种责任必须留给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而不能委托给任何一个总司令。”

罗斯福看出争论已经激化。他打了个电报给丘吉尔，想进行调停。他千方百计，力图说服丘吉尔，不要改变在法国南部的登陆计划。他提醒这位首相说，他们俩人都曾在德黑兰向斯大林谈到“铁砧”计划，暗示到下次美国总统大选中，他有可能由于这个问题而招致失败。罗斯福要求说：“我亲爱的朋友，我请求你让我们按照既定的计划行动。”他还挑明了说：“由于这是纯粹从政治上考虑问题，即使让‘霸王’计划产生轻微的影响，我们也难以向全世界人民面前交待。”

丘吉尔拒绝罗斯福的这些道理。双方电报来往频繁，相互进一步申述自己的意见。丘吉尔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一心想的是在巴尔干的推进。他答复罗斯福说：“把地中海战役分割成两个部分行动，结果将是哪一个都不会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以我的愚见看来，对此所造成的重大战略和政治上的失误，我们俩都不得不承担责任。”

这位英国首相还断言，“铁砧”计划只能使戴高乐从中得到好处。同时，他把在意大利的亚历山大将军描写为几乎要掉眼泪的样子，并抱怨说：“‘铁砧’行动计划的幽灵正严重地威胁着前线的战斗。”最后，丘吉尔又一本正经地说：“尽管如此，如果盟国联合参谋长会议下令‘铁砧’计划必须进行，英国将会照办，但这是在严重抗议下的照办。”艾森豪威尔为丘吉尔这一明智的屈服而感到高兴。

但是，在一周后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幻觉终于消失了。艾森豪威尔驱车到契克斯与正在卧室休息的丘吉尔会谈了 90 分钟。双方又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丘吉尔威胁说，如果他的建议不能实行，他就要晋见英王请求辞职。他再次恳求艾森豪威尔对亚历山大将军给予支援，这样从意大利他就能穿过卢布尔雅那的空隙插进“欧洲的腋窝”，即巴尔干地区。丘吉尔的要求，再一次遭到艾森豪威尔的拒绝。对于他，意大利是一个死胡同，他不愿把更多的可用之兵投放进去。这个插曲，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已经成了一场恶梦。走投无路的丘吉尔，在第二天也戏剧性地回答说：“我祷告上帝，但愿是正确的。当然，我们将竭尽所能助你成功。”

按照预定计划，8月15日“铁砧”行动开始了。盟国远征军沿罗纳河谷向北挺进，只遭到轻微抵抗。他们一举解放马赛港，从而为进军西欧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44年9月到12月，马赛港卸下的物资吨数比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所拥有的任何其他港口都多。

1944年最后三个月，盟军在欧洲卸下占总数1/3以上的补给品，是通过法国南部进行的。直到1945年1月，当安特卫普全面开展工作时，才取代马赛港而成为盟国远征军的主要港口。而在当时，即在最后一次战役中，将近1/4用来攻击德国的武器和弹药，也还是通过马赛港运进欧洲的。因此，艾森豪威尔从不怀疑他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

与在英美之间就“铁砧”行动发生争论的同时，蒙哥马利也突然向艾森豪威尔提出，他应继续保持整个战役中的全部地面部队的战术协控制权。艾森豪威尔断然答复：“这是不可能的。”特别是考虑到，在这同时，蒙哥马利需要保持对他自己的集团军群的直接指挥。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人员都认为这个提议是离奇的。设置集团军群司令，就是为了保证对前线某一部分逐日实行直接指挥。可以肯定，没有一个人既能完成他负责的一部分战线的职责，同时又能对任何其他部分的战线实施合理的和明智的监督。这个意见的唯一效果，必然使蒙哥马利处于随意动用他所指挥的所有部队去支持他

自己想法的地位。

此外，在盟军内部，为夺取胜利的荣誉也在进行着激烈的争吵。在8月份的头三个星期中，在第三集团军疾驰通过法国时，艾森豪威尔不对报界公布巴顿的名字。布彻请求这位远征军总司令透露巴顿的名字，以证明艾森豪威尔把他留在指挥岗位上是正确的。但是“坚毅”的欺诈行动还没有完全失去作用，因此艾森豪威尔不同意。他说：“为什么我要告诉敌人？”当终于发布这一消息时，巴顿的名字占据了报纸的头版头条，在世界引起轰动。巴顿非常高兴，而蒙哥马利很不舒服。双方相互指责。美国报纸抱怨“英国人统治着”盟国远征军，因为英国人领导着主要的陆海空部队，而艾森豪威尔不过是一个“傀儡”。

马歇尔对此很不高兴。8月17日他告诉艾森豪威尔：“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我，以及显然所有的美国人民，强烈地认为，你负责直接指挥美国部队的时间已经到来。美国地面部队不能再受英国人的指挥和制约。”

8月19日，艾森豪威尔告诉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他打算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在法国设立具有适当通讯设备的前进指挥所之后，立即亲自指挥陆上作战。他还拟订了一个作战计划，派遣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向东北，朝安特卫普和鲁尔进发；派遣布雷德利和巴顿的第十二集团军群从巴黎向东直指梅斯。蒙哥马利对此安排大为光火。8月22日蒙哥马利派他的参谋长弗雷迪·德·基恩甘去见艾森豪威尔，对这两个决定提出抗议。蒙哥马利争辩说，结束战争最快的办法是把巴顿留在巴黎，并要求将新近运来的补给品，大部或全部交给他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使用。蒙哥马利警告说：“在取得巨大胜利之后，现在来改变指挥系统，会延长战争时间。”在与艾森豪威尔的两个小时会见中，他紧紧地抓住这几条，但是艾森豪威尔拒绝改变主意。

于是，蒙哥马利邀请艾森豪威尔在第二天，即8月23日，到他设在贡德的战术司令部来共进午餐，讨论未来的作战问题。会谈开始前，蒙哥马利就给了这位盟国远征军总司令一个下马威，他拒绝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入内，只同艾克一个人单独会谈。蒙哥马利摆出了十足的绅士派头，站在地图面前，双腿叉开，背着手，昂着头，阐述他的“高见”。他建议由他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单独向鲁尔地区进攻，以布雷德利的部队担任支援任务。他宣称，如果不按他的意见办，而执行艾森豪威尔的计划，结果将是失败。

蒙哥马利对艾克说，他“不应降格参与陆上作战而成为一名地面部队的总司令”。他说最高统帅“应高瞻远瞩，以便不偏不倚地观察整个复杂的问题”，而由别人替他指挥陆上作战。艾森豪威尔平静而坚定地解释说，由于马歇尔的坚持和美国公众的意见，他必须指挥陆上作战。蒙哥马利极力主张统一指挥，他说，如果美国公众的意见是唯一问题，他愿意在美国将军布雷德利的领导下工作。蒙哥马利即使这样对他施加压力，艾森豪威尔也不改变主意，”并打算在9月1日接过指挥权。

蒙哥马利不能动摇艾森豪威尔对指挥问题的决心，于是转移到实际问题，即进军德国的实质问题。他要巴顿按兵不动；他希望空降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归他领导；他想得到一切可以得到的补给品；他想得到指令，派他越过加来海峡，向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挺进，直捣鲁尔。经过多次的争论后，艾森豪威尔作了某些让步，其中最重要的是，使蒙哥马利得以指挥空降集团

军，以及在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右翼和布雷德利的左翼之间，“有进行必要的作战协调权力”。此外，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优先得到补给。

艾森豪威尔安抚蒙哥马利的做法，使布雷德利和巴顿大为不满。布雷德利气得发疯，他大声嚷道：“这算什么最高统帅！”巴顿认为南方的进军比在北方水网地区，有着更好的坦克作战的地形。他非常厌恶地指出，蒙哥马利“有办法鼓动如簧之舌使艾克接受他自己的思想方法”。他向布雷德利建议，他们以辞职来威胁。“我认为这样摊牌后，我们会取胜，因为艾克不敢将我们解职。”但是，布雷德利不愿做得这么绝，他劝巴顿要顾全大局，不要影响两国关系。

不久，巴顿断油。为了保证蒙哥马利的突击计划，汽油正调往霍奇斯的第一军。巴顿的第三集团军被迫在巴黎东南部原地待命，只能进行一些微不足道的侦察任务。“英国佬又得逞了。”巴顿在日记中写道。人们所熟悉的“偏执狂”，从他身上一下子冒了出来。他在给比阿特丽斯的信中说：“我每前进一步都得拼命，然而，现在阻止我的不是敌人，却是‘他们’。假如我能偷到些汽油，仅凭这一条，我就能打赢这场战争。”想法变成了行动。长期以来，他那典型的巴顿作风，使他在后勤补给部队的黑人士兵中颇有声望，当时，一个汽车连替他偷到一些准备供给其他部队的汽油。很快，他又自行其是，开始了他的“旋风”式的进攻。

蒙哥马利已经“全盘获胜”，然而他并不知足。在如何选择合适的进攻路线问题上，他像狗缠着骨头一样，继续纠缠着艾森豪威尔不放。9月4日，他发报给艾森豪威尔称：“我认为，目前我们已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全力以赴向柏林展开大举进攻，很可能马到成功，就这样结束德国的战争。”当时，没有足够的补给提供给两路挺进的部队——蒙哥马利向鲁尔推进，以及巴顿取道梅斯和萨尔的进军。这位新提升的元帅要求当机立断，优先考虑鲁尔战役。接着，他在电报中说：“你如果同意此方案，我们也许再研究一下。如无异议，我高兴在明天午饭时见到你。要知道，我目前很难从这个战场上脱身。”

翌日，艾森豪威尔复电，否定了上述建议。这是艾克在与布雷德利和巴顿谈话之后，才做出的反应。他主张大面积突破“西墙”——齐诸菲防线，并越过莱茵河。艾森豪威尔断定，现在是让巴顿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巴顿对艾森豪威尔改变主意，当然欣喜若狂。9月7日，巴顿对随军记者发表谈话，富有诗意地表达了他的夙愿。他说：“我希望像射穿一只鹅那样穿过齐格菲防线，”但是进军并非完全顺利，英美将军之间的纷争仍在进行，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章 蒙蒂与艾克

桀骜不驯是蒙蒂，不听指挥自作戏；
强词夺理缓进军，狂妄自大令人气。

自从艾森豪威尔宣布直接指挥盟军地面部队后，丘吉尔意识到，这一指挥权的变化，将对蒙哥马利的自尊心是一严重打击。为了安抚他，9月1日丘吉尔宣布蒙哥马利晋升为陆军元帅。这样就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蒙哥马利的军衔比艾森豪威尔高，五颗星对四颗星，从而更加助长了这位将军的傲气。“蒙蒂与艾克的关系更加别扭了”。

英美军界不少人士认为，蒙哥马利是一个虚荣心很强，以我为中心，难于与人相处的将军。因此，蒙哥马利并不很受其同僚的尊敬。一个美国参谋说：“他不是是一个很机智的人，他孤朋寡友，对人冷淡，目中无人，他得到不列颠皇家军队所能授予的最高职位乃是命中注定。”他和艾森豪威尔不同，冷漠，服饰特别，不被他的部下所谅解。他喜欢自己周围的年轻参谋为他捧场。他渴望荣誉，追求名声。他的态度，他那圆润的嗓音，他的傲慢自大和他那贪婪的权力欲，不可避免地激起了西点军校将军们的怒火。

伯纳德·劳·蒙哥马利1887年11月出生于北爱尔兰，在塔斯马尼亚岛度过他成长发育之年，因为他父亲做了塔斯马尼亚的主教。蒙哥马利回英国上学时，脑海中铭记着母亲灌输给他的严厉家规：不准吃糖果。每天上午7点半开始，在建在住宅外的一间教室里上课。在学校中，蒙哥马利唯有在他本人当头头的时候才表现出“团体精神”。他在桑赫斯特皇家陆军学院毕业不久，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首次伊普雷歼灭战中，他作为一名陆军尉官，在一次白刃战中表现英勇，身负重伤，荣膺“优异服务勋章”。

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说，蒙哥马利是一个不顾传统的军官，不太尊重陆军部。他演说时，不仅不准听众吸烟，而且不许咳嗽。他是个严肃，勇于献身，却又古怪的人，处理钱财的方式更是奇特。有一次，他把军用地租给一个集市商场主，以筹措资金改善驻军生活。他的慷慨仅仅是“不痛不痒”的善举。一家肿瘤医院递送一份请求资助的申请书，蒙哥马利仅赠给一张陆军慰问基金会名下的25英镑的支票。

1927年，蒙哥马利与贝蒂·卡弗结婚，她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军官的遗孀。婚姻极其美满，他发号施令，她唯命是从。有一次蒙哥马利回家时，妻子正与女友们打桥牌，他就在客厅里大声宣称：“任何这种聚会玩到下午6点就够了。你们大家别再玩了，回家到你们丈夫身边去吧！”她柔顺地依从了。她的兄弟赫伯特，对于这位高声粗气而又跋扈的军官与他文静温柔的姐姐相结合的这段姻缘颇感不满，但这对夫妻却彼此好得不能分离，只是由于她被毒蜂螫后不幸去世才分手。据说他一直未能从这个打击中完全恢复过来。

这位在非洲打败过隆美尔的将军不怕任何人，而为了显示这一点，他坚定地、经常地让丘吉尔安分守己。在诺曼底登陆日之前三个星期，当丘吉尔来到索思维克大厦想讨论一下登陆部队的运送问题时，蒙哥马利予以独特的接待。这位注重礼节的将军“准备宽恕”丘吉尔只穿便服，但不能原谅他的干扰。蒙哥马利沉思了一下，拉住首相说：“阁下，我知道您想和我的参谋们讨论如何调遣士兵去登陆……我不能容许您这样做。参谋与我商量，我作出最后决定。无论如何我不能容许您在这种时候去打搅我的参谋以致可能动摇他们对我的信任……您可以和我争论，但不要和我的参谋讨论。”

随之是一阵尴尬的沉默。然后他引首相到邻屋去会见他的参谋。丘吉尔明白自己陷入了难堪的境地。他愤然对军官们说：“我未被准许与诸君作任何讨论。”后来他在蒙哥马利的纪念册上题了几行怀着希望的恰当的赞美之辞：“在这几页题辞所涉及到的最伟大的冒险临近的时刻，谨记下我的信心，我相信一切良好，陆军的组织和装备都与英勇的战士和他们天才的指挥官相称。”

毫不奇怪，艾森豪威尔不喜欢浑身是刺、架子十足的蒙哥马利来糊弄自己。战役发动初期，地面部队由英国人来指挥，这是必然的。开初的攻击波也主要由英国人进行。艾森豪威尔的委任，对于英国的自尊心说来，已经暴一副难以咽下的苦药。艾森豪威尔就任时，曾对英国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爵士说，他更喜欢亚历山大将军。布鲁克怀疑这是艾森豪威尔害怕驾驭不了反复无常的蒙哥马利。不过，布鲁克有他自己的想法，于是蒙哥马利就得到了这个职位。

尽管艾森豪威尔对这位刺头的将军表现宽容、仁慈，但蒙哥马利依然桀骜不驯。他越来越暴躁地指责艾森豪威尔在军事指挥上无能。他认为，艾森豪威尔不会任命一位指挥官来指挥进军鲁尔的战斗。他说，艾克利图“通过冗长的电报”坐在最高统帅部里指挥一切。蒙哥马利用他的派克—51型自来水笔在淡蓝色的信纸上写信回击艾森豪威尔。书信的基调总是彬彬有礼的，只是在情况严重时略带急躁情绪。当这种潜藏的刻薄情绪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时，蒙哥马利就在信末这样写道：“您最忠实的朋友，蒙蒂。”蒙哥马利在信中极力向艾森豪威尔说明，在当时军需供应阻塞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按照他的计划攻占鲁尔、萨尔和法兰克福地区，并继而向柏林挺进。因此，再次要求，将军需的全部或大部给他的军队，并由他担任主攻。

在此期间，蒙哥马利一直同他在伦敦的军事和政治上司布鲁克和格里格保持着通信联系，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他向格里格写道：“美军超用了他们应得的军需物资，结果使我们在整个前线落到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境地。我们现在不可能攻占鲁尔、萨尔或者法兰克福。我认为，我们的这场戏实际上已经‘砸锅了’，这只能怪我们自己。这是一场大悲剧。我已经尽力而为，我一直坚持我在9月4日发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所阐述的立场。我在那封电报里说，我们必须集中一切力量给敌人一次沉重打击。我还说，如果我们试图寻求妥协的解决办法，把给养物资加以分散，从而使任何一次打击都是软弱无力的。那么，我们就会使这场战争拖延下去。”

蒙哥马利在给格里格的这封长信的末尾加了附言：“倘使此事现在能够处理得当，我相信，我们尚能侥幸取得成功并在今年或在事态的发展所能允许的最短期间结束战争。然而，若不如此行事并抓紧进行，那么，我觉得，我们就只好咎由自取了。”接着，他又潦草地写道：“再附言：我在此信中发了一通脾气，我想你阅后把它烧掉为好。”

面对蒙哥马利的压力，艾森豪威尔我行我素，按自己的处事哲学办事。9月初，他虽然宣布蒙蒂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在补给方面有优先权，但是他也布布雷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在巴黎以东集结，并准备迅速向东进击。完全如蒙哥马利所担心的那样，布雷德利同意巴顿向兰斯和兰斯以东挺进。8月30日，巴顿越过马斯河。这样他在巴黎以东推进了100多英里，离莱茵河也不过这样的距离。然而，他的汽油用完了。当天他仅得到2.2万加仑汽油，而他需要40万加仑。可是，他还要继续推进。他部下的一位军长向他报告部

队已经停止前进，如果再往前推进，坦克就没有汽油了。巴顿要他“继续前进到坦克停下来为止，然后从坦克下来，徒步前进”。巴顿认为，他的坦克的汽油用完后，艾森豪威尔将不得不给他更多的汽油，甚至抽调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的配给额。

9月2日，艾森豪威尔到凡尔赛去见布雷德利、霍奇斯和巴顿，讨论未来的作战问题。凯·萨默斯比在盟国远征军总部办公日记中写道，在会见前，艾森豪威尔说，他要狠狠地批评巴顿，因为他把战线拉得太远，从而造成补给的困难。但是，巴顿抓住了机会先讲。他高兴地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已经在摩泽尔——夸大他说——在梅斯巡逻。“艾克，如果你让我得到正常的分配的吨数，我能推进到德国边界，而且突破那条该死的齐格菲防线，我愿意以我的名誉打赌。”

“乔治，小心点！”艾森豪威尔想到巴顿最近的一些麻烦事，不高兴地说，“你的名誉值不了多少钱！”

“我的名誉现在不错啊！”巴顿嬉皮笑脸地说，“我的部队在前方，机会好得不能再好，希望阁下开恩，同意拨给第三集团军额外的汽油。保障我的军队继续前进！”

经过讨价还价，艾森豪威尔允许巴顿继续向曼海姆和法兰克福进攻。此外，还同意布雷德利的请求，把第四集团军部署在阿登以南，巴顿的左面。

当蒙哥马利得知巴顿将得到更多的汽油，霍奇斯从他的右翼撤走时，勃然大怒。因为补给不足，意味着不能同时发动两次攻势。他说：“如果我们企图采取折衷的解决办法，分散我们必需的物资，势必使哪一次进攻都不能全力以赴，导致战争延长。”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仍优先补给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并在此基础上分配物资。

两天后，也就是在9月7日，蒙哥马利继续抗议，他在补给方面没有得到优先权。他被迫把补给品的数量削减到每日6000吨，他说这是“我消耗所需的一半，我不能这样长久地继续下去”。他需要每天空运1000吨，可是仅得到750吨。蒙哥马利引述了更多的，他所短缺的数字和情况后说：“在这份电报中很难把问题说清楚”。他不知道，艾森豪威尔能不能来见他。

提出这样的要求，正是蒙哥马利一贯的做法。在整个战争期间，只有一次他到盟国远征军总部去见艾森豪威尔，尽管他是经常被请去参加会议的。他总是坚持要艾森豪威尔来见他。但是，9月7日他提出这样的要求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艾森豪威尔刚刚遇到事故，行动还很困难。

艾森豪威尔是在9月2日出事的。当时他在凡尔赛会见布雷德利和巴顿后，回格朗维尔。艾森豪威尔的B—25型座机一个消声器坏了，他转乘一架L—5型飞机，这是一种航程有限的只可以乘坐一人用于联络的小型飞机。碰上了暴风雨，驾驶员迷了路，找不到跑道。汽油快用完了，他们在沙滩上迫降。艾森豪威尔跳下飞机帮助驾驶员把飞机推过潮水线。在潮湿的沙石上，他扭伤了膝盖。驾驶员帮助他一瘸一拐地走过盐滩到公路上。一辆路过的美军吉普车发现了他们，把他们送到格朗维尔。艾森豪威尔全身湿透，精疲力尽，一身泥水，两名副官把他抬到他的卧室。他的膝盖红肿，很痛，艾森豪威尔动弹不得。一名医生从伦敦飞来，要他卧床一个星期。几天以后，消了肿，医生给艾森豪威尔的膝盖打上了石膏。

在他卧床期间，艾森豪威尔心情很坏，经常大发脾气，尤其是他很不高兴只能用丁字拐杖在卧室内慢慢移动。两个星期后，他写信告诉玛咪，他每

天都在接受治疗，热敷和按摩一个半小时。腿伤在逐渐好转，但是差不多 54 岁的人，不像 30 岁的人好得那样快。“除了疼痛外，一切都很好。我不得不当心！真烦人。”

蒙哥马利明明知道艾森豪威尔的伤势，但仍坚持要艾森豪威尔前去布鲁塞尔和他会见，而不是他到格朗维尔去。因此，9 月 10 日下午，艾森豪威尔拖着痛疼的病体飞往布鲁塞尔。登上飞机很困难，走下飞机根本不可能。作为下级的蒙哥马利登上飞机，从口袋中拿出艾森豪威尔最近的指示，挥舞着手臂，激烈地把计划骂得一文不值，指责总司令欺骗他。言外之意说，是巴顿而不是艾森豪威尔在指挥战争，要求把地面指挥权归还给他，并且宣称，两面出击最后将导致失败。

当蒙哥马利骂得厉害的时候，艾森豪威尔默不作声。然而，在蒙哥马利第一次停下来换口气的时候，艾克欠着身子，把手按在蒙哥马利的膝盖上说：“冷静点，蒙蒂！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我是你的上级。”蒙哥马利嘟囔着说了几句道歉的话，接着他提出由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单独地通过阿纳姆，直插柏林，并要求得到他所需的补给。但是，艾森豪威尔断然拒绝，告诉他连考虑的可能性都没有。后来艾克在他的工作日记中写道：“蒙哥马利的建议很简单，就是把什么都给他，这是发疯！”

经过一阵激烈的争吵和讨价还价，艾森豪威尔最后同意了一项代号为“市场—花园”的计划。蒙哥马利宣称，这项计划会带来重大战果。计划规定用空降集团军和英国第二集团军在荷兰的阿纳姆渡过下莱茵河。艾森豪威尔所以同意这一计划，是因为他像蒙哥马利一样，想在攻势的势头没有消失前，在莱茵河对岸建立一个桥头堡。他也对于使用空降集团军进行一次重大行动的想法表示欣赏。

但是，这一计划有着某些明显的缺点。主要是：从比利时—德国边境向北，而不是向东推进，将使第二集团军在它的右翼和第四集团军的左翼之间出现一个缺口。霍奇斯将不得不把部队调到他的左边来堵住这个缺口，这就意味着各支队拉得更开，战线比以前更为宽阔。进攻方向将使第二十一集团军群离开鲁尔地区，要越过另外一条河。而最糟的是，它将推迟打开安特卫普港。安特卫普港是欧洲最大的港口，最靠近德国心脏地区。盟国远征军总部一直知道，没有安特卫普港，就不能在德国进行重大作战行动。可是艾森豪威尔允许蒙哥马利不顾安特卫普港而在阿纳姆进行不顾后果的行动，即使获得成功，也得不到重大的战果。

正如一些军事专家们所预料的，“市场—花园”行动一开始就进展不利。9 月 17 日，第一天第二集团军就打得不好，接着步步受挫。到了 9 月 21 日，由于恶劣的天气，德军的反攻，特别是蒙哥马利在指挥上的消极态度，使这一行动遭致失败。但蒙哥马利毫无自我批评之意，把失败的责任推倭给别人。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不能同意说，我们的想法是相同的。我相信你会愿意我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坦率。”他要求用有约束性的命令使巴顿停止前进，并催促艾森豪威尔“把一切都投入左翼”。但即使取得某些进展，没有安特卫普港也是不够的。整条战线情况不佳，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承认：“使人想起在突尼斯初期的日子，但是，如果我们只要用上安特卫普港，就会得到像输血那样的结果。”

9 月 20 日，艾森豪威尔已经把盟国远征军总部迁移到凡尔赛。第三天，即 9 月 22 日，在凡尔赛召开军事会议。这是从预定发起进攻日以来最大的一

次。有 23 位将军，海军上将和空军元帅出席。事实上，盟国远征军中的重要人物，除蒙哥马利由他的参谋长德·基恩甘代表外，全都出席了。这位傲慢十足的英国元帅所以不去，他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不能说服别人，特别是在有敌对情绪的凡尔赛的一班人中，差不多没有一个人是对他怀有良好印象的。他的霸道作风在远征军将领中引起强烈的不满。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宣布了他的作战计划。在他离开办公室去会议室前，他口授一封给蒙哥马利的信，传达了这样的决定。他说：“我坚持认为安特卫普港是很重要的。占领安特卫普是最后进军德国的先决条件。”他要求蒙哥马利给予加拿大部队为打开安特卫普港所需的一切，“其中包括全部空军力量和你们所使用的一切其它武器。”然而，蒙哥马利对总司令的命令，置若罔闻，继续坚持他自己的计划，组织部队向阿纳姆推进。结果，一切都很糟。法国境内的大规模的 8 月攻势没有带来欧洲的胜利。“市场一花园”行动失败，安特卫普没有及时打通，对于 1944 年的局势毫无帮助。

到了 10 月 9 日，艾森豪威尔终于忍受不住了，他要批评蒙哥马利了。直接起因是拉姆齐海军上将办公室送来一份报告，其中提到加拿大部队由于弹药短缺，在 11 月 1 日前不能完成任何任务。怒气冲冲的艾森豪威尔打电报给蒙哥马利：“除非在 11 月中使安特卫普港投入使用，否则我们整个作战行动将限于停顿。我必须强调，从瑞士到英伦海峡整个战线上的作战行动，我认为安特卫普是最重要的，而扫清入口通道障碍的战斗，需要你亲自过问。”他把电文中有刺激性的言词都删掉了，加了一句“你最了解哪里是你的集团军群的重点”。

蒙哥马利对这一指责很不服气，当天他就给艾森豪威尔回敬了一份电报。“请你代问拉姆齐，他有什么资格向你报告他根本不可能知道的、有关我的作战行动的情况。”蒙哥马利说，加拿大部队已经在进攻，而且“并没有弹药短缺”的情况。至于安特卫普，他声称：“那里的战斗正由我亲自指挥。”过后不久，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打电话给蒙哥马利，要求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可以在安特卫普周围采取某些行动。接着说了些激烈的话。最后史密斯气得满脸通红，转身对着他的副手摩根将军，把话筒塞到他手中。史密斯说：“拿着，告诉你的老乡他该做些什么！”摩根只好告诉蒙哥马利：“除非安特卫普很快打开，否则将切断对他的补给。”

这个威胁激怒了蒙哥马利，他丢下话筒，写了封信给史密斯。他把“市场一花园”行动的失败，归咎于他的部队和布雷德利部队之间缺乏协作；并对盟军总部的作战计划横加指责，再次要求掌握地面部队的指挥权，艾克对此甚为不满。他说，“如果蒙哥马利对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作战计划仍采取消极对抗态度，则我们之间确实存在着分歧，为了今后能有效地作战，必须很快予以解决。”艾森豪威尔说，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权限，“如果你作为伟大盟国之一在这个战区中的一位高级司令官，觉得我的想法和指示竟然危及作战的胜利，则我们有责任把这个问题向高一级的当局提出，以便采取他们可能选择的任何行动，即使是重大的行动。”

这位狂妄自大的蒙哥马利十分清楚，如果艾森豪威尔向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这就“有他无我，或有我无他”，而艾森豪威尔将会胜利。蒙哥马利赶紧回电：“我已经向你表明了观点，而你已经作出答复。我和我们全体将百分之百重视按你的要求去做，而且我们毫无疑问将完成它。”他说他已经把安特卫普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并将结束关于指挥权问题的讨论。

他允诺：“你将再听不到我重提指挥权问题。”最后在电文上签署了“您非常忠诚的下属，蒙蒂”。

1944年的秋天，霍雨连绵，阳光稀少。部队进展迟缓，蒙哥马利和布雷德利又暴跳如雷，使艾森豪威尔更为苦恼。唯一使他宽慰的是，美国参议院批准晋升他为新设立的五星上将，这使他和马歇尔、麦克阿瑟，还有蒙哥马利同级。足以使艾森豪威尔高兴的是，他可以告诉他的情人凯·萨默斯比少尉，他已经对丘吉尔谈到过她，英国首相答应，准备授予她一枚大英帝国勋章。

圣诞节过后，艾森豪威尔决意再次发起新的进攻。他认为，在“凸出地区”的德军各师缺编，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供应线不畅通。他想迅速地、狠狠地打击他们。蒙哥马利则犹豫不决。艾森豪威尔认为蒙哥马利严重缺乏军事行动上的时间意识。双方又引起了一场不愉快的争论，蒙蒂在一封信中，指责艾森豪威尔的作战方针，并再次要求让他全权指挥地面作战。而这当然是只朝一个方向，即向北面进击，并让巴顿原地不动。蒙哥马利甚至为此起草了一份指示，让艾森豪威尔签字。

艾森豪威尔不但不照他的要求办，反而发出他自己的指示，其中的每一点都和蒙哥马利起草的各点针锋相对。他强调说：“目前必须防止的一件事，是敌人用步兵来稳定他们的突出部，从而可以随意在前线任何部分使用他们的坦克。我们必须重新掌握主动，而要这样，速度和干劲是很重要的。”附在这一指示中的给蒙哥马利的补充说明中，艾森豪威尔的用语是简洁、直截了当和有力的。提到蒙哥马利争辩只应当有一名战场指挥官时，艾森豪威尔说：“我不同意。”他说，他对蒙蒂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不愿意再听到把布雷德利置于蒙哥马利指挥之下的意见。“在这件事上，我明确对你讲，我不能再让步。”他又说，“我已经制订好在宽广正面向莱茵河进军的计划。”他命令蒙哥马利仔细阅读他的指示。所有以前给蒙哥马利的信件和指示中的含糊态度，现在完全一扫而光。

艾森豪威尔要向这位英国元帅摊牌了。他说：“我很难过，我们之间产生这样一条不可逾越的信念方面的鸿沟，以致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的分歧提到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去。”如果蒙哥马利走得更远，这正是他要这样去做的。艾森豪威尔承认：“随之而来的混乱和争吵，肯定将损害对共同事业的良好愿望和献身精神，这种愿望和精神使盟军成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支军队。”但是如果蒙哥马利要坚持，他就没有别的办法。

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对蒙哥马利的反感是很大的。普遍的情绪是，蒙哥马利必须离职。蒙哥马利却不以为然，他狂妄他说：“让我离职，哪一个能替我？”德·基恩甘回答说：“听说已经安排好了，他们想要亚历山大接替你。”蒙哥马利的脸色顿时发白，他已经忘却了这位能力和威信都高于他的将军。“弗雷迪，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德·基恩甘拿出了一份已经拟好的电稿，让蒙哥马利签字。他说：“签字吧！当前唯一的办法是向艾克承认错误，并要求撤回或撕毁你要求单独指挥地面部队的那封信。”这位傲气十足的将军都照办了。

他在给盟国远征军总司令的信中说：“亲爱的艾克，你可以信赖我和在我指挥下的全体指战员，百分之百地全力以赴来执行你的计划。”1945年1月3日，他开始进攻，虽然不能完全符合艾森豪威尔的要求，但比蒙哥马利原来提出的要好得多。盟军在2月份对“凸出地区”连续发起猛攻。与此同

时，苏联红军奋起反攻，希特勒愈来愈难以招架了。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一章 希特勒反扑

“元首”放言要反攻，垂死挣扎狂乱行；
调兵遣将搞突袭，欲转战局成笑柄。

话说盟军从诺曼底登陆以来，西线德军损失惨重。绝大多数德军将领认为，第三帝国大势已去，战争将主要在德国本土上进行。但自巴黎解放后，由于盟军战线延长，供应日渐困难，加上内部意见不一，攻势逐渐缓慢下来，这给希特勒造成了喘息之机，他决意要进行反扑了。

1944年8月31日，希特勒在大本营对一些将军们训话，试图给他们灌输“铁的意志”。他说：

“我们在必要时将在莱茵河上作战，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战斗下去，正如腓特烈大帝所说，要一直打到那些该死的敌人精疲力竭不能再战为止。我们要作战到底，一直打到赢得在今后50年到100年内能够保障德国民族生命安全的和平局面为止。这个和平局面，首先不能像1918年那样再一次地玷污我们的荣誉……我活着就是为了领导这一战斗，因为我知道，如果这一战斗的背后没有铁的意志，这场战斗是不能胜利的。”

希特勒在严厉批评了陆军参谋总部缺乏“铁的意志”之后，对他的将军们透露了他坚信前途有望的一些理由。他说：“盟军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的时候，他们决裂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历史上所有的联盟迟早都要垮台的。不论怎样艰难，唯一的办法是等待恰当的时机。”

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受命组织“总动员”的工作。新被任命为补充军司令的希姆莱，着手建立25个人民步兵师以防守西线。在纳粹德国关于“总体战”的计划和言论尽管很多，但是国家的资源却远远没有全部利用起来。由于希特勒的坚持，在整个战争时期，日用品的生产仍维持着庞大的数字，这显然是为了维持民心 and 士气。而且他仍然迟迟未实行战前制定的动员妇女进工厂工作的计划。

1943年3月，当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打算要妇女进工厂时，希特勒说：“牺牲我们最珍贵的理想，这个代价太高了！”纳粹思想认为，德国妇女应该待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里。在战争的头四年，当英国有250万名妇女从事战时生产的时候，德国只有18.2万名妇女干着同样的工作。

现在盟军已经打到大门口，纳粹首脑们慌张起来了。

15岁到18岁的孩子和50岁到60岁的男子都应征入伍。在大学、中学、机关和工厂里到处搜寻入伍者。

1944年9月到10月，有50万人参加了陆军，但是没有规定要妇女进机关、工厂去替代这些入伍者。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艾伯特·斯佩尔向希特勒抗议说，技术工人的应征入伍，严重影响到军火生产。

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德国的军队就几乎没有在本国的土地上打过仗。后来普鲁士和德国的战争，都是在别国的领土上进行的，现在战争已深入到德国的核心，军队已陷入困境，因此他们进行了大张旗鼓的鼓励士气的工作。陆军元帅冯·伦斯德发出号召说：“西战场的士兵们！我希望你们保卫德国的神圣领土，坚持到底！”另一个陆军元帅莫德尔号召集团军的士兵们：“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妻室儿女的生命系此一战！”

为了挽救危局，希特勒脑子里在酝酿着一个计划，决定孤注一掷，倾尽

全力向盟军发动一次强大攻势，妄图挽回败局。

1944年12月12日的晚上，一群西线战场上的德国高级指挥官被召到伦斯德的总部。他们被搜取了腰间佩带的武器和手里的公事包，然后被装进一个大汽车里，在没有月光的原野上开了半个钟头，目的是弄得他们晕头转向。最后停在一个很深的地下室通道前，原来这是希特勒在法兰克福附近泽根堡的大本营。在那儿，这些人第一次知道了少数最高参谋官和指挥官一个月前就已经知道的事：“元首”准备在四天内，在西线发动一次“强大的反攻”。

自从九月中旬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在莱茵河以西德军前线受阻以来，希特勒的脑子里就涌现出一个大胆计划：夺回主动权，发动攻势，切断美军第三和第一军团，深入安特卫普，夺回艾森豪威尔的主要供应基地，压迫英加军队沿比利时和荷兰边境撤退。他认为这一攻势，不但会使英美联军遭受惨败，从而使德国西部边疆不再受威胁，而且可以使他转过身来对付苏联的军队。这一攻势还会很快打通阿登森林，1940年德军的大突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德国情报人员知道这里美军兵力薄弱，只有四个步兵师防守着。

深秋以来，希特勒就为他的最后孤注一掷到处搜罗残兵余卒。

10月间，他居然拼凑了近1500辆新的或改装的坦克和重炮。12月又拼凑了1000辆。他还征调了28个师，包括9个装甲师，供突破阿登森林之用；此外，还有6个师，准备在主要攻势发动之后，进攻阿尔萨斯。戈林还答应凑3000架战斗机。

这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虽然远比不上1940年伦斯德在同一战场上所使用的兵力。但是，要拼凑这样一支兵力，意味着取消对东线德军的增援；东线的德军司令官们认为，这种增援是击退苏联准备在一月发动的冬季攻势所必不可少的。当负责东线战场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表示异议时，希特勒痛斥了他一顿：“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了五年德国陆军，在这一时期我所获得的实际经验，参谋总部无论谁也比不了。我曾研究过克劳塞维茨和毛奇，而且把他们所有的军事论文都读过。我比你清楚得多！”

12月12日晚上，被搜去公事包和武器的将军们聚集在泽根堡元首大本营，他们发现这位纳粹统帅背已驼了，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他弯着腰坐在椅子上，两手发颤，尽量隐藏那只随时要发抖的左臂。走路时一条腿拖在后面。

然而希特勒讲起话来仍和从前一样。他对指挥官们作了一番政治动员：

“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我们的敌人那样的联盟，成分那样复杂，而各自的目的又那样分歧……一方面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一方面是垂死的帝国英国，另一方面是一心想取而代之的原来殖民地的美国……

“联盟中的每一个伙伴在参加时都抱有各自的政治野心……美国企图继承英国的衣钵，俄国要想取得巴尔干……英国打算保住它在地中海的地盘……眼前这些国家就在争吵不休。谁能够像蜘蛛那样坐在网中央，注意形势的发展，他就可以观察到这些国家间越来越加深的矛盾。

克劳塞维茨（1780—1831），普鲁士将军，资产阶级军事著作家，曾任柏林军事学校校长。著有《战争论》等。列宁说他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作家”。

赫尔穆斯·卡尔·毛奇（1800—1891），德国军事家、元帅。曾任德意志帝国参谋总长，成为俾斯麦“铁血政策”的热烈支持音。著有《1870—1871年普法战争史》等军事著作多种。

“如果我们发动几次攻击，这个靠人为力量撑住共同战线随时随地可能霹雳一声突然垮台……只要我们德国能保住不松劲的话。

“要紧的是打破敌人认为胜利在握的信念……战争最后要看哪一方认输。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让敌人知道，不管他们怎样，他们决不能叫我们投降。决不能！决不能！”

将军们散会时，希特勒的政治动员还在他们的耳朵里盘旋着。他们谁也不相信阿登攻势会成功，但是他们仍然决心尽最大的能力去执行命令。

12月15日夜，德军在亚琛以南的蒙却奥和特里尔西北的埃赫特纳赫之间的70英里的战线上进入他们的进攻阵地。这天晚上很黑，下着小雪，浓雾笼罩着阿登森林附近大雪覆盖着的群山。根据天气预报，会连着几天有这样的气候，估计盟军的飞机在这期间不能起飞，德国的供应线可以免遭诺曼底那样的厄运。连着五天的天气都帮了希特勒的忙。这个完全出乎盟军总司令部意料的德军行动，在12月16日早晨获得初步进展以后，德军接连几次突破盟军阵地。

12月17日夜，一支德军装甲部队到达斯塔佛洛，它距美军第一军团总部驻地斯巴只有八英里，美军仓皇撤退。更重要的是，它距一个存有300万加仑汽油的巨大美国供应站只有一英里。假如这个供应站被德国装甲部队占领，它就会进展得更远更快，因为德军非常缺乏汽油。由于汽油供应不上，它的装甲部队不断放慢进展速度。纳粹别动队斯科尔兹内的所谓第一百五十装甲旅，穿着美式军服，驾驶着缴获的美军坦克、大汽车和吉普车横冲直撞，给美军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盟军所以没有及早洞察敌人的阴谋和行动，据艾森豪威尔说，主要是天气给德军帮了忙。这位盟军总司令在《远征欧洲》一书中写道：

“这些日子以来，空中侦察无法进行；没有空中侦察，我们就无法判断敌人后方的主要后备队的位置和行动。齐格菲防线的强大人工防御工事也使敌人得到了攻击的力量。防线上的障碍物、碉堡和固定炮火，大大加强了敌人守军的防御力量，这样敌军就能从他们的漫长战线上抽出兵力，集中起来进行反击。虽然从双方投入的兵力看，卡塞林战斗与阿登战役比较，不过是小小冲突，但是两者之间有一些共同点。在这两次战斗中，敌人都是疯狂进攻，都是利用异乎寻常的坚固的防御屏障集中兵力打击盟军交通线，妄想诱使盟军最高统帅部放弃对他们无情进攻的全部计划。

“我们虽然对敌军反攻的时间和实力感到惊讶，但对于他们反攻的位置以及这次反攻终会发生的估计是不错的。此外，就盟军准备反击的一般性质来说，布雷德利将军和艾森豪威尔早已有了一致的计划。”

德军开始进攻后，12月17、18日整整两天，艾森豪威尔一直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并进行了分析。

18日夜，他认为盟军已经掌握了有关敌人的兵力、意图、动向以及盟军自己的实力等方面的充分材料，可以据此拟订一项盟军发动反攻的具体计划。19日凌晨，他在泰德空军上将和一个参谋小组的陪同下来到凡尔登。布雷德利将军、巴顿将军和德弗斯将军奉命在那里与他会晤。会议一开始，文森豪威尔说：“当前形势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而不是灾难，所以今天应该高高兴兴开会。”任性的巴顿叫嚷起来：“嘿！我们要沉着镇静，让这些狗崽子往远里冲，一直冲到巴黎才好，那时就真能把他们一段一段分割，一口一口吃掉！”于是引起哄堂大笑，巴顿自己也笑了起来。

他们仔细地回顾了形势，大家都高兴地看到与会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司令官还是参谋人员都沉着、自信。没有人表现出歇斯底里或发表惊慌失措的言论。

“在这种形势下，”艾森豪威尔说，“假定最高统帅部不惊慌失措，命令整个战线作全面撤退的话，防御部队的反应，一般有两种可实行的方针：一种是沿着受攻击的整个地区，只建立一条安全的防线，选择一些如河流之类的坚固地势，据此坚守。另一种是防御部队一俟集结好必需的兵力，就立刻发动进攻。”

“我选择后者，”艾森豪威尔说，“这不仅因为从战略意义上说，我们是处于进攻的地位，而且因为我坚信，敌人跑出齐格菲防线，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有利的歼灭他们的机会。”

艾森豪威尔决定，没有必要在南北两侧同时发动进攻。他说：“北侧在德军进攻中首当其冲，我们得采取几天守势；但在南侧，只要我们尽可能早地向北发动进攻，将有助于战局的改变。在19日的凡尔登会上，我的直接目的是安排开始南面的突击。”

为了立即执行这些计划，艾森豪威尔发布了口头命令，但有一个条件，即巴顿在布雷德利指挥下实施进攻，进攻时间不得早于12月22日和迟于23日。还进一步同意巴顿的部队抵达巴斯托尼后，可以大体朝着乌法利兹的总方向继续前进。一俟飞行条件改善，飞机能起飞，就决定给予充分的空中支援。此外，艾森豪威尔在会上还通知大家，他打算一俟北侧的德军进攻兵力消耗殆尽，就立即开始部署这一侧的进攻行动。

对巴顿的安排，是要求他把至少有三个师的进攻军队集中在阿尔隆，并且从那里开始向巴斯托尼推进。总司令警告他不要分散进攻，指示这次进攻必须有条不紊，稳扎稳打。巴顿最初对德军的突击力量似乎没有足够的理解，因此，谈起分配给他的任务来总是很轻松的。这使艾森豪威尔认为有必要向他强调指出，他的这次进攻需要实力和高度计划性。

德军在科耳马尔的据点，对艾森豪威尔他们那天早晨拟定的计划，有一定的影响和牵制作用。如果这个据点不存在，法军就能很容易地守住从瑞士边境往北到萨尔地区的莱茵河防线，这样就能把美国第六集团军腾出来用在那个地点以北的地方，从而为巴顿的进攻提供更多的兵力，但是，科耳马尔据点对于孚日山脉东面莱茵平原上的盟军是一个威胁，因此，把那个地区本来可以节省出来的全部兵力都调走，那是不明智的，也是有危险的。

德弗斯奉命，只要能节省兵力，就放弃他战区里的任何向前的凸出部。一旦遇到攻击，就从北侧慢慢往后撤，甚至完全撤退到孚日山脉也行。北阿萨但平原，对盟军来说，并不迫切需要。那时，艾森豪威尔十分希望德弗斯的战线往后撤，必要的话可以远远撤至孚日山脉的东端。但艾森豪威尔不允许德军再次进入山区，这条界线是德弗斯战线上所必须守住的。这些命令，同时也通知了法军，因为他们也暗示了后撤的可能性。如果后撤幅度大的话，连斯特拉斯堡也可能要暂时放弃。法军司令官后来把这个通知转交巴黎，从而引起了法国军界和政界的极大关心。法军参谋长朱安将军来找艾森豪威尔，要求竭力保卫斯特拉斯堡。这位盟国远征军总司令说，在那时他不能担保这个城市的安全，但同意尽力坚守不放弃。然而在阿登战役的整个过程中，斯特拉斯堡问题使艾森豪威尔伤透了脑筋。

到12月19日夜，在凡尔赛的最高统帅部接到报告说，德军通过凸出部

中央迅速向前推进，先锋部队继续向西北方向迂回。进攻的方向越来越表明德军的计划是在列日西面某处抢渡默兹河，并从那里继续向西北去抢占突破口以北盟军整个部队的主要交通线。北侧明显地处在危险之中，战斗越打越激烈。德军的这次进攻很快获得了一个被称为“凸出部之战”的浑号。因为德军一开始就猛烈突击盟军防守薄弱的战线，取得了迅速进展，结果突入盟军前线最大纵深竟达 50 英里左右。

敌人猛烈的进攻给在战场上的部队造成极大的压力，被攻击部队的士气也受到非常严重的有害影响。艾森豪威尔说：“在实际战斗中正遭受着种种危险的前线士兵，面临敌人压倒优势的兵力，而又无法了解司令官心里的增援措施，就必然要表现出混乱、恐慌和沮丧……说阿登战役的第一个星期，盟军各梯队不紧张、不忧虑，这是没有根据的，也是虚伪的。同样，过分强调这种紧张、忧虑的程度和影响也是不真实的。”

在阿登战役的初期，12 月 22 日，艾森豪威尔发布了一项他在战争时期很少写的“当日命令”，其中写道：“敌人一冲出他们的固定防线，这就能给我们机会，把他们的大冒险变为对他们的毁灭性打击。所以我号召全体盟军战士，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努力奋斗。希望每个人都坚持这个唯一的信念：从地面、从空中、从一切地方消灭敌人！让我们以这个决心和我们为之战斗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团结起来！在上帝的帮助下朝着最大胜利奋勇前进！”

在这个战役中，德国空军企图进行这次战事开始以来规模最大的袭击。

1945 年 1 月 1 日，德国空军发动了几个月来对盟军最猛烈的攻击。它的主要目标是盟军飞机场，特别是“凸出部”附近及其以北的飞机场。在这一整天中，希特勒的空军摧毁了盟军很多飞机，其中大多数是停在机场上的，当然，敌人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就在盟军接连遭受损失的时候，丘吉尔曾于 1945 年 1 月 6 日急电斯大林求援。第二天，斯大林就复电，表示要加紧准备工作，尽早从东线发动进攻。1 月 12 日，苏军从波兰的维斯杜拉河（现名维斯瓦河）发动了强大攻势，重创德军。十天以后，即 1 月 22 日，希特勒急忙把党卫军第六坦克集团军从西线调往东线，这就大大减轻了西方盟军的压力。

圣诞节的前一天，是希特勒在阿登森林赌博的决定性的转折点。这时德军的进攻已成强弩之末，它在狭长的突出阵地两翼所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圣诞节的前两天，天气转晴，英美空军大显身手，大肆轰炸德国供应线和狭窄崎岖的山间公路上的军队和坦克。德军向巴斯托尼作最后一次尝试。德军在圣诞节那天，从早上 3 点钟开始，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对德军来说，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狭长走廊地带撤退，以免被切断和被消灭。但是，希特勒对于任何撤退的建议都听不进去，反而命令继续猛攻巴斯托尼，重新向纓斯河推进。

12 月 28 日晚上，希特勒召集了一个大规模的军事会议。他不但不听从伦斯德和曼特菲尔的劝告，及时把德军从突击阵地撤出来，反而命令继续猛攻巴斯托尼，重新向纓斯河进军。此外，他还坚持马上向南方阿尔萨斯发动进攻，那里的美军战线由于巴顿派了几个师北上进攻阿登森林而变得薄弱了。将军们抱怨说，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兵力向阿登森林继续发动进攻，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向阿尔萨斯发动进攻。对于这些话，希特勒充耳不闻。

“先生们，这一行我已经干了 11 年了，而且……我从来没有听人向我报告过一切事情都已准备得完全了的……准备永远不会完全的。这是很明显

的。”希特勒滔滔不绝他说下去。他们的总司令早已看不见现实而置身于云雾之中了。

“问题在于……德国是否有意志继续生存下去和是否遭到摧毁……这场战争失败，德国人民就毁灭了。”希特勒接下去又花了很多时间谈了罗马帝国的历史，谈了七年战争中普鲁士的历史，最后他又回到当前的迫切问题。尽管他承认阿登攻势“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决定性胜利”，但是他声称这一战役已经带来了“整个形势的转变，在半月以前没有人相信这种转变是可能的”。

“敌人不得不放弃所有的进攻计划，”纳粹元首说，“他们不得不把已经精疲力竭的部队拖上战场。他们的作战计划完全被打乱了。他们在国内受到严厉的批评。目前是敌人心理上很不利的时刻。敌人已经不得不承认在8月以前决定战局已没有希望，也许到明年年底也不可能。”

“先生们，”希特勒又补充说，“你们决不能认为我，哪怕是极为遥远地，预计到战争将要失败……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投降’。在我看来，今天的形势并不新鲜。我经历过比这糟糕得多的形势。我提这些只是因为我要你们了解，为什么我要这样狂热地追求我的目标，为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拖垮。虽然焦虑使我苦恼，甚至有损我的健康，但没有东西能够丝毫改变我继续作战直到最后胜利为止的决心。”

最后，希特勒要求他的将军们拿出“全部精力”来支持这次攻势。他说：“那时候我们将彻底打垮美军，我不相信敌人能长期抵抗45个德国师，我们仍将掌握命运！”

然而，时间太晚了！希特勒的大话讲得太多了，德国已缺少能把他的话兑现的兵力！

元旦那天，希特勒以八个师的兵力攻打萨尔地区，并且命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率领一个军团从上莱茵河的桥头堡发动猛攻。

在德国将领们看来，让希姆莱带兵简直是开玩笑。这两起攻势都没有获得进展。从1月3日起，以两个军共九个师的兵力向巴斯托尼所发动的总攻，展开了阿登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但也毫无所获。到1月5日，德军已放弃夺取这一重镇的希望。他们面临着被英美军队反攻切断的危险。这一反攻是1月3日从北面发动的。1月8日，莫德尔所率领的军队开始从豪法里兹撤退。到1月6日为止，恰好是希特勒以他最后的兵力作赌注发动攻势的一个月之后，德军又退回到他们开始攻击的战线。

在阿登战役中，德军死伤和失踪约12万人，损失了1600架飞机、6000辆汽车、600辆坦克和重炮。当然，美军损失也不小，尤其以第一六步兵师为最严重。这个师的阵地是无掩护的，因此它不仅从一开始即进入战斗，而且很多士兵被孤立起来，后来成了俘虏。第二十八师同样受到沉重打击。第七装甲师在英勇的圣维特保卫战中，遭到重大损失。盟军全部伤亡为77000人，其中8000人阵亡，48000人受伤，21000人被俘或失踪，坦克和反坦克炮共损失733辆（门）。

在这一战役中，双方虽然伤亡都很大，但盟军能得到及时的补充，而德军却办不到了。希特勒已经把最后的招数都使出来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最后一次大反扑。它的失败不仅使西线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而且也葬送了东线的德军，因为希特勒将他的最后的后备力量投入阿登战役，这一行动的严重后果马上就显示出来了。

在苏联红军包围布达佩斯之后，古德里安曾在圣诞节前夕和元旦早晨两度向希特勒乞求援兵，以便应付苏军在匈牙利和波兰发动的强大攻势，但是毫无结果。1月9日，古德里安第三次再到希特勒的大本营去求救，他带着东线谍报处长盖伦将军，他们企图用地图和其他图表向“元首”说明，在苏军即将在北方发动的攻势下，德军所面临的十分危险的处境。希特勒听后大发雷霆。他说，这些图表是“完全荒谬”的，并命令要把制图的人关到疯人院去。希特勒硬说，东线战场“从来没有拥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的后备力量”。古德里安反驳道：“东线战场是个空架子，只要突破一点，全线就会崩溃。”事情果然如此。

1945年1月12日，科涅夫率领的集团军从华沙南面维斯杜拉河上游的巴拉诺夫的桥头堡出击，向西里西亚推进。在其北面，朱可夫率领的集团军跨过华沙南面和北面的维斯杜拉河，华沙于1月17日解放。再往北，苏联两个军团占领了半个东普鲁士，并且挺进到但泽湾。这是大战以来，苏军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攻势。仅仅在波兰和东普鲁士两地，就投入了180个师的兵力，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装甲师。它们锐不可挡，势如破竹。

到了1月27日，苏军声势浩大的进攻，很快就使纳粹面临着全军覆灭的危险。那时，东西普鲁士已经被切断。就在这一天，朱可夫统率的大军从卢本跨过奥得河，在两星期内前进了220英里到达德国本土，离柏林只有100英里了。最使希特勒伤脑筋的是，苏军已经占领了西里西亚的工业基地。负责军火生产的斯佩尔说，西里西亚失守以后，德国所能生产的煤只等于1944年生产的1/4，钢只等于1944年的1/6。这就预示出1945年对希特勒来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

纳粹的危机日益加深。到了1945年的2月，由于鲁尔区大部分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上西里西亚也已经失守，煤的产量降到1944年的1/5；而且由于英美轰炸使得铁路和航运瘫痪，这些煤很少能运出去。元首办公会议上主要是缺煤问题。邓尼茨抱怨说，因为没有燃料，他的舰只有很多无法开动。斯佩尔耐心地解释说，由于同样的原因，发电厂和军火工厂也陷于停顿状态。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油田的丧失，加上德国人造汽油工厂遭到轰炸，使得汽油非常缺乏，以致迫切需要投入战斗的战斗机大部分不能起飞，被盟军的空军炸毁在机场场上。由于坦克缺乏汽油，很多装甲师不能出动。

希特勒和戈林曾经想依靠新的喷气飞机把盟军的空军赶跑。

因为德国人已经制造了1000多架这种飞机。盟军的老式战斗机是无法同德国喷气飞机在空中较量的，但是，这种喷气机极少能够起飞，制造喷气飞机使用的特殊汽油的煤油厂已经被炸毁了。为了使喷气飞机能够起飞而建造的加长跑道，很容易被盟军驾驶员所发现，他们被迫把停在机场上的喷气飞机炸毁。

在此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所统率的欧洲远征大军，于2月8日开始向莱茵河进逼。正是：阿登战役惨败，德国大门洞开。欲知详情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二章 向德国本土进军

本上进军敌寇惊，东西两线竞立功；
无可奈何花落去，“千秋帝国”敲丧钟。

阿登战役结束之后，德国在西线的兵力形式上还有 66 个师，但其中很多部队的武器装备很差，有 24 个师甚至连反坦克炮都没有。艾森豪威尔统率的欧洲远征军，面临的任务是向德国本土进军，准备夺取莱茵河。

1945 年 1 月底和 2 月初，南方集团军群先在阿尔萨斯清除了莱茵河西岸的科耳马尔“口袋”，迫使德军退守河东的齐格菲防线。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战略部署，从北到南，各个集团军都要消除莱茵河西岸的残敌，扫清障碍，以利大军渡河。

“莱茵河是一个可怕的军事障碍，其北端尤其如此。”艾森豪威尔对参加这一战役的指挥员们说，“这条河不仅河身很宽，而且水势难测，甚至水位和流速也变化无常，因为敌人能打开沿这条大河东面的那些支流的闸门。我们组织起专门的侦察队和警戒队，监视这种威胁。由于莱茵河这个障碍的性质，这次渡河，除了部队不是从船上向岸上攻击，而是从岸上向岸上攻击外，很像一次对滩头的突击。”

参加这次突击的部队，有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和布雷德利的第十二集团军群。战役一开始蒙哥马利元帅和巴顿将军，这两位杰出的军事艺术表演家就暗自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友谊进军竞赛。巴顿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用这场竞争中表现出来的高度的进取精神来激励他的各级指挥官。这场竞争还从战场的形势发展中增添了新的动力。向德军薄弱之处发起攻击的巴顿，能够大踏步地前进。

2 月 8 日，也就是巴顿的第七军在其作战区域内发起进攻的两天之后，“名副其实的战役以排山倒海之势”开始了。先是在西线战场上发起了自战争爆发以来最为集中猛烈的一番炮火轰击。艾森豪威尔的莱茵兰作战计划就这样开始了。这个作战计划的第一个目标，是让蒙哥马利的部队“突破帝国森林，插入下莱茵起伏不平的丘陵地带”，使战场形势来一个决定性的转机。

蒙哥马利的部队很快就攻到了克勒弗，但是到达那里后，部队就停止了下來。第三十军军长霍罗克斯将军误认为巴伯少将指挥的苏格兰第十五师已经到达克勒弗城郊，便命令托马斯少将的第四十三师开始攻城，结果伤亡惨重。这两个师被纠缠在这场战斗中，脱不了身。一直到 2 月 11 日，克勒弗的守敌才被肃清。2 月 13 日帝国森林的守敌也被清除。德军在战斗中调了相当多的预备部队，不仅挫败了盟军意欲实现突进的希望，甚至还堵住了刚刚被打开的突破口。

与此同时，巴顿的部队势不可挡地滚滚向前。德军根本无法阻止巴顿所向披靡的部队越过艾弗尔河向科布伦茨以北的莱茵河推进。被裹在美军第三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之间的 11 个师的德军部队，除了一小部分设法逃过莱茵河之外，其余的全部被歼灭。艾弗尔战役已接近尾声，另一次战役的轮廓已逐渐显露出来。

这就是后来的攻克科布伦茨的法尔茨战役。军事评论家威尔莫特写道：“巴顿横扫法尔茨地区的战役的打法，类似他在法国西部丛林地带南边采取的迂回战术。”但是，为了打一次漂亮的胜仗，他不得不再施计谋。按规定，他的每一次战役都得经上级的批准方能进行。然而，这些战役的每一次全胜

或成功都是靠巴顿抓住某些有利时机，施展一些花招，才获得上级的允许的。尤其是在法尔茨战役中，更需要使用欺骗手段。这样做不是为了迷惑德军，而是为了对付巴顿自己的上司。

第三集团军作战区的战况瞬息万变，但对美军十分有利。巴顿的第八军已推进到莱茵河畔，并已开始清剿德军。在第二十军的作战区域，第十装甲师逼近了萨尔姆河，清除了一些村镇的敌军，然后向北开至多尔巴赫地区，并在那里架起一座桥梁，建立了一个桥头堡阵地。意义最大的可能要算在第二十军区域，第四装甲师完成了为攻打特里尔以便夺取摩泽尔河上的一座桥梁而进行的部队集结和部署工作。

在巴顿出发去盟军总部开会之前，他的参谋人员已最后修订完了向法尔茨推进的作战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若要包围科布伦茨，为这次战役创造所需的先决条件，就必须投入第八十师的部队。但是，这个师却被留在盟军最高司令部的总预备队里，第三集团军不能调用。

3月9日晚10时，当巴顿仍在列日时，他指示第十二军的埃迪将军打电话告诉盖伊将军：“查尔斯·里德上校指挥的第二快速机械化部队，夺取了摩泽尔河上一座完好无损的桥梁。”埃迪问盖伊如何行动。盖伊当机立断，命令埃迪继续扩大这一战果，建立一个牢固的桥头堡阵地。然后，他打电话给在列日的巴顿，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并建议巴顿去争取上级授权发起计划好的法尔茨战役。巴顿立即与布雷德利和艾森豪威尔开会讨论，向他们介绍了情况。他们两人都同意继续扩大战果。接着，巴顿又提出要第八十师，艾森豪威尔很爽快地同意了他的要求。法尔茨战役就这样开始了。

巴顿一回到指挥部就指示哈蒙德，在没有得到他的进一步的指示之前，中断与“上级领导”的通讯联络。然后命令埃迪尽可能多地架设些桥梁，继续进攻。就在第三集团军司令部装聋作哑的这个期间，埃迪在摩泽尔河上架起了三座桥梁。这三座桥梁都是插进法尔茨地区所必备的条件。

就在这个时候，被围在科赫姆以西的德军九个师的残余部队撤退到摩泽尔河以南，并于3月12日在洪斯吕克山一带慌忙筑起一道防线，以图保护战斗力日益削弱的巴尔克将军C集团军的北翼。但是，巴顿的部队已成为守卫西壁防线的敌军的主要威胁。德军的担忧完全是合理的。向莱茵河推进的第三集团军，已经暴露在敌军的有翼，并且创造了自去年8月在法国境内战斗以来的第一个好机会，对敌人再打一毁灭性的运动战。加菲将军的第四装甲师在科布伦茨南面渡过摩泽尔河，打破了德军的后方阵地，紧随在盾的是埃迪将军第十二军的步兵部队。没过多久，沃克将军的第二十军的装甲部队突破了西壁防线，并向莱茵河进攻。他的部队和第十二军的部队会师后，围住了洪斯吕克山区的十个师的残敌。与此同时，帕奇的第七集团军攻破了西壁防线后，正向北继续进攻。

德军此时已乱成一团，他们企图在美因茨和曼海姆西面建立起一道防线，但未能挡住第三集团军装甲部队的冲击。第四装甲师深入地插进法尔茨地区，进入了第七集团军的作战区域。在莱茵河畔，除了一个渡口之外，敌军其他所有可能逃跑的渡口均被第四装甲师切断。第十和第十二两个装甲师把敌军向东赶往莱茵河，敌军的撤退很快就变成了溃逃。敌军朝着莱茵河上唯一尚存的渡口施佩耶尔竞相逃窜。

德军的部队被从三面冲击而来的巴顿的装甲部队切割成无数个小块，又遭到韦兰将军的第十九战术空军部队战斗轰炸机的无情轰炸，加之美军步兵

毫不放松的追击，德军两个集团军的大部被歼，八万多人被俘。3月18日，第三集团军的其他部队攻克了科布伦茨。三天之后，第三集团军作战区域的德军除被歼的外，全部被赶过莱茵河，法尔茨战役到此胜利结束。

现在巴顿又恢复了与蒙哥马利的直接竞赛。这次竞争的目标是蒙哥马利称之为“西欧最大河流障碍——莱茵河”自3月12日以来，蒙哥马利指挥三十五个师的庞大军队，正为强渡莱茵河加紧工作。就其准备的规模和喧嚣程度来说，被称为“劫掠”的渡河战役似乎仅次于“霸王”战役，蔚为壮观的渡河战斗，事先就被吹嘘为蒙哥马利在这次世界大战中首屈一指的战绩，它甚至比阿拉曼之役还要伟大。蒙哥马利元帅摩拳擦掌，准备在这次行动中与“希特勒尚存的西部集团军之精华”较量一番。他集中邓普西将军的英国第二集团军，克里勒将军的加拿大第一集团军和辛普森将军的美军第九集团军，准备了约25万吨物资，其中包括大量水陆两用车、攻击舟和架桥材料。丘吉尔曾生动地描述过这次规模庞大的准备工作。这次行动激发了他那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想象力，他像凯撒当年要过鲁比肯河那样盼望着这一行动早日开始。他写道：“我们将投入所有的力量。百万大军前面八万人的先头部队将猛扑过去。大量的船只和浮桥都已准备就绪。在河的对岸，是据守在战壕里并配备有各种现代化火器的德军。”

英国丘吉尔首相、英国总参谋长布鲁克元帅和盟军远征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都曾亲自来到莱茵河畔，从位于起伏不平的河岸的一座小山丘上观看了这一极为壮观的渡河场面。丘吉尔从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点给斯大林元帅发去一份热情洋溢的电报说，“我和蒙哥马利元帅一起，在他的司令部。他刚刚下令从以韦塞尔为中心点的广阔的战线上发动强度莱茵河的主攻。这次战斗将得到3000门大炮和一个空陆军的支援。预计部队将于今晚和明天渡过河去，并在对岸建立起桥头堡阵地。一旦强渡成功，一支格外强大的装甲预备队将乘胜追击。”这份电报中还没有提及空军中将科宁汉指挥的数百架重型轰炸机和3000架战斗机正随时待命支援这次代号为“动掠”的战役。

然而，一次意外的收获几乎使“劫掠”战役成为多余的举动。3月7日，沿着艾弗尔北边推进的美军第一集团军第九装甲师的部队，发现雷马根的鲁登夫铁路桥仍然完好无损地横跨在莱茵河上。雷奇斯将军亲自打电话给布雷德利将军，把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告诉了他，布雷德利听后在电话里大声叫道：“好极了，考特尼。有了它，我们就可以把德国大门一脚踢开！”

布雷德利马上认识到夺取雷马根桥后的战机，便对作战部长布尔说：“大显身手的时机米到了。”但是，布尔反驳说：“你不能攻打雷马根，因为这与作战计划不符。”然而，布雷德利仍请求上级下这个决心。艾森豪威尔对他说，“冲过桥去用多大兵力都不要紧，但是务必要坚守桥头堡阵地。”可是还不到24小时，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就对这位最高司令官的慷慨指示作出了修正。第二天上午，布雷德利接到命令说：“在雷马根不能投入超过四个师的兵力。”这显然是为了照顾“原定作战计划”而作出的干预行动。

当巴顿的部队推进到莱茵河时，战场的形势就是这样。3月21日，巴顿的第十二军正沿着莱茵河迅速挺进，第二快速机械化部队牢牢地扼守在弗赖魏因海姆和美因茨之间的地区，第九十师正向美因茨靠拢，肃清了在莱茵河西岸作战区域内大部分敌军，而第五师也正在其他战区域清剿残敌，第四装甲师正沿着莱茵河西岸向北挺进。与此同时，第十一装甲师再一次向荣茵河

推进，该师的部分部队已进入沃尔姆斯。到了第二天，3月22日，第三集团军作战区域内莱茵河上所有德军的退路都已被切断。当天共俘获德军11000名。这表明德军士气瓦解，濒于崩溃。巴顿还得知，第十装甲师的部队已和第七集团军的部队接上了头，完成了对德军的包围圈。战争形势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还在等什么？”巴顿在没有空中支援，没有地面炮火准备，没有在敌军防线后方空投空降部队，甚至没有真正得到上级授权进攻的情况下，发出了开始攻渡莱茵河的信号。巴顿命令一下，当晚11时，整编第五师即以两个营的兵力开始渡河，渡河几乎没有碰到什么困难。拂晓时共有六个营渡过了河，而伤亡人数只有34人。随后又把一个师的兵力运过河去，从而建立了美军第二个桥头堡阵地。

“什么莱茵河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呀”，“什么东岸部署的是德军的精锐部队啦”，完全被巴顿的神速行动所戳穿了。蒙哥马利为渡河所作的规模巨大的准备工作，现已暴露了他当初未能估计到德军已经濒于崩溃。这次连布赖恩特也为巴顿的行动拍案叫绝。他写道：“当英军总司令还在为3月24日的渡河作准备工作时，巴顿就开始了一场新的攻势。这位第三集团军司令在圣诞节之日挥师北上，堵住了德军在阿登的突破口，尔后在3月初穿过艾弗尔，挺进到科布伦茨，为阿登之役雪了恨。现在他又挥师转向东南，两度指挥装甲部队渡过摩泽尔河……一周内，包围了齐格菲防线守军，此外还圈住了数万名士气低落消沉的德军，清扫了莱茵河西岸的残敌，接着，这位伟大的将领又一次——此次也是正确地——抢在蒙哥马利前行动，胜利地渡过了莱茵河。”

起初，巴顿对于这次渡河一声不吭，直到3月23日，他才打电话对集团军群司令说：“布雷德利，我已经渡过了河，但先不要声张。”

“什么？你说什么？”布雷德利叫着，“你是说渡过了莱茵河？”

“正是，”巴顿说，“昨天夜间，我让一个师悄悄地渡过河。对岸德军部队少得很，他们现在还不知道呢。所以先不要声张，先保守秘密，然后再看看情况会如何发展。”

天黑以后，巴顿又给布雷德利打电话。这次他就不像早上那样压低声音，这次他大声要求，快向全世界宣布，他们已经渡过了河。他说：“我要让全世界知道，第三集团军在蒙哥马利未渡河之前就渡了过去！”

“据说还发生了一件与这次渡河有关的、十分有趣的事情，”巴顿后来写道，“第二十一集团军群定于3月24日渡过莱茵河。为了迎接这一惊天动地的战斗，丘吉尔先生写了一篇演讲稿，祝贺蒙哥马利元帅发动现代史上第一次攻渡莱茵河的战斗。这篇演讲稿事先录制了下来，由于英国广播公司方面出了个差错，被播放了出去，尽管第三集团军过河已有36个小时了。结果闹出了大笑话。”

就是在蒙哥马利“劫掠”战役发起之日，巴顿在埃迪、科曼和斯蒂勒等将军的陪同下，以胜利者的姿态过了莱茵河。当他的车开到浮桥中间，他停了下来，朝河里吐了一口唾沫——有人说他就是这样来庆祝这一事件的。

为了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巴顿在五天内，在莱茵河对岸建起了两座桥头堡阵地，尔后又建起了两个。第八军的部队在科布伦茨南面发起了第二次强渡。巴顿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穿过美因茨—法兰克福—达姆施塔特三角地带，并于3月25日夺取哈瑙和阿沙芬堡附近的美因河桥头堡阵地。德军进行疯狂的反扑，企图把美军遏制在美因河桥头堡阵地，可是未能堵庄这个

突破口。到了3月28日这天，第四装甲师向北推进了30英里，与第一集团军的部队会师，并且在威斯巴登—宾根地区围歼了数千名德军。

巴顿向卡塞尔和富尔达疾驶猛进，不使德军有任何守卫防御阵地的机会。巴顿的装甲部队沿着韦拉河的两岸迅速向爱森纳赫挺进，然后越过富尔达河，又向前推进了20英里，从而彻底粉碎了德军想在埃德河、富尔达河和韦拉河一线站住脚跟的幻想。4月10日，第三集团军已开始向穆尔德河进军，它的装甲部队又以脱缰的野马之势，把埃尔富特、魏玛、那拿和格拉甩到后面，一直推进到克姆尼茨近郊才停住脚，五天共推进了80英里。4月14日，巴顿应邀去参加在美因茨的莱茵桥通车典礼。在剪彩时，他以轻蔑的态度拒绝使用递给他的一把大剪刀。“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裁缝师傅吗？”他咕咕哝哝地说，“他妈的，给我拿把刺刀来！”

且说盟军百万雄师渡过莱茵河后，即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迅速从南北两面包围德国主要工业区鲁尔以及退守那里的B集团军群。在对鲁尔的包围圈即将完成时，蒙哥马利于3月27日向部下发出一道命令，同时报告了艾森豪威尔和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这道命令的要点是，英国第一集团军和美国第九集团军（从阿登战役以来归他指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 and 干劲向易北河猛进，直指从汉堡到马格德堡一线。他特别强调需要“突然出击”，以快速装甲部队为先导，沿途占领飞机场，以备随后用来进行密切的空中支援。

然而，第二天，即3月28日，当蒙哥马利的部队已经开始准备出发时，发生了一件“爆炸性的事件”。艾森豪威尔不仅完全改变了计划，而且直接通知了斯大林，以便他的作战行动同苏军的作战计划协调起来。他给蒙哥马利的信息只是赞成计划中的这一点，即同意蒙哥马利在鲁尔东面同布雷德利会师。然后，不仅美国第九集团军不让蒙哥马利指挥，而且还清楚表明，盟军的主要突击方向不是柏林，而是莱比锡和德累斯顿。

艾森豪威尔通知蒙哥马利说：“一旦你和布雷德利在卡塞尔—帕德博恩地区会师，第九集团军将立即转归布雷德利指挥。那时，他将负责占领鲁尔和肃清敌军，并尽量少耽误时间，然后他的主要突击方向将沿着埃尔富特—莱比锡—德累斯顿轴心前进，并同俄国人会师。”

当蒙哥马利向艾森豪威尔呼吁，在到达易北河之前，既不要改变计划，也不要变动指挥安排时，艾森豪威尔更全面地说明了他的意图：“我的计划很简单，其目的在于分割和消灭敌军，并同俄国军队会师，只要斯大林能给我情报，卡塞尔—莱比锡轴心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最直接的进军线。”

丘吉尔和英国军界人士对此极为恼火，纷纷指责艾森豪威尔越权与斯大林直接联系，但美国军政要人马歇尔等则支持艾森豪威尔的行动，认为在纯军事问题上盟军最高统帅有权直接与苏军最高统帅取得联系。英国人的指责实质上不在于艾森豪威尔同斯大林进行了直接联系，而在他改变了计划，不让蒙哥马利担任主要突击力量去攻占柏林。

艾森豪威尔为什么要改变目标、放弃了占领柏林的计划呢？事实很明显，由于希特勒在阿登的反击，盟军耽误了六星期的时间。结果，当蒙哥马利的北方集团军群在莱茵河畔准备东进时，他离柏林还有480公里；而这时苏军已在奥得河边，距柏林只有60公里左右，并且早已准备攻打柏林了，所以艾森豪威尔作为一个军人已经预见到，争夺柏林的比赛已经输掉了。

而且，就德国来说，希特勒还在柏林，困兽犹斗。在这种情况下，要强

攻德国首都，就要付出重大的伤亡代价。布雷德利将军回忆说：“假设即使我们能在朱可夫强渡奥得河之前到达易北河，那么易北河离柏林反正还有 80 公里的低地带。在柏林西部一带地区，湖泊棋布，河网纵横。艾森豪威尔问我，据我看，从易北河冲到柏林，我们要付出多大代价？对这个问题，我说，我估计我们大约要损失十万人。”并且，在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大国已经划定了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柏林是在苏联占领区内。即使美军付出这么大代价占领了柏林，布雷德利说：“我们还要退出来，并把地方让给人家。”所以美国高级将领不愿为了政治上的威望而付出这样重大的牺牲。

还有，在 1945 年的最初几个月里，美国情报部门获悉，希特勒在德奥边境的萨尔斯堡一带山区，以伯希特斯加登为中心，建立了“民族堡垒”，储备了大量的弹药物资，甚至修建了飞机制造厂，准备纠集纳粹狂热分子，负隅顽抗。布雷德利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在当时，传奇式的堡垒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现实的和非常严重的威胁，我们不能轻视它。它一直严重地影响到我们在战争最后几星期里的战术思想。”艾森豪威尔在《远征欧洲》一书中对此问题也这样写道：“如果让德国建立了‘民族堡垒’，它就可能迫使我们陷入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或者是陷入代价很大的围攻战……十分清楚，纳粹打算作这种尝试，而我决不能给他们实现这种尝试的机会。”

由于上述原因，所以艾森豪威尔决定不同苏联争夺柏林，而是尽量利用美国军队去占领德国，肃清纳粹顽抗势力。

然而，丘吉尔对此极为不满，在他的心目中，“柏林是头等重要的政治目标”。这位资产阶级政治家懂得，欧洲是大国争霸的重点，并且他已经看到，未来争夺欧洲的斗争将在苏联同英美等西方国家之间进行。因此，对西方来说，对抗的起点越靠欧洲东部越好。由于这些原因，丘吉尔强调柏林是“英美军队主要的和真正的目标”。早在 3 月 11 日他就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所以我宁愿十分坚持我们渡过莱茵河所确定的计划，就是美国第九集团军应该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群一同向易北河前进并越过柏林。”当丘吉尔得知盟国最高统帅已改变计划，不让蒙哥马利去攻打柏林时，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赶快于 4 月 1 日打电报给罗斯福，反复重申自己的主张：“我认为从政治立场出发，我们在德国应当尽可能地向东推进，如果能拿下柏林的话，我们就应当占领柏林。”

然而，罗斯福这时生命垂危（他于 4 月 12 日逝世），军事大权掌握在马歇尔手中，而这位总参谋长是完全支持艾森豪威尔的。因此丘吉尔始终未能改变这位盟军总司令的决断。

不过，艾森豪威尔对英国人的批评、抗议是十分反感的。他在《远征欧洲》一书写道：“根据 1 月份所作的、并经联合参谋长会议同意的安排，我认为将这项计划通知斯大林大元帅完全是我职权范围内的事。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丘吉尔首相激烈反对我的这个行动。他不同意这项计划，并坚持认为，由于目前战役已接近尾声，部队的调遣已具有政治意义，这就要求在发展广泛的作战计划方面应有政治领袖的过问。他显然认为，我与斯大林大元帅的通信，已经越出了我只在单纯军事问题上与莫斯科联系的职权。他非常失望和不安，因为我的这项计划没有用能从美国部队中抽出来的所有兵力首先支持蒙哥马利向前挺进，以便不顾一切地试图在俄国人之前去占领柏林。丘吉尔先生把他的意见送给了华盛顿。

“当然，首相知道，不管盟军往东能推进到什么程度，他和总统早已同

意英国和美国的占领区在东面将限于柏林以西 200 英里的一条界线。他所以极力坚持用我们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来保证西方盟军先于俄军到达柏林，一定是基于这种想法：这个成就今后将会为西方盟国造成巨大的威望和影响。

“我无法知道他的真正理由，但这个抗议立即开始了一系列的电报往来……”

不过，为了给丘吉尔保留点面子，艾森豪威尔也没有完全关死大门。六天之后，即 4 月 7 日，艾森豪威尔在给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中说：“我非常同意进行战争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如果联合参谋长委员会认为，盟军尽力占领柏林的意图超出本战场的军事考虑，我将欣然再调整我的计划。”然而，事实上，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并没有指示艾森豪威尔去占领柏林，艾森豪威尔也没有再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

这场风波过去之后，艾森豪威尔继续指挥百万雄师，按既定计划向德国内地进军。当时西线德军还有三个集团军群的编制，号称 60 个师，但实际兵力还不到半数。而艾森豪威尔指挥的欧洲远征军已增加到 93 个师，458 万人；空军早已取得了制空权，拥有飞机 17000 多架。在盟军地面和空中的绝对优势兵力的打击下，德军已成强弩之末，不堪一击，只有少数法西斯党卫队的狂热分子还负隅顽抗，作困兽之斗。

4 月 1 日，美国第一和第九集团军在帕德博恩以西里普施塔特会师，封闭了对鲁尔的包围圈，把德国 B 集团军群的 18 个师紧紧地围困在鲁尔地区。莫德尔两次突围都告失败，最后只好决定顽抗到底，尽量多地牵制盟军。但是，他的末日快到了。4 月 14 日，美军把这个大口袋切成两半；16 日，东半部德军瓦解了；18 日，西半部德军宣布投降。在整个鲁尔战役中，美军俘敌 32.5 万人，莫德尔本人失踪，后来人们说他自杀了。

鲁尔战役还没有结束，美第一和第九集团军来不及打扫战场，就把肃清残敌的任务交给了新近建立的美第十五集团军，他们自己日夜兼程，每天以 50 到 80 公里的速度向东挺进，沿途包围和俘虏已处于瓦解状态的小股德军。美国第九集团军的先头装甲部队于 4 月 11 日抵达易北河边，并于 12 日在马格德堡附近建立一个小小的桥头堡。第二天，另一支美军又建立了一个。德军猛烈反击，并出动了飞机，迫使美军于 14 日放弃了它们。但美军建立的第三个桥头堡却守住了。

德军现在已经遭受一连串重大失败。自从希特勒阿登反扑未遂、在血泊中败退以来，盟军势如破竹的打击，继续使它遭到一系列惨重的损失和失败。如今东西两条战线的大军正在德国本土上作战。德军完全丧失了鲁尔、萨尔和西里西亚。它分散在国内中央地区的残存工业，不可能再支持继续企图作战的军队。交通线遭到严重破坏，纳粹高级司令官再也不能确信他的命令能够下达到他所属的部队。在此情况下，艾森豪威尔作为盟军总司令发表了告德国军民书，敦促德军投降；并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命令，如果敌人不投降，继续顽抗，就坚决歼灭它！

在向德国本土大进军中，巴顿的第三军团仍一马当先，他们继攻克法兰克福后，继续向北挺进，在赫斯费尔德发现了一个深藏在盐矿底层的纳粹宝库。井底有一大堆德国纸币，其中有一些显然是在美军到达以前仓皇撤退时堆在那里的。在一个地道里有大量油画和其他艺术珍品。这些东西有些用纸和粗麻布包着，另一些只不过像捆起的木材那样堆在一起。在另一个地道里，有一个存放价值约 2.5 亿美元的金库，其中大部分是金条。这些金条装在袋

子里，每袋装两条，每一条重 25 磅。此外，还有欧洲各国铸造的大量金市，甚至还有好几百万枚美国金市。

在手提皮箱、衣箱和其他容器里，塞满了显然从欧洲各地的私人住宅里掠夺来的大量金盘、银盘和装饰品。很清楚，为了节省存放的地方，所有这些东西都被铁锤砸平后随便塞进容器的，敌人显然是在等待时机，以便把它们熔化成金条或银条。

在发现这批珍宝那天，巴顿情绪很高，兴致勃勃。全部的黄金都在他的脚下，他感到自己俨然是一个中世纪的征服者。他边引导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参观，也说着诙谐的俏皮话。金库在一个漆黑的矿井里，只有乘摇摇晃晃的破旧升降梯才能进到里面去。当这部古老的电梯靠一根钢缆高速度地下降时，巴顿数着电梯里人的肩章上的星，一本正经他说：“如果这根像晒衣绳似的钢缆折断了，那就会大大加快美国军队里的晋升。”

这批珍宝被丢弃只能清楚他说明希特勒的千秋帝国在它的第十三个年头已经土崩瓦解。秘密金库是在 4 月 6 日发现的。那天，一支军需队的几名士兵，占领了一个德国军团的司令部，俘获了这个军团的司令官哈恩中和他的部下。4 月 7 日，这四十多名战俘被关进了第三集团军的一个战俘营。从此，这座金库连同他的主人们一起作了巴顿将军的俘虏。

就在盟军向德国腹地飞速进军时，4 月 12 日，罗斯福总统在佐治亚州温泉疗养时，突然患脑溢血逝世。消息传出，全军上下十分震惊。那天晚上，巴顿辗转难眠，他在一幕一幕地回忆着他和总统的交往。

那是 1942 年，巴顿到前线参战时，总统亲自向他致以良好的祝愿。之后在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巴顿又以主人的身份招待过罗斯福。他们在整个战争期间，都保持着接触。巴顿偶尔给这位总司令寄一些礼物，罗斯福收到礼物时，总是亲自给巴顿写封亲切而诙谐的回信。

1943 年 7 月 27 日，为了对巴顿攻占巴勒莫的辉煌胜利表示称赞，罗斯福送给巴顿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这使巴顿感到十分意外。作为回礼，巴顿送给总统“一幅一直随身携带、弄得很脏的地图，它经过了西西里的大多数战役，上面标有到目前为止我们占领的各个地方”。

总统收到这份礼物之后，在 8 月 4 日写的一封回信中称巴顿为“亲爱的乔治”。信中写道：“我很高兴收到你 7 月 27 日的来信，你曾随身携带的那幅极有意思的地图，的确是对海德公园图书馆的一份贡献。

1918 年，从马恩到韦斯勒的进军中，我同德古特将军在一起待了两天，他送给我几幅原本野战地图，你的这幅地图将要同这几幅地图放在一起。你在这次进军中工作十分出色。帕·沃森、威尔逊·布朗和哈里·霍普金斯向我建议，战后我应当封你为埃特纳火山侯爵。但是，小心不要跌进火山口里去！”

巴顿在 10 月 7 日的回信中，用同样的语气写道：“请接受我对您 8 月 4 日盛情来信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我深知您十分繁忙，因“而承蒙您给我写信，使我对您更加感激不尽。谈到埃特纳火山，我想我还是躲开那个地方为好，因为，报纸上说我讲了那么多可怕的事情，如果这些事情属实的话，那么魔鬼肯定会从山里跳出来把我抓住。但是我相信，历史上确实有一个‘不在其位’的侯爵的先例，因为您还记得，意大利人曾封纳尔逊勋爵为埃特纳火山西麓的布朗蒂侯爵。而众所周知，不管是纳尔逊还是汉密尔顿夫人都从未到过那个地方，多么遗憾呀！”

史汀生陆军部长和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恰如其分地向罗斯福总统介绍了巴顿的品德和他的必不可少的作用。所以在巴顿再次面临危机，甚至当白宫中的一些顾问认为巴顿是一个严重的政治累赘而要总统甩掉巴顿时，总统都是坚定地支持巴顿的。在 1944 年 8 月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罗斯福同弗朗西斯·斯佩尔曼大主教给巴顿写了一封非常友好的信，巴顿在 10 月份给总统写了回信，并随信送上一艘船的模型作为礼物。这个模型是第三机械化突击队的詹姆斯·波尔克上校在布列塔尼“缴获”的。巴顿对于迟迟没有给总统回信表示了歉意，他用一种肯定会使罗斯福高兴的借口作了解释：“我之所以没有及时回信，是因为我在执行您的计划，一直在非常紧张地同德国人打仗。”

有人曾数次挑拨他反对罗斯福，至少有一次露骨的企图要把巴顿抬出来作为战后美国保守党运动的领导人，用运动倡议者的话来说，这个运动是为了把国家从罗斯福的“新政”中拯救出来。但是巴顿将军以自己的耿耿忠心报答了总统对他的好意。

现在，罗斯福逝世了。巴顿将军和他的战士们，决心以对敌斗争的实际行动来悼念罗斯福总统。就在罗斯福逝世的那一天，辛普森将军的第九军的先头装甲部队向易北河推进了 57 英里，到达马格德堡附近，并在河上建立了桥头阵地。再向北，他的第五装甲师各部队到达了唐格明德，离柏林只有 53 英里。从加拿大军队刚刚发起主攻的阿纳姆，到德国的心脏耶拿，盟军的士兵正在猛攻希特勒摇摇欲坠的“欧洲堡垒”的内部巢穴。那拿是拿破仑在 1806 年同普鲁士人作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地方。但是，现在图林根这座萨勒河畔古老的城市，只不过是第三集团军向东进攻作短暂逗留的地方。

在东线，苏联红军在这场战争里最强大的攻势中，动用了 180 个师的兵力，从冰天雪地的波兰南部平原，推进到了奥得河边，并且正在猛烈地轰击着柏林的外围防线。希特勒所建造的这座纳粹大厦就要倒塌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三章 纳粹德国投降

攻克柏林敌投降，欧洲人民庆解放；
纳粹战犯要审判，历史教训切勿忘。

1945年春天，第三帝国的末日很快来到了。在苏联红军和西线艾森豪威尔部队的猛烈打击下，纳粹军队节节败退，希特勒所曾鼓吹的“千秋帝国”眼看就要翻船了。

早在1月27日下午，朱可夫的部队已渡过奥得河，离柏林只有100英里。希特勒大本营发生了一件饶有趣味的事。这时大本营已迁至柏林总理府，此后，大本营没有再迁移。

25日那天，急得团团转的古德里安去见里宾特洛甫，要他设法同西方马上接洽停战，以便使剩下的德国军队能集中起来对付东线苏军。这位外交部长马上到“元首”眼前告密，于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把古德里安大骂了一顿，并且指控他犯了“叛国罪”。

但是，在两个晚上以后，东线的灾难性的打击使得希特勒、戈林和约德尔反而认为没有必要向西方要求停战了。他们深信西方盟军由于害怕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会自动找上门来。1月27日“元首会议”记录的片断还保存了这场戏的一部分。

希特勒：你们认为英国人对俄国的这一切进展会感到高兴吗？

戈林：他们当然不希望我们会挡住他们，而让俄国人占领整个德国……他们当初并不希望我们会像疯子一样地抵挡他们，而让俄国人节节进逼，现在差不多占领了整个德国……

约德尔：他们一向对俄国人怀有戒心。

戈林：如果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几天之内我们就会从英国人那里收到电报……

第三帝国的头目们就这样把他们的最后希望系在一根游丝上，结果他们的幻想又完全破灭了。

从2月底开始，艾森豪威尔所统率的百万大军就向莱茵河进逼，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就牢牢地控制了摩泽河以北的莱茵河左岸。德军死伤和被俘的又有35万人，其中被俘的占29.3万人，大部分武器和装备均已损失。希特勒对此又大发雷霆。3月10日，他最后一次再把伦斯德革职，换上来的是在意大利长期苦战坚守的凯塞林元帅。但是战局的发展，和希特勒所希望的完全背道而驰。

3月7日午后，美军第九装甲师到达雷马根。几天以后，3月22日晚上，巴顿的第三军团在美国第七军团和法国第五军团的配合下，打了一个漂亮仗，拿下萨尔—巴拉丁那特三角地带以后，又在美因茨以南的奥本海姆渡过莱茵河。3月25日，英美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莱茵河西岸，并在两处地方渡河建立了坚强的桥头堡。在六周之内希特勒在西线的兵力损失1/3，并且损失了差不多可以装备50万人的武器。

与此同时，苏联红军所向披靡，与柏林的距离愈来愈近了。据古德里安后来在纽伦堡军事法庭交代，在形势日益危机的情况下，他与纳粹元首又在俄国战场形势问题上大吵了两个钟头。

“他站在我面前，举起拳头，脸上气得通红，全身发抖。”古德里安说，“狂怒使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完全丧失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在每一次发作之

后，他就在地毯上走来走去，然后猛地在我面前停下来，重新指着鼻子骂我。他几乎是放开嗓子嘶叫，两只眼睛鼓得要脱出来，额头的青筋也暴了起来。”

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这位德国元首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重大决定之一。3月19日，他下了一道总命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完整地落入敌人之手。这些措施要在纳粹地方领袖和“民防委员们”的协助下由军事人员执行。命令最后说：“一切指示与本命令相抵触者均属无效。”这就是说，德国要变成一片荒漠不毛之地，可以使德国人民在战败后维持生存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保留下来。

纳粹政府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从以前和希特勒的谈话中已经预料到他会发出这种野蛮的指示，因此在3月15日曾写了一个备忘录交与“元首”。备忘录写道：“四至八个星期内，德国经济将要最后崩溃，这是可以料定的。经济崩溃之后，战争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即使在军事上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尽力保持一个基础，哪怕是一种最原始的状态的基础，使这个民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我们没有权利在战争的现阶段进行一种可以影响这个民族的生存的破坏行动。如果我们的敌人要摧毁这个曾经无比英勇地作过战的民族，那么，这个历史的耻辱应完全由他们承担。我们有责任使这个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得到复兴。”

但是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的希特勒，对于他曾经表示过无限热爱的德国民族的继续生存是毫无兴趣的。他对斯佩尔说：“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考虑这个民族维持一个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基础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俄国）。而且，在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不过都是劣等货，因为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因此第二天，这位最高统帅公布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焦土”政策的指示。元首办公厅主任马丁·鲍曼在3月23日也发了一道同样野蛮的命令，这位胆小如鼠的人物，现在在希特勒宫廷中的地位超过任何其他纳粹暴吏。斯佩尔在纽伦堡法庭上叙述道：“鲍曼的命令旨在把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国工人和战俘在内，移至德国中部。数以百万计的人必须徒步旅行。对他们的生存，没有准备任何条件，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准备。这势必要造成不可想象的饥荒。”

人们普遍认为，假如希特勒和鲍曼的命令都付诸执行的话，数以百万计的尚未在战争中死去的德国人也要死去。斯佩尔在纽伦堡法庭上总括各种“焦土”命令说，必须摧毁的有：“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自来水厂、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的桥梁、铁路和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德国人民所以能够幸免这最后的灾难，除了因为盟军的进展神速使得这次巨大破坏无法执行之外，还由于斯佩尔和一些军官尽了他们非凡的努力。他们终于直接违抗希特勒的命令，在国内四处奔走，保证重要的交通、工厂和商店不被那些死心塌地服从命令的军官和纳粹党徒们所炸毁。

希特勒虽然还作垂死挣扎，但他的末日眼看就到了，德国法西斯已处在“四面楚歌”之中。

战争进行到1945年3月底、4月初，德国法西斯已处在最终灭亡的前夕，除了东方的日本，德国在世界上已没有任何盟国，彻底被孤立起来。反法西

斯的战火正从东西两面猛烈而迅速地向着德国中心地区燃烧。德国人民的反战厌战情绪日益高涨，法西斯恐怖手段再也镇压不住工人的怠工和军队中的开小差现象。在失败和灭亡的恐惧中，法西斯统治集团内部的尔虞我诈和互相倾轧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德国法西斯政权已摇摇欲坠了。

在军事上，维斯瓦—奥得河战役、匈牙利战役、东普鲁士战役和东波美尼亚战役结束之后，苏军已进抵奥得河—尼斯河一线，并开始积极准备攻克柏林，在西线，艾森豪威尔统率的美、英、加、法军队，于3月中旬先后渡过莱茵河后，4月中旬正向易北河方向猛进，其先头部队于4月12日到达马格德堡，接着又解放了莱比锡和纽伦堡等地区。德军在东西两线大批大批地被歼和被俘，控制的领土急剧地缩小。

德国的部分领土被占领，又失去欧洲的盟国和仆从国，加之反法西斯同盟国对德国工业区和交通线的猛烈轰炸，致使德国的经济全面瘫痪。尤其严重的是德国失去了它的钢铁和煤炭基地鲁尔区和西里西亚，使其战时经济遭到致命的打击。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解放，则断绝了德国石油的主要来源。3月份德国煤的产量下降为1944年平均月产量的26%，钢下降为15%。1至3月份平均每月只生产了333辆坦克。1945年第一季度，德国的空军每月需要12万吨煤油，但每月只能生产1万吨；坦克和汽车每月需要18万吨燃料，而实际的产量仅为4至6万吨。结果德军的相当一部分飞机和坦克无法开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工业的产量下降得越来越厉害。所以，德国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1945年3月中旬在致希特勒的备忘录中心酸地写道：“4至8个星期内，德国经济将最后崩溃，这是可以料定的……经济崩溃以后，战争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希特勒原来打算在4月20日，他56岁生日那天，离开柏林前往上萨尔茨堡，在神话般的已巴罗沙山间堡垒中指挥第三帝国的最后决战。政府各部门大部分都已南迁，汽车上满载着政府文件和拼命要离开这注定要沦陷的柏林的疯狂的官员。十天以前，“元首”也把他的大部分侍从人员送往伯希斯特加登，收拾他的山间别墅伯格霍夫，专候他的到来。

然而命运已经注定他再也看不到他那心爱的阿尔卑斯山上的山间别墅了。他没有想到末日来得这样快。苏军和美军正神速地向前推进，已会师于易北河上。英军已兵临汉堡和不来梅城下，被占领的丹麦有被切断的危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已经沦陷，亚历山大率领的盟军正在向波河流域推进。苏军在4月13日拿下维也纳以后，沿着多瑙河挺进。而美国第三军团也在顺河而下准备和苏军在奥地利的希特勒的家乡林茨会师。在战争期间一直在修建宏伟的大礼堂和体育场以作纳粹党的首府的古老城市纽伦堡已被包围。美国第七军团的一部正绕过纽伦堡向纳粹运动的诞生地慕尼黑挺进。柏林已听到苏军重炮的隆隆声了。

纳粹财政部长冯·克洛西克伯爵，一听到布尔什维克党人要来了，便离开柏林仓皇逃向北方去了。他在4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整整一星期，噩耗不断传来。我国人民似乎正面临着不幸的命运。”

希特勒是在上年11月20日由于苏军的逼近，最后一次离开他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大本营来到柏林的。自从东线战场战事爆发以来，他很少来柏林，如今他就一直待在柏林了。直到他的末日为止，他都在总理府。总理府的大理石的大厅，已被盟军炸成废墟。他就在下面50英尺深的地下避弹室中指挥他的正在崩溃的军队。

这位纳粹元首的健康在急剧恶化。2月间第一次见到他的一个陆军上尉，后来回忆当时他的容貌时说：“他的脑袋微微晃动。他的左臂松弛地垂着，手颤动得很厉害。他的眼里射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闪烁的惨淡的光辉，给人以恐惧的、极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面色和眼圈使人感到他已经精疲力尽。他的一切动作都和衰老的人一样。”

自从1944年7月20日炸弹事件以来，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甚至对党内老伙伴也不例外。“所有的人都欺骗我，”3月里希特勒向一位女秘书这样发火道，“我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难过……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便没有领袖了。我没有接班人。赫斯疯了，戈林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希姆莱不会得到党的赞同，而且他根本不讲艺术……你去想吧，有谁能做我的继承人！”

希特勒的身体虽然已经垮了，而且由于苏联红军打到了柏林和西方盟军占领了德国西部本土，可怕的末日已迫在眉睫；但是，他和他的几个最疯狂的追随者却顽固地盼望着能在最后一分钟出现奇迹，使他们得救。他们之中，戈培尔尤其如此。

四月初的一个夜晚，戈培尔向希特勒朗读其元首喜爱的一本书：卡莱尔所著的《腓德烈大王史》。他所朗读的这一章叙述的是七年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那时这位大王已感到日暮途穷。他对他的大臣们说，如果在2月15日以前他的运气仍不好转，他就要放弃战争，服毒自杀了。这一段历史的确很合时宜，戈培尔无疑是用极其戏剧化的方式朗读的：

“英勇的国王！请您等一等，您那受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您那交好运的太阳就要拨云雾而升起来照耀着您了。2月12日，俄国女皇死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就出现了。”

他们在这本英国人所写的书的鼓励之下，从希姆莱的无奇不有的研究室档案里调了两张预卜吉凶的星象图来研究。一张是在1933年1月30日“元首”就职时为他卜算的；另一张是一位无名星象学家在1918年11月9日魏玛共和国诞生之日为它卜算的。戈培尔把这两个非凡的文件加以重新研究以后所得出来的结论是：“一个惊人的事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两张星象图都预卜战争要在1939年爆发，并且预料到1941年以前的胜利和以后的节节失败，以及1945年初，特别是4月的前半月的最大的打击。4月下半月我们就要获得暂时胜利。然后是停滞状态，一直到8月，才会有和平。在今后三年内德国的处境很困难，但从1948年开始德国就会东山再起。”

用卡莱尔和星象图的“惊人”预言所武装起来的戈培尔，在4月6日对败退中的士兵发出了动听的呼吁：“元首宣称，时来运转就在今年……天才的真正品质在于它能意识到和确知即将到来的转变。元首知道转变到来的确切时刻。命运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人，因此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我们将要亲眼看到奇迹……”

不到一个星期，4月12日的晚上，戈培尔自信的奇迹“确切时刻”已经到来。一位机要秘书前来向他报告：“从外国通讯社报道获悉，罗斯福死了！”戈培尔听到这一消息，如获至宝。“把最好的香槟酒拿来！”他喊道，“给我接元首的电话。”

希特勒在马路对过的地下避弹室里躲避轰炸。戈培尔拿起电话报告说：“我的元首，我向你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里写得清清楚楚，4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转折点到了！”

这一意外的消息，使纳粹头目们欣喜若狂，他们真的认为，从此可时来运转了。

4月15日，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勃劳恩来到柏林与希特勒相会。她做他的情妇已有12年以上。正如特莱佛—罗伯尔所说的，为了她的婚礼和葬礼，她在4月间来到了柏林。

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说：“她是德国最不幸的女人。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候希特勒。”这位“金发美女”住在希特勒阿尔卑斯山别墅的一套房间里，但因为不能忍受长期别离之苦，他们在他们相识后的最初几年曾两度要自杀。但是，她渐渐地习惯于那令人沮丧的既非妻子、也非情妇的暧昧身份，满足于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唯一女伴，尽量享受极为难得的共同在一起的时光。爱娃·勃劳恩头脑简单，在思想上对希特勒可以说毫无影响，但希特勒对她的影响却是“绝对全面”的。

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这一天颇为平静地过去了。纳粹军政头目们在为“元首”祝寿后都作鸟兽散了。在苏联红军强大炮火的猛烈打击下，希特勒和戈培尔之流“时来运转”的美梦彻底破灭了。攻城部队步步逼近，苏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城内。最高统帅听到这样的消息实在受不了。他尖声叫道，每个人都背叛了他。除了背叛、撒谎、腐化和怯懦之外，没有别的。一切都完啦！好吧，他愿意留在柏林。他愿意亲自保卫第三帝国的首都。谁愿意走，就可以走。他愿意在这里以身殉国。

的确，希特勒是逃不出去了；苏军把柏林围得风雨不透，装甲部队已进入市区，而且又牢牢地掌握了制空权。希特勒就是插翅也难飞了。

为了捣毁德国法西斯的老巢，苏联红军早在1944年底就制定了攻占柏林的计划；随着战争的发展，这一计划又进一步修订、完善。

1945年3月底，东波美拉尼战役结束后，苏军立即加紧了柏林战役的准备工作，军队和物资火速地向奥得河东岸集中。为了加速运送物资，甚至把德国东部的部分铁路改成了宽轨（苏联的铁路是宽轨）。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总兵力在250万人以上。他们拥有41600门大炮和迫击炮，625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7500架飞机。战役的目的是粉碎退缩在柏林附近的全部德军，攻占德国法西斯罪魁祸首希特勒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柏林，迫使德国无条件投降。

希特勒知道柏林战役将最终决定德国法西斯及其本人的命运。所以从1945年2月份开始，他便下令强迫当地居民、战俘和被强制到德国服劳役的外国工人，在奥得河一线和柏林周围构筑防御工事。他们在柏林以东建成三道防御阵地：第一道是北起沃林湖东岸，沿奥得河伸延到尼斯河一线。从此往西10至20公里、是第二道防线，其中以泽劳弗高地为主要阵地。再往西10至20公里为第三道防线。此外，环绕柏林城筑成了三层防御圈：最外一层距离市中心半径为24至40公里，沿着当地的湖泊、河川构成。第二层距离市中心12至20公里，主要利用郊区的森林筑成。第三层是沿着柏林的环城铁路修成的。同时，把柏林市区划成9个防御区，分兵防守。当时希特勒搜集到柏林附近的兵力近100万人，在柏林市内还组成近20万人的守备队。他们装备有10400门大炮和迫击炮，15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300多万发火箭炮弹，3300架飞机。

显然，无论从人数或装备上来看，苏军均占优势。希特勒曾指望在奥得河一线粉碎苏军的进攻。假若失败了，则将死守柏林城。他要求德国士兵和

柏林市民“死守柏林直到最后一人”，其目的是把战争拖延下去，等待美英军队到达柏林地区；或则将柏林交给美英军队，或则美英军队与苏军冲突起来，他们便从中渔利，借以保住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然而，这一切只是痴心妄想而已。

4月16日凌晨5时，苏联红军开始发动攻击。经过四昼夜的激战，苏军连续突破了德军的三道防线，逼近了柏林防御圈。在这段时间内，希特勒被迫把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苏军粉碎了九个德国师。4月20日，苏军开始炮击柏林，从4月21日开始，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东面、北面，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从南面和东南面向柏林突击，在郊区展开激战，并冲入市区。

希特勒急令柏林以西的德国第十二集团军向东南移动，妄图与德国第九集团军会合后向苏军反击。但是，4月24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部队在柏林的东南侧会师，从而切断了德国第九集团军和德国第四坦克集团军同柏林的联系，并将这支大约20万人的敌军包围在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古本地区，4月25日，在柏林西侧，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北面南下，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从北面北上，胜利地会师于波茨坦之西，形成了对柏林的包围圈。

此外，美军与苏军于4月25日中午会师于柏林西南的易北河西岸的托尔高。于是整个德国领土和德军的阵地被切成南北两块，而且盘踞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两个集团军群也失去了向柏林地区靠拢的退路，在柏林市内激烈巷战的同时，德国第十二集团军、第九集团军和第四坦克集团军很快被苏军消灭。

柏林是一座战火熊熊、炮声雷鸣的孤城了。决定自己在柏林顽抗到底的希特勒，既无后备也无援军了。英勇的苏军战士，在威力强大的炮群和坦克支援下，在胜利的鼓舞下，在为祖国报仇雪耻的热情的激励下，不顾巨大牺牲，人人奋勇向前。所以市内的巷战进行得相当顺利，至4月29日，战斗已发展到市中心。在攻打柏林的过程中，苏军大约发射了180万发炮弹。为了摧毁敌人的工事和坚固的石头建筑物，苏军使用了每颗炮弹半吨重的大口径要塞炮。然而，尽管拥有威力如此强大的重武器，苏军战士有时还得用炸药把墙壁炸开，穿越前进。苏军经过猛烈的攻击和白刃战，于4月30日下午占领了象征着德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国会大厦。剩下的仅有德国政府所在地——总理府了。

正当苏军猛攻德国国会大厦的时候，恶贯满盈的德国法西斯魁首希特勒于4月30日下午3时许，在总理府的地下室开枪自杀。不可一世、凶残暴戾、杀人如麻、妄图建立欧洲和世界霸权的法西斯元凶，就这样结束了他的生命。与他同时自尽的是他多年的情妇、在4月29日与之举行了婚礼的爱娃·勃劳恩。稍后，戈培尔夫妇毒死了自己的六个孩子，便命令士兵开枪将他俩击毙。这样，德国法西斯集团中仅有三人自愿作了希特勒的殉葬品。

希特勒自杀之前，留下了臭名昭著的遗嘱，其中值得提及的是，他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他的这种做法，显然是费了一番苦心的，德国的陆军将领是多次暗杀希特勒的主谋者，已不可信任了。至于法西斯集团的二号、三号人物戈林和希姆莱，他们于4月20日在风雨飘摇的气氛中为“元首”祝贺了56岁的生日之后，当夜各怀鬼胎，急忙离开了炮火连天的柏林。他二人都认为希特勒的生命即将完蛋。所以，4月23日戈林从上萨尔斯堡拍给希特勒一封电报，探问他现在是否可以接管德国的全部

领导权。希特勒一见电报火冒三丈，立即下令解除戈林的职务，并命令当地的党卫军逮捕了他。与此同时，希姆莱也背着希特勒，暗中与西方联系，表示德国愿意向美英投降，而对苏军将继续抵抗下去。希特勒知道此事之后，同样愤怒万分，所以在自尽之前，也没忘记指令邓尼茨政府逮捕希姆莱，并大骂希姆莱和戈林是叛徒。

希特勒自杀后，他的继承人邓尼茨仍继续玩弄分裂盟国的活动。他渴望在一个反苏联盟中与美国人携手合作。他认为，由于希特勒去世，西方会更乐于把德国看成欧洲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5月1日，邓尼茨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演说中说，德军将继续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战争，以免作战部队和在德国东部的千万个家庭遭至毁灭。但是到了5月2日或3日，邓尼茨意识到艾森豪威尔不会接受只在西线的全面投降。因此，他试图通过使德军向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投降而在东线继续作战，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蒙哥马利正面的德军告诉他，他们不但想让第二十一集团军群正面的德军投降，而且也让在德国东北部面对红军的德军投降。艾森豪威尔命令蒙哥马利拒绝后一建议，并允诺派到兰斯担任苏联驻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联络官苏斯洛巴罗夫将军，如果出现较为全面的投降，他将“和在场的俄国代表一起，安排较正式的投降仪式”。

5月2日清晨，德军的柏林城防司令维德林命令德军停止抵抗之后，德国境内的战火逐渐平息下来。5月7日德国政府代表约德尔由弗雷德堡海军上将和一名副官陪同，来到兰斯西方盟军司令部。约德尔高高的个子，身体笔挺，穿着一身洁净的服装，戴着单片眼镜，看上去像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化身。他生硬地低头鞠躬，在兰斯二所职业技术学校里，向美英苏代表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签字后，艾森豪威尔向盟国联合参谋总部拍发了一封电报。电报说：“盟军的任务在1945年5月7日当地时间2点41分完成。”

但是，斯大林对兰斯的投降仪式不满意。既然苏军是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主力，柏林是苏军攻克的，那么兰斯的投降仪式从地点到方式均有损于苏军的威望。所以苏联政府与美英政府商讨之后决定：兰斯投降仪式只当作投降仪式的预演，正式的仪式将在柏林举行，并将由苏方主持。

5月8日24时，在柏林正式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参加仪式的苏方代表是朱可夫元帅和维辛斯基，仪式由朱可夫主持。盟军最高统帅部的代表是：英国空军上将泰德，美国战略空军司令斯巴兹将军和法军总司令德·塔西尼将军。代表德国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是：陆军元帅凯特尔、海军上将弗雷德堡和空军上将什图姆普弗。投降书的第一条宣布：“我们，这些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的签字者，同意德国一切陆海空军及目前仍在德国控制下的一切部队，向红军最高统帅部，同时向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无条件投降。”并规定，该投降书从1945年5月9日零时开始生效。欧洲战争至此结束。

1945年5月8日午夜，欧洲的炮火和轰炸停止了。自从1939年9月1日以来，在欧洲整个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了解放后的和平欢乐。胜利的礼炮，和平的烟火，映红了柏林城，照亮了整个欧洲大地。欲知欧战结束后，艾森豪威尔的情况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四章 胜利以后

艾克将军大名扬，贺电祝捷赞歌唱；
热火朝天庆胜利，演说访问走四方。

纳粹德国投降后，艾森豪威尔作为统率数百万大军的盟国远征军总司令，成为战争中最著名、最成功的将军。那时罗斯福已离开人世，因此艾森豪威尔仅次于斯大林、丘吉尔之后，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在邓尼茨政府投降签字后的当天，美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将军，就以国家、盟邦以及美国军队的名义，给艾森豪威尔发来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电报说：“你以战争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完成了你的任务。你出色地指挥了从来没有这样集结起来的最强大的部队。你遇到并成功地解决了涉及各种不同的国家利益的一切可以想象到的困难；处理了国际政治问题中前所未有的复杂问题。”

电报进一步指出：“自你三年前到达英国以来，在所有这些方面，你在行动上是无私的，你的判断总是正确的和容纳各方面意见的、你在军事决策中的勇气和智慧完全令人钦佩。”

“你创造了历史，为了人类的幸福创造了伟大的历史，你代表着我们对于美国军队的一位军官所希望和钦佩的一切。这是我对你的敬意和我个人对你的感激。”

这是来自权威方面的最高的褒奖，马歇尔既是美国军队的总参谋长，也是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要负责人。

德军投降后，艾森豪威尔继任美国占领军总司令，他统率的美国军队有300多万。在此期间只要有重大事情去完成，很自然就会提到他的名字。爱德华·R·默罗对杜鲁门总统说，艾森豪威尔是“世界上唯一”能使联合国起作用的人。工党政治家西德尼·希尔曼说，艾森豪威尔是能引导德国将来走向民主的“唯一的人”。英国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元帅对艾森豪威尔说，如果发生另一场战争，“我们将把我们的全部人力和物力都交给你调遣”。民主党和共和党人都认为，艾森豪威尔是能够给他们的党赢得1948年总统选举胜利的“唯一的人”。

当德国投降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时，用丘吉尔的话来说，这是“在人类历史上爆发最大欢乐的信号”。对艾森豪威尔来说，十分繁忙，在以后几个星期内排满了活动。他要和盟国占领军首脑会商占领的任务、职责，还要把美国在欧洲的部队重新部署到太平洋，接待来访的人物；但是，他的大部分精力是用来应付热火朝天的、使人精疲力竭的、长时间的庆祝活动。

庆祝从5月15日开始，他接受邀请到伦敦度过一个晚上。他的儿子约翰、秘书凯·萨默斯比、侍从吉米·高尔特和布雷德利将军，随他一同前往。他们带了兰斯最好的18瓶香槟酒，带着怀旧的心情去访问了“电报”乡间别墅，在朵尔彻斯特旅馆吃了一顿便饭，然后到剧院。凯的母亲也和他们在了一起，而凯在剧院的包厢内坐在艾森豪威尔的身旁，结果拍下了那张议论纷纷的照片。照片登在英美报纸上，给他们之间的关系增添了谈论的资料。这是三年来艾森豪威尔第一次观看演出，第一次在饭馆里吃饭，1942年以来第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变得这样出名，这样受人欢迎。当剧院里的人们见到他时，欢呼，叫喊，要他讲话。他从包厢里站起来，说：“我非常高兴回到我差不多能讲它的言语的国家。”

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者斯蒂芬·安布罗斯说，这位昔日的盟国远征军总司令，在英国备受欢迎。他走到哪里，哪里人们就向他欢呼、鼓掌。6月，在伦敦市政厅举行盛大的庆祝会，丘吉尔坚持要艾森豪威尔参加正式庆祝活动，而且不顾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仪式中“不要过分突出我在盟国合作取得的胜利中所起的作用”的请求。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艾森豪威尔身上。当他知道他将在英国式的布置及其豪华的一个历史性大厅内，向包括联合王国所有高级将领和政府高级官员在内的广大听众发表主要演说，并接受威灵顿公爵的宝剑时，他非常认真对待这一任务，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独自作正式讲演。一连三个星期，他每天晚上准备讲演稿，向布彻、凯和他周围的人大声宣读了无数遍。布彻建议他背熟讲演稿，这样就显得自然，并使他在讲话时可以不必戴眼镜。

6月12日上午，艾森豪威尔从多尔彻斯特由泰德将军陪同，经过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废墟和瓦砾，来到留下轰炸痕迹的市政厅。艾森豪威尔从戴着假发的伦敦市长手中接受了宝剑。接着艾森豪威尔发表演说。他说，给他这样崇高的荣誉，使他忧喜交加，“因为任何受到欢呼的人永远必须谦虚，这种欢呼是他的同伴用鲜血、他们的朋友们牺牲生命换来的”。他讲到伟大的盟军合作队伍，他坚持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象征，他所得到的奖赏和欢呼属于全体人员，属于那些在反法西斯战场英勇奋战的将士们。

“我来自美国的中心，我出生于阿比伦一个农民的家庭。”艾森豪威尔说，“阿比伦和伦敦之间，在历史长短和面积大小上虽有差异，但有着共同的渊源。一位伦敦人要为自己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而斗争，一位阿比伦的公民也将这样做。当我想到这些事情时，泰晤士河流域和堪萨斯的农场靠得更近。”

接着，他又再一次地提到他所领导的盟国远征军的队伍。“单独一个人决不可能赢得胜利。”艾森豪威尔谦逊他说，“即使我有马尔伯勒的军事才能，所罗门的智慧，林肯的理解力，但是如果没有千百万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忠诚、远见和慷慨大度，我还是无能为力的。”艾森豪威尔讲到这里，大厅里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暴风雨般的掌声。

第二天，6月13日，伦敦报纸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演说与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在葛底斯堡的演说相媲美。他讲完后，丘吉尔把他带到阳台上，向聚集在阳台下面街道上的三万人挥手致意。艾森豪威尔对着要他讲话的人群说：“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现在是一个伦敦人。我有权利像你们一样走到人群当中欢呼。”

继英国之行后，艾森豪威尔接着又应邀到法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欧洲国家访问。他走到哪里，”他都是备受欢迎的人物，然而活动的高潮还是在他自己的祖国。6月下旬，他回到美国。美国人民热烈欢迎这位胜利而归的战斗英雄，这位统率百万雄师的远征军总司令。巨大的人群向他欢呼，他发表了许多演说，最重要的一次是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讲的。马歇尔给他一份在国会上宣读的讲稿，艾森豪威尔向马歇尔表示感谢。但是他说，他喜欢不要讲稿，即席发表演说。结果，他的演讲中，尽是些平淡无奇的老生常谈，可是他讲得如此真诚和感情丰富，深深地打动了听众。议员们对艾森豪

马尔伯勒公爵（1650—1722），英国历史上战胜法王路易十四最伟大的军事将领。古以色列王国国王大卫之子，以智慧著称。

威尔长时间地鼓掌欢呼，人们说，这是国会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欢呼。

从国会出来，艾森豪威尔又在他儿子约翰的陪同下，一道飞往纽约。当他们在飞机上坐好后，艾森豪威尔说：“唔，我现在要考虑我到了纽约后要说什么。”据美国报纸报道，这一天有200万纽约市民在市政厅外听他演讲。他讲的主题是，“我不过是一个完成职责的堪萨斯农家孩子”。《纽约时报》称赞他这篇演说是“杰作”。

在美国，到处要求他去演说。在庆祝胜利的日子里，美国形成了“艾森豪威尔热”。请柬像潮水般涌来，富豪，知名人士，各种著名团体和历史悠久的大学的校长，朋友，都要求他去发表演说。这些邀请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将军不愿拒绝，但感到很为难。正如他对一位老朋友所说的：“我最怕的是成为饶舌的将军。”他尽可能把演说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除了在伦敦市政厅和在美国国会发表的演说外，他尽量少作准备。他常常谈得恰到好处。

在阿比伦，在艾森豪威尔的家乡，有两万人在城市公园集会，欢迎“英雄”回到家乡。这个数字是这个小镇居民人数的四倍。不少人是长途跋涉从西部草原上来的。艾森豪威尔对乡亲们说：“我有幸，也可以说不幸，在这个世界上，我到过很远的地方，但是这座市镇始终在我的心中，在我的记忆中。”他像谈家常一样向听众们介绍了两军对阵的情况，介绍了战士们的英雄事迹。大家听起来很新鲜。

艾森豪威尔的专车，在堪萨斯大学的所在地曼哈顿作了长时间停留。将军的弟弟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是这所大学的校长。哥俩在站台上相见，这里聚集着一大群学生和当地居民。学生们热情洋溢地向将军致敬。其中有一人对德怀特说：“在欧洲您可以当总司令，但是在这里，你只是米尔顿的兄长。”德怀特·艾森豪威尔高兴地放声大笑起来，现在他知道确实在家里了，在无拘无束的堪萨斯人中间了。

艾森豪威尔在美国的活动非常成功，无论他是在国会的正式演说，还是在国会的委员会作证，或者向街上的人群发表即兴讲话，或者只是坐着敞篷车，像职业拳击家一样挥舞着手和张口大笑，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月18日，他在华盛顿下飞机后的第一句话“啊，天呀，回到老家多好”，第二天成了首都报纸的头条新闻。在华盛顿，阿瑟·伯恩斯博士，华盛顿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注视着艾森豪威尔坐着敞篷车驶过去，他转身对他的妻子说，“这完全是个天生当总统的人。”因此，庆祝胜利使已经广为流传的艾森豪威尔要当总统的议论更加有声有色。

在战争期间，艾森豪威尔对这样的建议“嗤之以鼻”，或者“轻蔑地一笑置之”。1943年10月，他的朋友乔治·艾伦给他寄来一些关于此事的剪报，并附上一张条子，问道：“你对当总统候选人有些什么想法？”艾森豪威尔拿起一支铅笔，在艾伦的条子下面潦草地写道：“胡扯！为什么不让更多一名战士安心地去执行命令？我对‘候选人’这个词非常反感——我不是而且将来也不是总统候选人。”战后，他还是一样持否定态度。当杜鲁门说他将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1948年总统时，艾森豪威尔笑了，回答说：“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谁将是你的竞选对手，但不是我！”这些话讲得很有意思，同时也表明了艾森豪威尔非常精明。他知道，不管杜鲁门在1945年说些什么，杜鲁门自己将是1948年的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休斯敦萨姆堡的一位老朋友来信说，他和在圣安东尼奥的其他人“准备并很想组织一个‘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俱乐部’”。艾森豪威尔回信说，这个建议使他感到不胜荣幸，“但是，

我必须告诉你，我要尽我所能地强调，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比参加政治活动更使我感到厌恶。我相信，我的朋友中没有人会使我处于甚至需要我去否认有政治野心的地位”。

虽然艾森豪威尔这次凯旋大受欢迎，但他的妻子玛咪却感到十分失望。因为她不得不让她的丈夫和公众见面。当她在华盛顿机场见到他时，她只能在艾森豪威尔被簇拥着去五角大楼前，稍为吻了一下和拥抱了一下她久别的丈夫。以后八天中，他总是在公众面前露面，最后，在6月25日，艾森豪威尔、玛咪、约翰和玛咪的双亲一起去白硫磺温泉安静地过了一星期。艾森豪威尔回到德国后，玛咪来信谈到她对这次艾森豪威尔回国感到失望。她承认她“只得靠边站”。艾森豪威尔安慰她说：“你只要了解到我爱你，多想念你，这样你就能理解我们在白硫磺温泉过的一个星期多有意思。”他说，由于这次旅行，“我比过去更加厌恶华盛顿。这包含着很多意思！”“我不知道你怎么能在华盛顿住下去。”

盟国欧洲远征军司令部的工作虽然结束了，但是凯·萨默斯比仍在协助艾森豪威尔工作，报刊仍在不断报道，流言蜚语仍不绝于耳，玛咪对此耿耿于怀。如何对待凯，成了一个问题，她不是美国公民，因此她不能留在陆军妇女队，或继续为艾森豪威尔工作。

10月她决定前往美国申请公民证。她返国德国后，艾森豪威尔要求在柏林的卢·克莱将军在他那里给她安排一个工作。他告诉克莱：“我希望你能给她找到一个好工作，我知道你会记得，她不仅曾经忠心耿耿协助过我，同时她在这场战争中遭到很多不幸；还有，她几乎是我从未碰到过的言语谨慎的人。”对史密斯，这位盟军总司令部的参谋长，艾森豪威尔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他对凯·萨默斯比极为同情，因为他知道“她感到非常凄凉和孤独”。

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如何处理和凯的关系，是非常为难的。三年来他们在战争中结下了深情厚谊，但是考虑到家庭，考虑到社会的舆论，考虑到他自己的前程，他和这位动情的女人只得一刀两断了，再不能向前发展了。至于凯本人，她虽然深深地爱着艾森豪威尔，但她认识到只要有玛咪在，有他的儿子约翰在，他们的关系再向前发展一步是不可能的。她哀叹他说：“谁说有情人终成眷属？根本不可能！苦难的人，总解脱不了命运的摆布！”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怀着极为痛苦的心情，口授了一封条理清晰的长信，说明她为什么不能再为艾森豪威尔工作。艾森豪威尔也动情他说：“我不想表白你在我手下工作，对你无以复加的忠诚的深深感激之情。”同时，他本人感到十分苦恼：“对我来说，这样有价值的关系，就这样完结。”他表示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会协助她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最后，我希望你经常给我来信——我将永远有兴趣知道你的近况。”然后在信的结尾，他亲笔附加了两句：“请自己珍重，并且保持乐观。”

自从1945年5月25日，艾森豪威尔就把他的司令部搬到法兰克福的法本办公大厦。这座大厦没有受到盟国空军的轰炸，完整无损。据有些说法，这是因为艾森豪威尔想把这座大楼保存下来，以备他自己将来使用。但据另一些说法，这是因为德国和美国化学公司之间存在财政上的关系。可是据艾森豪威尔说，这纯粹出于偶然。

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很宽敞，他在这里每天都在处理着战后许多极为复杂的问题。他对布彻说：“打一场战争并不像占领工作那样使人厌烦。”他的权力不像过去那样明确和完整，他不再作决定，而是在执行别人的政策。

他和他的司令部经常受到批评，有些批评很激烈、很刻薄。布彻曾预见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在日记中预言：“艾克将军和他整个司令部处于一个困难时期。”布彻看出，在德国采访的记者会与太平洋战争剧烈地争夺报纸的版面，“因此只有批评这个战争胜利的骄子和批评处理占领德国事务的文章才能争到版面”。因此布彻希望，“艾克将军没有必要在德国呆太长时间，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他的地位很可能下降”。

批评的浪潮很快就开始。5月13日，马歇尔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说，陆军部“收到纷至沓来的强烈抗议”，抗议“戈林和其他纳粹领袖受到友好的待遇”。保守的、激进的和自由派的报纸都纷纷发表措词激烈的社论，明确提到5月9日的事件。当时有一名美国军官和戈林握手，拍了一张照片，后来又与这位帝国元帅一起进餐。早在1944年9月，当美军刚进入德国时，艾森豪威尔就曾经禁止对纳粹军政人员做任何友好的表示，并且把美军和德国人在一起的照片列入检查清单。对于戈林事件，他致电他的高级司令官们，以强硬的措词重复他禁止友好表示的命令。他说戈林事件是“使人震惊的”。又说，“在这个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不想使它对全体美国公众，由于任何军官的这类愚蠢举动，在美国受到破坏性的影响”。他还说，他“非常不高兴，我关于禁止作出友好表示的命令，竟公然不执行”。

与此同时，巴顿继续使用纳粹分子来管理巴伐利亚。艾森豪威尔写信给巴顿，严肃指出：“归根到底，美国是作为纳粹的敌人而参加这场战争的；在把每一个活跃的纳粹党徒从负责岗位上清除掉，并按情况给予应有的惩处以后，我们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他坚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和纳粹主义妥协……这个问题的讨论阶段早已过去……我期望像在战争时期一样，忠实地执行这一政策”。艾森豪威尔发出信后，又亲自去看巴顿，强调他对这一问题的关切。他说他要将非纯粹化扩大到整个德国生活中去，不仅限于公共职务方面。可是艾森豪威尔不能说服巴顿，他继续坚持使用纳粹分子，最后艾森豪威尔不得不解除巴顿第三集团军司令的职务。

战争结束是艾森豪威尔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7月下旬，他前往柏林。杜鲁门总统、国务卿和其他官员都聚集柏林，准备参加波茨坦会议。这次会议从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由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和外交长参加。波茨坦会议讨论的问题比较多，主要是关于战后占领德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原则，德国和意大利的赔偿，对待意大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芬兰的政策，波兰西部的边疆等。经过多次讨论，三国政府首脑对一些主要问题基本上达成协议，有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协商。8月1日，三国政府首脑在柏林签订了一份《柏林问题议定书》，这个议定书反映了苏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期间达成协议的最后结果，对于战后处置德国和欧洲问题定了调子。

就在波茨坦会议举行期间，1945年7月26日，苏美英三国首脑讨论了结束对日作战的条件和有关对日本战后处置的方针，通过了一项决议。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也就是后来的美英中苏四国的对日宣言。《波茨坦公告》实际上是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法西斯发出的一份敦促投降书。这对于日暮途穷的日本法西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波茨坦会议结束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应邀访问苏联，参加8月12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体育节。在正式邀请书中说，在苏联他将作为朱可夫元帅的客人。这就是说，将军不是作为国家政界领导人，而是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伟大军事活动家被邀访问苏联的。

1945年8月11日，艾森豪威尔在朱可夫的陪同下，从柏林飞往莫斯科。随行人员有克莱将军、艾森豪威尔的老朋友戴维斯将军，还有他的儿子约翰中尉。据约翰回忆说，艾森豪威尔和朱可夫单独耽在飞机的前舱，一路上通过翻译，两人谈笑风生。“朱可夫的秉性是非常友好和喜欢放声大笑的。他显得非常友好”。飞机于8月11日16时在莫斯科机场着陆。翌日下午，艾森豪威尔和他的陪同人员站在列宁墓不远的指定地点。再过几分钟体育检阅就要开始了。

这时，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走到美国客人跟前，转达了约·维·斯大林请他登上列宁墓观礼台的邀请。“因为我同美国大使在一起，”艾森豪威尔回忆说，“他作为总统代表的威望具有重大意义，我感到疑虑，我撇下大使到大无帅那里去是否合适。”

安东诺夫说，斯大林请他和由他选定的两位伙伴同往，从而使艾森豪威尔不再感到为难。艾森豪威尔、美国大使哈里曼和美国驻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丁登将军登上列宁墓。正如哈里曼对艾森豪威尔解释的，这对盟国最高司令官来说是很大的荣幸，因为他是被邀请登上列宁墓观礼台的第一位外国人。

体育大检阅持续了五个小时。艾森豪威尔写道，美国客人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面。参加检阅的人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舞蹈和许多人表演的技巧运动，动作协调一致。

1000人的乐队不停地演奏。艾森豪威尔不只看红场，他还仔细地观察斯大林，发现他身体很好，“毫无倦意；相反，却认真地欣赏每一分钟的表演”。“斯大林大元帅请我站在他身旁，通过译员我们利用整个体育运动表演期间的间隙进行交谈”。

“斯大林对美国的工业、科学和经济成就很感兴趣。”艾森豪威尔说，“他几次重复谈到，对俄国和美国来说，重要的是仍然作朋友。斯大林渐渐地把话题转到柏林的地位问题上来。根据他的见解，在柏林的盟国监督委员会工作之重要，首先是因为它有助于弄清在战争中获胜的大国在解决和平时期的问题时，能否继续有效地进行合作。”

艾森豪威尔一行，在苏联受到热烈的欢迎和殷勤的接待。在莫斯科的短短几天中，他们观看了一场足球赛，到场的有八万名热情的球迷。他们参观了苏联人感到非常骄傲的地下铁道，还观看了莫斯科的美术馆。另外，他们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访问了斯托莫维克飞机制造厂，又用一天时间访问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所到之处，都看到了人们为恢复战争创伤的真诚的献身精神。艾森豪威尔说，“人们经常用下面的话来表达他们的爱国主义，‘这是为了俄罗斯祖国，因此是不怕困难的。’”斯托莫维克厂的一群工人还告诉美国客人，战争期间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是84小时。他们还骄傲地说，工厂的出勤率超过94%。这些工人很多是妇女和儿童，很难想象，他们的口粮定量这么少，交通工具如此缺乏，竟能保持这样的高记录。在参观集体农庄时，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中尉还颇感兴趣地注意到，“尽管在诸如朱可夫这样的俄国元帅的周围随从众多，戒备森严，但是农民同他们谈话却是随便的，平等的，朱可夫同农庄庄员们一起谈话和开玩笑”。

“莫斯科之行的主要社交活动是克里姆林宫宴会。”艾森豪威尔写道，“在金碧辉煌的宴会厅中，出席的有一批红军元帅以及莫洛托夫先生，许多

外交官员在宴会上充当译员。宾主频频举杯为战争期间逐步发展的协力合作精神干杯。”宴会后，应斯大林的邀请，艾森豪威尔在克里姆林宫观看了《攻克柏林》的纪录影片。“我对这部影片很感兴趣，大元帅允诺送我一部拷贝。”艾森豪威尔还说，想要一张斯大林的相片。从莫斯科回来后不久，他“在柏林收到了影片拷贝和大元帅签名的照片”。

全体美国客人都注意到在苏联受到的破格的接待。艾森豪威尔写道，朱可夫元帅和其他官方人士邀请他“提出想去参观的地方，他们说没有任何地方我不能去看，甚至可以要求去海参崴”。美国客人欣然应邀参观了克里姆林宫的兵器馆珍宝，当时这些珍品尚不向外开放。原来美国驻莫斯科使馆全体人员，几乎从来没有看到如此独一无二的搜集品，都表示愿意陪同艾森豪威尔前往。他“开玩笑地同意把他们作为临时副官。约 60 人一行在博物馆度过了一个下午，参观收藏在那里的珍品”。经过克里姆林宫的庭院时，他们看到了过去从未见过的最大口径的大炮；炮筒的内部直径大概在 30 英寸以上。它是 18 世纪的遗物。当他们离开它时，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中尉沉思着说：“我猜想那是 200 年前使人们感到来来战争可怕到难以想象的武器。”

艾森豪威尔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晚上，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举行招待会时，传来了日本投降的消息。这是反法西斯国家的又一共同胜利。苏联和美国参加招待会的人士，异常热烈地谈论这一消息，从此，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以这样一个事件而告结束，它引起所有珍惜世界的利益、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的人们认真思考。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在原子弹爆炸的地狱一般的环境里，转瞬之间死亡了 30 万名和平居民。其他居民在受到大量放射性辐射后终生致残。世界舆论指出，这类事件绝不是出于战争的需要。杜鲁门政府采取这种行动主要目的是恫吓世界人民。这是原子讹诈政策的开端。

对此，艾森豪威尔的儿子约翰回忆说，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的一个夜晚，他和父亲两人坐在他的卧室里。微弱的灯光照亮着房间。德怀特将手枪放在桌上，端坐在床沿上，沉默了片刻后说：“约翰，陆军部长史汀生今天告诉我，在原子裂变的基础上制造出了新型炸弹。它的威力超出了人的想象力。他们郑重地考虑，要用它来对付日本人。所有这一切当然是绝对秘密的……父亲显然情绪忧郁。”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者安布罗斯也说，艾森豪威尔反对使用原子弹，他曾对史汀生部长说：“美国应当避免使用原子武器，来震惊世界舆论。”

战后，艾森豪威尔还常常思考自己以后的生活道路。他认为，随着战争的结束，他在军界的仕途也就终结了，何况在战争结束前不久，他和美国的其他几名将军一起都被授予最高的、刚刚制定的军衔——五星上将。

1945 年 11 月，艾森豪威尔写信给童年时代的朋友、与他的军人命运有关的赫兹利特说：“我没有比退伍更强烈的愿望了。”但是退伍后干什么呢？要知道 55 岁还没有到人们认为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的年龄。战争结束后，艾森豪威尔对亲近的朋友们说：“我已经得到了想要的全部荣誉。我想担任一所大学的校长，同时种点地，了却余生。”另一些作者断言，他想退休，从事写作，打打高尔夫球和享享清福。也许，艾森豪威尔的个人计划是这样的。但是，美国两个政党的首脑在他身上紧打主意。有关推荐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职务的主张越来越强烈。

1945 年 11 月 11 日艾森豪威尔飞往华盛顿，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会

议，然后同玛咪乘火车去依阿华州的博尼，看望玛咪的亲戚。他们一到，玛咪因支气管炎立即住进医院。几天之后，艾森豪威尔确信玛咪正在痊愈中，便回华盛顿去，出席国会各委员会的会议。

11月20日，杜鲁门接受马歇尔总参谋长的辞呈，并任命艾森豪威尔接替总参谋长一职，并同时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12月3日艾森豪威尔走马上任。

美国人民对战争感到厌倦。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当局奉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必须保持庞大的和有战斗力的军队，遭到人民强烈的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的老兵，纷纷要求复员回家。

1946年初，艾森豪威尔痛苦地向国会报告说，在美国国土上没有留下一支受过良好训练和装备精良的美国部队。

艾森豪威尔在担任参谋长的时候，与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经常有接触，与他建立了非常密切的私交。这位部长看到艾森豪威尔战后在华盛顿官场的巧妙手腕，发现了将军的“卓越的办事能力”，曾问：“艾克，让你当总统，你干不干？”恰恰在这个时候，德怀特已经对自己入主白宫的道路进行了认真思考。正如一些传记作者所写的：“艾森豪威尔开始经历了从不干到干的历程。”看来，当两党的首脑强求推他为总统候选人，两万选民写信要求他对此表示同意的时候，他已经很难对白宫不作考虑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五章 竞选总统

问鼎白宫搞竞选，财团政客竞相劝；
政治赌博非儿戏，将军审慎二又三。

1945年11月至1947年2月，艾森豪威尔担任军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期间，形形色色的政客纷纷盘算着利用这位将军的显赫名字，进行最冒险的政治赌博，而赌博的筹码是入主白宫。

东部财团的显贵们几乎在他还没有担任新职务以前，就已向他靠拢。例如，国际商业机器公司的托马斯·T·华生，在1946年3月初到五角大楼来会见将军，坚持要请他到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去演讲。纽约的其他一些大公司的头头也各有打算，他们利用自己在团体或大学中的地位来开始接近艾森豪威尔。在大战以前，他对美国商界的领袖人物几乎一个也不认识；在大战期间见过少数几个人；到1947年时，他会见过他们中间的好几百个人，或者至少与他们有过书信往来，其中包括最有财势的100名大亨中的大多数。许多人成了他亲密的私人朋友。

当20年前艾森豪威尔和玛咪住在华盛顿时，他们的社交圈子是些默默无闻的军官和他们的妻子。然而从1946年到1948年，他们的社交生活中几乎已无一名军人。当他们在30年代打桥牌时，对手是其他的少校和他们的妻子；而在40年代，则对手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总裁，或者美国钢铁公司董事会主席，或者标准石油公司的总裁。从1946年起，艾森豪威尔的新朋友，几乎清一色都是百万富翁。

大多数敦促艾森豪威尔参加竞选的人都认为，如果他竞选的话，他会以绝对的优势取得胜利。艾森豪威尔没有答应。他不属于任何党派，没有政治经验或基础，没有从政的记录，没有组织，他怀疑“艾森豪威尔热”的真实性。他或者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深罕众望”，或者便是拒绝相信在别人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当布彻写信告诉他，“许多人”对他谈到国家非常需要艾克来当总统，并预言艾森豪威尔将“被迫作出决定”，艾森豪威尔报之以嘲笑。他答道：“你谈到的那种情绪是很稀疏地散布着的东西，我对于你说我将不得不表态的结论，表示怀疑。”他认为这热潮由于得不到未来候选人的鼓励，将趋于自生自灭。

艾森豪威尔对其处境深感痛苦。他非常讨厌党派政治。请求人们给予支持的想法，如同搞政治交易、争取提名、参加竞选、封官许愿以及其余一切属于党派政治的想法一样，都是与他格格不入的。但是，整个国家，从一些最大的企业家和著名的政治家，到成千上万名退伍军人，劝他不要推辞。人们执著地要求他当总统候选人，迫使他意识到想脱身是不容易的，同时也迫使他考虑当总统是怎么回事。毕竟他很快要从军队退休，他也应该考虑一下他今后的“前程”了。

形成艾森豪威尔热潮的突出原因之一，是艾森豪威尔从来不表示他喜欢哪一个政党，甚至连对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没透露过。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很容易把艾森豪威尔看作是自己党的党员。他的家中唯一与华盛顿政治舞台有关系的人是米尔顿，他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中都工作得相当出色。艾森豪威尔将军一向小心地绝对避免谈论国内的政治问题，因此谁也不知道他对这些问题的立场。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不得不避免对国内政治妄加评论，对赤字财政、福利国家、政府对工农业的调整或者种族关系之类的问题保持

沉默，已成了他的第二天性，对于他自己持有的观点，他执著地坚持着，但是这些观点在政治上始终是中间路线的。

就竞选总统的问题，艾森豪威尔不止一次地征询不同倾向的人的意见，麦克阿瑟和马歇尔就是其中的两位。然而，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弟弟米尔顿已经是他的主要顾问，艾克对他言听计从。米尔顿认为，政客们需要的是德怀特风云一时的名字，而不是他本人。艾森豪威尔家族的这个“讲求实际的自由派”，反对德怀特参加竞选总统。

1948年6月，艾森豪威尔当上了全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在此之前，他已拥有世界许多大学的名誉学位和称号，但是，周围的人，首先是他本人十分清楚，他获得这些学术上的荣誉并不是因为他对某一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是出于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军事贡献的尊敬。

还没有迈入这所驰名国内外的大学门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就面临着在新岗位上许多他回避不了的棘手问题。一些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反对新任校长，他们认为这样的学府应当由学者主持，而不是将军。艾森豪威尔听到这种议论，心里并不痛快。但是，他有一套处世本领，因而这次他又想出了摆脱困境的妥善办法。他在和学校教授们第一次见面时就宣布，他不追求学者的桂冠，因而在处理学术问题时，将主要听取教授们卓有见地的意见。

艾森豪威尔虚心学习，他经常到各个班级和院系去听课，这在一所名牌大学内几乎是少见的事。他对历史和物理特别有兴趣。他把较年轻的历史学家们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发表讲话，谈他们的职责和任务。他最喜欢的是物理系，他对原子能极感兴趣。他和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西多·拉比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当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研究所向拉比提出聘请时，艾森豪威尔使尽他浑身解数，挽留拉比，艾森豪威尔对拉比说，哥伦比亚需要他，他本人需要他，如果拉比离开，哥伦比亚大学的声誉会遭到十分沉重的打击等等。拉比被说服同意留下来。

这对哥伦比亚大学显然是一个收获。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收获。艾森豪威尔在哥伦比亚大学两年半时间内，实际上在那里工作的时间不到一半，他开始实行了一连串的计划，给学校带来声誉、金钱和更加活跃的知识气氛。艾森豪威尔在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期间，也是“全美议事会”的组织者。这个议事会的宗旨是把企业家、劳工、学者、党派代表聚集在一起研究全国性问题。这个组织不仅为哥伦比亚带来了基金，也为学校带来了显赫的名声。

艾森豪威尔为世界有名的经济学家埃利·金兹伯格主持的“保持人类资源”计划筹措款项和开展工作。艾森豪威尔说，他觉得“几乎不可理解，竟没有一所美国大学长期从事有关战争的原因、进行和后果的研究”。为了纠正这一情况，他为“战争与和平研究所”筹集基金。他想说服乔治·凯甫任所长。凯甫拒绝后，他说服威廉·福克斯离开那鲁大学担任这一职务。福克斯使这个研究所不断前进和成功地开展工作。

艾森豪威尔到哥伦比亚大学上任时，正是“冷战”寒风吹遍大学课堂的时候。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方面问题的研究，也被宣布为大逆不道。哥伦比亚大学新校长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虽无好感，但却主张必须对其进行研究。一些人说：“艾森豪威尔懂得要掌握事实这个道理。因此，他认为应当研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以便了解它们，从而找到与其斗争的有效方法。”

为了改善农业条件，艾森豪威尔还创设了一个研究土壤——美国“最大

的资源”——的“侵蚀和浪费”的计划，并利用他的关系，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参与其事。他还建立了一个新“工程中心”。随着给学校的赠款增加，教师的薪金也提高了。研究生院朝气蓬勃。总之，艾森豪威尔在他的短短任期内，在开展新的计划方面的成就，比大多数校长在十年中的成就还大。

艾森豪威尔非常善于筹集基金。他从不直接要求捐款，但是，他给他的有钱朋友和熟识的人们写了很多信，解释哥伦比亚大学各方面计划的情况。他向他们清楚表明，如果他们捐款“帮助哥伦比亚来帮助美国”，他会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支持。有一次艾森豪威尔专程到得克萨斯，去见一些石油富豪，他设法为哥伦比亚大学筹集到近50万美元。艾森豪威尔能够筹集到大笔的钱，部分地是由于他的介绍和热忱，但主要是由于这些施主们知道，这是与艾森豪威尔将军建立或保持良好关系的方法。

在哥伦比亚任职其间，艾森豪威尔一面主持校务，一面撰写回忆录。

1948年，他的《远征欧陆》第一版问世。这部书引起了巨大反响，也给作者赚得了不小的收入。征税机关考虑到艾克不是专业作家，向他提供了特殊的征税优惠，作者的纯收入达476250美元。到1966年底，《远征欧陆》一书在美国销售量达170万册，还被译成了22种文字。

许多关于他的传记作者都肯定，艾森豪威尔离开军队到哥伦比亚大学任职只是他要入主白宫的一个跳板。他们指出，按照美国的传统，国家总统必须具备一定的文职工作经验，而德怀特缺少的正是这个。

然而，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职务的时间并不长。正当他探索大学生活奥秘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发动的“冷战”席卷了世界。它涉及到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外交各个领域。

1949年4月，在美国庇护之下，成立了北大西洋的政治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根据参加国首脑们的一致意见，艾森豪威尔将军是领导这个组织的最合适的人选。

1950年12月18日，德怀特和玛咪舒适地坐在普尔曼式卧车里，经俄亥俄州前往远方的一个学院。在一个火车站上，一名铁路员工通知艾森豪威尔，杜鲁门总统正在通过电话找他。到有电话的地方，要走一段积雪很深的荒地。这是一条走向“冷战”之路。杜鲁门将北约成员国首脑们的一致意见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将军后来回忆说：“这一要求引起我一种失望的感觉，必须重新改变已经走上正规的生活习惯，动身去欧洲。”但是，他又肯定他说：“我对北约的观点是深信无疑的。在我看来，西方文明的前途有赖于它的成功。”

1951年1月7日，艾森豪威尔将军来到巴黎，领导西方大国—北约成员国的陆、海、空军，他必须为组建北约武装部队付出较多的心血。艾森豪威尔聘请蒙哥马利元帅担任最高司令官的副职。这是一项准备战争期间英美进行政治军事合作的政治交易。在北约组织者看来，聘请蒙哥马利担任这个集团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艾森豪威尔的副职，为的是突出英美在新的政治军事同盟中的团结。

艾森豪威尔聘请艾尔弗雷德·格伦瑟中将担任他的参谋长。“五角大楼”对格伦瑟的评价是：他既是一位优秀计划专家，又是一个全军最好的桥牌手。尽管艾森豪威尔为压缩编制尽了最大努力，在巴黎的北约司令部驻地仍聚集了来自12个国家穿着40种军装的200名军官。

北约的创建者想尽量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斗传统，使这个“冷战”的畸形儿仪表堂堂。艾森豪威尔为建立这个政治军事集团的武装部队，倾注

了大量心血。他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仍把所谓大西洋团结、全面加强在美国庇护下的北约参加国集团的原则，作为其所有外交活动的基础。

像北约所有战略家一样，艾森豪威尔不断重复一个观点：只有西方的政治军事统一，才能使资本主义世界免遭“共产主义威胁”。在苏联制成原子武器之后，他宣称：“现在美国人在本国历史上第一次被迫生活在受到完全毁灭危险的条件下。”“苏联威胁”这个可怕的东西，当时已被利用来混淆西方国家的舆论视听，并成为帝国主义集团奉行侵略的对外政策的借口。

艾森豪威尔所以叫嚷“共产主义威胁”，主要是在政治上和西方右翼集团保持一致，这些反对集团正企图联合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阻挠世界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欧洲地区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过去和当时都异常重要。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建立，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整个面貌。欧洲已成为两种体系斗争的中心，它在很多方面决定着整个国际生活的发展。

在北约成立之后，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利益冲突，在地球上的这个地区就特别激烈了。艾森豪威尔作为北约武装部队的最高司令官，积极推行美国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而在这个政策中，欧洲的地位又至关重要。在这种情况下，身居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要职的艾森豪威尔是怎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呢？最好的办法是用他的私人通信来回答这个问题。在官方公布的声明中，有不少关于北大西洋集团“防务使命”、“保卫西方文明”、西方的二次世界大战盟友间的“战斗兄弟情谊”等言论。在私人通信中却谈到艾森豪威尔的另外一种重要使命。这位北约武装部队司令官，1953年3月8日写信对国会议员沃尔特·周以德说：“我作为不分党派的所有美国人的战士和公仆，在欧洲这里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和加强美国在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的投资。”

艾森豪威尔本人也清楚，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根本不是一回事。就连普通美国人也经常提醒他这一点。在他的个人档案中，保存不少美国士兵和军官、普通老百姓写给他的信。信中很坦率地指出，美国人民强烈谴责孕育着新军事冒险的侵略政策。一个美国普通军人1951年8月在写给艾森豪威尔的一封信中说，士兵们“经常喝着啤酒议论世界大事和个人的前途”。士兵们情绪忧郁，他们得出结论，在未来的战争中他们的命运是：“杀人或者被杀，杀人的想法使他们厌恶，被杀的前景使他们感到恐惧。”写信的人代表自己的伙伴质问艾森豪威尔：“我们这一代人真有必要成为职业杀人者，就像大家称呼朝鲜战场上的老兵一样吗？”

德怀特给寄信人复了信。他搬用“冷战”理论家和实践家创造的一切论据，在信中写道，在他看来，只是因为“共产党实行无神论，才迫使美国武装起来”。艾森豪威尔清楚地感觉这些道理不能令人信服，在信中最后便老实他说：“我知道，您和您的伙伴不会把这封信看作是对强烈引起你们不安的问题给予了准确的或者是稍令你们满意的答复。”真是不打自招了！

坚定地主张为了北约的政治利益，可以利用西德的军事经济潜力，这一方针是美国“大西洋政策”的基础，而这个政策在大西洋两岸舆论界眼中是声名狼藉的。美国将自己的政策建立在这种急剧的政治变态上，因而它事先就估计到不仅会遭到舆论界的强烈谴责，也会遇到北约盟国的强烈的反对。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年代中，曾任西方盟国欧洲武装部队最高司令，现在又是北约武装部队第一任最高司令官。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预料到，接纳联邦德国参加北约将不可避免地遭到强烈反对，首先是欧洲国家

的反对。他的预料和担心很快得到了证实。在 70 年来的三次大战中，深受德国侵略之害的法国，拒绝批准关于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协定。

艾森豪威尔像在战场一样，对此反应迅速而果断。在华盛顿的谈判中，他同丘吉尔协调了步骤之后，便要求法国政府刻不容缓地“结束含糊不清的态度”，因为“继续拖延将是对大西洋国家团结的一个打击”。在这次外交行动之后，立即成立了英美“研究小组”，研究一旦法国拒绝批准条约应采取的具体制裁措施。在美英威胁面前，法国政府最终还是表示同意重新武装德国，让它加入大西洋集团。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应聘就任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阶段。这时期的活动巩固了他在美国右翼政治集团中的地位。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这是政治上可靠的高标准。美国政客们确信，这样的职务能为艾森豪威尔轻而易举地开辟通向白宫之路。

当艾森豪威尔在巴黎忙于北约事务时，在美国国内狂热的政治活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

1952 年的竞选运动看来将要达到少有的激烈程度。在华盛顿政治交易所里，对杜鲁门总统的评价不高。在 1952 年竞选运动开始前，杜鲁门实际上是个政治破产者。经济已转入和平轨道，但却不裁减军备，因而恢复平时生产进行得相当吃力。

1948—1949 年经济危机的伤疤也还没有痊愈。在朝鲜，美国被迫承担侵略战争的主要负担，战争虽然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但也没有因此受到普通美国人的欢迎。美国的盟友在这场军事冒险中只是出了最小的力。共和党向民主党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击，声称美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困难，是由于杜鲁门领导无能和民主党的总的政治方针所造成的。

许多政治领袖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时刻已经到来。要执行新的政治方针，必须有新的领袖。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都同样希望艾森豪威尔上台。而要搞清楚他属于哪个党派，是不可能的。他一生中并没有投过票，从没有公开发表言论对两党中的一党表示好感或反感，尽管他的父亲一贯投票赞成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还有一个与提名将军为总统候选人有关的麻烦问题。北约参加国领导人担心，一旦他辞去这个集团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的职务，将发生这个同盟是否还存在的严重问题。例如，蒙哥马利就把战争时期同艾森豪威尔的争吵置之脑后，对他宣称：“如果你要回国竞选总统，我也要去你们那里进行反竞选。”

艾森豪威尔虽然领导北约的时间不长，但是，就在这有限时期内，他已表现出是妄想统治世界的美国垄断集团意志的一个出色执行者。对华盛顿实现侵略性对外政策的路途坎坷，他的心中是有数的。可能从他未来的政治前途来考虑，艾森豪威尔不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表现出了他利用自己全部威望和才能，去实现美国统治集团提出的侵略性对外政策目的的决心。

提名艾森豪威尔作为总统候选人的运动日益展开。堪萨斯城的出版人罗伊·罗维尔特斯肯定他说，他还在 30 年前就知道，艾克是“堪萨斯的优秀共和党人”。参议员约翰·斯巴克曼在亚拉巴马宣称，他将争取让德怀特作为民主党候选人。但是艾森豪威尔，他从自己的政治生涯一开始就表现了一种“善于控制自己的重要品质”，从不轻易表态。

杜鲁门总统两次派遣原驻苏联大使约瑟夫·戴维斯去见艾森豪威尔。这位外交官肩负着一个难以完成的使命：说服德怀特以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

统。尽管杜鲁门向将军保证，在未来的选举中将全力支持他，艾森豪威尔仍然回答说：“我不能接受以民主党候选人参加竞选的建议，因为我好像是共和党人的成分比民主党人的成分多。”僵局打开了。艾森豪威尔第一次相当肯定地暗示，他打算竞选总统。

1951年11月4日，共和党有威望的领袖之一、参议员亨利·凯波特·洛奇飞抵巴黎。艾森豪威尔的这位从战争年代以来的老友告诉他，在美国有很多组织在发动提他为总统候选人的运动。德怀特说：“您在政界享有盛名，为什么您自己不参加竞选呢？”洛奇毫不踌躇地回答说：“因为我不可能当选。”在交谈中洛奇强调：“您是唯一能被共和党选作总统候选人的人，您必须同意在即将到来的预选中利用您的声望。”艾森豪威尔答应他将“认真考虑这件事”。

艾森豪威尔本人对自己在选民中的威望只是看了在纽约拍摄的15000名选民集会支持他竞选总统场面的影片之后，才深信不疑。2月11日，为了推动德怀特参加竞选，金融家洛伊德·奥德伦的妻子杰奎琳·科克伦，带了一部长达两小时的影片飞往巴黎。片中记录了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的一场拳击比赛后，在午夜举行的拥护艾森豪威尔集会的实况。这部影片是由艾森豪威尔的朋友们和“拥护艾森豪威尔公民协会”精心导演的。据科克伦说，尽管完全得不到这个城市的官员合作，还是大约有15000人参加。影片显示了人群一边齐声高喊：“我们要艾克！我们要艾克！”一边挥动着“我喜欢艾克”的标语牌的场景。艾森豪威尔和玛咪在他们的起居室中观看这部影片，深深受到感动。

当影片结束时，艾森豪威尔给科克伦斟上一杯酒。当他们举起酒杯时，玛咪不觉脱口而出，“为总统干杯！”她后来回忆当时情况说：“我是第一个对他这样说的人，而他突然哭起来……泪水从他眼中涌出，他太激动了……因此他接着开始谈起他的母亲，他的父亲和他的家庭，但主要谈起他的母亲，他谈了一个小时。”接着科克伦对他说，他应表明自己的态度，回到美国去。“就像我坐在这里，看着你一样地肯定，假如你不表明你的态度，塔夫脱会得到提名。”艾森豪威尔沉思了一会儿，最后表态说：“你回去可以告诉朋友们，我准备参加竞选。”

第二天上午，艾森豪威尔口授了好多封信给他最亲密的朋友们。他的每一位朋友都表示惊奇和激动。例如，他在给斯韦德的信中说，影片“使我第一次深感，美国人今天要求变革的深切愿望……我无法向你表达，一个人突然意识到他自己成为迫切期待和希望的象征时，是多么激动”。在另一封信中，他谈到人民的“委托”，他看到人民需要他，他是如何感动。“如果任何美国人竟对这种信任不感到无比骄傲，我可以这样说，他几乎是缺乏人的感情的。”

到了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候了。

1952年4月11日，将军得到了白宫同意，从1952年7月1日起，解除他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职务和从军队退役。在北约主要成员国首都进行告别拜会之后，艾森豪威尔于1952年6月1日返回美国，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身份参加总统竞选。采取这样的一个步骤，显然是从实际出发考虑的。一般说来，美国大多数选民都把自己看作民主党人，但对这位有名望的将军同伴也会给予广泛支持的。以共和党候选人竞选，能保证他能得到有势力的垄断资本集团的帮助，垄断资本集团对共和党的倾向大大超过民主党。这就是

他竞选策略的总轮廓。在美国正全力以赴地为他筹备竞选运动。这项艰难而又麻烦的事，由参议员亨利·凯波特·洛奇主持。

在 1952 年 6 月 7 日至 12 日在芝加哥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开展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因为艾森豪威尔虽然是一个最有希望的总统候选人，但却不是唯一的。代表大会上，除了他以外，还有一位将军作为候选人的呼声也相当高。他就是德怀特的上级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党内的各集团中，曾就“大西洋英雄”和“太平洋英雄”之间的竞争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谈判。有一个共和党的领袖曾考虑组成这样一个两驾马车：麦克阿瑟竞选总统，塔夫脱作为副总统候选人。

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上进行的错综复杂的政治赌博中，艾森豪威尔是手握王牌的：“头号”战争英雄的威望和工商界的积极支持。大企业家的头面人物通常不亲自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而在幕后左右风云，并以此自得其乐。在艾森豪威尔问题上却是个例外。“汽车大王”福特二世和“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查尔斯·威尔逊等垄断集团的头目，都出席了共和党代表大会，积极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

第一轮投票的结果，艾森豪威尔获得 595 票。离取得胜利，他还差 9 票。他的主要对手塔夫脱获得 500 票，沃伦获得 81 票。但是，没有经过重新投票，事情就得到了解决。因为明尼苏达州代表团团长突然站起来宣布，该州代表票的 19 票改投艾克。竞选运动中的第一道重要壁垒被顺利攻克。芝加哥代表大会后，艾森豪威尔立即精力充沛地投入竞选斗争。他身边有经验丰富、善于运筹的竞选运动指挥，其中洛奇和亚当斯成了他最有力的竞选助手。

但是，艾森豪威尔仍遵循美国的老习惯，对这项新的事业的一切细节考虑得尽量周到，并像对待军事活动一样组织得“天衣无缝”，有一次他说：“将军的工作归结一点，就是纠正外交家们造成的混乱局面，以便让外交家们能够将局面重新搅乱。”而这一次，德怀特既是将军，也是外交家，他亲自组织和主持自己的竞选运动，而没有完全依赖于政治阅历而变得练达的助手们。

共和党代表大会提出加利福尼亚州年轻的参议员理查德·尼克松为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没有卓著功勋，但以他的全部政治倾向，特别是以他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时的种种表现，证明了他是个狂妄的反共分子。共和党打算在反共口号下开展竞选运动。该党的战略家认为，艾森豪威尔所需要的副总统候选人正是一个有这种名声的人。

艾森豪威尔在竞选运动过程中面临严重考验。按照计划，为了竞选，他将乘飞机和火车行驶五万英里，还不包括乘汽车的路程。

这相当于绕地球两圈以上，按照计划，他将访问 45 个州的 232 个居民区。会见、演说、答记者问、谈话、数千次握手，所到之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到了晚上，艾森豪威尔脸上的一道道皱纹更加明显可见，身体感到异常沉重，嘴唇不断抽搐，眼神中充满了疲惫。到了日未，如果告诉他还有一次约好的谈话，他常常咬牙切齿他说：“全国委员会的这些白痴！他们想以选举一个死人才高兴吗？”但是，他稍事休息后又说：“走！他们想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6 月 4 日，他在阿比伦首次向全国发表电视政治演说。总的来说是不热闹的。天下着雨，大看台上一半是空的；他穿着平民的雨衣，看起来有点奇特；他无表情又口齿不清地念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他的话来回重复，是人

们所熟悉的。但是他所得到的效果比他出现在电视机前更重要，因为他使共和党的保守派放心。他说，他是通货膨胀的敌人，是高税收、政府集权、欺骗和腐败等等的死敌。尤其是，他对雅尔塔秘密协定和丢失中国表示痛惜。虽然他也确实谴责了“任何孤立政策之毫无益处”，但是他强调雅尔塔和中国，正是那些没有表态的代表们想听的。这篇演说也为以后的竞选定下了调子。

第二天艾森豪威尔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记者们一致认为，他与事先准备好的演说相比，艾森豪威尔对即席问题的回答是非常精彩的。詹姆斯·赖斯顿认为，艾森豪威尔是自罗斯福总统以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大师。赖斯顿写道：“他说话直截了当，平易近人，不使性子，不挖苦讽刺。同样重要的是，在回答某些问题时，他好像比他实际上更为坦率；他说话简洁，不像知识分子那样绕弯子。”

在具体问题上，艾森豪威尔说，他没有结束朝鲜战争的秘密方法，指出轰炸鸭绿江对岸的危险性。他说，他愿意为“体面的停战协定”而努力。他拥护公民权利，但是他认为这是各个州的责任，因此他反对公平就业委员会。他要使经济摆脱“人为的直接立法手段的控制”，而依靠自由市场。对于麦卡锡的挑战，他提高声调说，他比任何人更坚决地“要把任何共产党、颠覆或赤色影响从我们政府的负责岗位上彻底清除掉”。至于说，谁要对丢掉中国负责，他再一次拒绝纠缠个人问题。

对外政策问题在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运动中占有特殊重要位置。在争夺入主白宫的过程中，就国际局势，他也发表了一些清醒的见解。他反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中国是不可能占领的。即使共产党撤退，让出了地盘，美国也无法去填补这些真空地带。”一旦发生战争，西欧是否能给美国以有效的军事援助，他是非常怀疑的。因此他说：“在现代战争中，取胜的唯一途径便是制止发生战争。”

艾森豪威尔明白，扩大朝鲜冲突的方针，孕育着外交连续反应的危险。因此，进攻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是一次对外政策的冒险，它给美国带来的严重后果是显而易见的。朝鲜战争证明，靠武力解决亚洲争端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而且它已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亚洲人民的心目中名声扫地。不仅需要寻找解决朝鲜问题的办法，还要制定美国新殖民主义政策的长期方针。

1952年10月1日，艾森豪威尔宣称，朝鲜战争的主要担子应当由南朝鲜人自己承担，而不是美国人。未来的总统说：“我们不想让亚洲把西方的白种人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假如那里必须进行战争，就让它是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而我们要支持的是捍卫自由事业的一方。”

竞选运动接近尾声。艾森豪威尔考虑到现实的政治局势，便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去注意亿万选民感到最迫切的难题。他越来越肯定地表示，朝鲜战争的和平解决势在必行。

10月29日，总统候选人宣称，美国不应永远陷在朝鲜的陷阱里，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美国只是在同真正敌人的辅助部队作战。11月3日，他进一步强调：“和平事业是自由人民眼中的瑰宝，新政府的第一个任务便是结束这场涉及美国千家万户、孕育着第三次世界大战危险的悲剧冲突。”

麦卡锡（1909—1957）美国参议员。1951—1954年间，一度操纵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搜集黑名单，进行非法审讯，采取法西斯手段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有麦卡锡主义之称。

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艾森豪威尔小心地降低他评论民主党腐败的调子，而他和其他共和党人加强了他们对政府中共产党同情者的攻击。反共产主义的刺耳声调使艾森豪威尔的一些东海岸支持者感到不安，尤其是爱德华·米德·厄尔。厄尔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厄尔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谈到他听到或者在报上看到对艾森豪威尔的剧烈抨击时，他感到的“精神上的痛苦”。艾森豪威尔非常尊重厄尔，而厄尔显然触到了他的痛处，或者引起某些内疚。他在回信中指出，民主党人造成了麦卡锡主义的横行。然而，他仍“谴责不公正的指控”，并说，“我不宽恕不公平”。他还向美国人民许诺，如果他当选，他将给他们带来和平与繁荣，平衡的预算，联邦政府机构的精简，白宫的尊严，并结束在华盛顿的共产主义和腐败现象。他认定这是美国人民所最需要的。

11月4日举行大选，投票结果艾森豪威尔获得33936234张选票，而史蒂文森获得27314992张选票，或者艾克的55.1%对史蒂文森的44.4%。艾森豪威尔获得442张选举人的选票，而史蒂文森仅获得89张。艾森豪威尔在共和党候选人名单中到处领先，尤其使他高兴的是，他在威斯康星州比麦卡锡多得10万张选票。

他设法使共和党在国会中占了多数。这一胜利使艾森豪威尔击败了民主党人，从而使他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欲知艾森豪威尔进入白宫后情况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六章 入主白宫

竞选胜利入白宫，就职大典闹哄哄；
诺言许下九千六，众目睽睽看其行。

1953年1月20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参加总统就职典礼。这天上午，艾森豪威尔一家由36位亲属和大约140位即将参加政府的成员陪同，在全国长老会教堂做礼拜。当他们回到斯塔特勒后，艾森豪威尔对玛咪说：“你对这类事情总是特别能注意举止得体。你认为我是否应当在我的就职演说中包括一段祷告？”玛咪很赞成这个意见，于是艾森豪威尔花了十分钟写了一个简短的祷词。然后，他乘车去白宫会见杜鲁门夫妇。

当艾森豪威尔的汽车到达白宫的门廊时，这位当选总统拒绝接受邀请进去喝杯咖啡，以表示他与杜鲁门总统的对立。艾森豪威尔坐在汽车内等杜鲁门出来，他们在冷冰冰的气氛下一起乘车去国会。据杜鲁门说，艾森豪威尔打破沉默说：“1948年，我没有参加您的就职典礼，是出于对您的考虑，因为我如果出席，我会从您那里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过去。”杜鲁门回敬了一句，他说：“艾克，要是您在那里的话，我不会请您参加！”

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走过圆形大厅，来到国会东面，那里为举行仪式建造了一个平台。一大群人喜气洋洋，这是美国历史上参加总统就职典礼人数最多的一次。共和党人以毫不掩饰的喜悦心情，前来出席庆祝活动。这天阳光明媚，大家一致认为，这是艾森豪威尔运气好。他穿着一件深蓝色双排扣大衣，颈上围了一条白色围巾，十分引人注目。

12时32分，弗雷德·文森大法官主持宣誓仪式。在艾森豪威尔发表就职演说时，他严肃坚定的表情，变成大家所熟悉的微笑。他把手高举过头，手指作V字形，表示胜利。人群中欢呼声停下来后，他就念当天上午所写的祷词，请求全能的上帝“使我们能全心全意为在场的人和全国各地同胞服务”。他没有忘记民主党人，接着又说：“但愿我们能合作，但愿在我们宪法概念指导下合作，成为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的共同目标，从而大家都能为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利益工作，为上帝的光荣效劳。阿门。”

然后，他开始他的就职演说：“全世界和我们已经度过一个挑战的世纪的一半。”演说中，他特别强调了战争的危险和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问题，说“我们目前不得不面临的挑战是，战争的危险和侵略成性的共产主义”。在专门谈到外交政策时，他答应他的政府“既不会妥协，也不会厌烦，更不会停止去寻求世界范围的体面和平”。但是，人民必须认识到，“善与恶的力量已在史所罕见地集结、武装和对立起来”。在这样的敌对气氛下，寻求和平的迫切性尤为紧迫，因为“科学似乎已准备赋予我们从这个星球消灭人类的力量，作为它最后的礼物”。

在此情况下，艾森豪威尔强调要加强和盟国之间的团结和协作。在谈到外援和对外贸易时，他坚持认为，在经济上闭关自守是没有安全的。美国需要市场，要得到原料。他表示坚决支持联合国。他还谈到了使他烦恼的生产率问题。他希望在农场和工厂中，产生更大的力量，更高的生产率，不管政治派别如何，大家都应该为振兴国家的经济而努力。在这篇演说中，艾森豪威尔没有谴责雅尔塔协定，没有对减税或保持预算平衡作出承诺。他的讲话，受到大部分在场人士的欢迎。

就职典礼结束之后，艾森豪威尔就开始主持白宫的工作。他认为只靠总

统发号施令是无济干事的。只有在千千万万人的帮助下，才能办成事情，才能有所成就。因此在职典礼之前，他首要的任务是筹组新的内阁班子。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就是挑选合适的人做合适的工作，并且和他们一起共事。他要的是有能力的、经过考验的工作人员，敢想敢于的人。他完全不需要去助长他的自负，或去炫耀他的决策或领导，他要“培养出”与他一道工作的人。依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就，懂得如何管理巨大企业的实业家，总是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他要的是有重大成就的人，那些能向他们请教，与他们同挑重担和共享荣誉的人。

在挑选他的内阁和白宫工作人员时，艾森豪威尔首先考虑的是国务卿这一重要岗位。他认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最合适的人选。杜勒斯出生在一个外交家世家，他的外祖父当过本杰明·哈里森的国务卿，他的舅父罗伯特·兰辛在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内担任过国务卿；1919年，杜勒斯是美国出席凡尔赛和平大会代表团中的成员；他是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高级成员，该事务所在国际交易中代表美国许多大公司的利益；他起草过日本和平条约，他是共和党过去十年外交政策的发言人。艾森豪威尔对谢尔曼·亚当斯解释道：“杜勒斯一生为担任这一职务而锻炼着。他对外交事务了如指掌，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

1952年4月，艾森豪威尔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首次见到杜勒斯。他曾与杜勒斯一起制订共和党纲领中的对外政策要点。尽管艾森豪威尔对杜勒斯某些好战言论，尤其是关于“解放共产党卫星国”以及“大规模报复”的思想不完全同意，但是他赞赏杜勒斯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态度。此外，艾森豪威尔对于杜勒斯对世界事务的渊博知识，有深刻的印象。

此外，艾森豪威尔确实喜欢杜勒斯。在这一点上，他是非常独特的。差不多每一个人都认为，杜勒斯自高自大得出奇，一本正经和古板得令人受不了。杜勒斯喜欢教训人，喜欢说教，喜欢夸夸其谈。甚至英国的贵族都不能容忍这种人。安东尼·艾登在1952年5月对艾森豪威尔说，他希望艾森豪威尔不要任命杜勒斯为国务卿，“因为我认为，我不能和他一起工作”。丘吉尔认为杜勒斯是一个愚蠢的人，很不愿意见到他。丘吉尔有意说不清楚他的名字，叫他“杜里士”。当丘吉尔知道杜勒斯的弟弟艾伦将成为中央情报局局长时，他哼了一声说：“他们告诉我还有一个‘杜里士’，这可能吗？”但是，艾森豪威尔确实非常欣赏这个人，当他把自己的决定通知杜勒斯时，杜勒斯非常感谢这位新总统，接着对艾森豪威尔说：“由于我对世界各国人民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了解，和您对有关政治问题的敏感性，我们将成为历史上最成功的班子。”

艾森豪威尔挑选的第二个人是约瑟夫·道奇，他请道奇与预算局一起制订1954年预算，明确向他表示，他要任命道奇为预算局局长。艾森豪威尔在德国认识道奇。道奇负责美国占领区的财政事务。道奇是底特律银行的总裁，精于财道，艾森豪威尔认为，让他把财政预算大关万无一失。

接着艾森豪威尔召集赫伯特·布朗内尔、谢尔曼·亚当斯和卢修斯·克莱到晨边山庄会晤。他请布朗内尔和克莱组织一个班子，向他提出其他内阁成员的任命的建议，由亚当斯协助他们工作。布朗内尔和克莱首先会见洛奇，向他提出，他可以在政府中担任任何他愿意担任的职务，但是同时告诉他，艾森豪威尔想要他或者任总统助理，或者任驻联合国大使。洛奇选择了后者。艾森豪威尔把这一职务提高到阁员的级别，仅次于国务卿。艾森豪威尔接着

请亚当斯任总统助理，其地位相当于阁员。他曾考虑由布朗内尔担任这个职务，但是，他最后决定要布朗内尔任司法部长。

与此同时，市朗内尔和克莱挑选了内阁中其他职位的人选。他们挑选世界上最大私人企业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查尔斯·威尔逊任国防部长，领导世界上这个最大的雇佣部门和采购部门。在美国企业界以最高薪的总经理闻名的威尔逊，会懂得如何管理这个巨大的五角大楼帝国。他们挑选乔治·汉弗莱任财政部长。汉弗莱是克利夫兰的马克·哈纳公司的董事长。这是一家有广泛业务活动的联合大企业。艾森豪威尔没有会见过他们俩人，但是他接受他的顾问们的推荐。他发现威尔逊目光短浅，办事简单，但是他非常喜欢汉弗莱。据艾森豪威尔的传记作者斯蒂芬·安布罗斯说，汉弗莱是内阁中除杜勒斯外，德怀特与之建立起密切的私人关系的唯一的一个人。他们差不多正好是同样害怕赤字财政，都喜欢打猎和钓鱼。在他们初次见面时，艾森豪威尔对着秃头的汉弗莱咧开嘴笑着说：“喂，乔治，我看你的头和我的一样！”汉弗莱在接受任命时，仅向新总统提出来一个条件：“假如有人对你提到钱的事，你告诉他去见乔治。”艾森豪威尔说：“我一定照办，属于你权限的事我绝不干预，更不会乱批条子！”

布朗内尔和克莱挑选俄勒冈州卸任州长道格拉斯·麦凯为内政部长。在进入政界前，麦凯曾是一名有成就的汽车商人。另一位保守派的商人马萨诸塞州的辛克莱·威克斯成了商务部长。艾森豪威尔让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阿瑟·萨默菲尔德担任邮政部长，农庄合作组织的代理人埃兹拉·塔夫脱·本森担任农业部长。

任命劳工部长是最棘手的问题之一。共和党预期会与有组织的劳工之间发生麻烦。经过多次物色、筛选，艾森豪威尔选中了芝加哥劳联的水电工人联合会主席马丁·德尔金。德尔金是内阁中唯一的民主党人，唯一的天主教徒。塔夫脱发现内阁中处理劳工关系的关键职务将由工会人士担任时，大吃一惊。他反对说：“这是不可理解的！”

艾森豪威尔挑选阁员的方法相当特殊，但其目的性却十分明确，大多数部长的年龄与总统大致相同。他的第一个内阁被称之为“八个百万富翁和一个自来水工人的政府”。艾森豪威尔的部长们真像精选出来的一样，都是各实业界中实力雄厚的财主。这反映了垄断集团在艾森豪威尔的政府中有决定性的作用。很明显，聘请一个“自来水工人”当部长是为了陪衬。他在享有特权的内阁成员中也没有待多久，便“很快离任了，从而内阁中的反常现象也就消失了”。

艾森豪威尔进入白宫后，千头万绪，但生活很有规律。大约在6时左右，他悄悄地起来，以免惊醒玛咪。吃过早点后，开始读早报。他读报非常快，能很快熟悉报纸上的主要新闻。他通常看华盛顿出版的报纸，如《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他还经常阅读新闻杂志。他和杜鲁门不一样，从不给报纸的编辑寄去表示愤怒的信件，但是他会给报社捎去几句表扬某一篇文章或某一栏目的话。要是他不满意某一栏目或报道，他就告诉他的亲密朋友，或者一声不响。他不反对批评他的政策和行动，但对批评他的私人生活却很反感。这也只不过是对他的亲人们发发牢骚而已。

艾森豪威尔非常遵守工作时间。他以军人的纪律要求自己。8点准时来到办公室，一直工作到下午：点，中间不休息。他吃午饭时，大部分时间也谈工作。接着埋头一直工作到下午6时，有时还晚些。有许多各种各样的问

题要他作出决定。他尽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作决定。他使自己接触各种观点，这要求他阅读大量材料，认真听取口头汇报和提出许多深刻的问题。在办公室工作一天后，他会喝一杯鸡尾酒轻松一下。他严格限制自己饮酒。他通常的限量是在就餐前喝一杯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或白兰地。除了他自己做的饭菜外，对吃些什么，他都没有多大兴趣。

使玛咪一直苦恼的是，不管什么东西摆在他的面前，他都是囫囵吞下。当了总统后，开始另外一种吃饭方式，一面看电视晚间新闻，一面吃饭。晚饭后，如果没有讲演或其他约会，他就研究文件、报告、建议，直到深夜 11 点，然后在上床前画一个小时的画。他的床头读物是一些西部故事。在这些小说中，没有什么复杂曲折的情节，结局是一目了然的，因为这些故事都是根据容易回答的是或非的问题来写的。读这类小说，艾森豪威尔用不着动脑筋而进入幻想世界，只会使他得到必要的休息。玛咪说，这些小说对于艾森豪威尔是最好的催眠剂。

艾森豪威尔和玛咪的关系是幸福的。除了德怀特担任欧洲远征军总司令时外，他们一直生活在一起。

1946 年在迈那堡，玛咪专门定做了一张很大的双人床。1948 年这张床从华盛顿搬到纽约。现在玛咪又把这张床摆在白宫内。玛咪说，她喜欢在半夜翻身：“我想随时拍拍艾克的光头。”这张床是玛咪的指挥基地。她喜欢躺在床上，起码一直躺到中午，有时一整天。她在床上写回信，指挥管理家务，接待来访的人。

事实上，玛咪对丈夫十分忠诚，是他生活上不可缺少的助手。她虽然不参与艾森豪威尔的工作，但是她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都给他重要帮助。当她的丈夫成为世界性人物时，她克服她原来的羞怯心理，而成为他的事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她款待他的有钱有势的朋友们和他们的妻子。她还出席或主持许多大型的社会活动。她仔细地答复每封来信。她还记住给艾森豪威尔工作班子的助手、顾问、秘书们，以及他们的孩子，在他们生日和圣诞节时送礼物。在公共场合，她站在艾森豪威尔将军身旁，穿着得体入时，显得快活。总之，她做到了艾森豪威尔要求妻子所要做到的一切。

艾森豪威尔是在美国困难时刻开始执政的。在过去的 20 年中，美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流血大战。在西方国家发动的“冷战”厮杀声中，这位著名的将军成了白宫的主人。共和党执政当局遇到了棘手的国内问题，而这些问题又与其对外政策问题紧密相关。尤其是侵朝战争已成了艾森豪威尔面临的第一大难题。欲知这一问题如何解决，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七章 朝鲜停战

侵朝战争众怒怨，损兵折将又费钱；
艾克对此伤脑筋，当务之急是停战。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蓄意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历时三载的战争，美军伤亡数十万，耗资上百亿，结果却是美国开国以来的第一次战而无胜之役。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自命不凡的“美国世纪”的鼓吹者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最为沉重的打击。尽管这绝非唯一的和最后的打击，但美国的衰落却由此显露端倪。

美国政坛老手艾夫里尔·哈里曼谈到朝鲜战争时，曾称它是“一场苦涩的战争”。哈里·杜鲁门总统则顽固地认为，这不过是一场“警察行动”，甚至当美国的伤亡突破五万大关时，他还坚持这令人恼怒的委婉说法。共和党把它称为“本世纪对外政策的蠢举妄动”，并以此为杀手锏，结束了民主党对白宫的16年统治。“老实说，这是一场军事上的奇灾大祸，”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说：“这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敌人，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朝鲜战争是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冒险。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正式爆发。第三天，6月27日，美国就正式参战，并以武力霸占中国领土台湾。7月7日，美国盗用联合国的旗号，组织由美国军官指挥的所谓联合国军，残暴屠杀朝鲜居民，朝鲜人民军奋起反击，至8月中旬把美伪军驱至釜山一隅。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悍然北犯，战争规模进一步升级，并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严重威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

到了8月底9月初，美军和李承晚的部队已到达离新义州只有20公里的地方，只要一个钟头就可以兵临安东城下。华尔街的音板们公开叫喊，要把新生的中国“扼死在摇篮里”。几条指向中国沈阳的粗大而醒目的进攻箭头，已不再掩饰地出现在五角大楼勺军事地图上。麦克阿瑟扬言：“鸭绿江并不是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朝鲜在危难中，中国也在危难中，世界和平也在危难中！

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岂能逆来顺受！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说：“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950年10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在分析了朝鲜战场形势后指出：“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讲话，中国政府的声明，迅速传遍全中国、全世界，一张张谴责美帝、声援朝鲜的宣言发自全中国；北京成立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和朝鲜运动委员会，各地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从华中到东北，军队进行着调遣，向鸭绿江边集结。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拯救和平，中国人民组成志愿军，准备赴朝参战。一个民族又毫不情愿地被逼向战争的边缘。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如下的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各级领导同志们：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迅

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三）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对我们有利，对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将军的率领下，于 1950 年 10 月 25 日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朝中部队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把美军和李承晚部队从鸭绿江边逐回三八线附近。美国舆论界把这次失败称之为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的军事败绩。有的要求撤麦克阿瑟的职，有的要求撤换艾奇逊，还有的要求“打扫国务院”。

面对着中朝人民的奋力抗击，杜鲁门进行原子讹诈，他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关于对朝鲜进行原子打击的问题。这一声明，在美国和国际舆论中，激起了强大的愤怒之波，使白宫不得不急急忙忙往回缩。尽管麦卡锡主义嚣张一时，反战运动仍在美国兴起，并在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后蓬勃发展。书信和请愿书雪片般飞往白宫，普通的美国人坚决要求新总统履行选举前的诺言，停止朝鲜战争。在一封致艾森豪威尔的信中是这样说的：“请想一想朝鲜战争所造成的苦难和不幸。我相信，假如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在忍受这种痛苦，我们定要设法终止这场战争。”

朝鲜战争进一步揭穿了美国的反动面目。还在 1949 年 6 月 29 日，社勒斯在一份秘密文件中就写道：“美国的对外政策在亚洲已经破产。”朝鲜战争使这个政策处于灾难边缘。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联合抗击，使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美军和李承晚的部队招架不住，不断向南方撤退，到 1950 年 12 月中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被收复，局势已开始明朗，战争对美国将是旷日持久的和前途暗淡的。麦克阿瑟恼羞成怒，坚决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原子轰炸，并和蒋介石军队一道对大陆进行登陆作战。这位将军还公开抨击杜鲁门的政策。

1951 年 4 月 11 日，美国总统撤掉了麦克阿瑟驻朝司令官的职务。

很多人认为，麦克阿瑟被撤职的主要原因是这位 70 岁的宿将表现了拿破仑的派头，不愿执行“预备役上校”杜鲁门的不在行的指示。杜鲁门和麦克阿瑟个人关系的紧张，显然对麦克阿瑟的退役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决定性的作用还是美军在朝鲜的惨败。麦克阿瑟在其长期的军事生涯行将结束的时候，身不由己地扮演了美国对外冒险政策的替罪羊的角色，在决定他的命运时，势力强大、忧心忡忡的美国垄断集团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担心，胆大妄为的最高司令官一旦使用原子武器，就会挑起同中国甚至和苏联的战争，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是无可挽回的。

麦克阿瑟回到美国后，到参议院作证。他这时再次提出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交战的方案。看来，朝鲜战争的经验，已使五角大楼的将军们能够比较冷静地看待事物，而他们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有决定性的意义。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说，麦克阿瑟的战略把美国拖入了一场错误战争的深渊。

就在这个时候，在美国面前出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怎样来结束这场实际上打输了的战争，同时又避免投降，“保留住面子”。必须尽快地结束这场战争，这不仅因为美国在朝鲜遭到军事上的失败，还因为它遭到了政治上的挫折，正是在朝鲜这里，美国的盟友第一次用“忘恩负义”来报答美国为执行马歇尔计划而花费的数十亿美援，报答美国在战后最初年代为使资本主义欧洲和日本的经济、政治稳定而付出的心血。

美国本来指望，一旦战争开始，它的盟友就会根据华盛顿的一道命令，派来所需要的“炮灰”。美国政策原来考虑的是，美国盟友派到前线若干个师的兵力，而美国将主要发挥军火库和指挥棒的作用。结果事与愿违。不管白宫如何施加压力，盟国都不急于向朝鲜派遣本国士兵。在整个战争过程中，美国人不得不承担战争的军事、经济、政治和道义上的主要担子。这种沉重的超负荷，有可能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宣告破产。艾森豪威尔 1950 年 12 月 30 日写给国防部长弗兰克·佩斯的信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在信中说：“美国并不那么强大，能够把全世界都背在自己肩上。”

帝国主义同盟者对朝鲜战争所尽力量的平衡表证明，进行这场不受欢迎的战争的主要负担确实压在美国身上。哈里·已利斯 1953 年 4 月：日向艾森豪威尔总统报告：“现在，在两年零九个月的无出路的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已完全被北朝鲜人和中国共产党人阻止住了。”他是作为小组领导人去台湾解决保障“共同安全”问题刚刚返回美国的。根据巴利斯的计算，美国向朝鲜派遣了 35 万军人，南朝鲜拥有 40 万军人，而这场军事冒险的其他 17 个参加国总共派了 35000 人。巴利斯写道：“美国人民不仅要质问我国政府，而且还要质问联合国及其所有成员国，什么时候能在朝鲜采取有效措施，以便停止这场前途无望的战争。”

1951 年 7 月 10 日，陷入军事政治困境的美国，在世界和美国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开始了关于朝鲜停战的谈判。然而，谈判困难重重，直到 1952 年美国竞选运动开始前，谈判实际上毫无进展。这种局面向艾森豪威尔提供了有利机会，使他得以利用反战情绪取得选举的胜利，同时还能设法达到同朝鲜的“体面和解”。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蝶蝶不休他说：“新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地和体面地停止朝鲜战争……为达到此目的，如需要我亲自去朝鲜一趟，我一定前往。”他在另一次演说中说：“我们能够防止类似朝鲜战争这样的新的战争。我们有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

根据约翰·艾森豪威尔的回忆录判断，这位年轻的美军少校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反战思想的。反战思想在美国青年中特别普遍，因为战争要他们不是在大学讲坛上或外交论坛上进行战斗，而是直接在战场上。约翰也曾到朝鲜参战。他的父亲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在约翰动身去朝鲜之前，他同儿子进行了长时间的严肃谈话。谈话涉猎甚广：谈到如何安排约翰妻子的生活，由谁照看他的小孩。然而主要还是艾森豪威尔对儿子的临别赠言：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当敌人的俘虏”。

美国人民为朝鲜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强调指出：“除了国内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外，这次是美国历史上流血最多的一次战争。”美国在朝鲜的伤亡和被俘人数约 39,8 万人，而美国的所有其他

盟国（南朝鲜除外）共损失 2.9 万人。

在竞选运动过程中，艾森豪威尔曾主张进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这个办法的目的是，如果美国不能从欧洲盟友那里搞到士兵，就用亚洲盟友的。然而，转向亚洲的政策同样也是无前途的，连装备精良的强大美军用三年多的时间都未能打败一向被华盛顿一些人士瞧不起的“亚洲人”，那么南朝鲜傀儡政权的军队则更是力所不能及的了。

出路只有一个：尽快签订和平协定。但是，在签订和约的路途上又出现了一个预想不到的障碍。年事已高的南朝鲜总统李承晚，突然表现出了令人吃惊的好战性。他企图利用北朝鲜和中国战俘问题，破坏和平谈判，并使战事再起。李承晚十分狂妄，宣称如果需要，南朝鲜军队将单独战斗到“最后胜利”，美国极右势力也跟着叫嚷：“不消灭共产势力决不罢休！”

李承晚和美国右派的战争叫嚣，再次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愤怒。美国的反战运动方兴未艾。要求停止战争的无数信件、请愿书、呼吁书飞向白宫。一封来自明尼苏达州的致艾森豪威尔的呼吁书说：“全世界 90% 以上的居民，对朝鲜战争怀有愤懑之情，你一点也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你只能指望大型报纸、电台、通用汽车公司、杜邦公司的帮助。”这份致总统的呼吁书还指出，关于朝鲜战争可以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和全世界蔓延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战争永远不能遏制共产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共产主义在俄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以共产主义在半个世界的胜利而告结束。新的世界大战将是何种结局？谁知道呢？有可能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胜”。呼吁书的作者代表明尼苏达州的选民坚决要求停止在朝鲜的军事冒险。

公众反对朝鲜战争的激烈情绪是使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的一个重大因素。而 1953 年 7 月 26 日使朝鲜大炮静止下来的停战，则是他的总统任期内的里程碑之一。

当艾森豪威尔进入白宫的时候，这个陷入僵局的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 6 个月零 26 天，当时他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他的党内最强硬的分子所赞成的，那就是扩大战争，进行大规模的海空攻势，以“击败共产党中国，然后粉碎鸭绿江以南的全部共军，从而统一朝鲜”。这同麦克阿瑟于 1951 年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著名的备忘录有某些共同之处。他在这份备忘录中建议：“一、对中国实行海上封锁；二、轰击大陆上的基地和军事中心；三、在朝鲜使用国民党军队；四、鼓励台湾对沿海地区进行袭击。”

另一条路是为了获得“一种光荣的和平”，即在杜鲁门政府时期所确定的范围内，继续进行板门店谈判，求得“体面解决”。

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后，最先作出的重大决策之一，就是选择后一条道路，在分裂的朝鲜的敌对双方军队之间寻求停战。他要使美国力量“不再消耗在这种外围战争上去，这种战争对于同共产主义作斗争来说，没有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希望”。他相信结束这场战争是美国人民最迫切的要求。

1953 年 3 月，艾森豪威尔在内阁会议上说：“在朝鲜对共军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地面攻势，需要付出大量的人力和金钱的代价。自从 1951 年 7 月 10 日停战谈判在开城开始以来的一年半中间，一度动荡不定的战线已经稳定下来了，共方已经抓紧了这个时机在他们那边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如今，再发动攻势就更困难了。”

而且，作为一名军人，艾森豪威尔完全懂得，对中国发动进攻的后果重大而又难以预测，他说：“这一进攻如果终于发动了的话，就很可能不得不

在得不到我们主要盟国的支持的情况下进行，因为他们对于任何这种冒险都是反对的……因此，我认为，我们在朝鲜打仗，没有机会打赢这场战争，因为打过鸭绿江就会冒犯国际舆论。”

为了尽早地结束这场“令人伤脑筋”的战争，在就职典礼前，艾森豪威尔就在杜勒斯和太平洋舰队司令阿瑟·雷德福海军上将的陪同下，前往朝鲜考察。他们得到的印象是，“美国在亚洲只采取了杂乱的不协调的守势，而并没有一个真正有效的长期、全面的战略计划”。

艾森豪威尔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分布太广，尤其在亚洲，把大多的军队驻扎在足以受共产党牵制的地点。雷德福不主张这样分散的部署方式，而赞成把美国的力量集中在北美洲或北美附近，成为一支战略性的后备力量。经过这样的部署，“前线的防务将主要由非共产党国家正在建立的当地军队来负担；万一发生战争，美国的机动力量可以静待机会向敌人的要害出击”。

具有同一见解的杜勒斯，极力推销他两年多来一直在鼓吹的主张，就是建立一支强大的进攻力量，“用来威慑共产党，使其不敢从事战争”。他的理由是，美国不大可能沿着共产党这么大的整个地区，在四周都驻上充分和固定的防御力量，虽然他们也许会从这些地区出击。他说：“美国应该用维持一支足以迅速地向侵略大本营还击的巨大报复力量的办法，来集中力量吓退进攻，而不要把防御力量到处分散。”所讨论的这一点，就是美国“大规模报复”政策的先声。

雷德福和新任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两人都觉得将来亚洲在冷战中是一个重点。艾森豪威尔一方面承认亚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又说，西方不能解决它在亚洲所面临的许多问题，除非等到欧洲强盛之后才有可能。他的论点是，一旦西欧拥有了维持和保卫它自己的力量，并能使全世界感到它的威力时，亚洲问题就达到了“可以解决的地步”。

朝鲜之行对最后选中雷德福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位当选的总统在军队工作时就认识雷德福，可是威尔逊却从来没有遇见过雷德福。艾森豪威尔曾要求国防部长推荐一位接替陆军上将奥马尔·布雷德利的职务的人，因为后者已经当了两任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他的任期将在下一年8月届满。艾森豪威尔觉得新任主席应该由一位赞成在亚洲实施远大的战略这种观点的军官来担任，从这一点上来说，雷德福当然是这样一个人。关于这件事，还有一点是当选总统必须考虑的，就是多年来共和党一直在指责说，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太偏重欧洲而很少注意亚洲。艾森豪威尔正在寻觅一位适当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的经历一定要表示出他对远东抱有浓厚的兴趣。在雷德福的资历里，这一点比任何人都突出。最后，艾森豪威尔和威尔逊对雷德福在朝鲜之行中的表现大为赞赏。

在“海伦娜号”巡洋舰上时，艾森豪威尔获悉，12月5日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在纽约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宣称：他对朝鲜冲突有“一个明确具体的解决办法，而且这个办法不会增加挑起全球冲突的危险”。麦克阿瑟不愿公开说他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愿意向艾森豪威尔透露，如果总统对此有兴趣的话。当时，在“海伦娜号”上，艾森豪威尔的顾问中，有几个人不太相信这句话，他们怀疑当选总统在这个关头同麦克阿瑟牵连在一起是否明智。艾森豪威尔说：“为什么不？麦克阿瑟毕竟是一个伟大的军人。”他和这位前远东司令虽然在某些事情上有不同意见，但是他觉得同麦克阿瑟商谈并没有什么坏处。

这一点决定了，可是艾森豪威尔的这一批人中有几个人仍觉得拍给麦克阿瑟的任何电报应该保守秘密，但是当选总统又表示反对。他说，为什么不应该听听麦克阿瑟的建议呢？他以习惯的口吻说道，不论谁有任何好的意见，他都愿意倾听。他拍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麦克阿瑟，其中有一段说：“多谢你公开表示愿意同我讨论这些问题，并向你肯定地表示我期待着同你作非正式的晤谈；我和我的同僚们可以因此而得悉你的全部意见和经验。”

12月9日，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詹姆斯·哈格蒂公布了这封电报和回电。麦克阿瑟在电报中表示谢忱，并说：“我特别感谢你，因为虽然由于我个人在职务上同这件事有着特别密切的联系，而自从我回国以来，官方对我的意见所表示的兴趣，即使是极轻微的兴趣，这也还是第一次。”

报纸刊登了这两个往返电报后，读者中有一位勃然大怒起来，他就是杜鲁门总统，他在参加他岳母葬礼之后，正从密苏里的独立城回到华盛顿去。火车到达西弗吉尼亚时，晨报已经放在他的车厢里了。他叫他的新闻秘书洛哲·德贝发表声明说，如果麦克阿瑟真的有一个结束战争而不会引起更大规模的战争的计划，他应该立即呈报给有关当局——总统。第二天在他的记者招待会上，杜鲁门仍然心里冒火，对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大肆攻击。他说，他怀疑麦克阿瑟有行得通的结束战争的计划，杜鲁门宣称：至于艾森豪威尔，他的朝鲜之行不过是实行竞选诺言的一种迷惑人心的举动罢了。这句话使艾森豪威尔大为光火。

艾森豪威尔进入白宫之后，就采取各种步骤，逐步解决朝鲜问题。

4月11日，在板门店达成了关于交换病伤战俘的协议。

5月22日起，杜勒斯访问印度，同尼赫鲁会谈了三天。杜勒斯希望他的话能通过外交途径传到中国人的耳朵里去，他告诉尼赫鲁说，美国“愿意光荣地结束战争”。

5月29日，美国内阁中再度提出了朝鲜问题。副国务卿史密斯回顾了停战谈判最近进行的情况。他也提到了他从俄亥俄州参议员共和党人布克·希肯鲁伯那里听到的一个消息，那就是“单独干”的情绪在国会中正在增长。史密斯对内阁说，他相信“这是由于国会对于要是美国在亚洲单独行动对付共产主义就将落在美国身上的严重义务，认识不足”。他说，从国会对停战谈判的抨击，可以看出某些国会议员担心，无论如何“停战会使共产党中国被接纳入联合国”。

甚至在6月间，当板门店谈判取得进展的时候，李承晚又顽强地反对，“任何使朝鲜处于分裂状态的协议”。这位78岁的南朝鲜总统通知美国说，他要求：

“第一，不可更改地答应，如果停战后90天以内召开的国际政治会议没有能统一朝鲜的话，美国就帮助大韩民国以武力统一朝鲜。第二，同意如果政治会议开会90天而仍然没有产生解决办法时，就重新恢复战争。”

6月6日，艾森豪威尔写信给李承晚，扼要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他在信中说：“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我们必须决定到底是继续以战争来进行统一朝鲜的斗争呢，还是以政治和其他方法来追求此项目标……我深信，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和大韩民国有必要接受停战。我们没有理由为了希望以武力达成朝鲜的统一而使这一苦难丛生的战争拖长下去。”艾森豪威尔还答应：“美国政府，在取得必要的国会拨款的条件下，准备继续给予大韩民国以经济援助，这将使它得以在和平状况下恢复它的饱受摧残的国土。”

然而，李承晚拒绝停战的条款，说：“按照目前的条款，停战对我们意味着死亡。我们一贯要求应该把中共军队赶出我们的国土，即使在这样作时，我们不得不单独作战也在所不惜。”与此同时，南朝鲜国民议会表决“一致反对停战条款”，同时汉城和其他南朝鲜城市到处爆发了所谓“反对停战的示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奉命于6月26日会见了李承晚，“耐心地”向他说明了美国的立场，并许诺战后美国帮助南朝鲜重新建设。并使李承晚明白，“在任何情况下美国都要实行停战”。经过两周的会谈和施加压力，李承晚让步了，并且书面答应使他的军队处于“联合国军”的指挥之下。7月11日，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说，为了尊重艾森豪威尔的意志，他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的实施。在同一天，李承晚写信给杜勒斯说，虽然他对于停战条款心存疑虑，但是他将放弃他的信念而对美国的政策让步。李向杜勒斯提出保证，虽然南朝鲜不同停战发生关系，但是南朝鲜政府将遵守停战，以便“给联合国一个通过政治协议来统一朝鲜的机会”。杜勒斯在7月17日对内阁说，由于罗伯逊“耐心而坚定”地同李承晚进行交涉的结果，罗伯逊的任务完成了。

1953年7月26日下午9时38分（美国时间），白宫接到板门店关于朝鲜停战协议签字的消息。艾森豪威尔准备在10点钟发表广播讲话。他坐在广播室内维多利亚女王赠给白宫的那张雕花橡木大写字台前等候广播的时候，一个摄影记者问道：“你有什么感想？”

艾森豪威尔微笑着答道：“战争过去了，我希望我的儿子不久就能回家来。”

他对美国听众的演说并不长，他表示对战斗和伤亡的结束非常高兴。他说，射击已经停止，这是他以“感恩的祈祷”由衷地欢迎的一件事。然而，他仍认为，有必要提醒美国人民，“我们仅在一个战场上赢得了停战——而不是世界和平。我们现在不能放松警惕，也不能停止我们对和平的追求”。他引用林肯的话来结束他这次低调的演说：“不与人交恶，而与人为善。”

对此，美国政治评论家约瑟夫·格登指出：“朝鲜战争，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和外交战略的转折点，它标志美国第一次试图通过诉诸武力来阻止共产主义军事扩张的冒险行动，而且是这类冒险行动的漫漫长路上的第一步。果不其然，就在朝鲜战争刚开始两个月，美国就给在印度支那的法国人送去了第一批军事援助，以资助其与当地的起义者作战，后来这场起义演变成了越南战争。无论结果如何，美国在以后的十年中，把国家的资源，加上声望名誉，越来越多地投到东南亚、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为了保持这种力量，即使在‘和平年代’里，也要消耗美国联邦政府年度预算的一半，并使美国的无数儿子在世界最遥远的地方枕戈待旦。”

“在美国不甚愉快的经历中，朝鲜战争算是其中的一个。”约瑟夫·格登进一步写道，“当它结束之后，大多数美国人都急于把它从记忆的罅隙中轻轻抹掉。出于某一原因，朝鲜战争是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美国使朝鲜处于僵待状态，同共产党中国这个庞大而落后的亚洲国家打成了平手。尽管美国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武器，中国则以人海战术和对国际政治巧妙的纵横捭阖，制服了美国现代化的军事力量。”

朝鲜战争，美国遭到了惨败，被迫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美国政府是否接受教训？欲知艾森豪威尔今后对外政策动向，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八章 艾森豪威尔主义

第三世界大造反，解放运动火连天；
艾克政府害了怕，千方百计搞欺骗。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并没有接受失败的教训，而是打着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幌子，大肆进行侵略扩张，填补所谓“政治真空地带”。正如中东地区一些公众舆论所指出的：“艾森豪威尔主义是一个奴役新近走上独立发展道路国家的人民的大规模计划，是地地道道的殖民主义，是一种新的侵略工具。”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连任总统的就职典礼上惊呼：“新兴力量和新兴国家在全世界崛起进行斗争。从北非的沙漠到南太平洋的岛屿，1/3 的人类进入了一场争取新的自由——摆脱极度贫困的历史性斗争。”尤其是苏伊士事件使艾森豪威尔惨痛地认识到，第三世界对美国的重要性。他告诉美国同仁说：“没有人能独自生存，如果第三世界的生活条件得不到改善，它就要变成共产党。如果其他国家不繁荣，美国的繁荣甚至也不能维持下去。”他要求民主党和共和党必须正视现实，采取适应当前斗争的新的对外政策。艾森豪威尔最关心的是，如果第三世界“赤化”，西方将得不到原料，美国的经济也将受到严重的削弱和影响。

1956年7月26日，埃及政府宣布将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这一举动，在西方世界引起了震惊。为了对埃及进行报复，三个西方帝国主义大国英国、法国和美国，抛开它们之间的矛盾而纠合起来了。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埃及把苏伊士运河公司收归国有，这是对整个世界挑战，是对摇摇欲坠的殖民主义体系的又一次打击。资产阶级报刊议论说，谁能担保其他国家不会仿效埃及，谁能担保整个殖民主义体系的环节不会发生“连锁反应”？而这种反应按美国著名政治评论家华尔特·李普曼的说法，将使“整个殖民主义体系彻底崩溃”。《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撰文说：埃及的例子“会推动其他有可能抓住现今世界自由贸易的孔道的小国也采取这样的行动。例如，叙利亚和约旦就可能要求中断经过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到地中海的石油管输油的权利。西班牙就可能要求封闭直布罗陀海峡的权利，而巴拿马就可能考虑为什么它不能封闭巴拿马运河。这会带来数不清的灾祸”。

由此可见，孤注一掷的不仅是处于英法两国控制下的苏伊士运河的前途问题，而且也是近东一切帝国主义势力的前途问题。《纽约时报》在1956年10月露骨地写道：“英国失去什么，我们也就失去什么。英国并不仅仅是我们主要的盟国。它和我们分享着近东丰富无比的石油财富的主要部分。”

《纽约先驱论坛报》在1956年8月7日写道：“苏伊士仍旧是西方在中东的威力和影响的标志。”英法两国的报刊也这样写着。法国《世界报》指出：“苏伊士运河……这是个标志。一旦这个标志倒塌，那么堤坝就将溃决……国有化将一个跟着一个接踵而至。所有的石油公司都将遭到破产……这就是对西方威望的最后一击。”

就在西方报刊厚颜无耻地把运河称为“西方的标志”的同时，埃及纳赛尔总统在8月12日广播说：“苏伊士运河标志着帝国主义，标志着外国的势力，而埃及正是为反对这一点而斗争的。”

在西方列强对埃及所采取的这种恐吓和威胁的政策中，发起者是美国。一切指望用威胁迫使埃及放弃自己的主权并取消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计划，

都是在华盛顿制定的。美国国务卿 8 月 16 日至 23 日，在关于苏伊士运河问题的伦敦会议上，提出的所谓“杜勒斯计划”，其实质在于禁止埃及管理运河并把运河永远交归某种国际机构管理。其目的是恢复近东殖民主义秩序的稳固，为冲突制造借口。“杜勒斯计划”遭到埃及的反对，纳赛尔说：“对苏伊士运河的国际管制，这是一种新式的帝国主义，集体的帝国主义。”

当“杜勒斯计划”显然已经遭到彻底失败时，在华盛顿又制定了一个挑衅方案，即建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来接收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切权利，同时，美国声明它要参加这个“协会”。这同美国政客们所谓美国只是与苏伊士问题“无利害关系的调停人”这种令人作呕的言论，是有着惊人的矛盾的。

成立“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的方案，与臭名远扬的“杜勒斯计划”一样，又制造了一个同埃及冲突的借口。杜勒斯所建议的对埃及的经济制裁，规定了对苏伊士运河实行抵制。这种抵制打算用两种办法实现：第一，减少从近东供应西欧国家的石油，而相应地增加从美洲大陆上美国领土供应石油；第二，减少通过苏伊士运河输送的石油到最低限度，而利用绕过非洲的迂回路线。无须特别解释就可以明白，这些措施只对美国有利，对其余的一切西方国家却带来了巨大损失。西欧国家的收支已不平衡，它们的黄金和美元的储备已消耗殆尽，又从哪里去取得美元呢？正如美国报纸《每日新闻》所供认的：华盛顿背着它的同盟者并靠损害它们的利益来准备“把中东大部分经济事务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

由此可见，美国一切关于所谓“和平”解决苏伊士问题的建议，其实质就是用威胁手段迫使埃及放弃自己的主权，取消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国有化，以便在对运河实行“国际管制”的幌子下达到美国独占的目的。但是，埃及政府不畏强暴，坚决拒绝了西方列强关于由外国建立对运河管制的一切要求和最后通牒。埃及政府强调指出，诸如此类的管制都是损害埃及的主权、剥夺它的独立的。纳赛尔总统在揭露美国“国际管制”计划的实质时说：

“难道在独立和不独立之间能够折中解决吗？”埃及《人民报》写道：“埃及坚持它的立场，因为真理在它这方面，而威胁和恐吓的策略必遭破产。”

为了维护美国垄断阶级的利益，1957 年 3 月 9 日，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美国对中近东的政治纲领，它的具体内容就是所谓“艾森豪威尔主义”。艾森豪威尔在致国会的咨文里，企图把它说成是美国对外政策中一个新的、“被迫”采取的步骤，是为了“保证”和平和自由免受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而由美国政府承担起来的沉重“负担”。其实，这个政策是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斗争中的一个新阶段。在美国的扩张计划中，中近东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美国近东问题专家霍斯金斯，早在 1954 年出版的一本书里就说明了美国对待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他曾露骨地宣称：中近东各国人民的政治趋向，对于任何想夺取世界霸权的集团说来，都是一个首要问题。”

近东对美国所具有的意义还在于，这个地区不仅拥有资本主义世界石油蕴藏量的 2/3，而且地处欧亚非的中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了夺取这一地区的石油资源，美国和英国的垄断组织之间，早就进行着剧烈的斗争。美国统治集团很早以来就梦想在近东的主要阵地上将英国排挤出去，取代这个老牌的殖民国家的地位，建立自己的独占统治。

艾森豪威尔主义的纲领规定：第一，“同中东一般地区的任何一个国家

或国家集团进行经济合作和援助”以发展他们的经济；第二，“对这个地区希望获得军事援助的任何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执行军事援助的计划”；第三，在近东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以“保护”这个地区的国家免受“国际共产主义的侵略”。为了这个目的，美国拨出两亿美元由总统支配。艾森豪威尔宣称，美国“对于任何其他国家人民并不谋求建立政治或经济的统治，而只是关心中东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只是对他们提供援助”。

美国渗透中近东的历史事实证明，美国对于这个远隔几万公里的地区兴趣的增加决不是偶然的，决不是关心近东各国人民的“自由”和“安全”。这个兴趣的发生不仅由于本地区的巨大的地下资源，这些资源使石油垄断组织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过去，也出于帝国主义的战略考虑。

中近东的石油资源确实巨大。这里拥有资本主义世界所已发现的石油蕴藏量的70%。而问题不仅止于此。近东石油对于帝国主义重大的意义还有其他方面。

首先，资本主义垄断组织花费在近东石油开采上的代价是特别低廉的。这是因为这里的油井生产率很高。每口油井平均每天可产石油4000桶（每桶约合135公斤），而在委内瑞拉为230桶，在美国仅为11桶。此外，由于对当地工人加强剥削的结果，石油垄断组织在劳动力上花费的代价非常低廉。当地石油工人通常每昼夜工作10—12小时，而所得工资则是美国石油工人的1/7。如果石油垄断组织每年从每个美国工人身上剥削4000—5000美元，那末，例如，在科威特的油田上，它们每年可从每个工人身上剥削40000美元，即几乎多了9倍。

这就是近东石油开采成本低廉的原因。当时，每吨石油开采的成本在0.75美元和2.40美元之间，而每吨售价则平均在15美元左右。由此可见，石油垄断组织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近东能取得那样高额的利润，它们在近东开采石油，每吨的利润竟是成本的400%。

美国垄断资本，为了获取最大利润，不仅关心石油的有利开采条件，而且也关心有利的销售条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指出：“近东的石油是如此之多，问题不仅在于对它的开采，同样也在于运输和销售。”向西欧国家销售石油可获取最大的利润。那里的统计资料证明，西欧国家自近东进口的石油占其需要量的85%。例如，法国自近东进口的石油在1955年占其需要量的94%。正如美国垄断组织的机关刊物《华尔街与商业研究杂志》所供认的，“中东石油对于欧洲是绝对必要的”。

当“艾森豪威尔主义”刚出笼的时候，美国垄断组织在近东拥有的石油资源总值计2750亿美元，为了开发这些资源，美国垄断组织已向近东国家投资20亿美元。美国垄断组织从其投资中攫取的巨额利润，比之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区的石油公司的利润要高出好多倍。石油垄断组织获得的利润，在美国为10%，在南美为25%，而在中近东则为75%。正因为如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中东地区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50年代，中近东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这对艾森豪威尔的对外政策方针不能不产生影响。美国在这里的政策，首先是由美国石油垄断集团的利益和该地区对世界的重要政治军事意义所决定。巨大的石油蕴藏量、苏伊士运河、这个区域直接靠近苏联和东欧的地理位置，所有这些都像磁体一样，吸引着美国的注视。

艾森豪威尔还在担任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时，就着手和积极探讨中

近东的对外政策问题。

1951年4月29日，摩萨台政府在伊朗执政，并做出了石油开采工业和石油加工工业实行国有化的重要决定。这是整个战后时期对帝国主义大国在中近东的石油利益的第一次沉重的打击。美国曾公开试图利用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来“填补”由于英国丧失在该国的阵地而出现的“真空”。但是，美国控制取代英国控制的前景并不符合伊朗人的意愿。美国统治集团占领英国在伊朗丧失的阵地的愿望，未能取得成功。美国担心民主运动进一步发展，便与英国人联合起来，共同投入了反摩萨台政府的斗争。

丘吉尔认为，伊朗事件具有国际性质，因为它开创了一个损害帝国主义大国在第三世界“合法”经济权利的不合西方世界心意的先例。不到北约司令部办公室去要求保护自己的“权利”，还能到哪儿去？1951年7月5日，丘吉尔要求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向美国发报，请求支持英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在英美策划共同制裁伊朗国有化的运动过程中，艾森豪威尔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这是他在北约武装部队最高司令官岗位上最初的行动之一。

但是，摩萨台政府并没有停止不前，毅然采取了像同英国断绝经济和外交关系这样的果断措施。这一行动之后，伊朗不得不向美国请求经济援助。美国方面则给予了坚决回绝。艾森豪威尔对本国的立场做了如下的解释：“我拒绝为了使摩萨台摆脱贫困而把更多的金钱投入一个混乱的国家，因为他处境烦恼的根源在他拒绝与英国商订一项协议。”

受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伊朗国内反动派，于1953年8月得手，推翻了摩萨台政府。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这个行动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具有亲西方倾向的伊朗新政府立即就从美国得到了价值45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艾森豪威尔写道：“在这次危机中，美国为支持国王做了一切能做的事……在国王凯旋归国时，我向他发了电报。”

伊朗争取石油国有化的斗争，虽然遇到了挫折，但这一斗争却在中东引起了巨大反响。该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力量不断壮大。正如事态的不断发展所表明的，1952年埃及革命的胜利意义尤为重大。这一切都迫使美国采取紧急措施，联合帝国主义大国和当地反动政权的力量来共同对付进步力量。

在文森豪威尔政府积极倡议和策划下，1952年2月，产生了被称之为巴格达条约的新的军事集团，参加该集团的国家有英国、法国、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美国与巴格达条约的有效范围相距很远，为避免声誉受损，没有公开参加这个目的在于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集团。文森豪威尔当局的算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来更能随心所欲行动。美国参加这个集团还可能妨碍它今后实现另一个打算：占据在民族解放运动压力下英法在这地方丢失的地盘。

伊朗和埃及事件，仅仅是中东民族革命进程积极发展的开端。后来又发生了一些极深刻的社会政治变化，发展下去会根本改变这个广阔地区的整个面貌。特别是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事件，更引起西方的严重震惊。当时在中东，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已经开了头。以色列开始跃跃欲试，想在阿拉伯东方充当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突击力量。以上这些情况，就是“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的总背景。

美国统治集团竭力想利用英法两国地位的削弱而在近东出现“力量真空”的借口来为自己的侵略政策辩护。按照这种理论，如果在世界某一部分

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因为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而被迫撤退，那就会形成一个空白地带，即一种“真空”。为了保持西方世界的势力，美国就应当来填补这个“真空”。每当需要为美国的侵略意图寻找论据时就提出这种理论，这是美国殖民主义的明显反映。正因为如此，中东各国人民才把美国的“真空理论”看作是对自己的最大侮辱，是对他们内政粗暴的干涉。

因此，“艾森豪威尔主义”一出笼就像瘟疫一样遭到中东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埃及《政治局刊》主编鲁兹·优素福著文说：“艾森豪威尔主义是建立在美国的陈旧的‘皮鞭和蜜饼’政策原则上的，这个政策早就破产了。现在大家知道，美援不仅不会带来利益，而是相反地会破坏接受美援国家的经济，就像在土耳其、伊朗那样。”叙利亚议员豪拉尼说：“阿拉伯人民坚决反对损害他们独立和主权的军事和经济的援助。”他进一步指出，“美援计划的目的是煽动侵略、破坏中东的一切稳定。”不论美国的政客们怎样巧妙地为美国的侵略政策辩护，对中东各国人民来说，美国政策的帝国主义实质却是十分明显的。要想对那些数十年来为美国垄断组织的油田做牛马并为他们的业主带来巨额利润的阿拉伯人掩盖“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实质，是很困难的。他们知道，这个侵略性的“主义”，既不是为了保护中近东各国人民，也不是为了帮助他们。

美国的政客们把艾森豪威尔给中近东国家以“援助”的诺言提到了首要地位。他们指望，刚取得政治独立的阿拉伯各国人民都有着尽快消除自己经济落后的愿望。埃及总统纳赛尔说：“我们的主要愿望就是提高我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反对外国的奴役和剥削。”

美国统治集团对“保持独立”这个规定所硬加的含义，杜勒斯在国会讨论“艾森豪威尔主义”时曾加以说明：“我们这个规定是指同共产主义作斗争。”这样，提供美援就是以政治条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军事条件来决定的。美国政府就是用这些手法再次来完成石油垄断组织的任务的。这些垄断组织，正如1956年1月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给艾森豪威尔的秘密信中所强调的，要求给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能有助于“将来我们可能会面临的任何军事任务的完成”。美国企图以此迫使阿拉伯国家放弃和平共处的政策，放弃他们所坚持的符合“万隆精神”的积极中立的立场。

由此可见，实施“艾森豪威尔主义”的最初的企图证明，这是一个圈套，美帝国主义想以空谈“援助”为掩护，引诱阿拉伯各国人民落入这个圈套，以便对他们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美帝国主义者，不仅在中东，而且用同样的方法来保持自己对受其支配的在拉丁美洲的领地，以及在亚洲一些国家的统治。对于1954年的危地马拉事件，人们记忆犹新。当时美帝国主义者对奋起为自己的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人民进行了镇压。总计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帝国主义为了巩固北美洲垄断组织的阵地，对拉美国家组织了100多次武装干涉。1950年7月31日，美国国务院公报发表的材料表明，从1832年到1932年的100年内美国在亚洲进行了43次武装干涉。

美国殖民史上的丑恶事实，迫使美国资产阶级教授罗伯特·马凯维尔在他写的《更完善的联盟》一书中作了如下有趣的自白：“在东方国家，生活着世界人口的大部分，它们在国际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长。这些国家不信任我们的友谊，也不相信我们的话，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对待这些国家代表人物的态度远不像在他们国家里对待任何一个美国人的态度……对待他们就

像对待下贱的人一样。”这就是华盛顿想输往国外的大肆吹嘘的美国式的“自由”。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主义”允诺给各国人民的是什么呢？它所允诺的是使国际局势更加紧张，挑起新的军事冲突，在近东建立新的战争策源地。它威胁着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所已取得的伟大成就。阿拉伯国家人民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致谴责确凿地表明，英法者殖民者的可耻命运，正等待着力图在中东、在世界建立自己统治的美国帝国主义。

欲知艾森豪威尔对亚洲对中国的所作所为，且看下文分解。

第二十九章 台湾海峡危机

台湾海峡风浪激，中国人民不可欺；
炮打金门示惩罚，“反攻”叫嚣调门低。

艾森豪威尔在入主白宫期间，奉行扶蒋反华的反动政策，在台湾海峡曾多次掀起恶浪，酿成严重危机。美帝的侵略行径，遭到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

1950年夏天，杜鲁门政府在发动侵略朝鲜战争的同时，即派第七舰队耀武扬威闯进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妄想把台湾当作“不沉的航空母舰”，帮助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威胁太平洋和平和侵略东南亚国家。那时，“苦撑待变”的蒋介石也大作其“收复大陆，重返金陵故都”的美梦，他高喊着：“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四年成功。”然而曾几何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调子越唱越低了。蒋介石集团悄悄地摘掉“军事反攻”的招牌，而代之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美国侵略者也陷入它自己编织的罗网中，而且愈来愈难以逃脱。正像《纽约时报》所说：“我们（美国）愚蠢地一步一步跟着向前走，我们让国民党收复大陆的迷梦，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处境进退两难的恶梦中。”美国民主党议员汉弗莱也供认，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困境”。

继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之后，1954年12月2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公开和蒋介石订立“共同防御条约”，在台湾海峡加紧扩大侵略战争的部署。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卡涅当时宣布，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部队已“处于准备停当状态”，“可以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任何任务”。美国间谍机关“西方企业公司”，积极地在中国沿海金门、马祖、白犬、大陈等岛设立特务机关，对大陆派遣特务，发展“游击武装”，建立“游击基地”，以配合正面“反攻大陆”。美国军事顾问团直接帮助蒋介石在中国沿海岛屿构筑“反攻大陆”的前哨阵地，利用海岛上的险峻地形，在滩头和纵深建筑了永久性、半永久性的明、暗碉堡，设置了重重铁丝网，并且在岛的四周和岩缝里，埋下了大量的地雷和爆炸物。当时路透社的记者兰金说，“美国要在亚洲大陆上和中国共产党作战”了。

早在1953年2月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向驻日本东京的美国远东军总司令发布如下一道命令：“现行紧急指令中关于保证台湾和澎湖列岛不被用作中国国民党向中国大陆作战的基地的那部分，现在予以撤销。”

杜勒斯根据他同艾森豪威尔共同作出的决定，在总统就职前，在华盛顿起草的国情咨文中就含有这样的意思。他们两人很少，或者说没有向军事顾问们征询意见就这样做了。可是在1月30日艾森豪威尔向内阁提出来后，威尔逊说，这个问题不久会在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地反响。他问：这个命令是否含有任何足以影响美国 and 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用意在否？艾森豪威尔回答说：“目前这个要采取的行动一点也不含有这种用意。”他向内阁保证：这个声明字面上说什么就是什么，没有其他用意在否。

然而，这个命令发出后的第二天，安东尼·艾登向下议院说，伦敦已向美国提出抗议，警告它这一行动也许会“遭到十分不幸的反应，而无补于军事优势”。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说：“这个命令加重了世界上的恐惧病。”从此，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就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支持和纵容下，

不时地对大陆进行骚扰，在台湾海峡造成了严重的局势。

面对着美蒋的战争挑衅，中国人民解放军在 1955 年 1 月 18 日一举解放了美蒋苦心经营的护卫台湾的大门——大陈岛的前哨阵地——一江山岛。

艾森豪威尔和蒋介石 1954 年 12 月 2 日在华盛顿签订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宣称，美蒋将采取行动对付“共同危险”。蒋介石以为有了美国这张“保险单”，解放军就不敢进攻他所占据的任何海岛。但是中国共产党偏不信这个邪，12 月 8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声明，指出这个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为了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主权，就在这个声明发表一个月后，1955 年 1 月 18 日，解放军奉命向一江山岛发起进攻。攻势凌厉。至中午，岛上蒋军阵地、工事、通讯遭受严重破坏，各部队间已失去联络。午后，解放军以小型登陆艇为主体的登陆船队，分由南田至海门一带港湾驶出，在大型作战舰队掩护下，向一江山岛海岸抢滩登陆。激战 53 小时后全岛解放。国民党守军司令王生明，顽固抵抗，“浴血奋战”，结果作了蒋介石的牺牲品。为了使其余海岛上蒋军避免被歼的命运，1955 年 2 月 5 日美国国务院不得不宣布，艾森豪威尔政府已下令第七舰队和其他美国部队“协助”蒋军从大陈、南鹿、渔山列岛等海岛撤退到台湾。

对此，美籍华人作家江南发表评论说：“一江山是个弹丸之地，中共必争，且无畏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所标榜的‘战争边缘’政策，发动三军，强行夺取。其中颇多奥秘。”他又写道：“毛泽东紧接着协防条约签订之后不久而用兵，一方面考验美国的真实意向，一方面给蒋猛掴一掌，告诉台湾军民，有这个条约，解放军还是想打就打，别以为条约是万灵符！”

一江山之解放，台湾军队中几乎没有人再相信蒋介石能打回去的神话，而且解放军矛头所向，已指大陈岛。这可急坏了蒋介石，于是，在艾森豪威尔的“劝逼下”，急派蒋经国来到大陈岛，执行撤退大陈岛居民的“金刚计划”。消息一传出，岛上百姓惊慌不已，因为宣布“疏散”的理由十分吓人，说什么“最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这是为“确保生命”所采取的措施。蒋经国在大陈岛住了近十天。2 月 8 日撤退这一天，可谓兴师动众。台湾政府的国防部长俞大维、海军总司令梁序昭、国防部第三厅副厅长蒋纬国同时到达，指挥撤退，岛上 33777 人，在美军第七舰队的保护下，乘着各式各样的船只，开始分批撤离。岛上随之实行“坚壁清野”。撤退时，岛上居民痛哭流涕，他们不理解：“为何要离弃世代相守的家园赴台呢？”

一江山惨败，大陈岛放弃，台湾全岛一片沮丧气氛。大陈守军和居民撤离前，蒋经国自太昭舰上带来一面国旗，举行升旗仪式。这位蒋太子强自镇静勉励大家，“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此刻我们要决心打回来。”然后，他默默地领着岛上的军政官员沈之岳、刘毅夫等走遍了大陈街道，而后到了海边。这次大陈的撤退，虽然没有五年前海南、舟山那么令人震撼，却因而谱出“反攻无望论”的凄厉乐章，谁再相信蒋介石在草山别墅发出的“我带你们回大陆”的梦话呢？

在艾森豪威尔对第七舰队发出训令前后，那些很久以来就主张在远东采取强硬政策的人，重新提出了对中国实行海上封锁的建议。例如，当时担任参议院共和党政策委员会主席的诺兰，表示赞成美国必要时单独实行封锁。塔夫脱对此也表示同意。他说，如果可以实行封锁，而又不引起盟国发生分裂的话，那么进行封锁是“适宜的”。这一主张不仅遭到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对，西方盟国也不赞成，英国人说，他们所以反对这一主张，不仅因为封锁

会影响他们同中国人之间的贸易，而且也因为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担心实行封锁将导致同中国进行战争，甚至会因此引起新的世界大战。

艾森豪威尔扶蒋反华的政策，到处碰壁，使他伤透了脑筋。他的身体也不如从前了。1957年11月25日午饭过后，艾森豪威尔到他的办公室。坐在办公桌前，开始在一些信件上签名，突然间他感到一阵头晕。他挣脱这种感觉，伸出手去拿另外一封信。当拿起来时，他觉得信里的字好像跑出来似的。于是，他沮丧、迷惑，无力地放下笔。他感到一阵头晕，尔后摊倒在椅子上。他按铃要秘书怀特曼进来。当怀特曼进来时，他想告诉她出了什么事，只见他话语不清，语无伦次。怀特曼惊呆了。她赶紧叫隔壁办公室的安迪·古德帕斯特过来，抓住艾森豪威尔的手臂，帮助他从椅子中站起来，扶他朝门口走去，对他说：“总统先生，我想我们应当送你到床上去。”艾森豪威尔在古德帕斯特的搀扶下，行走并不觉困难，也不感到任何痛楚。他们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寝室，他们帮他脱衣服躺下。当医生到来时，他已经睡着了。

总统的保健医生斯奈德请来两位神经科专家，随后玛咪和他们的儿子约翰也来了。初步诊断是轻微中风。斯奈德猜测，总统的脑中有一根小的毛细管发生痉挛。总统助理兼办公厅主任谢尔曼·亚当斯在会客室参加到他们中间。他说已经打电话给尼克松，要副总统在当天晚上代替总统出席国宴。这时卧室的门打开了，艾森豪威尔站在那里，穿着浴衣和拖鞋，脸上露出笑容。这使大家都大吃一惊。在他坐下来时，玛咪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艾克，你起来干什么？”他轻声地、慢慢地、语音不清地说：“我为什么不该起来？我还要去出席宴会。”斯奈德、玛咪、约翰和亚当斯都异口同声地反对他去。在大家的劝说和强制下，又把总统送到床上去休息。

他睡得很舒服，约翰和斯奈德晚上在床边轮流陪着他。早上，医生们发现他的脉搏正常。然而，他说话还是有困难。他指着墙上一幅水彩画，想说出这幅画的名字，但是说不出来。他越想说，越感到沮丧。他在宽大的双人床上翻来覆去，用拳头敲打床单。约翰、斯奈德和玛咪大声喊出所能想到的任何一个词，直到玛咪最后终于想起了这个标题：《走私犯》，她脱口而出。艾森豪威尔向她摆摆指头，要求重复一遍。尽管他听了第二遍，但还是说不出来。他倒下躺在床上，精疲力竭地睡了。

次日，11月27日，星期三，艾森豪威尔除了说话有时不清楚外，感到身体好多了。又不顾大家的劝阻，开始处理文件了。在感恩节时，他和玛咪上教堂，然后在星期五驱车到葛底斯堡去过周末。这时，他的说话功能基本恢复了，但对某些多音节长字说不清楚，这使他感到恼火。他担心这样下去就不能履行总统的职责了。

真正使美国垄断集团烦恼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两年内三次生病的消息。艾森豪威尔以67岁这样的高龄，完成他第二届任期余下的三年的任务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更令人惊慌不安的，是艾森豪威尔无论在体力上，或者在更糟糕的精神上，不能胜任工作的这一前景。万一总统认识不到自己不胜任工作、因此不能将权力移交给尼克松时，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万一他精神不正常那又怎么办呢？

星期天上午，在葛底斯堡，总统看到报纸上都登满建议。沃尔特·李普曼建议艾森豪威尔将权力移交给尼克松；很多编辑和专栏作家敦促他辞职。对艾森豪威尔产生的影响是，使他在星期一早上加强了担负起全部职责的决心，从而证明他已完全康复，能够完成他的工作。艾森豪威尔的决心引起了

他的助手们的恐慌，他们要他至少再休息几天。杰里·珀森斯在下午1时45分打电话给杜勒斯，说总统决定恢复工作。杜勒斯说：“他认识不到他需要休息，这件事本身是一个很不好的迹象。”于是杜勒斯又说：“必须有人来掌握局势。”

杜勒斯是内阁中的高级成员，是最接近艾森豪威尔的人。下午2时，他打电话对副总统尼克松说：“我们有可能遇上总统不能执行职务，而自己又意识不到的这种情况。”他对此感到不安，心想：“我们该不该宣布他不能胜任？”如果他们阻止艾森豪威尔工作，“这就成了威尔逊问题的翻版，妒忌和篡权”。

杜勒斯放下电话，又打电话到葛底斯堡，这次是和陪伴斯奈德到宾夕法尼亚去的一位军医谈话。这位医生告诉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报纸很恼火，说要他辞职“对他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他目前感觉非常好”。此外，医生说，艾森豪威尔想回去工作，并不是一个坏主意，因为“继续沮丧下去”比“积极参加工作”更糟；但是，他仍希望总统多休息几天。杜勒斯说，如果总统思想方法正确，应当接受医生的劝告。然而，艾森豪威尔执意工作。他说，如果在这次生病后三个星期，他不能去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他认为那时再提出他“退位”这一严肃的问题。

从此，艾森豪威尔拖着他沉重的、疲惫的病体，继续执行他那“国际宪兵”的任务。1958年8月，台湾蒋介石集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金门和马祖发生冲突。艾森豪威尔是在8月25日获悉这次最新的危机的。当时，他正在北卡罗来纳山中地下深处的防弹掩蔽所里，周围都是最先进的电子仪器。他在参加一年一度的“行动”演习。

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作了情况汇报。台湾国民党当局一直在不断增加他们在金门、马祖的兵力，达到十万人之多，占蒋介石的总兵力的1/3。中国人民解放军抗议这一挑衅行动，但不起作用。8月24日，解放军炮击国民党军盘踞的这两个岛屿。杜勒斯说，大炮轰击所造成的有形损失是轻微的，尽管伤亡不小。他预料“中共将对这两个岛屿实行封锁，企图使守军挨饿”。

艾森豪威尔听了杜勒斯的汇报，认为有危险的远不止是金门和马祖。运用他的多米诺理论的想象力，他预言如果失去金门和马祖，这会“导致失去台湾”，这将威胁“日本、菲律宾、泰国、越南，甚至冲绳未来的安全……因而将使美国的根本利益受到严重的损失”。8月29日，艾森豪威尔急忙回到华盛顿，下令从第六舰队调出两艘航空母舰驶过苏伊士运河，加入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艾森豪威尔声称，如果中共真的企图“侵占”金门和马祖，他将考虑批准“对共产党中国的机场使用战术原子武器”。

9月4日，艾森豪威尔与古德帕斯特和福斯特·杜勒斯会晤，讨论下一步怎么办。杜勒斯全力支持使用战术原子弹。艾森豪威尔犹豫不决。根据杜勒斯关于这次谈话的备忘录，他当时告诉总统：“我认为，当我们决定把这些武器包括在我们的武库之中时，我们已经承认使用这些武器要冒政治和心理上的风险。”根据古德帕斯特的记录：“杜勒斯先生把注意力指向有关原子武器的问题上，提醒说，我们已经使我们的国防适应于在任何规模的冲突中使用这些武器，他说，当情况危急时，如果我们由于世界舆论的反对而不

1919年威尔逊总统生病，杜勒斯的舅父罗伯特·兰辛当时担任国务卿。兰辛想掌握政府，他劝威尔逊辞职，结果被驱逐出阁。

使用它们，我们必须修改我们的国防部署。”艾森豪威尔指出，假如美国使用原子武器攻击中共的机场，“共产党很可能用核武器攻击台湾来报复”。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准备批准使用原子弹的”。

两天以后，9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就台湾海峡地区局势发表声明。他说：“1958年9月4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授权之下发表声明，公然威胁要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略范围，进行战争挑衅，从而加剧了美国在这个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使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为此，我受权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

声明说：“台湾和澎湖列岛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们已经由日本的一度侵占归还了中国。中国人民行使主权解放这些地区，完全是中国的内政。这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美国政府自己也曾经正式声明不在台湾地区卷入中国的内政。如果不是因为美国政府后来背弃自己的声明进行了武装干涉，台湾和澎湖列岛早已获得解放，早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管辖之下。这是全世界一切公正舆论所一致承认的不可抹煞的事实。”

声明谴责美国支持盘踞在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早已被全中国人民唾弃的蒋介石集团，并且直接用武力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是干涉中国内政，是侵犯中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是同联合国宪章和一切国际法准则直接冲突的。声明说：“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签订的任何所谓条约和美国国会通过的任何有关的决议，对于中国人民是完全无效的，它们决不能使美国的侵略行为合法化，更不能成为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扩大侵略范围的借口。”

声明最后强调指出：“中国政府完全有权对盘踞在沿海岛屿的蒋介石部队给予坚决的打击和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任何外来的干涉，都是侵犯中国主权的罪恶行为。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中存在着像金门、马祖这些岛屿的直接威胁。美国的任何战争挑衅都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相反地，只会激起六万万人民更大的愤怒和更坚强的同美国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美国一些政界人士和报纸对美国政府在台湾地区的冒险活动，感到不安。他们不同意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挑衅，担心这会使美国陷入一场战争之中。

美国统一独立社会党竞选委员会反对美国政府在远东的冒险政策。它打电报给艾森豪威尔说：“我们（美国）的军队驻在中国领土上是对全世界和平的威胁。我们呼吁立即从金门和马祖以及这些岛屿四周的海面上撤出美国军队，以防止把美国 and 整个世界卷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要求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再干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政。”

由一些著名的民主党人组成的“美国民主行动协会”8月5日写信给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他们在信中说，美国没有义务去“保卫”金门和马祖，美国人不会同意为这个问题卷入战争。信中指出，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来使金门和马祖继续处在蒋介石分子的控制下，实际上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这个行动将得不到任何美国的主要盟国的支持。

民主党参议员莫尔斯8月4日晚上要求美国国会立即召开特别会议来制

止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采取“战争边缘”的外交政策。

他认为美国无权保卫像金门和马祖这些岛上的中国国民党人。他说：“如果我们（美国）去保卫他们，我们就会被斥为侵略国，而且事实上也的确是。”

民主党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也担心美国在台湾地区的挑衅行动引起战争的危險。8月5日，他要求艾森豪威尔政府“冷静考虑问题”，并且要求政府在作出任何决定前同国会领袖磋商。

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指责政府在向“错误的道路上滑下去”。他说：“看来，我们正在晕头转向或者满不在乎地听任自己卷入和中国的战争中去。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既没有朋友，又没有盟国，为的是政府没有向人民说明而且不值得牺牲一个美国人的生命的问题。”

美国公众不满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的挑衅政策，纷纷写信给报纸，反对杜勒斯的好战声明。美国国务卿8月4日声明说：“美国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福摩萨）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这一声明引起美国广大公众的愤慨。《每日镜报》刊载一读者来信说：“美国有什么权力决定中国岛屿的命运？难道朝鲜的教训对美国还不够吗？！”《纽约邮报》的读者来信质问美国政府：“为了支持从中国大陆赶出来的卖国政权，你们打算牺牲多少美国人的性命？”

面对着美国侵略者的挑衅，9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明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信心。毛泽东说：美国侵略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同侵占黎巴嫩和在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一样，只是替自己的脖子套上绞索。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制造紧张局势，同在黎巴嫩以及其他地方制造紧张局势一样，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事实的真象难道不是如此吗？难道美国侵略政策近来的每一次施展，不是越来越显得荒谬和疯狂，不是把美帝国主义越来越推向在国际和国内完全孤立的绝境吗？这种事实难道会让我们伟大的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伟大的人民有丝毫害怕吗？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美国侵略者这一套，只能征服那些时刻准备着向美国的原子弹、氢弹和美国的小麦、美国金元屈膝投降的机会主义者，而在我们创造着新历史的大无畏的人民看来，美国侵略者手里的一切法宝，不过是在人类前进道路上一些还没有扫除，还在散发着臭气的垃圾罢了。美国的决策者们决心非要收紧他们套在自己脖子上的绞索不可，那么就让他们这样做吧！

毛泽东的讲话，武装了中国人民的头脑，进一步鼓起了中国人民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从9月7日到11日，仅仅五天的时间，全国各地就有2.12亿人参加了规模空前的反对美帝的大示威。中国人民的斗争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9月7日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警告他必须悬崖勒马，否则必将招致恶果；中国六亿人民强大不可战胜，美国张牙舞爪必会激起全世界的公愤。在9月19日的信中再次强调：“对中国的侵略就是对苏联的侵略。美国不撤离台湾、远东就没有和平。原子讹诈吓不倒苏联，也吓不倒中国。如果美国竟然对中国发动原子进攻，那么它就将立即遭到应有的同类武器的反击。”

中国政府在这场斗争中，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掌握分寸，恰到好处。

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向台湾、金门、马祖军民同胞发表文告，建议国共双方举行谈判，和平解决争端。文告说：“为了人道主义，我已命令福建前线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地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如有护航不在此例。”10月13日，彭德怀向前线发布命令，对金门炮击再停两个星期。

彭德怀元帅在命令中说：“金门炮击，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无损于己，有益于人。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1000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65000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

“台湾发言人说：停停打打，打打停停，不过是共产党的一条诡计。停停打打，确是如此，但非诡计。”彭德怀说，“你们不要和谈，打是免不了的。在你们采取现在这种顽固态度期间，我们是有自由权的，要打就打，要停就停。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嚷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

“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不大高明。即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彭德怀说，“台、澎、金、马整个地区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统一，这是我们65000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门海线，美国人不得护航，如有护航，立即开炮。切切此令！”

然而，停止炮击后，台湾当局毫无悔悟。他们坚持顽固态度，拒不接受和谈，加紧战争准备，高叫反攻大陆。而且还邀请杜勒斯到台湾活动，策划进一步实施“美蒋条约”。于是彭德怀元帅，于10月20日，命令前线恢复炮击，以示惩罚。

金门炮声，使杜勒斯在赴台途中惊慌失措，美国当局承认计划已被打乱。据当时西方通讯社报道，在中国恢复炮击的消息宣布后，正在乘飞机前往台北途中到达阿拉斯加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立即在美国时间清晨5时30分（北京时间10月20日下午5时30分），从阿拉斯加州费尔班克斯打电话，给正在美国西部科罗拉多州丹佛准备前往西海岸作竞选旅行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把他从睡梦中叫醒谈了十分钟。同时，美国务院和杜勒斯之间，国务院和艾森豪威尔之间，杜勒斯和刚刚到达台北的助理国务卿罗伯逊之间，进行了多次长途电话商谈。经过这些商谈，艾森豪威尔最后决定指示杜勒斯继续前往台北。随后，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的新闻秘书哈格蒂分别就这事发表了声明。

杜勒斯声明说，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恢复对金门蒋军的炮击，预定即将举行的他和蒋介石之间的会谈“不可能具有在停火情况下本来可能具有的那种范围和性质”。他又说：“尽管这样，我相信举行磋商会是有益的。”杜勒斯在这里以无可奈何的腔调承认：他在美蒋会谈中的原计划被打乱了。

在台湾海峡危机之时，正值亚当斯事件处于高潮，禁止核试验的辩论在激烈进行，而黎巴嫩危机还没有解决……艾森豪威尔捉襟见肘，焦头烂额。他把 1958 年说成是“一生中倒霉的一年”。他说，以“八”结尾的年份，总好像是他倒霉的一年。艾森豪威尔回忆说，在 1918 年，他错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28 年，他在巴黎写一本书，但使他有一种在他的事业中停顿不前的感觉。1938 年，他在菲律宾的最后一年，他与麦克阿瑟有过一些艰苦的斗争，并且担心他将永远不能离开这些岛屿或这个人。

1948 年，他从军队退休，到哥伦比亚大学当校长，他在那里感到很失意，很不满意。在 1958 年，他心脏病发作，发现自己经常与他的主要对外政策顾问以及国会意见不合，失去了谢尔曼·亚当斯和刘易斯·施特劳斯，经受了一系列国际危机和一次经济衰退，因而不得不预期共和党在下届选举中将遭到重大失败。因此，他盼望退休，回到农场过田园生活。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谢尔曼·亚当斯是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助理。由于艾森豪威尔的内外政策遭到失败，引起国内外人民的反对。共和党内，要求艾森豪威尔政策的主要制定人——亚当斯辞职。

第三十章 告别白宫

告别白宫回家园，两届总统任期满；
秋风萧瑟吹枯叶，书画写作度晚年。

到了1960年1月20日，艾森豪威尔还有一年的任期。那天早上，他对秘书安·怀特曼谈到今后的打算。他说，他计划搞点写作，不知道怀特曼是否愿意到葛底斯堡去，在那里搞起一个办公室，以便他在那里安心写他在白宫期间的回忆录。

怀特曼在她的日记中写道：“我说，我愿意做他要我去做的任何事情。艾森豪威尔说，他曾认为，他心甘情愿地为国家牺牲了八年他的生活，他并不认为我会在他成了平民后还乐意这样做。我说，这是他所曾说过的最愚蠢的话，我对他的忠诚，十倍于对我的国家的献身。他承认可能是如此。”

艾森豪威尔已经把他的文件都交给政府，以便最后可以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内分类处理，以供学者们使用。艾森豪威尔图书馆是用堪萨斯州阿比伦的艾森豪威尔基金会的私人资金建的。然而，怀特曼保存的大批材料，其中包括大部分的私人信件，电话记录摘要，内阁会议记录等等，将首先送到葛底斯堡去，艾森豪威尔将在那里用这些文件来写他的回忆录。他的儿子约翰计划在1961年1月20日辞去他的职务，同意担任文件保管员和帮助他的父亲写回忆录。

在那个期间，1960年初，艾森豪威尔主要考虑的是他的退休。

然而，几乎所有其他的美国政治家都在考虑即将举行的总统选举。艾森豪威尔冷眼旁观民主党争取提名的斗争，他对肯尼迪经常不断地提到“导弹差距”以及其他夸大其词的谈论，表示愤怒和厌恶，例如，在4月26日的一次共和党集会上，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告诉总统，肯尼迪在前天说，1700万美国人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艾森豪威尔嗤之以鼻，然后说：“他们一定都在忌食！”

同样，他对共和党提名洛克菲勒作为候选人也不赞成。他很早以前就认定，洛克菲勒没有当总统的智慧和品格。他给洛克菲勒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赤字财政以及要求更多的国防经费表示惋惜。他认为，这位纽约州长在国防开支方面的立场是肯尼迪的应声虫，对民主党利用此事于党派斗争，也使他大为恼火。艾森豪威尔在1月13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含蓄地指责我是从党派的立场出发来处理整个国防事务，我不认为是善意的。”他拿出他的杀手锏，指出：“对于国防问题，我付出了毕生精力，在这方面，我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多！”

在与共和党领袖们私下会见时，艾氏对民主党的候选人的鞭挞是毫不留情的。他谈到肯尼迪、赛明顿和其他一些人“使用赌博手段和吓唬人民，来逃避谋害的罪责”。艾氏怀疑：“抨击者们究竟需要多大的威慑力量！他们是不是就想制造更多和更大的‘大力神’火箭去存放在仓库里？这是极不合情理的。”然而，在削减国防开支方面，艾森豪威尔实际上是在孤军作战。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意支持他，新的国防部长汤姆·盖茨、原子能委员会主席麦科恩以及共和党领袖们也都不支持他。此外，白宫的新闻记者们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一边。记者招待会上向他提出的问题，毫无例外都带有敌意：“为什么美国不作更多的事情？我们何时能赶上俄国？总统不怕苏联的第一次打击吗？总统坚持健全的财政不在危及国家的安全吗？”但是，艾氏坚持

认为：“美国的国防不仅是强大的，而且是令人生畏的。”

1960年初，艾森豪威尔拟订了禁止核试验条约，继之以进行某种“实际的裁军”。这是他在总统任期内，最后工作的“主要目标”，以便退休后，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美好的印象”。5月14日，艾森豪威尔带着他的计划，前赴巴黎参加首脑会议。但他一抵达法国首都就遇到赫鲁晓夫的挑战。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一项书面声明中说，如果艾森豪威尔不公开为美国U—2飞机侵犯苏联领空公开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件，苏联将不参加首脑会议。对此，艾氏十分尴尬。第二天，5月16日，艾森豪威尔与麦克米伦共进早餐。他对英国首相说：“在我们使用卫星之前，美国空军将不再进行误入苏境的这类飞行。”麦克米伦说，赫鲁晓夫对U—2飞机激动不安。他认为澄清这一点，在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讨论时，可能具有“很大价值”。

艾氏本想在会上首先发言，说明美国的态度和对裁军的立场，但是，会议的东道主戴高乐刚刚宣布开会，赫鲁晓夫就站起来要求发言。赫氏发表长篇激烈演说，批评美国政府和艾森豪威尔的战争政策。他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戴高乐打断他的话，转身对苏联的翻译说：“这间房子的音响效果极好，我们都能听见部长会议主席的话，他没有必要提高他的嗓门。”待译员翻译后，赫鲁晓夫向戴高乐愤愤地瞪了一眼，于是压低声音继续发言。

赫鲁晓夫很快激动得甚至更加厉害。他指指他的头上喊道：“有人飞越我的头顶！”戴高乐再次扫断他的话说：“也有人飞越过我的头顶。”赫鲁晓夫不相信地问道：“是您的美国盟友吗？”戴高乐回答：“是您。昨天就在您离开莫斯科前，您为了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而发射的那颗卫星，没有得到我的允许，飞越法国上空18次。我怎能知道您在卫星上没有照相机，拍摄我们国家的相片？”艾森豪威尔向着为他解围的戴高乐咧着嘴笑笑。这时，赫鲁晓夫双手举过头说：“上帝给我作证，我的手是干净的。您难道以为我会做这样的事情？”赫鲁晓夫最后发表一项声明说，艾森豪威尔不再在苏联受到欢迎，以此结束他的发言。

艾森豪威尔随后发言。他说，赫鲁晓夫没有必要这样走极端，取消他的邀请；他到巴黎来是希望参加严肃的讨论，他希望会议现在进行实质性问题的讨论。赫鲁晓夫和苏联代表团愤然走出会议室。结果会议不欢而散。这是艾氏在白宫期间最后一次参加首脑会议，这是一次处境狼狈而最没有成果的会议。

艾氏从巴黎首脑会议回来之后，又忙于国内的竞选活动。7月26日，他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他不谈尼克松接管椭圆形办公室的资格，而是谈他自己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这次会议之后，艾森豪威尔想说服肯尼迪降低他批评国防政策的调子。他指示中央情报局长艾伦·杜勒斯向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人作简要情况介绍。艾氏要求杜勒斯强调美国国防态势如何坚强。但是，在情况介绍中，杜勒斯只想谈柏林、古巴、伊朗、中东、台湾、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刚果局势的发展。民主党参议员们只对竞选期间可能出现的情况感兴趣。肯尼迪直截了当地问杜勒斯：“我们在导弹竞赛中的地位如何？”杜勒斯说：“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最有资格的是国防部。”这很难说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从而使肯尼迪可以放手谈论“导弹差距”，继续对共和党和艾森豪威尔政府进行攻击。

竞选结果，共和党失败，民主党获胜。肯尼迪当选新任总统。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最后十个星期，是停顿不前的时期，因为艾森豪威尔的职责是看守，

他不再采取任何新的主动行动。他在准备搬出白宫了。1960年圣诞节后的那天，艾森豪威尔写信给他的一帮人和其他几个亲密的朋友，信的内容是相同的。他开头写道：“在我整个一生中，直到我从第二次大战作为一名‘重要人物’归国为止，我的同代人都叫我‘艾克’。”他继续写道，“现在我要求，作为我的权利，你们从1961年1月21日起，用我的外号称呼我。我不再想被剥夺我的其他朋友们所享有的特权。”

当然，没有哪一位前任总统只会成为一名普通公民。艾森豪威尔已经收到雪片般的邀请，向这个俱乐部或那一个慈善机构，向这个团体或那所大学发表演讲，提出的酬金是1000美元或者更多。美国的一些出版商们，考虑到艾森豪威尔继续享有盛名，考虑到他刚刚领导度过的“动乱年代”，考虑到《远征欧陆》一书所获得的巨大成功，都想出版他的白宫回忆录。艾森豪威尔决定交给“双日出版社”，主要是因为他和该社社长格·布莱克的情谊。他没有与出版社签订合同，但是与布莱克达成一项非正式的安排，相信布莱克会公平地，甚至大方地对待他。没有像《远征欧陆》一书那样的一揽子交易，这次艾森豪威尔可以经常地收取版税。

另外，1月间，根据国会的特别法案，艾森豪威尔重新获得他在1952年辞去的五星上将军衔。作为一位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每年能得2.5万美元退休金，加上5万美元办公费，这比他作为五星上将的收入高得多。特别法案使他得到两方面的最大好处——他重新得到军衔，国会规定他应当得到总统的全部退休金和津贴。还有，他保留德赖中士和莫内中士，以及舒尔茨上校作为他的助手，他们的报酬从5万美元的办公费中扣除。

1961年1月17日晚上8时30分，艾森豪威尔前往电台和电视台发表他的告别演说。他的主题是冷战。他谈到战争与和平，谈到“警察国家和自由”。他宣称：“我们面临着全球范围的无神论性质的、目的冷酷无情和手段阴险的敌对意识形态。”他说它造成的危险是“无穷的”。这意味着很多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许多呼吁，通过花费不断增加的大量金钱来寻找一个“神奇的解决办法”。艾森豪威尔说，一切这类建议都“必须根据……在所付出的代价与希望得到的好处之间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来衡量”。

艾森豪威尔最后表示歉意他说：“裁军……仍然是迫切需要的……由于这一需要是这样尖锐和明显，我承认我是以一种肯定的失望感觉，卸下我在这方面的职责。作为一个目睹战争恐怖和连绵不断的哀伤的人——作为一个懂得另一场战争会彻底摧毁数千年来如此缓慢和艰难地建立起来的文明的人——我希望今晚我可以这样说，持久的和平已经在望。”他结束他的演说时祈求，“各国人民将得以在相互尊重和友爱的约束力量所保证的和平中，一起生活。”

新总统就职的日子来临了。艾森豪威尔不可避免地要离开白宫了。1月20日前几天，亨利·里斯顿来到椭圆形办公室，递交国家目标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这是艾森豪威尔在一年前指定要的。如今，这份报告已经过时，任何人对它都不感兴趣，但是必须收下来，拍张照片。在进行这些工作时，艾森豪威尔听到宾夕法尼亚大街对面铁锤的敲打声，在那里正在修建一个总统正式就职的检阅台。艾森豪威尔说：“你看，亨利，就像在死牢中看着他们支起绞刑架。”

1月20日早晨，天下起大雪，总统的就职典礼就在这一天举行了。艾森豪威尔在上午的大部分时间里，靠着空空的保险柜，与安·怀特曼回忆往事。

仆人们排成一行，艾森豪威尔和玛咪从他们面前走过，向他们一一告别。许多人的脸上挂着泪水，肯尼迪一家，约翰逊一家，和民主党一小批陪同人员来作简短的拜会。中午时分，在大法官厄尔·沃伦的面前。迄当时为止，担任总统的年龄最大的人，让位给当选的最年轻的人。仪式举行过后，当人们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肯尼迪夫妇身上时，艾森豪威尔夫妇通过边门悄悄地退下。然后，动身赴葛底斯堡，沿着他们非常熟悉的道路回家，回到农场去。

经历了战争的年代，经过在华盛顿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当校长，在巴黎任盟军最高统帅和担任了八年总统之后，艾森豪威尔想象着他的退休生活。他曾有过各种各样的想法：在得克萨斯购买一个牧场，在威斯康星置一座避暑庄园，游山玩水，与玛咪谈古论今，在小溪边垂钓……他坚持认为，在为国效劳 50 年后，他已心力交瘁，得休息休息。不再参加会议，不再作演讲报告，不再参与国家紧急问题的处理，可以在青山绿水间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艾森豪威尔的弗农山就是他在葛底斯堡的农场。他和玛咪都很喜欢那座农场，除了冬季外，该处气候温和宜人，位置也很理想。他们住在乡间，但离华盛顿和纽约都很近，可以不时上那儿去玩，朋友们周末来访也很方便。农场位于古战场的边缘，增强了使人成为美国历史延续的一部分感觉，还使艾森豪威尔得以对葛底斯堡战役当时“如果变更打法的结局”，作无休止的遐想。

农场占地 246 英亩。此外，艾森豪威尔还租了 305 英亩。他买下了部分的土地，因为他喜欢在他的祖先们在 18 世纪安家落户的地方居住，因为他很高兴有机会使那里的土地恢复昔日的富饶肥沃，他轮种庄稼和牧草，主要种植玉米、燕麦、大豆和高粱。他利用这些草料在冬季饲养百把头良种安古斯牛，这是他主要的现金收入。他还养马，供孙儿们驰骋，养狗给他们逗乐，还饲养了 14 头荷尔斯泰因乳牛来喂他的安古斯牛犊。宅第从外表看来是移民时代的式样，但内部设备却完全是现代化的。玻璃走廊是阅读和作画的最佳场所。在整个总统任期内，艾森豪威尔很少白天见到玛咪；在葛底斯堡，艾森豪威尔长时间地陪伴玛咪待在向阳的走廊里俯视绿油油的田野。

经过半年的“心情平静”之后，艾森豪威尔就在他的儿子约翰、双日出版社高级编辑塞缪尔·S·沃恩的帮助下，开始撰写《白宫岁月》的回忆录。尽管有人帮助，写一部总统回忆录要比写《远征欧陆》困难得多。《远征欧陆》写的是取得胜利的、结局美满的故事；但是，白宫回忆录中所写到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结局如何还无人能预料，这就给他的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经过四年的努力，两卷的《白宫岁月》方才完成。第一卷于 1963 年 11 月 9 日出版，副标题为《授权改革》；1965 年出版第二卷，副标题为《开展和平运动》。著名政治评论家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赞扬的评论。双日出版社第一版印了 125000 册，开始销路很好。但在《授权改革》出版两个星期后，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这一事件压倒了公众对艾氏政绩的兴趣，《授权改革》销路下降。《开展和平运动》则从未达到《远征欧陆》的销售额。继《白宫岁月》之后，艾森豪威尔又撰写了自传体的《悠闲的话：对朋友们谈家常》，这部书发行量较大。《纽约时报》评论说：“《悠闲的话》叹为观止地把我们这个时代里最持久、最受人欢迎的英雄之一的形象写得富有血肉，栩栩如生。”

随着年岁的增长，艾森豪威尔的身体越来越不济了。在他 70 岁生日那

天，最近被提升为陆军参谋长的威斯特摩兰前来探望。艾森豪威尔祝贺威斯特摩兰的擢升，并敦促他要照顾好陆军。当天下午，陆军军乐队在艾森豪威尔的房间外面，为他演奏了一首小夜曲。艾森豪威尔坐着轮椅到窗边，以微笑和挥动一面小小的五星旗表示答谢。很明显，他的身体极度虚弱，每个人见了都热泪盈眶。然而，他很平静，也很愉快。他对儿子约翰说，他放心了，因为议会已经通过了为前总统遗孀提供终生特工服务的法律。“今年八月，”他说，“在我可能去见上帝时，我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玛咪，至少这项法律使我在这方面放心了。”

当死亡日益临近时，他越来越想着家里人。1968年的感恩节，玛咪作了安排，要家里每个人和他一起共进火鸡宴。他的儿媳妇看他的样子感到凶多吉少。“艾克盖着陆军军用单被，形容枯槁。死灰般的脸上，蓝色的眼睛使人吃惊。”

1969年3月24日，艾森豪威尔心脏病严重发作。他心脏在衰竭下去。医生开始为他的鼻孔插管输送氧气。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行将结束。他嘱咐约翰“要好好照料妈妈”。到了3月28日，病情进一步恶化，但艾克仍在拼命挣扎，他叫喊着：“把百页窗给拉上！”光线刺激他的眼睛。百页窗拉上了，房内几乎是一片黑暗。艾森豪威尔注视着玛咪，紧紧握着她的手，轻轻地说：“亲爱的，我们要分手了，上帝召我去了。”说罢他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

艾森豪威尔的生命虽然结束了，但是他的名字却与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击溃德国法西斯相联系着。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艾克作为盟军欧洲远征军总司令，对赢得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此他的名字受到了世界人民的广泛颂扬，战后，1953—1961年间，作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名字，又同“战争边缘政策”和“冷战政策”联系在一起。许多事实说明，艾森豪威尔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政策的“忠贞不渝”的维护者。对于他的功过是非，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自有看法。然而，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员名将，人民始终怀念他！

艾森豪威尔年表

1890年10月14日 戴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诞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丹尼森，在堪萨斯州的阿比伦长大。

1900年7月4日 在阿比伦小学读书。

1904年夏—1909年5月 在阿比伦中学读书。

1911年6月14日 去西点军校学习。

1915年6月 在西点军校毕业。

1915年9月中旬 被派往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的林斯敦萨姆堡军营服役，一年后被派往新成立的陆军第57步兵团任军需官。

1916年7月1日 在丹佛市与玛丽·吉尼瓦·杜德（玛咪）结婚。

1917年9月24日 长子杜德·德怀特（艾基）诞生。

1917年12月 调堪萨斯的利文沃思堡训练暂编少尉军官。

1918年2月 参加第65工兵大队，这支部队是第301坦克营的前身。内定将于春季开赴欧洲战场。

1918年10月14日 擢升为暂编中校（临时任命）。

1918年11月11日 德国战败，在贡比涅签署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1919年秋 同巴顿协助筹建步兵坦克学校，他们在那里既是学生也是教官。两人还分别指挥一个坦克营。艾森豪威尔和巴顿立即成为“莫逆之交”。

1920年1月1日 美国军人大量复员，现役军队只有13万人。

1920年7月30日 艾森豪威尔恢复正式军阶上尉，三天后擢升为少校。他以后保持这个军衔达16年之久。

1921年1月2日 长子艾基死于猩红热。

1922年1月 前往巴拿马美驻军第二十旅任主任参谋。

1923年8月3日 次子约翰·艾森豪威尔诞生。

1925年8月 到利文沃思参谋学院学习。

1928年1月 去麦克奈尔堡陆军大学进修深造。

1929年11月—1933年1月 任美国陆军部副部长办公室助理。主要任务是负责制订下一场战争中美国工业人员的动员计划，还负责其他专题研究工作。

1933年2月—1935年9月30日 在参谋长麦克阿瑟办公室任助理。经常为麦克阿瑟起草演讲稿和信件。到国会游说，并帮助准备参谋长的年度报告。

1935年10月—1939年末 随麦克阿瑟前往菲律宾，为美驻菲军事顾问团助理。

1939年9月1日 希特勒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爆发。

1939年12月13日 艾森豪威尔由菲律宾回美国。临行前受到麦克阿瑟和菲总统奎松的表彰。赞扬他是有“非凡的才能，广博的知识，以及具有吸引力的领导”。

1939年—1942年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美国军队由19万扩充到500多万。

1940年7月11日 任第三师第十五步兵团副团长。

1941年3月11日 艾森豪威尔晋升为上校。

1941年6月11日 马歇尔参谋长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第三集团军参谋长。

1941年12月7日 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1941年12月8日 美英对日宣战。

1941年12月14日 调总参谋部工作，前任作战处远东科科长，后任作战处处长。

1942年3月10日 艾森豪威尔的父亲戴维·艾森豪威尔 逝世。

1942年3月9日 总参谋部作战处和计划处合并为作战处，艾森豪威尔任处长，权限扩大，升为少将。作战处有107名军官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

1942年5月23日 艾森豪威尔去英国考察。6月3日返回华盛顿。6月8日将考察后草拟的“对欧洲战区司令的指示”草稿呈交总参谋长马歇尔。

1942年6月11日 被任命为美国驻欧洲战区司令，并于6月24日抵达伦敦。

1942年7月 艾森豪威尔晋升为中将。

1942年7月25日 盟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讨论在北非的“火炬”行动。8月14日，盟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布命令，任命艾森豪威尔为盟军总司令，实施“火炬”计划。

1942年11月8日 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的美英远征军，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海滩登陆。参加“火炬”作战的美国军队共有13个师，650艘军舰和运输船，首批登陆兵力11万人，使用飞机1700架。

1943年1月20日 艾森豪威尔升为上将。

1943年1月14—24日 罗斯福、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晤，商谈联合作战和日后德意无条件投降等问题。

1943年3月20日—5月13日 盟军在突尼斯对德意法西斯军队展开进攻。5月7日分别攻占突尼斯城和比塞大港。25万德军于5月13日宣告投降。至此，盟军已在北非全部肃清德意军队。

1943年7月10日—8月17日 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参加这一战役的盟军总兵力达47万多人。此外，还有作战飞机4000余架，各种战斗舰艇和辅助船只共约3200艘。经过38天的战斗，共歼德意军167000人，其中德军37000人，缴获飞机1000多架。

1943年7月24日 墨索里尼在法西斯大委员会遭到不信任表决。第二天，7月25日，墨索里尼政权垮台，这位法西斯头子被意大利国王解除一切职务，并投入监狱。巴多格利奥奉命组织新政府。

1943年9月3日 意大利政府签订停战协定。9月8日巴多格利奥政府向盟军无条件投降。

1943年12月7日 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指挥“霸王”行动的盟军远征军最高统帅。

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 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在德黑兰举行英美苏三巨头会议，发表《德黑兰宣言》。

1944年6月6日—7月18日 英美在法国北部实施诺曼底登陆战役，开辟第二战场。

1944年7月23日 美军在诺曼底登陆总数已达77万人。第一集团军伤亡73000人。英国和加拿大登防部队总数达50.1万人，伤亡49000人，大

量可以立即调用的美国后备部队，在英国待命。

1944年7月21日 艾森豪威尔飞往诺曼底，亲自视察“眼镜蛇”战役的准备工作。7月25日早晨，“眼镜蛇”战役揭开序幕。2500架轰炸机向德军阵地投下4000多吨炸弹。

1944年8月1日 新组建的巴顿将军的第三集团军横扫布列塔尼。

1944年8月7日 艾森豪威尔在诺曼底设立了前进指挥所。

1944年9月2日 艾森豪威尔座机被迫降落，膝盖扭伤。

1944年9月20日 艾森豪威尔晋升为五星上将。

1944年12月15日 希特勒拼凑了28个师，2000多辆坦克和重炮，3000架战斗机，在阿登地区开始反扑。

1945年2月4—11日 英美苏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签订《雅尔塔协定》。

1945年3月23日 美英军向鲁尔地区发起进攻。4月18日，31.7万名德军向盟军投降，是这次战争中最大的一次集体投降。

1945年4月11日 美军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 马格德堡抵达易北河畔。

1945年4月12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由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

1945年4月25日 美苏军队在德累斯顿西北的托尔高会师。

1945年4月25日—6月21日 51 国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签署了联合国宪章。

1945年4月28日 墨索里尼被处死。

1945年4月30日 希特勒和他的妻子爱娃·勃劳恩自杀身亡，尸体在总理府花园火化。

1945年4月30日 苏军在柏林攻占国会大厦，并在它上面升起红旗。

1945年5月2日 苏军攻克柏林。

1945年5月8日 德国凯特尔元帅代表德国最高统帅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正式签字。欧洲战争从此结束。

1945年6月12日 伦敦举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会。艾森豪威尔应邀参加并发表讲话。

1945年6月18日 艾森豪威尔抵达华盛顿，向国会发表讲话。

1945年11月20日 杜鲁门总统接受马歇尔参谋长的辞呈，任命艾森豪威尔接替参谋长一职。12月3日，艾森豪威尔走马上任。

1948年2月7日 艾森豪威尔辞去总参谋长职务，布雷德利继任此职。

1948年6月1日 艾森豪威尔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全家搬进晨边山庄大道上的校长宿舍。

1948年12月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远征欧陆》一书出版。

1949年春天 应杜鲁门总统的要求，担任非正式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派兵进行武装干涉。

1950年10月25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的率领下，渡过了鸭绿江，参加朝鲜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同年12月，美军被赶回三八线。接着李奇微取代了被解职的麦克阿瑟。

1951年1月1日 艾森豪威尔前往巴黎，担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

1952年5月27日 法、意、比、荷、卢和西德外长签订了欧洲防务共同体条约。

1952年6月1日 艾森豪威尔从北约回到美国，参加总统竞选。

1952年9月2日 艾森豪威尔去南方开始他的竞选活动，访问了除密西西比以外的各州。在八个星期的竞选活动中，他行程 51376 英里，走遍 45 个州，在许多小市镇和城市发表了 232 次演说。

1952年11月4日 艾森豪威尔在大选中获胜。

1952年11月19日 为了解朝鲜战争情况，艾森豪威尔飞抵南朝鲜。

1953年1月20日 正式就任美国第 34 届总统。

1953年7月26日 朝鲜战场双方签订停战协定。

1953年8月22日 美国在伊朗策动武装政变，逮捕总理摩萨台。为此，9月23日，艾森豪威尔在一次秘密会上授予特工人员金·罗斯福一枚“国家安全奖章”。

1953年12月8日 在联合国大会发表“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演说。

1954年7月21日 签订有关越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

1954年9月8日 美国组织反共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国为美、英、法、澳、新、泰、菲、巴等国。

1954年12月2日 美蒋签订《共同防御条约》。

1955年1月24日 艾森豪威尔向国会提出咨文。要求国会通过决议“明确地和公开地授予总统，作为总司令，在他认为必要时迅速和有效地为前述目的而使用本国武装力量的权力。”

1955年4月16 美国参议院批准了重新武装西德的协定。这样，艾森豪威尔把西德牢固地与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连结在一起。

1955年4月17—24日 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有 29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4月24日发表会议联合公报。

1955年7月15—23日 艾森豪威尔前赴日内瓦，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军备竞赛继续升级。

1956年11月6日 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得以连任。

1957年9月 美国小石城黑人为反对种族歧视展开斗争，后遭到军警残酷镇压，酿成震惊世界的小石城事件。

1957年10月4日 苏联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空间轨道。这一重大成就对艾森豪威尔和他的政府来说，“完全出乎意料”。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三天后，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结束了“铅锤”计划的一系列试验。一共爆破了 24 枚核炸弹，其中包括一次地下核试验。1957 年苏联试验了 15 枚，美国 4 枚。美国在核武器方面仍居领先地位。

1958年3月31日 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单方面停止进一步核试验。全世界积极响应，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愤怒。

1958年1月31日—5月 美国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轨道，但这颗卫星几乎和“先锋”一样令人难堪，因为这颗命名为“探险者一号”的卫星，重量只有 31 磅。在 3 月份，海军终于使“先锋”号火箭可以发射，但是送入轨道的卫星仅重 3 磅。当苏联在 5 月将重达 3000 磅的“人造卫星 号”送上太空时，更使美国感到震惊。

1958年11月4日 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到重大失败。在新的国会中，民主党在两院几乎都以二比一的优势超过共和党。民主党有 35 名州长，

而共和党只有 14 名。

1959 年 5 月 24 日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逝世。艾森豪威尔痛感悲伤。

1959 年 9 月 赫鲁晓夫访美，同艾森豪威尔会谈。

1961 年 1 月 19 日 艾森豪威尔邀请新当选总统肯尼迪前往白宫，听取最后一次情况介绍。

1961 年 1 月末 艾森豪威尔离开白宫，回到他的葛底斯堡农场度晚年。他在这里读书、绘画、撰写回忆录。离开白宫前，他极力主张必须保持军事力量，但是，他又告诫道：“大量的和长期不断的军费开支，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产生潜在的危险。”

1963 年 11 月 9 日 艾森豪威尔的《白宫岁月》第一卷《授权改革》出版。1965 年出版第二卷，题为《开展和平运动》。以后，他还写了一部自传体的《悠闲的话》，比《白宫岁月》发行量还大。

1963 年 11 月 23 日 肯尼迪总统被刺身亡。按宪法规定由副总统约翰逊接任。这使美国对越战争态度发生急剧变化。

1964 年 8 月 大量美国军人开始派往越南。1965 年 2 月，美空军开始轰炸北越。同年 3 月，美海军陆战队的地面作战部队登陆。年底，南越已有 15 万美军。到 1969 年，美军人数已增加到 150 万人。

1965 年 1 月 24 日 温斯顿·丘吉尔逝世，终年 90 岁。

1969 年 3 月 28 日 艾森豪威尔因心脏病发作与世长辞，终年 79 岁。

